

# 热浪

芝加哥灾难的社会剖析

〔美〕埃里克·克里纳伯格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 热浪

## 芝加哥灾难的社会剖析

[美] 埃里克·克里纳伯格 著

徐家良、孙龙、王彦玮 译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热浪:芝加哥灾难的社会剖析/(美)克里纳伯格  
著;徐家良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ISBN 978-7-100-09185-5

I. ①热… II. ①克… ②徐… III. ①社会问题—研究—美国 IV. ①D771.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552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热 浪

芝加哥灾难的社会剖析

〔美〕埃里克·克里纳伯格 著

徐家良、孙龙、王彦玮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185-5

---

2014年1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2¼

定价: 48.00 元

Eric Klinenberg

**HEAT WAVE**

**A Social Autopsy of Disaster in Chicago**

© 2002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 S. A.

根据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译出

## 中文版序

1995年7月,不同寻常的酷热和潮湿笼罩了美国中西部地区,芝加哥的气温超过100华氏度,打破了这个城市历史上的最高纪录。虽然极端天气只持续了几天,但对人的影响却是毁灭性的:中暑所引发的各种疾病使数以千计的人生病住院,其中739人非正常死亡。

按照国际标准,这是一个相对较小的灾害。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的灾难有:2004年的海啸(约22万人)、2005年的克什米尔地震(8万人)和2003年的欧洲热浪(3.5万人)。这次热浪的灾难,特别是与进入21世纪的“9·11事件”和卡特里娜飓风相比较,在美国排名甚至是很低的。事实上,很少有美国人记得,1995年7月有这么一个大灾难,这意味着它可能不被看作是一个事件,那为什么芝加哥热浪值得社会学的关注呢?

原因之一,热浪之所以作为社会学分析的对象而引人注目,在于这一事件有许多困惑难解的地方,研究人员在解释这一事件的过程和原因上遇到了麻烦。例如,用气候模型预测的中暑死亡率,大大低于实际死亡率,气象学家和卫生学者不得不承认,仅仅用天气热这一因素很难解释这一灾难,而这并不是唯一的困惑。大多数热浪的死难者是老人,最危险的是高龄独居者,但是,老年学家和流行病学家也百思不得其解,同样是独居,妇女的死亡率为什么低于男性?这些现象说明热浪期间有多重的因素在起作用。研究城市邻里关系的学者发现,另一个神秘的事是灾害损失:为什么一些贫困地区的死亡情况比其他类似的贫困地区要好一些?不同社区的死亡率有什么样的巨大差异?

社会学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来解决这些问题和其他难题,如

热浪这种现象出现在城市的不同地区,这种社会学取向的方法,我称之为“社会剖析”。正如伟大的科学家鲁道夫·魏尔啸所讨论的,通过剖析,不仅可以解释死亡的原因,而且还可以起到保护生命的目的。同样是这个社会剖析,尽管它剖析的对象是政治机体,该机体的失灵状况反映的却是社会的问题和体制的问题,其目的是要探讨严重危机的脆弱性与“危机处理迟缓”之间的关系,这种情况体现在美国各大城市的日常生活中。

撰写《热浪》一书的动机,是有理论预设为前提的,通过对灾难的完整的个案研究,我们能够审视社会环境,这些社会环境总是存在,但在常态下却很难察觉。社会环境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导致了1995年7月的灾难,本书认为一系列的棘手问题值得关注,包括社会隔离——名存实亡的城市穷人的邻里关系,在政府管理下城市服务企业化的转型,公共关系治理实践,以及地方新闻报道稿件质量的下降,这些因素无处不继续影响着城市,与天气状况无关。

社会剖析是不容易进行的。这项研究开始于博士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时,当时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所学校以发展“公共社会学”著称,有较浓厚的学术氛围,许多学者关心公共事务。当然,这里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多学科融合交流的环境,在伯克利,我学到了社会学如何能够通过相关领域的研究获得相应的研究成果,从人类学和流行病学,到政治学和城市地理学。读者可能会注意到,热浪最原初是建立在几个经验研究的基础上的,它们由其他学科的科学家所进行:一项死亡率的“案例控制”研究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非正常的过量死亡”的流行病学研究发表在《美国公共卫生杂志》上;老龄化研究报告刊登在《老年学杂志》上;公共政策分析报告由政府所发布。这些成果不仅带来了更多的社会学学者之间的交流,而且也提供了丰富的实证研究成果。

对热浪这项研究的设计继承了城市研究的传统,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理论的创造性和批判性风格有机结合,塑造了伯克利的社会学。在



实践中,这意味着理论和方法持续地发展,并直接决定着每一步的研究和写作过程。在芝加哥,我的实证经验研究达五年以上,结合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深度访谈、档案研究(到过的每一个地方,包括社区图书馆、县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从独居和没有亲戚朋友的人们中获得相关的材料)、地图制作和统计分析。但是,我也从事了一定的实践活动和思考相关的理论问题,通过理论思考来赋予问题生命力,并组织研究项目,所以这本书将运用比较多的篇幅来描述芝加哥人的生和死,当城市发生危机时,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

这本书最初在2002年出版,今天回过头来思考,我可以看到几个理论问题和经验问题值得更多的关注。关注的主题,正是我书中所关注的话题:特别是在城市,独自居住、独自衰老、独自死去的人数超乎寻常地上升。中国也绝不是不受这些趋势的影响。正如人类学家 Hong Zhang\* 的研究表明,近几年随着城市和农村的社会变迁,在中国许多地方,年迈的父母和他们的家人空间分离,生活在不同的地区。一方面,经济发展带来了独居现象,正如张虹报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包括年轻人和老年人,都喜欢独自生活,不像以前为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履行义务和责任。但另一方面,这已被证明,在所有灾难中,从飓风、热浪到地震、水灾,甚至是所有的日常生活中,最危险的就是老龄独居,这个结果来自于社会隔离。

也许,还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热浪》这本书的研究,忽视了全球气候变暖和城市灾害的关系。当然,我们绝不能把气候变化归咎于任何单一的环境事件,但是在今天,毫无疑问,全球变暖导致了更多的极端天气,包括天气越来越热、时间更持久的热浪。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气候变化的社会后果,以及城市管理如何准备迎接未来恶劣天气所带来的灾难。一些城市规划、邻里社区,以及各种形式的社区组织如何

---

\* 张虹,音译,美国缅因州科尔比学院(Colby College)人类学系副教授。——译者

更有效地减缓城市环境中越来越多的危险？是否有一些地方的市民已经对这些变化有一些创造性的适应，寻找相互保护的途径，同时，也保护环境呢？

对城市而言，比较重要的是，制定和执行一些项目，如 1995 年以来，芝加哥一直在使用紧急状态的“炎热应急计划”。但是，在每天气候都变得越来越不正常的情况下，更紧迫的挑战是制订一项计划，寻找处理气候紧急状况的方案。因为，这一危机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从美国到中国。年轻一代的学生和学者已经认识到，这是社会学家过去好长时间把环境问题放到学科研究中心的原因。我希望《热浪》的中文版将为这一重要的课题做出微薄的贡献。

埃里克·克里纳伯格

2009 年 5 月 30 日于纽约大学

献给我的父母亲，罗娜·塔尔科特(Rona Talcott)和爱德华·克里纳伯格(Edward Klinenberg)。

同时献给赫伯特·J. 戴维斯(Herbert J. Davis)，其敏锐的思维和慷慨的情怀，总是给人带来灵感。

# 目 录

致谢	1
序言 地狱之城	7
导论 极端的城市	21
社会剖析	22
城市的社会流行病学	28
典型性与极端性	30
本书概述	39
第一章 独自死亡:孤独的社会生产	43
独自生活	49
孤独的社会生产	53
独自变老	55
“我差点就死了”	57
暴力和孤独	61
恐惧文化	62
最坏的组合	67
一居公寓危机	71
警戒信号	77
孤独的性别差异	80
第二章 种族、空间与脆弱性:都市邻里和支持生态	85
配对	92
贫困的社会环境差异	96
一个被遗弃的社区	98



## 2 热浪 芝加哥灾难的社会剖析

转折点	100
日常生活的暴力	104
“这里所有人都得谨慎”	108
邻里瓦解中的社会纽带	110
教堂和街区俱乐部	112
南朗代尔:成长中的小村	116
“这里的街道总是人山人海”	124
集中化的教会组织	129
第三章 灾难中的政府:赋权时代的城市服务	136
灾难中的政府	146
面对热浪:责任政治	151
组织性的匹配错误:社会保护与社区警察	154
有害的忽视:容忍剥夺的政治意愿	160
赋权时代为服务买单	164
日常能源危机	166
福利国家和极端事件	170
第四章 公共关系治理	172
否认、推卸和辩护	176
摆脱危机	187
第五章 引人注目的城市:灾难中的新闻机构和发言人	194
新闻和灾难	198
新闻是什么	199
发现灾难	204
谁的新闻?官方来源和记者报道惯例	211
不同的声音和有异议的地方	215
指派故事	217
快速思考	221
头条和可视图像	224

事件、图像和新闻地点 .....	229
读者的碎片化及目标新闻 .....	230
灾难事件的新闻价值:新闻事件的发生与终止 .....	232
结论 城市环境中的新危险 .....	237
灾难公式:城市极端条件日常化的典型危险 .....	241
社会解剖分析 .....	246
后记 永远在一起 .....	248
注释 .....	255
参考书目 .....	294
索引 .....	322
译者后记 .....	335

# 图 表 目 录

## 图 片

1. 城市工人用水管浇桥降温 .....	8
2. 成千上万的人蜂拥到北大街沙滩 .....	8
3. 应急公共卫生 .....	9
4. 孩子接受紧急救护 .....	10
5. 变电站的工作人员在变电器上浇水 .....	11
6. “水战” .....	11
7. 1995 年 7 月,最大热浪指数和过量死亡 .....	13
8. 报纸头版头条追踪死亡总数 .....	13
9. 库克县法医局的冷藏货车 .....	15
10. 美国 1960—1995 年的灾难死亡率 .....	24
11. 年龄调整后每 10 万居民的中暑死亡率 .....	27
12. 太平间外一个疲倦的工人 .....	32
13. 首席法医鉴定人埃德蒙·多诺霍 .....	33
14. 该指责谁? .....	38
15. 一位死者的警方报告 .....	48
16. 美国和芝加哥独居家庭的比例 .....	50
17. 美国和芝加哥 65 岁以上独居老人的比例 .....	50
18. 热浪中散步的老人 .....	52
19. 待在家中的老人 .....	53
20. 1964 年热浪期间睡在户外 .....	63

21. 警察搬运罹难者尸体 .....	68
22. 1988—1994 年老年人居住地一类犯罪率 .....	69
23. 芝加哥中暑死亡率最高区域和独自居住的老人比例最高 区域分布 .....	88
24. 芝加哥中暑死亡率最高和暴力犯罪比率最高区域分布 .....	89
25. 芝加哥中暑死亡率最高和贫困线之下人口比例最高的区域 分布 .....	90
26. 北朗代尔最初的西尔斯塔的开阔空地 .....	101
27. 北朗代尔一个居民区内空旷的场地 .....	102
28. 曾经繁华的北朗代尔的一块空地 .....	103
29. 北朗代尔的奥格登大道 .....	103
30. 1995 年 7 月 12—19 日,已经报告的第 10 和第 11 警区每 10 万居民的犯罪率 .....	106
31. 小村的第 26 街 .....	118
32. “这里的街道总是人山人海” .....	119
33. 街道的商贩和顾客 .....	120
34. 小村大热天,一个家庭在院子里乘凉 .....	121
35. 医务人员救助同事 .....	139
36. 太平间存放尸体的冷藏卡车 .....	155
37. 将罹难者的尸体运送到法医局 .....	156
38. 无水水管前的一位妇女 .....	169
39. 杂货店里变质的食物 .....	177
40. 新闻发布会上的戴利市长和其他官员 .....	178
41. 委员会极端气候报告的封面 .....	186
42. 一个酷热夜晚的约翰·加西亚记者 .....	195
43. 在打开的水龙头前玩耍的青年人 .....	196
44. 眺望城市 .....	197
45. 警察搬运尸体的新闻画面 .....	226



46. 库克县太平间外的摄影师 .....	227
47. 永远在一起 .....	249

**表格**

1. 芝加哥不同年龄和种族/族群中暑死亡总数 .....	26
2. 1995 年 7 月在芝加哥特定年龄和年龄调整后的不同种族/ 族群每 10 万人中暑死亡率 .....	26
3. 芝加哥中暑死亡率最高的社区 .....	91
4. 北朗代尔和南朗代尔的不同特点 .....	93
5. 1994—1995 年,第 10 和第 11 警区总体暴力犯罪率报告 .....	94
6. 1950—1990 年,北朗代尔地区的人口 .....	99
7. 1950—1990 年,南朗代尔地区(小村)的人口 .....	122
8. 芝加哥中暑死亡率最低的社区 .....	134
9. 20 世纪 90 年代芝加哥城市管理机构的全职人员 .....	157
10. 政府对热浪的反应 .....	189
11. 对热浪事件的内容分析:《芝加哥论坛报》 .....	202
12. 对热浪事件的内容分析:《芝加哥太阳时报》 .....	203

## 致 谢

1995年搬到伯克利的时候,我没有打算研究芝加哥,但是当意识到在写这座城市的时候,我明白了这座我通常视之为故乡的城市也在召唤我。我很幸运,有很多芝加哥人同样对这座城市抱有归属感。归属感是某种不寻常的强烈集体意识的基础,而我想,正是这种状况使在芝加哥开展的社会研究成为一种有意义的体验。我应该感谢对本书的完成做出贡献的很多人,最值得感谢的是那些积极参与了调查的人:老人、街区俱乐部的参加者、社区活动家、官员、城市雇员、医护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和记者,他们对我敞开心扉,与我分享热浪的记忆和在这个城市生活的点点滴滴。 xiii

社会学更适合于解释和理解社会过程和事件,而不是诋毁或赞美特定的个人或组织,所以,虽然在书中出现了大量复杂的个体性和棘手的社会问题,但我所提供的分析中没有出现特别的英雄和恶棍。如果对1995年热浪的社会剖析揭示了芝加哥不为人知的某些阴暗面,这也不是要批评哪个人或哪个组织,只是希望引发人们对于日益增长的孤立、剥夺和脆弱性的关注,这些问题应该得到仔细探究。本书既是一份邀约,让大家一起来思考我们在当前城市中的生活和死亡的方式,也是一项挑战,让我们去想象如何改变将来的城市并如何居住于城市。

如果没有以研究生的身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获得的训练,我就没有可能想到这个项目,更不用说进行独立研究了。我要感谢博士论文指导小组,卢瓦克·华康德(Loïc Wacquant)、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迈克尔·罗金(Michael Rogin)、马 xiv  
丁·桑切斯-扬科威茨(Martin Sanchez-Jankowski)、玛格丽特·韦

尔(Margaret Weir),还有两位读者,克劳德·费希尔(Claude Fischer)和南希·谢佩尔-休斯(Nancy Scheper-Hughes),他们虽然不是正式的指导小组成员,但他们像正式成员一样参与了进来。劳伦斯·科恩(Lawence Cohen)、吉尔·伊亚尔(Gil Eyal)、尼尔·弗里格斯坦(Neal Fligstein)、阿莉·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迈克·胡特(Mike Hout)、汤姆·拉克(Tom Laqueur)、萨姆·卢卡斯(Sam Lucas)为我提供了洞察力和支持。

伯克利的研究生团队营造了一个令人激动的学术氛围。我要特别感谢金伯利·麦凯因·达科斯塔(Kimberly McClain DaCosta)、丹尼尔·多翰(Daniel Dohan)、罗德尼·本森(Rodney Benson)、杰夫·朱里斯(Jeff Juris)、夏·拉维(Shai Lavi)、安德鲁·佩林(Andrew Perrin)、奥内西莫·桑多瓦尔(Onesime Sandoval)、杰茜卡·休厄尔(Jessica Sewell)和马特·雷(Matt Wray),他们知道如何将批评、同情和友谊结合起来,这使我的论文得以通过,并且在写作的过程中非常愉快。到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之前我就认识的同事,特别是芭芭拉·爱泼斯坦(Barbara Epstein)、萨姆·卡普兰(Sam Kaplan)、戴维·刘易斯(David Lewis)、路易斯·耶杰尔斯基(Louise Jezierski),提供了有益的建议和真挚的友谊。SAGS的成员们促使我在其他人休息的时候仍继续忙碌,使我的微小进步看似大的飞跃。

数个机构为我提供了资源、时间和空间,以及关键性的关照,才使这项研究成为可能。这个项目早期的研究和写作得到了雅各布·贾维茨(Jacob Javits)研究生奖学金项目、国家科学基金的资助,以及伯克利人文学部和优等生学会(Phi Beta Kappa)的小额资助。开放社会研究所的个人项目为我提供了继续开展研究和修改本书的费用。我十分感激开放社会研究所的管理员盖尔·古德曼(Gail Goodman)、乔安娜·科恩(Joanna Cohen)、加拉·拉玛舒(Gara LaMarche)、琼·莫特(JoAnn Mort)和帕梅拉·索恩(Pamela Sohn)的支持,以及开放社会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杰米·卡尔文(Jamie Kalven)、伊亚尔·普雷斯

(Eyal Press)、乔纳森·肖尔(Jonathan Schorr)和伊莱恩·西奥利诺(Elaine Sciolino),他们让我参加了一些非学术的社会活动。

我在芝加哥做田野调查的时候,爱德华·劳勒(Edward Lawlor)邀请我在芝加哥大学卫生管理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介绍我进入有关健康和老龄化的当地组织网络。我在巴黎欧洲社会学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European Sociology of the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工作了六个月,在那里,我通过研讨会与帕特里克·尚帕涅(Patrick Champagne)、莱米·勒奴瓦(Remi Lenoir)、多米尼克·马尔凯蒂(Dominique Marchetti)和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讨论,学到了研究政治、文化和媒体的新方法。我在伯克利的最后一年是在城市民族志中心浓厚的学术氛围下工作的。在学术活动中,我得到了不少学界同仁非常好的反馈,包括加利福尼亚大学、<sup>xv</sup> 洛杉矶大学、芝加哥大学、纽约大学、西北大学和里昂-卢米埃第二大学(University of Lyon-LumiereII)社会学系的学术研讨会;1997年美国人类学会会议和1998年美国社会学年会上的发言;1999年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有关医疗、市场和团体的一次系列公共演讲。这些研究机构的影响很明显贯穿于本书的始终。

我在西北大学完成了手稿的最后版本,在那里,社会学系和政策研究所的同事们给我提供了不少新的视角,使我能够突破原初的工作框架。之后2000年我回到芝加哥,亚瑟·斯汀斯比(Arthur Stinchcombe)给我提了非常有价值的建议,即强化理论工具而使全书更加紧凑——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精练就好。杰夫·曼扎(Jeff Manza)实现了他的诺言,通读了我放在他办公室书稿的每一个章节,他使我确信公共社会学仍然前途无量。虽然玛丽·帕蒂略(Mary Pattillo)总是说如果不花费如此长的时间在交流和讨论上,我会早几个月就已经完成了书稿,但是我在交流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使书稿质量提升不少。西北大学的其他同事给我书稿的某些部分提供了有价值的反馈。感谢尼古拉·拜赛尔(Nicola Beisel)、费伊·库克(Fay Cook)、加里·艾伦·法



恩(Gary Alan Fine)、本杰明·弗罗姆(Benjamin Frommer)、珍妮弗·莱特(Jennifer Light)、安·舒拉·奥尔罗夫(Ann Shola Orloff)、伊桑·谢根(Ethan Shagan)和韦斯·斯科甘(Wes Skogan)的许多贡献,也感谢埃伦·贝里(Ellen Berrey)、利兹·拉普(Liz Raap)、斯科特·利昂·华盛顿(Scott Leon Washington)和皮特·奇姆科维奇(Pete Ziemkiewicz)专业的研究帮助。

芝加哥以外的许多朋友和同事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杰克·卡茨(Jack Katz)和理查德·森尼特(Richard Sennett)阅读了整篇书稿,帮助我提炼出多种论点和想法。伊夫林·布罗德金(Evelyn Brod-kin)、乔迪·坎托(Jodi Cantor)、多尔顿·康利(Dalton Conley)、戴维·格拉齐亚(David Grazian)、道格·格思里(Doug Guthrie)和苏蒂尔·韦卡特施(Sudhir Venkatesh)各自对不同章节提出了建议。保罗·迪马乔(Paul Dimaggio)、瑟奇·艾里米(Serge Halimi)和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对我发表在1999年第28期的《理论与社会》、2001年第2期的《民族志》和1997年《世界外交界》(*Le Monde Diplo-matique*)关于热浪的期刊文章提出了尖锐的编辑评论和及时反馈。在我研究初期阶段处于苦闷时,阿兰·萨利尔诺·马森(Alane Salier-no Mason)对这部关于热浪的书稿表示出浓厚的兴趣,这对我继续研究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还要感谢愿意与我分享热浪数据和芝加哥情况的人们,他们帮助我建立了这项研究的经验基础。他们主要包括:史蒂夫·惠特曼(Steve Whitman),芝加哥公共卫生局(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流行病科室前主任,现任芒特西奈(Mount Sinai)医院城市健康研究所主任;埃德蒙·多诺霍(Edmund Donoghue),库克县(Cook County)的首席法医鉴定人(Medical Examiner)。他们两位在解释1995年7月的事件上比其他任何人做的都要多,他们的慷慨帮助使我能够去探讨这次灾难的社会维度。在芝加哥的其他学者和研究机构也提供了帮助。库克县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满足了我对信息的要求,提供了有关

中暑死亡者调查的没有公开的材料。西北大学比勒老龄化中心的西莉亚·伯德斯(Celia Berdes)、马德林·艾利斯(Madelyn Iris)让我很容易地接触到了愿意参加调查研究的独居老人的数据库。罗伯特·桑普森(Robert Sampson)和我分享了来自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人权项目的芝加哥邻里集体效应方面的数据,并且提出了思考社区层面脆弱性的有用建议。简·西门扎(Jan Semenza)提供了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如何开展热浪研究的一些数据。《芝加哥太阳时报》(*Chicago Sun-Times*)的罗恩·斯尔(Ron Theel)、特瑞纳·谢普利(Trina Cieply)帮助我收集了报纸上的一些照片;尼尔·威森博格(Neal Weisenberg)、弗兰·普雷斯顿(Fran Preston)从他们在芝加哥 ABC7 的繁忙工作中抽出时间来从 ABC 的电视新闻中制作静态图片。阿比盖尔·席尔瓦(Abigail Silva)、苏珊娜·拉格斯豪森(Suzanne Lagerhausen)和我一起绘制了热浪死亡率分布图,用我个人难以操作的地理学软件去探讨空间的模式。我感谢他们的帮助。

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一起合作是件开心的事情。道格·米切尔(Doug Mitchell)真是注定要编辑这本书,他的女儿是热浪那一周在芝加哥结婚的。道格从我给他解释这个项目开始就有兴趣,他有关一个社会解剖如何“测量城市温度”的建议总是令人耳目一新。罗伯特·德文斯(Robert Devens)、桑迪·黑兹尔(Sandy Hazel)值得我特别感谢,他们做了很多的文字工作。

最后,我想感谢在这个项目中一直支持我的亲密朋友和家人,丹妮尔·克里纳伯格(Danielle Klinenberg)、爱德华·克里纳伯格(Edward Klinenberg)、罗娜·塔尔科特(Rona Talcott)、赫布·戴维斯(Herb Davis)、安妮·麦丘恩(Anne McCune)、马特·布朗(Matt Brown)、凯特琳娜·克里斯托普洛斯(Katerina Christopolous)、布里克森·戴蒙德(Brickson Diamond)、亚当·格罗斯(Adam Gross)、科林·霍尔(Colin Hall)、吉夫·卡什库里(Giev Kashkooli)、塔马·克尔贝尔(Tamar Kelber)、谢里尔·克尔贝尔(Sheryl Kelber)、罗纳

德·利伯(Ronald Lieber)、芭芭拉·梅辛(Barbara Messing)、梅拉妮·纳特(Melanie Nutter)、马克斯·波普(Marquez Pope)和奥德利·普林斯-帕特(Audrey Prins-Patt),他们真诚地共同努力,直到看着这本书付印。埃丝特·毕晓普(Esther Bishop)、佛罗伦斯·克里纳伯格(Florence Klinenberg)和我已故的祖父母杰尔姆(Jerome)和缪里尔·克里纳伯格(Muriel Klinenberg)、欧文·毕晓普(Irving Bishop)、马丁·塔尔科特(Martin Talcott),给了我鼓励。凯特琳·扎罗姆(Caitlin Zaloom),在和我一起生活的过程中产生了对芝加哥和都市生活快乐和痛苦的第一手感受,她成了我获得勇气、建议、激励和爱的持续源泉。凯特琳从到这个城市以来一直是这个项目的合作者,她对书稿每一页的影响都很明显。在我写这本书期间,我的朋友和家人给我上了一课,我在芝加哥的研究更强化了这种认识:没有什么东西比美好的陪伴更有价值了。

在社会科学家当中,为研究项目的参与者取一个别名是很普遍的;我在确定那些其观点和经历不属于公共记录事项的人名时遵循了这一传统,比如独居的老人、邻里居民、我进行田野调查的宾馆客人和社会工作者。在这本书中提到名字的官员和活动家、记者、科学家、热浪的受害者和卫生官员则不可能掩饰,这既是因为他们在分析中的重要性与他们在热浪期间扮演的角色有关,也是因为他们参与这一事件中已经被记录在案了。

## 序言 地狱之城

1995年7月12日,星期三早晨,《芝加哥太阳时报》报道,一股热浪正在向这座城市袭来。一篇题为“热浪即将到来:它能成为一个杀手”的文章出现在报纸的第3版,而不是在天气信息版上。气象预报员预测在当天下午温度将会上升到华氏95度\*,接下来的两天内将接近华氏100度。在芝加哥,湿度和臭氧水平很高,空气让人感到似乎是身处热带,像在斐济或者关岛。炎热指数,即人们对气温的主观感受,可能高达华氏120度。

星期四,温度达到106度,而炎热指数攀升至126度。砖造的房屋和公寓楼像烤箱一样,室内的温度计在窗户打开的情况下也高达120度。成千上万辆汽车在路上爆胎,很多道路被堵塞。工人们给横跨芝加哥河上的桥浇水防止金属板膨胀(图1)。由于铁轨从路基上脱落,上下班的人群被耽误好长时间。

在报纸和电视上,气象学者提醒芝加哥市民使用空调,每天多喝水,放松心情:“到沙滩、游泳池和有空调的商店里乘凉。放慢节奏……多想点儿开心的事。”遍布全城的电器商店已经卖光了所有的空调和家用水池,“这正是我们要祈祷的天气”,一个地区供应商说。有近10万人蜂拥来到市区的沙滩上乘凉(图2)。其他的一些人坐船去密歇根湖,只有身体虚弱或生病的一些乘客才返回家中。中午,数以百计坐校

---

\* 本书所提到的温度均为华氏温度。华氏温度与我国通用的摄氏温度的换算公式为: $C = (F - 32) \times 5/9$ (其中F代表华氏温度,C代表摄氏温度)。华氏95度等于摄氏35度。——译者

2



图1 工人们正用水管浇着金齐桥降温。资料来源:《芝加哥太阳时报》,约翰·怀特(John White)摄影。《芝加哥太阳时报》授权许可,2002年。



图2 成千上万的人蜂拥到北大街沙滩(the North Avenue Beach)乘凉避暑。资料来源:《芝加哥太阳时报》,安德烈·钟(Andre Chung)摄影。《芝加哥太阳时报》授权许可,2002年。

车的孩子被堵在路上,忍受着酷热的煎熬,大人把孩子们抱出车外,消防队员用水管给孩子们从头浇到脚。护理人员提供紧急帮助(图3、图4)。那些病重者只能被送进医院。



图3 应急公共卫生:在城市公园,消防部门员工正用水管给孩子浇水纳凉。资料来源:ABC7,WLS-TV 友情提供。 3

前所未有的电力消耗导致整个城市经常临时停电。当电灯、空调、收音机、电视都变得不能使用的时候,新闻、天气预报、健康咨询等这些信息也就很难获得。电梯停了,警察和消防队员把住在高楼的老人们从他们闷热的公寓里搬下来。不少家中没有照明用电或家中没有空调的人们开始整理行李,到别处和家人或者朋友住在一起。周五,作为城市基础电力输送单位的联邦爱迪生公司西北总部(Northwest Substation of Commonwealth Edison)所属的三家变电站无法供电,造成4.9万用户停电,其中一些地区持续了两天。

在没有安装空调的社区,年轻人打开消防栓浇湿全身以保持凉爽。一度有超过3000个消防栓同时打开喷发,导致差不多20亿加仑水的

4



图4 虚脱的孩子接受紧急救护。资料来源:ABC7, WLS-TV 友情提供。

消耗,相当于芝加哥夏季平均日用水量的两倍。水压降低了,那些打开了消防栓的地段连续几个小时都没有水;水泵不能工作,导致一些大楼断水好几天。警方宣布,一旦发现有人打开消防栓,就会被逮捕和罚款。市政府动员上百名管理人员去关闭这些在紧急状态下才能使用的消防栓(图6)。在一些地方,人们看到这些管理人员过来就会向他们扔砖块和石头,不让他们靠近。还有一些人向这些卡车开枪,造成四名工人受轻伤。

5 7月14日,星期五,炎热指数已连续三天超过100度,晚上温度也很高。身处持续高温的情况,人体最多只能支撑48小时,因此,不少市民开始出现不同的病症。超过往常很多的人生了病被送往医院:在7月13—19日,救护车急救服务部收到了比平时多出数千的呼叫。有3900名患者找不到可用的救护车;政府不得不派出消防车以应对这些呼叫。尽管芝加哥急救服务那一年的平均回应时间不到7分钟,但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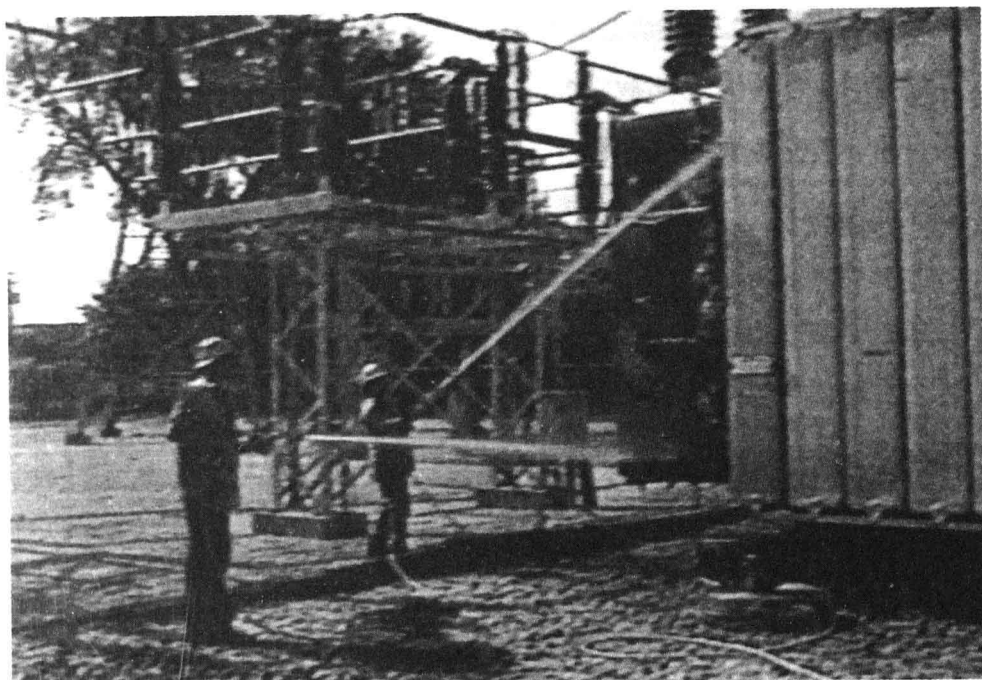


图5 变电站的工作人员正在向变电器上浇水散热。资料来源：ABC7，WLS-TV 友情提供。



图6 “水战”：工人们尝试着关闭在热浪期间被非法打开的3000个消防栓之一。资料来源：ABC7，WLS-TV 友情提供。



- 6 此时医务人员却常常迟到。一些打电话呼叫救护车的市民被告知需要等待救援,因为救护车都被预定出去了。有 55 个紧急呼叫者等待了半个多小时,有些甚至等了两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患者由于等待医疗救助的时间过长而死亡。

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在满足服务需要方面也遇到了不少麻烦。从周三开始一直持续到周末,到急诊室的人和住院病人的数量激增。一些急诊室摆满了病床,工作人员极其忙碌。超过 20 家医院关闭了它们的急救室,拒绝再接受新患者,这些医院大部分分布在城市的南区和东南区。由于没有其他有效途径让市民和医疗人员知道哪所医院的急诊室还在开放,救护车和患者只得自己开车继续寻找。通常情况下,不同的患者会要求不同的紧急治疗方案,但附近的医疗设施无法告诉司机哪里有患者所需要的治疗设备。一些医院报告说,有些患者在寻找到能够救治他们的医院之前,跑了超过 10 英里的路程。救护人员开始焦虑。未被接受的患者将会怎样?他们能到哪里去呢?

许多热浪罹难者没有被发现或是直到医生治疗已经太晚的时候才被送到医院。例如玛格丽特·奥蒂茨,她在自己家里办了一个小型的幼儿园;星期五,她开着福特车带着 10 个小孩儿去有空调的电影院看电影。电影结束后,奥蒂茨将孩子带回幼儿园并送进房间。每个人都玩得筋疲力尽,孩子们很快就睡着了。一个半小时后,奥蒂茨开车去接其他孩子,当她走到车前时,发现有两个小孩儿被忘在了车里。奥蒂茨立即将孩子抱到房间并打了急救电话 911。尽管如此,当医务人员赶到时,两个小男孩儿已经死亡,他们的体温分别是 107 度和 108 度。芝加哥的报纸和有线电视将这两个小男孩儿的死亡事件引人注目地放在关于热浪报道版面的头条。库克县法医鉴定人在第二天早晨为两个孩子验尸,这两个孩子的死因是毋庸置疑的。

时间一天天过去,更多的芝加哥人死于炎热。对比看来,7 月 12 日(星期三)和 7 月 13 日(星期四)分别有 74 人和 82 人死亡,稍微超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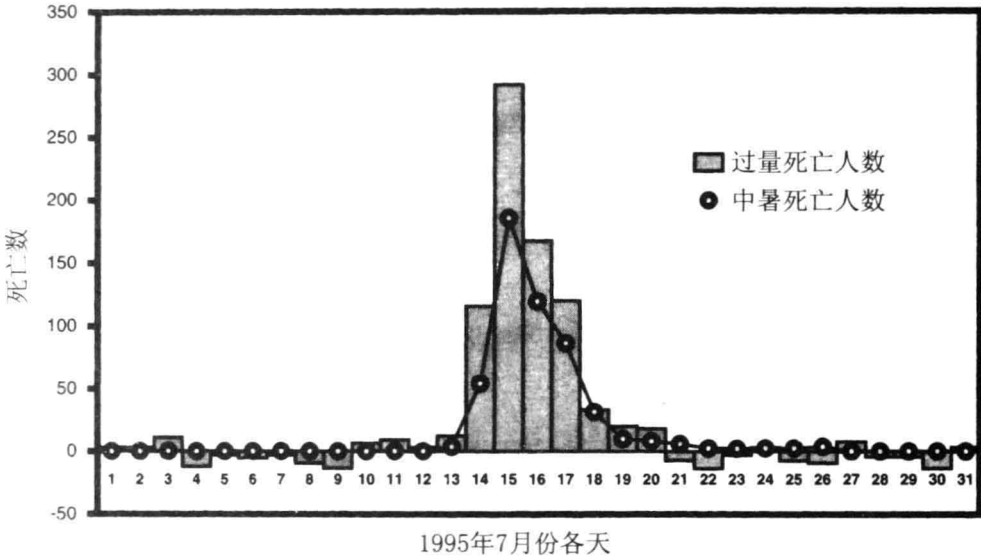


图 7 在芝加哥,过量死亡人数和中暑死亡人数,1995 年 7 月。资料来源:芝加哥市公共卫生局。



图 8 报纸头版头条追踪死亡总数。

72 人的七月份每天平均死亡人数。但是当持续的高温累积起来时，死亡总数大量增加(图 7、图 8)。7 月 14 日，星期五，有 188 名芝加哥市民死亡。星期六，报告的死亡人数是 365 人，是平常死亡人数的 5 倍。星期日有 241 人死亡，星期一和星期二分别死亡 193 人和 106 人。7 月 19 日，星期三，全城的死亡人数降到 92 人，星期四降至 91 人。城市当局已经努力设法应对这场危机，寻找可以安放这些死者的地方。根据应急事务署工作人员的说法，这项任务与连续三天都处理一起致命的喷气式飞机相撞事故差不多。

## 死亡之城

警察将几百具尸体运到库克县法医局检查，这是一座远离县医院和位于车站西边几英里的现代化混凝土大楼。这所凝重的太平间平常每天大约接受 17 具尸体，但是，工作人员通常能够处理的尸体还要多。现在他们每天接受的尸体超过他们能处理的数字，14 名病理学家每天进行着马拉松式的轮班工作，首席法医鉴定人从附近的殡葬学校招募一些牙医和学生来帮助识别和鉴定这些尸体。他还让警察将尸体从停放点运到工作室，并派工人为病理学家们清扫工作的地方，但是只有这些帮助是不够的。随后，库克县感化官员(corrections officials)向人们提出建议，到太平间工作一天时间可以当成见习两天，有一部分人接受了这一提案。尽管如此，仍有排成长队的警察车辆将尸体运到法医局周围，需要等待近三小时才有工作人员接受尸体。“这里简直就像一条装配线”，一个官员这样说。有时，警察是在死者死了几天后才将腐烂的尸体运到太平间的，因为无人注意到他已经失踪了一段时间。不可能知道究竟有多少罹难者仍然在自己家里没被发现。

截至星期六，被送进太平间的尸体数以百计，超过了 222 个床位的容量。送来的尸体横七竖八地散落在地，因为没有亲属在场，很多已经被检验的尸体无人认领。当地的一家肉食公司老板自愿派出他的冷藏

车队到太平间,暂时存放尸体。第一批红黄相间的车队周五到达,每辆车长达 48 英尺,但它们很快就被数十具尸体塞满。周末又调来更多的车辆,最后一共有 9 辆冷藏车。这些车辆停靠在太平间外的广场上,周围停满了警车、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新闻车、灵车和私家车。这样的场面出现在电视屏幕和报纸上,传遍了整个世界(图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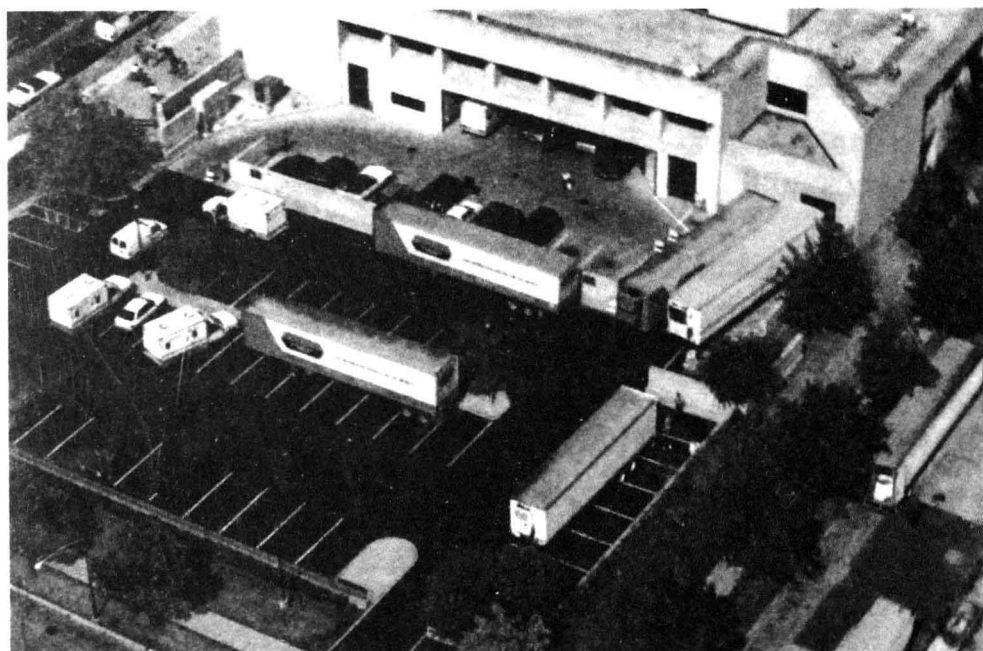


图 9 库克县法医局,在太平间都已经塞满的情况下,冷藏车保存着尸体。资料来源:《芝加哥太阳时报》,罗伯特·戴维斯(Robert Davis)摄影。《芝加哥太阳时报》授权许可,2002 年。 9

最后,城市当局报道,7月14—20日间,共有485名芝加哥市民直接死于炎热的天气,使这个月的死亡总人数达到521<sup>1</sup>(这些数字是基于医学解剖和警方逐个确认每名死者的死因而统计出来的)。超过7月正常数字的1000多人被认定为由于心脏病、极度脱水、严重中暑、肾功能衰竭和内分泌失调而住进当地医院。那些心脏病患者落下了永久性损伤,比如丧失独立能力和多种功能系统器官损坏。数以千计受中暑疾病折磨的人们在急诊室接受过治疗。

酷热消退之后,流行病专家收集到了7月份死亡的统计数据,将未

被送到法医局的死亡情况考虑进来。他们认定,仅仅基于医学验尸数目所得到的死亡人数低估了这场灾害。7月14—20日之间,芝加哥一周的居民死亡人数比往年当月正常死亡人数多出了739人。事实上,10 公共卫生方面的专家也认为,这次热浪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了以往美国历史上因酷热引起的任何一次灾难。

跟历史上其他灾难进行比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场灾害的破坏程度。在这场热浪中死去的人数是1871年芝加哥大火中死亡人数的两倍,估计当时有300人遇难。与更近的美国环境灾难相比,1994年加利福尼亚诺斯里奇(Northridge)地震和1992年的佛罗里达飓风,其死亡人数分别是在这次灾难中死亡人数的1/10和1/20。1995年4月,俄克拉荷马城(Oklahoma)爆炸导致168人死亡;1996年的环球航空公司800航班(TWA Flight 800)空难导致230人死亡,都要比这场灾害的死亡人数少几倍。记者、政府官员和科学家们对以往的环境或技术灾难中有如此多人死亡的原因都有着令人信服和直接的解释,但是在芝加哥热浪灾害当中,死亡原因很复杂,一下子难以解释清楚。

近年来,气象学研究和新闻报道对这次历史性悲剧事件的原因进行了调查。根据全国海洋和大气管理署的说法,“造成1995年7月热浪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个异常的高压气旋和一个异常潮湿的地面环境恰巧同时出现,由此产生了一个移动缓慢的湿热空气团。”<sup>2</sup>地理学家劳伦斯·卡尔克施泰因(Laurence Kalkstein)对这种气候给出了一个更深刻的分析。运用一种新的以气团分析为基础的综合方法确定导致严重健康灾害的气象环境,卡尔克施泰因发现,一种多雨炎热的气候系统与高湿热、微风和高温相结合,就会产生一种十分恶劣的7月高温天气。

但芝加哥的人间悲剧是不是仅仅由恶劣的气候环境所引起呢?就那些研究过这次事件的气象学和传染病专家看来,这一答案是完全不对的。发表在《美国公共卫生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上的一篇文章,是由一批前芝加哥公共卫生局主任为首的学者

写的,他们宣称:他们已经“研究了一些气候变量,但是没有发现 1995 年 7 月芝加哥的惨剧到底和天气有什么关系”。即使最复杂的气象学分析,“仍然留下了相当数量的难以解释的变量”。<sup>3</sup>换句话说,天气因素只能解释引起 1995 年芝加哥热浪人类惨剧的部分原因。这场灾害还存在着一种社会病理学现象,而无论是气象研究、医学解剖还是病毒学 11 报告都没有涵盖它。这场灾难中人为因素的影响仍未被探究。

本书是围绕 1995 年芝加哥热浪的一种社会剖析而写的。就像医学解剖尸体分析生理上的死亡原因一样,这项研究旨在检验这个城市的社会“器官”,从而寻找导致这么多芝加哥市民死于 7 月的各种情况。如果说进行社会剖析的想法听起来很古怪的话,这主要是因为现代政治和医疗机构在对生命和死亡的官方解释、界定和分类上扮演了垄断角色,建立了一系列塑造我们看待或漠视世界的方式。就像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所写的那样,“经常存在这样的事,一个现象之所以是无关紧要的仅仅是因为一个人未能考虑到它”。<sup>4</sup>我们对于这次热浪惨剧的理解所忽视的维度,正是源自这种诊断的失败。

芝加哥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一场自然灾害,它的故事也不仅仅是一连串的城市恐怖。1995 年的热浪惨剧是一部社会戏剧,它将往常一直存在却不容易被人察觉的问题暴露出来了。调查那些受热浪影响最大的人群、地方和公共机构——罹难者的家庭、死亡最集中或者防范最严格的社区和建筑、城市应急系统以及寻找死因的法医局和研究中心,还有记者和编辑编发这次事件的新闻部门——能够帮助我们揭示这座处在危机中的城市的社会秩序。这项研究表明,热浪惨剧就像保罗·法默(Paul Farmer)说的那样,是“社会系列失误的生物学上的反应”<sup>5</sup>,因而,这是我们人类自己而不是大自然的责任。我们共同创造了导致众多芝加哥市民在 1995 年夏天死亡的状况,也同时形成了让这些死亡如此容易被忽视和忘记的条件。我们原本也可以集体还原这段记忆,但那需要认识和检视那些我们一直习以为常和置之不理的社会现实所隐藏的真相。

我第一次听说芝加哥的死亡爆发是在热浪发生的那周读到的一份外国报纸。那时,我 24 岁,人还在欧洲,正在准备下个月进入伯克利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生论文选题阶段。不幸的是那个夏天欧洲也非常热,从巴黎到马德里,气温达到 90 到 100 度左右,但是我没有听说那里的死亡问题。这则新闻引起我的关注,不仅是因为对欧洲和美国的比较,更重要的是因为我是一个芝加哥人。我是众多在这里长大的芝加哥人中的一员,我曾穿梭在这座地理和文化上被分割的城市,尝试着接触不同的区域和群体,正像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的一句名言:“接触但没有互相渗透。”<sup>6</sup>芝加哥过去是、现在也是我的家。它的热浪致人死亡故事吸引了我,我朦胧地就突然决定去认真调查这一世界性事件。我想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那些文章充满了新闻界关于丑闻、死亡、政治和科学上的辩论,并没有提供给我需要的线索。我猜想发生在芝加哥的事情比这些已有的解释更有刺激性。

这几乎是我第一次因为芝加哥感到困惑。我从小在市中心长大,一直对它着迷:富裕的黄金海岸线和贫民窟有着鲜明对比,那些政界人物多姿多彩的生活和地下交易,在我小时候看来,把这个城市变成了一个被瓜分为多块的王国,统治者们凭借自己的背景按照自己的意愿制定出一些条条框框,无视公正和平等;那些神秘隐蔽的地下小路,废弃的铁路,环绕这座城市的空旷工厂;那些密歇根大街上来来往往的拥挤人群和旁边坐着的寂寞旁观者。我决定攻读城市社会学博士,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希望在伯克利的学习能够帮助解释我小时候在芝加哥经历的事情。

当我 1995 年 8 月到达加利福尼亚北部时,几乎没有人能记起仅仅几星期之前在中西部发生的事情了。这个高速发展的地区十分富裕而又充满经济自信,没有时间来谈论这件事情。加利福尼亚和芝加哥之间,在文化、空间上的巨大距离很容易忽略“西海岸反应”,虽然和欧洲相比我已离家乡更近了,可是我仿佛再次生活于另一个国家。几个星



期之后,我回到芝加哥,发现当我向许多老朋友和亲戚问起这次灾难时,他们的反应近乎冷淡。自相矛盾的是,经历了这场热浪的人们,一方面承受了这场巨大的灾难,另一方面却掩盖了它的意义和内涵。这次事件的有些东西使它变得无法理解或者不能解释;在这个城市中的人们在面对这一事件时显然陷入了困境。这次灾难中人的因素被忽视了,不可言说。 13

当然,每个人都记得闷热的空气和无休止的炎热,我认识的有些人还叙述了停电的那几个小时或几天中他们做了什么。但是我被朋友们随后提及的观点所困惑,他们认为这场热浪中的死亡人数可能不是那些官员们提供的数字,换句话说,用他们记录中的词汇,即不是“真的真实的”。他们认为这一周中如此高的死亡率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捏造出来的,一些人的死亡可能跟热浪没有关系。这种观点为什么会如此盛行呢?

使这个问题更具吸引力的一个原因是我接触到的许多芝加哥人都清晰地记得法医局前的那种难以置信的景象:几百具尸体停在那里,数十位工人在旁边工作着,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播放这里的新闻。我知道有些关于人权的调查研究认为,发现这么多尸体意味着回答了一个问题:一场大屠杀或是狂暴的镇压是否真的发生过。但是在芝加哥,一个相反的过程在进行着:不是澄清死亡原因的状况,对死者尸检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他们的位置。尸体摆在眼前,以至于几乎无人能看到他们发生了什么。

我的故乡之旅起初让我更加被这场热浪和我们了解它的过程所困惑。我认为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社会剖析,这样一项工作的概念并不存在,更不要说运作的技术了。我开始思考如何运用社会学调查的工具——如民族志田野方法、深度访谈、档案研究、图表制作和统计分析——来帮助建立一种解释,即自然、文化和政治机制是如何具体化为1995年夏天的芝加哥的。那之后很快我就开始确信,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理论能提升或回答其他调查所无法解释的有关芝加哥热浪的问



题。自此我开始了为期五年的研究项目，这份摆在你面前的报告记录了我的发现。

## 导论 极端的城市

1995年7月14日,星期五,这天是芝加哥有历史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天,但是这样的天气并不是约瑟夫·拉奇克(Joseph Laczko)独自一人死在家里的唯一原因。拉奇克是一位68岁的匈牙利裔男子,一个人生活在城市西北部的一所公寓里。平时几乎没有人去看望他,他打发时间的方法就是收集邻居不要的邮件,将电话簿、旧报纸和破旧家具塞满整个房间。拉奇克在破旧收音机的嘈杂声中安静地生活,坐垫中夹着一本日历,上面记录着每天的天气情况和令他感动的故事。7月15日,他在本子上记下“94度”,7月16日他就去世了。

库克县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的调查人员清理拉奇克的住所,试图获得关于他的朋友或者家人的信息,但是除了这本日历,他们只找到了一点社会生活的迹象。拉奇克保存了几十封20世纪80年代从匈牙利寄来的信件;一份银行账单显示,他7月1日最后一次取款后,账户余额已经少于一千;有些信件表明,他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卷入了一些司法案件;一张他在1991年复活节时写的卡片,但从未寄出。拉奇克的大多数文件都被公共管理办公室取走,工作人员以后将尽力核实谁有兴趣来认领他的财产。

在报告中,调查员列出了调查结果:“一居室公寓,没有家具。非常零乱……客厅:4把椅子,2个音箱,2条凳子、几个箱子、混杂的报纸、废旧的杂物、垃圾。卧室:1个衣柜、1张单人床、3个衣橱、凌乱的衣物、纸张和垃圾。餐厅:1个碗柜、1个电影放映机、1张桌子和垃圾。家庭成员:0。”他们拍了两张快照,询问了拉奇克的房东,然后就去做其他事情了。“要做的事情太多,以至于完全没有了时间概念”,负责拉奇 15

克案件的一位调查人员回忆道，“我们要跑许多街道，不停地行走，直到夜幕降临。我们很忙乱，不得不在现场写出我们的报告。”这是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最忙碌的一周，他们负责管理无人认领的遗产，许多案例与拉奇克的情况相似。

库克县的官员把拉奇克的尸体运到太平间，在这里，首席法医鉴定人埃德蒙·多诺霍(Edmund Donoghue)召集病理学家们加班加点以尽量满足工作需求。验尸之后，病理学家们认为拉奇克死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和中暑。他们把这些发现记录在死亡证明书上，并将他的记录输入电脑数据库，然后把尸体运到储藏室。官员们等待他的亲属来认领遗体 and 遗物，但是从没有人来。很明显，遗体无人认领，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使用拉奇克银行账户里的钱在附近买了一块墓地将他安葬。

数以百计死于热浪的芝加哥市民与拉奇克有着同样的命运，在生命的尽头孤独死去，他们获得了两个方面的生命关怀——州政府资助的工作人员的关注和人工制冷服务——但这些服务是在他们的尸体被送到库克县的太平间之后才提供的。只有少数罹难者和同伴一起遇难，其中包括死在一起的母女两人，以及住在同一栋楼里的姐妹两人。其他几百人都是独自死在自己的房间里，这些房间很少有人来访，门窗紧锁，空气污浊凝滞，令人窒息。在这些罹难者中，大约有 170 人的遗体和遗物无人认领，直到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运动以提醒那些不知道有家庭成员失踪的市民。甚至在此之后，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案例没有从公共部门移走。直至今日，包括拉奇克在内的约几十位热浪罹难者的私人财物仍然存放在县办公大楼的纸箱里。

## 社会剖析

在热浪过后几年，一些政治团体和市政官员逐渐淡忘了拉奇克和数以百计的芝加哥人奇怪而非正常的孤独死亡。他们争辩说，7 月份的一

周是一场罕见的灾难,它说明了我们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脆弱性。比如,在热浪之后,市长理查德·M.戴利(Richard M. Daley)委任了一个大型的委员会,用其自身的话来说,就是研究“热浪的流行病学、气象学 16 与社会学因素”。该委员会的主要发现在报告开头进行了概括:热浪是由一些关键因素叠加而引发的独特的气象学事件,这些关键因素包括:(1)每天的气温指数都超过 100 度,其中有一天连续超过 115 度;(2)天空晴朗,晚上也很少降温;(3)城市热岛效应\*——建筑物群和道路集中吸收并积聚热量——这就升高了城市内部的温度。其中标题为“为何高温会致命”的子报告简单地解释说:“人类生理和环境之间的联系是微妙和重要的。当体温超过正常范围很多时,高温伤害就会发生。严重的高温伤害是致命的。”<sup>2</sup>在报告的这一关键部分,社会因素没有引起注意。

委员会在它的报告中还掩饰了它的工作与这场热浪的关系,因为此标题《最终报告:市长委员会论极端天气状况》没有提到热浪造成的创伤。这份报告伪装成一份关于气候的普通声明,并且以其他机构的名义发表,以帮助市政府推卸其关于这场灾难的责任。这种策略是应对危机典型的公关性、政治性的回应。尽管一周的热浪造成的死亡数在美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但对于这次灾难的集体回应却笼罩着 17

---

\* 城市气候与其周围区域的气候系统是不同的,城市热岛效应指城市空间内典型的气温升高。根据 1967 年威廉·劳里(William Lowry)所写的经典文章,“城市自身就是造成这些天气异常的原因之一”。劳里为城市的异常气候概括了五个原则性的原因:(1)“构成城市街道与建筑物像岩石般坚硬的材料会传导热量,其速度是湿润沙土传导速度的三倍”;(2)“相对于自然地貌的特征,城市结构有更多区位和形状的变化。房屋的墙、屋顶与街道通过奇妙的反射作用,吸收它们得到的能量并将剩余的大部分传导到其他吸收表面”;(3)“城市有许多乡村没有或数量很少的热源,比如说工厂、交通工具和空调(它理所当然会释放热空气才有制冷的效果)”;(4)“城市有处理排水管、排水沟和下水道的特殊方法……由于城市中蒸发的机会较少,进入这些程序的热量易使空气变热”;(5)“城市的空气与乡村的空气不同,携带大量的固体、液体和气体的污染物……尽管这些颗粒都会反射阳光,因此会减少到达表面的热量,同时,它们也会阻碍热量的流出”。(劳里,1967, 15—17)

一种愿望,不想知道那么多人死亡的原因。<sup>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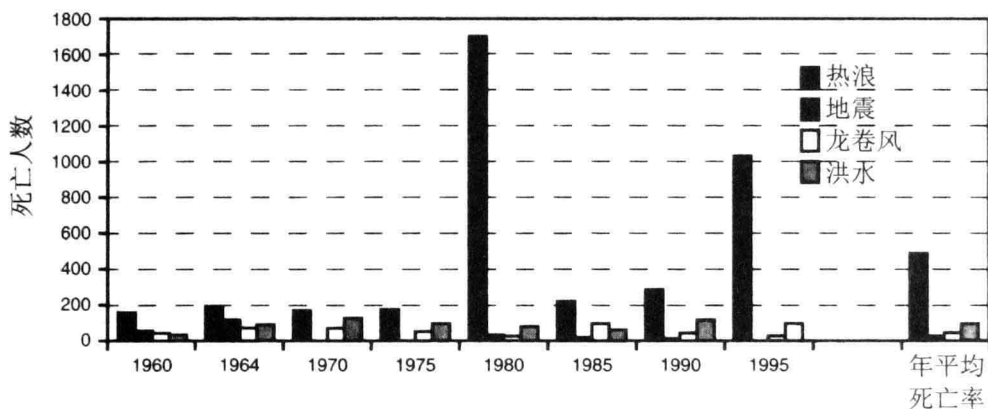


图 10 美国 1960—1995 年灾难死亡率。资料来源:热浪,《美国人口统计》;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国家地震信息中心;龙卷风和洪水,全国海洋和大气管理署。

这样的处理方法是正常的。我们更多地关注那些壮观的、适于拍摄的灾难,例如飓风、地震、暴雨和洪水。如果得知在美国死于热浪的人比死于其他所有天气灾害的人数还多(图 10),那么美国人通常会感到非常吃惊。热浪得到很少的公众关注并不仅仅因为它没有造成其他气候灾害带来的大量财产损失和引人注目的景象,而且也因为其受害者主要是社会边缘群体——老人、穷人和孤独者——而我们总是习惯性地避免讨论这些人。<sup>4</sup>使热浪如此致命的社会因素是这些无声无息之人的无声无形的杀手,虽然这一点并没有得到新闻报道以及观众的注意,甚至也没有得到研究灾害的社会科学家们的关注。<sup>5</sup>例如,最近一份关于城市灾难的文章选集的引言列出了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死亡率最高的城市事件,毫无说明地排除了芝加哥热浪——其实还有其他的国内热浪——即使这场 1995 年的大灾难比表中最致命的 1989 年旧金山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还多 10 倍。<sup>6</sup>

与公众不愿进一步关注芝加哥夏季创伤的原因截然不同的是,一些领域的科学家已经开始研究热浪,因为死亡的发生率和分布方式否定了简单的解释。正如公共卫生研究者们所指出的,城市区域的发病

率与死亡率高于标准科学模型的预测水平。在对热浪的分析中,医学 18  
家和气象学家们发现了他们近年来一直在努力解决的一系列困惑,比如,为什么有那么多芝加哥人在孤独中死去?为什么死亡总数高于气象学模型的预测?为什么一些社区和人群遭受的破坏大于其他地方?为什么设计用来保护脆弱人群的支持系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不幸的是,在传统的卫生与气候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和理论不能为他们提供工具来进行一项全面的研究。在他们的专业工具中,很少能用于解释这场灾难的社会原因。尽管每一次重大的研究与报告都发现,医学与气象学的方法不能恰当地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芝加哥居民死去,但是却没有人分析过这座城市的社会环境是如何带来这场灾难的。

这本书的思想主要受到了两个关注点的驱动。首先,本书要考察导致几百名芝加哥市民——大部分是老人、孤独者和贫困者——在这一周高温中死去的社会条件。正如在卡伊·埃里克森(Kai Erikson)的《吞没一切》中提到的,社会剖析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通过已存的社会学知识宝库来审视它能为一次单独的人类事件带来什么启示”<sup>7</sup>。尽管有一些政治团体和新闻报道坚持认为,热浪的遇难者是遍布在整个城市的——就像《芝加哥论坛报》的一则标题所提到的,他们“和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一样”;或者像《芝加哥太阳时报》所说的,“他们就像一场空难的死难者一样是各种各样的”,可是死亡率的模式反映出了芝加哥不同区域的各种不平等。<sup>8</sup>

死难者主要是老人:炎热造成的死亡情况中有73%的人的年龄都高于65岁(表1)。在所有的族裔中,非裔美国人的死亡率最高。<sup>9</sup>在这场灾难中,他们显然比白人更容易受到伤害,总的死亡比例为1.5:1;根据年龄分布(表2)\*,中年死难者(55—64岁)比例为1.8:1;高龄死

---

\* 这是一种统计方法,具体人群中的年龄分布状况被标准化,因此这些人的经历——在这个案例中是热浪相关死亡率——能根据他们年龄的不同进行比较。如果想要获得更多关于死亡率分析中年龄分布的信息,参见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网站:[www.cdc.gov/nchs/datawh/nchsdefs/ageadjustment.htm#Mortality](http://www.cdc.gov/nchs/datawh/nchsdefs/ageadjustment.htm#Mortality)。

- 19 者(85 岁以上)比例为 1.9 : 1。实际上,尽管一些官员和记者强调炎热造成的死亡人数在非裔美国人和白人之间是均等的,但在这个城市中没有一个年龄段的非裔美国人的死亡率不是最高的。这些分层的死亡率数据反映了芝加哥的典型模式,在那里,非裔美国人每天都会比白人面临更高的死亡风险,这与热浪死亡状况的典型模式相同。相反,拉丁裔芝加哥人却出现了惊人的低死亡率,虽然他们总体的贫困水平使他们位于较高的死亡率风险当中。尽管他们在 1995 年至少占了这座城市总人口的 23%,但是他们的死亡人数只占了热浪中总死亡数的 2%。要去解释拉丁裔美国人的“健康悖论”:为什么拉丁裔美国人超出公共卫生学者预期,出现了与其贫穷族裔地位相比更好的结果和情况呢,这会是社会剖析面临的一个挑战。<sup>10</sup>

表 1 不同年龄和种族/族群中暑死亡总数:芝加哥居民

年龄	白人	黑人	拉丁裔人	其他人	总数
<55	27	39	1	0	67
55-64	25	45	4	1	75
65-74	62	64	1	0	127
75-84	90	66	1	2	159
85+	48	42	2	1	93
合计	252	256	9	4	521

资料来源:芝加哥市公共卫生局。

表 2 特定年龄和年龄调整后不同种族/族群每 10 万人中暑死亡率:  
芝加哥居民,1995 年 7 月

年龄	非拉丁裔白人	非拉丁裔黑人	比率:黑人/白人
<55	4	5	1.3
55-64	31	57	1.8
65-74	75	83	1.1
75-84	119	176	1.5
85+	222	429	1.9
合计*	11	17	1.5

资料来源:Whitman, et al. (1997, 1516)

\* 按照 1940 年的美国人口进行标准化。

男性和女性的死亡率水平也有着令人吃惊的显著差异。与热浪相关的死亡人口中有 55% 的男性和 45% 的女性。按年龄区分的死亡率 20 表明,当把年龄作为控制变量时,男性比女性的死亡机率高两倍(图 11)。这些模型困扰了一些研究老龄问题的专家,因为老年女性比她们的男性伴侣更可能独自生活,以致许多老年病学专家都把高龄独自生活作为女性的问题。老年病学专家汉密尔顿·吉布森(Hamilton Gibson)发现女性比男性更易感到孤单和寂寞。<sup>11</sup>当考虑到这点时,男性相对更高的死亡率就更加令人困惑了。这种模式需要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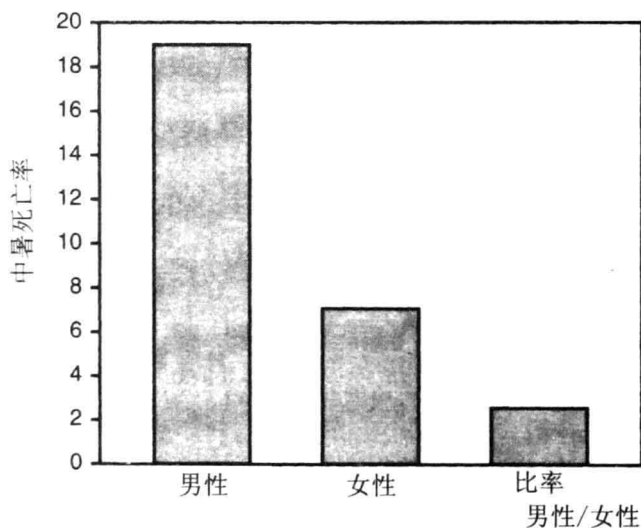


图 11 年龄调整后每 10 万居民的中暑死亡率,依据性别分组。资料来源:芝加哥市公共卫生局。

除了这些群体层次的差异,芝加哥社区之间的死亡状况也存在着鲜明的对比,<sup>12</sup>在这个以城市空间秩序反映居民社会分割而著称的城市里,热浪期间脆弱性的地理分布与不平等的日常生态分布高度相似。热浪中的死者集中在那些低收入的、老龄化的、非裔美国人集中区,以及城市中的犯罪率高发区。流行病学和人口统计学中的个体层面研究,以及以总体为基础的研究,只能部分地解释这种地理学模式。社会生态环境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对于人们互动方式和公共空间使用方式的影响,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 城市的社会流行病学

群体与社区层面的死亡率只是描述高温影响的开始,这些表明,热浪是一次由环境引发而由社会因素塑造的灾害,社会学的调查将有助于进行解释。社会剖析可以利用并且扩展社会流行病学的知识来剖析这一事件中的潜在关联。<sup>13</sup>这里的分析与那些常规的人口统计学和社会学对死亡率的研究是不同的,它把影响死亡率的个体水平的因素置于更为广阔的邻里、社会服务系统和政府项目的背景之下。本文将城市自身作为研究的一个焦点,从多个层次进行分析,将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与流行病学报告中流行的个体与社区层面的状况整合起来。<sup>14</sup>

如果不把这个事件放在芝加哥 20 世纪 90 年代的社会地理和政治经济背景下来考虑,将难以理解这场导致这么多人死亡的危机。<sup>15</sup>本书的解释将集中关注剥夺和苦难的社会与政治生产过程,但也从这个城市的个体、社区、州和象征层面提供更宽阔的视角,来阐释各种类型的拥有不同个体体验的行动者和机构是如何共同卷入一个重大的城市事件中的。本书以广泛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芝加哥市民、市政官员及其雇员、社会工作者、记者、科学研究者的深度访谈为基础进行写作,可以站在一个制高点上审视不同立场和不同体验,而社会生活中这些角色和体验很少汇聚在一起。

有时候,社会工作者与科学家、州行政当局与独自居住的居民、记者以及政府官员的解释是不一致的,甚至相互矛盾。但是放在一起,它们将代表组成这个现代化城市的不同立场和各种观点,也能解释人们应对和表述热浪的不同方式。<sup>16</sup>不同观点与不同叙述的碰撞能够帮助说明城市中一个领域的行为与其他领域的行动之间的关系,比如新闻与地方政府的危机应对机构或者邻里关系的非正式支持网络之间的关系。<sup>17</sup>城市居民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同呼吸共命运,即使这种联系是建立在排斥的基础上。这种虚虚实实、若隐若现的联系方式决定着城市

及其居民的命运,而热浪则使人们可以聚焦于这种联系。

热浪所发生的地域使这次事件为人们评估城市社会学的方法和理论工具,特别是芝加哥学派所开创的传统,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芝加哥并不仅仅以其著名的区位分割、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和赤裸裸的不平等,成为美国极端城市的典型。也正是在这座城市,学者们创立并发展了城市研究的美国式方法,创造了在城市环境中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案,塑造了20世纪城市社会科学的很多特性。尽管近几十年来,新一代城市社会学的学者们对芝加哥学派的“城市意识形态”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最明显的是它没有唤起对这座城市中不平等与统治的政治经济生产过程的关注——但是芝加哥学派探索城市社会结构的技术为新的发现提供了众多可能性。

芝加哥学派第一波与第二波的标签都很明显地贯彻在对热浪的分析之中:个案研究强调物理与社会空间,关注社区与公共生活,考察种族的差异性,将城市作为一个总体的社会系统进行评估——这些都处于芝加哥学派问题意识的核心——也是本研究课题的关键。尽管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芝加哥这样一个鲜活的社会实验室中,对孤独死亡的分析与这个学派研究城市社会隔离的传统方法决裂了,而该传统是美国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之一。虽然早期芝加哥学派的城市学家强调在这座大城市中不同区域的隔离,但在这里,我把这个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制度整合的社会系统,这些制度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接触并相互作用。城市生活的特殊性在于空间形式以及行动者与制度的网络,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一系列压力,比如集中的犯罪、拥挤、污染和各种可能性,例如与相似处境的人之间的关系和政治行动的机会。从来没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城市区域会像早期芝加哥社会学家们所描述的那样被分裂为孤立的社会世界;回顾过去,他们将注意力集中于社区或街道的方法看上去使城市理论更加关注分割的问题而不是接触和联系的机制。但是这场热浪有助于表明,在当前条件下某些城市居民正在遭遇各种形式的完全隔离(*literal isolation*),其后果非常可怕。评价造

成这种隔离的社会过程和空间模式需要更新芝加哥学派用来描绘城市社会过程的生物学词汇,这些词汇所使用的概念和分类识别了社会化  
23 不平等与异质化的重要性。而且,它要求一种能够将城市理解为一个复杂系统的调查方法,在那里面,自然、文化和政治共同决定着其居民的命运。

本书的第二个关注点是分析热浪作为公共事件与社会经历的符号学建构。本书特别关注政治官员、记者和科学家们通过符号建构过程而建立起来的对热浪的主导性分析,以及关于这次灾难将公共舆论组织起来的基本事件。新闻、科学及政治机构都得益于符号权力,以此创造和强加作为整体的并普遍适用的一套标准和概念,比如自然灾害或中暑死亡,那将成为探讨新问题的合法性框架(或是组织性概念)。<sup>18</sup>尽管芝加哥的每个人都经历了那次严酷的气候,但是新闻记者、政治家和科学家们负有主要责任,向不同的听众就这场灾害做出解释和阐述。热浪既是一个文化事件,同时也是一次公共健康危机,但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并没有被作为主要事件进行记录,它的遗产很难追溯。检视这一灾难的特征被曝光或隐瞒的各种方式,能帮助揭示构成这次灾难的公众理解的符号生产系统。这部分研究有助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尽管这次灾难损失惨重,且获得了广泛的新闻报道,但热浪的社会生活和受害者却如此容易被忽视或遗忘。

## 典型性与极端性

尽管本书主要关注 1995 年的热浪,但这份报告所提供的并不是这次灾害的传统社会史。相反,这种分析被两个理论原则所激发,力图让芝加哥灾难的案例能够开拓对城市生活更宽广的研究。第一个原则来自于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和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学说,即芝加哥大灾难的极端事件标志着“一个极端状况,该状况能使我们更好地察觉到社会事实。而在正常情况下,这些社

会事实,虽然也同样重要,但发生的规模小而且不系统”。<sup>19</sup>第二个原则是,公共机构在面临压力和危机的情况下,对自身的暴露更为充分。<sup>20</sup>毫无疑问,导致这场灾难的天气是异常的,但本书将揭示出,灾难所反映出的城市生活的很多因素是当地环境的典型特征。其中已经显露出来的一系列最重要的因素已经开始为美国城市引入新形式的风险,但这些因素在日渐增长的城市不平等研究中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sup>21</sup>在热浪中被证实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包括,年老的贫困者在社会交往上的完全隔离,尤其是在城市犯罪率最高的地区;城市旅居者生活恶化和冲突增加,这些人构成了低收入住房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却经常被忽视;社会服务体系的变化,以及由于私有化和地方政府其他行政方式的激进变革对公共卫生和福利造成的威胁;商业机构、地方政府弃用区域,以及人口下降区域所形成的新的社会生态条件。在气候正常的情况下,热浪所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仍没有消失,这些问题的隐蔽性使城市日常生活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24

以孤独死亡为例。在一个星期的热浪中孤独死亡人数的比例非常高,但他们死亡的环境在芝加哥和其他美国大城市中却并不特殊。在一个寻常的月份中,库克县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将调查大约一百例人员死亡却没有家庭成员来处理遗产或埋葬尸体的案例。当我们考虑迅速增长的芝加哥居民数量以及在美国独自生活(尤其是在老年时)的普遍性之后,这些数据就不惊人了。尽管近年来一些城市报告了居民独自死亡(时常几天或几个星期未被发现)的数量上升,但关于这种发展趋势的公共讨论却很少。《纽约时报》报道:在美国的一个主要城市中,“无人认领的尸体堆积的速度比城市能处理的速度更快”。在县办公室中,装死者的私人文件的盒子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sup>22</sup>“我们之前从没这么忙过”,一位库克县的调查员解释说,“但是除了遇难者人数之外,热浪没有什么事情是真的不正常。”(参见图 12)

然而,对于芝加哥的大部分人来说,由热浪中呈现出的人群的孤独程度否定了那些以往人们对社区力量和社区团结的认识,而正是这些



图 12 一位疲倦的工人把尸体运到太平间后,正在休息。资料来源:《芝加哥太阳时报》,里奇·海因(Rich Hein)摄影。《芝加哥太阳时报》授权许可,2002年。

认识维持着这个“邻里团结之城”的信心。<sup>23</sup>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之外的人很少知道有那么多芝加哥人一个人生活,在孤独中死去;如果不是首席法医鉴定人埃德蒙·多诺霍的工作(图 13),城市也许绝不会获知热浪的破坏力。正是多诺霍的早期报告认定死亡爆发可归因于气候炎热,才引发了这次公共卫生危机转化为一次重大的公共事件。

26 多诺霍是一位在有政治热情的芝加哥家庭中长大的医生,1977年开始在法医局工作。他一直密切关注由于炎热引发的流行病,并认识到关于流行病严重性的报告经常引起政治辩论。热浪是缓慢、沉默和看不见的杀手,它对于健康的直接影响很难测定。极度的炎热摧毁身体的抵抗力,但其周围的环境却未改变。经受炎热中暑死亡的证据既在死亡的环境中也在死者身体内部,而调查者并不总是知道如何检查每一位热浪的死难者。

多诺霍以前对炎热灾害的知识使他认识到有效诊断中暑死亡,有两个方面至关重要。



图 13 首席法医鉴定人埃德蒙·多诺霍。资料来源:《芝加哥太阳时报》,安德烈·钟摄影。《芝加哥太阳时报》授权许可,2002年。

第一个方面是为中暑死亡确立清晰的标准用来指导调查员和法医鉴定人的检验。设置标准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部分原因在于1995年联邦政府和国家法医鉴定人协会对中暑死亡都没有正式的定义,这导致美国许多城市出现不一致的诊断。根据最流行的科学标准,多诺霍建立了三个标准,如果符合以下任何一个条件的话,就可以确定中暑死亡:“(a)在死亡之时或死亡后极短的时间内,尸体测量温度为华氏105度;(b)充分的环境或条件证据表明炎热是死亡的原因(例如,死者被发现在一个没有空调、所有窗户都紧闭且温度很高的房间内);(c)死者被发现时已高度腐烂,无证据表明死于其他原因,且死者活着的时候最后一次被看见是在热浪期间。”<sup>24</sup>

第二个方面是,多诺霍认识到尽快知道热浪死难者的信息和准备好证据支持尸体解剖的必要性。他凭经验深知有人对死亡原因发出质疑,但他相信案例记录会支持他的科学工作。多诺霍没有想到的是,对其验尸可信度的挑战会来自芝加哥近期历史上权力最大的政治领袖,

理查德·M.戴利市长。在7月18日(星期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戴利坚决地否定了多诺霍所做的死亡报告的有效性。他和其他芝加哥的领导人<sup>27</sup>都怀疑多诺霍在天气和大量死亡之间建立的联系。记者们很快以市长的评论为由展开争论,用那时被反复使用的措辞来说,这些死亡“真的真实”吗?死亡和天气是简单的巧合还是真的与炎热有关?新闻发布会后的第二天,《芝加哥论坛报》报道说,热浪中的死亡人数达到了199个,但是报纸也刊登了一篇关于法医鉴定人对热浪死亡归因的争论和大名鼎鼎的迈克·罗伊科(Mike Royko)的名为“凶手是热浪还是媒体报道”的专栏。

1995年的夏天,芝加哥的领导人及其支持者有充足的动机来怀疑或否认芝加哥已经成为一个死亡和腐烂大熔炉的报道。在由制造业转移、社区的萧条引发的经济和社会衰退之后30年,到20世纪90年代,芝加哥从政治、社会经济和形象恢复方面着手承诺改变这个大都市。<sup>25</sup>像那时大多数其他的美国城市一样,很多居民和社区都在享受持久且强健的经济增长时期所带来的实惠,甚至长期以来的批评者们也开始操起城市复兴的腔调。戴利市长由于再造城市政府运动受到当地和全国媒体的赞誉;包括旅游在内的新兴行业重新奠定了当地就业的基础;离开了十多年后,郊区居民又搬回市区;并且,芝加哥正大力美化街道,重塑形象,为1996年的全国民主党大会在这里召开做准备。由于清醒地认识到芝加哥的名声曾被1968年会议期间的暴力所败坏,当地领导人希望1996年的会议能够成为一个窗口,显示芝加哥恢复名誉并成为像其座右铭所说的“运转良好的城市”。

尽管1995年的热浪使芝加哥面临重新被钉上耻辱的烙印和在非常时刻城市复兴被破坏的危险,但芝加哥仍然保持着平稳和上升。众多的死亡代表着一次严重的社会灾难,城市中死亡的丑陋景象也是潜在的公共关系灾害,给世界一个信号:芝加哥不能摆脱曾经与其名字相联系的极度贫穷和不安全。在家里,戴利市长不得不担心这次灾害对<sup>28</sup>其政治前途的影响。在16年前一次著名的选举中,迈克尔·比兰迪克



(Michael Bilandic)市长输给了简·伯恩(Jane Byrne),部分原因就在于他没有能够在那次不严重的暴风雪中清洁城市街道。不能使城市免于受自然袭击的后果是严重的,尽管法医局不是城市的一部分而只是县政府的一部分,多诺霍仍然面临着否认自己这份报告的压力。

然而,这位首席法医鉴定人拒绝向要求修改死亡报告的重重压力屈服,有效地阻止了市政官员和媒体记者在不需要公共辩论的情况下就否认这场灾难的严重性。“如果换作另一个政治敏感性较强的人,也许就不能告诉我们整个故事了,”国家法医鉴定人协会前主席劳伦斯·哈里斯(Lawrence Harris)解释说,“他(多诺霍)应该为此受到赞赏。”<sup>26</sup>

测定中暑死亡的标准,要求发现尸体的警官或医学工作者记录诸如房间的温度、周围环境和尸体状况的信息,法医鉴定人在进行分析时会使用这些信息。然而,大多数的死亡并不要求警察报告或医学解剖报告。在热浪期间很多受害者的尸体没有受到很好的重视,因为民间安葬机构独立保管这些尸体。多诺霍所知道的其他许多案例最初并没有引起城市的注意,因为直到其死亡证明被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的州办公室归档之后,那些死在县城之外的偏远医院的居民才被包括在城市范围内的死亡数据中。由于这些原因,对一些中暑死亡并没有进行分类,因此,公共卫生学者们认为中暑死亡测量低估了极端天气的后果。<sup>27</sup>多诺霍相信科学证据会支持他的发现,面对普遍的怀疑,他大胆地宣布:“我们很高兴能核对这些数据,但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我们低估了死亡的人数。”<sup>28</sup>在7月14—20日这一星期,到完成计算尸体为止,官方中暑死亡数据为465人,整个7月份为521人。

几天之内,多诺霍的死亡归因受到另一位领导芝加哥公共卫生工作的史蒂夫·惠特曼(Steve Whitman)的支持。惠特曼之前是西北大学的研究员,他在芝加哥公共卫生局从事并指导一项流行病学项目,他决定将来自法医局的数据与早期芝加哥热浪的死亡率进行比较。他回



29 忆道：“当我发现没有人知道和热浪事件有关的任何事情时，我非常吃惊。我发现报纸上的文章只是列举了在那个炎热的夏日各地发生的一些死亡，而对热浪所致的死亡率却几乎没有报道。”惠特曼和他的助手首次研究了美国历史上主要城市的炎热传染病，他们找到了城市酷暑时期的气象学报道，然后由此追溯到相关的死亡率。“结果让人大吃一惊！”惠特曼解释说，“我们发现在有些事件中，死亡人数超出正常的死亡人数好几百倍，但官方的报告没有解释其中的原因。”

在仔细研究了有关热浪的报道以后，惠特曼和他的同事们意识到记录热浪事件死亡人数的最精确方法是使用“过量死亡（非正常死亡）”<sup>29</sup>（excess deaths）的概念。和一般的中暑死亡率测量方法不同，过量死亡数目不需要对每一次死亡进行特别的检查。恰恰相反，流行病学家可以通过比较特定时期官方报道的死亡率和实际死亡率来获取过量死亡的数据。为了分析美国热浪死亡的相关数据，芝加哥的流行病学家比较了在那些酷热事件到来前相应时期的平均死亡率。他们的研究没有确认死亡的原因，所以研究者必须保证没有其他的非同寻常事件——例如一次大屠杀或者另外一种传染病——会导致死亡率的不同寻常的提高。但是最终，他们能够成功地排除其他潜在的死亡诱因，获得了热浪期间在芝加哥、洛杉矶和纽约的过量死亡数据，该数据比以前的任何统计数据更可靠。<sup>30</sup>

关于过量死亡的研究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说明多诺霍做了两个准确的估计。这位首席法医鉴定人关于中暑导致死亡的归因是可靠的，他发表的关于早期死亡数据低估了灾难严重性的公开讲话也是可靠的。依据芝加哥的过量死亡人数，有 739 位城市居民在 7 月 14—20 日非正常死亡——比县法医局最初宣布的死亡人数多了 200 多人。同样重要的是流行病学家从密尔沃基（Milwaukee）得到的信息，这个城市在芝加哥北部约 90 英里，虽然小很多，但却在社会和人口特征方面与芝加哥高度相似。通过运用过量死亡的测量方法，他们发现密尔沃基与芝加哥遭受的灾难具有可比性，尽管总死亡人口相对较少，而媒体对

芝加哥的关注掩盖了来自威斯康星的报道。<sup>31</sup>

最后,联邦官员也开始支持多诺霍的死亡归因。辛西娅·惠特尼<sup>30</sup> (Cynthia Whitney),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一位流行病学家,告诉媒体,“法医鉴定人提供了非常好的信息……多诺霍博士的衡量标准非常好”。<sup>32</sup>芝加哥那些对死亡归因持怀疑态度的官员发现,很难挑战科学证据的丰富性,也难以质疑为多诺霍的研究提供支持的机构的正当性。“我们将不再讨论数据”,卫生局一位高级官员表示,这预示着市政官员将不再质疑多诺霍分析得到的死亡数据,这也意味着政治争论告一段落。<sup>33</sup>不过,有关热浪带来的真正影响的争论仍在继续。

当质疑死亡数据的呼声已完全站不住脚后,城市官员对热浪事件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或许那些死去的芝加哥人本来就处于死亡边缘,或许他们的死和热浪并没有多大关系?当然,所有人最终都会死去,质问热浪能否对那些所谓的“弥留之际”的人死亡负责显得不够真诚。没有必要的死亡总是值得关注,即使死亡仅仅发生在几个月里。但是流行病学家的质疑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细微的差别。如果在热浪之后,比如说,死亡率快速降低能够弥补事故中739个过量死亡数,那么就确实可以认为流行病导致了“死亡提前”,因为从总的死亡水平来看,净死亡数量并没有大规模的增加。

法医鉴定人的数据显示,热浪受害者更有可能是城市中最没有抵抗力的弱势人群:老年人、非裔美国人、穷人,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热浪中死者本来就奄奄一息。大灾难过后的两年,伊利诺伊州公共卫生部分析了热浪中死亡人群的分布,他们发现,与一些官员的推测相反,即使在很恶劣的天气情况下,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官员们所说的“死亡提前”。<sup>34</sup>换句话说,热浪并没有杀死那些本来就临近死亡的人,而是导致了那些弱势人群的死亡,如果不是热浪的原因,这些人本可以继续活下去。然而,政府官员和记者们怀疑的声音极大地影响了公众对大灾难的解读。由于缺乏更多的热浪死亡率的证明,关于热浪死亡的争论一直持续至今。



图 14 芝加哥电视新闻主播说, 这样的事该怪谁呢? 资料来源: WBBM-TV(CBS 分部)。

一旦芝加哥政府官员发现对热浪死亡数的科学报道进行否定已经不再可能, 城市中大多数居民和组织便开始提出另一个质疑: 谁应该对这场灾难负责? (图 14) 许多人都成了怀疑对象。一些地方的活跃分子和社区领袖争辩说, 责任应该由市长和政府官员承担。根据他们的观点, 城市基层官员都没能意识到社会风气和自然气候所带来的危险, 没能采取有效的公共回应。一方面, 城南的一群反对派黑人政治家要求罢免城市的一些高级官员并呼吁要对整个事件有一个正式调查。另一方面, 市政官员推卸责任, 并且声称责任其实应该由另外一些并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的组织承担。联邦爱迪生公司, 基础设施的提供者, 成了市长和市议会批评的对象, 并被提交给听证会。官方报道批评媒体没有发出足够的警告, 而像《芝加哥太阳时报》这样的一些报纸, 反过来责备市政府忽视了政府应有的应急处理计划。市政官员高层责备

死难者的家属没有照顾好他们的亲人。公众服务部的委员责备受害者本人,公开表示“有的人死于他们自己的疏忽”。

最终,成立一个机构来调查谁应该为热浪事件负责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只有不負責任的分析才会把如此复杂的事故归咎于一个个体、一个责任人或者社会力量。没有单纯的原因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这个悲剧中有那么多芝加哥人死去,当然也不存在某个人或某个团体能为整件事情负全责。让热浪事件变得如此有意义的原因在于,它为马塞尔·莫斯所谓的“整体性社会事实”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这种“整体性社会事实”整合并激活了一套广泛的社会组织,创造了一系列反映城市内部运转的社会程序。<sup>35</sup>当数百人慢慢死去,孤身一人在家,受不到朋友、家人和政府的保护,这预示着一种社会的崩溃。在这个过程中,社区、邻居、网络、政府机构、发警戒信号而被责备的媒体都受到牵连。如何展示出这个过程是本书的主要挑战。

## 本书概述

本研究以多层次的方式展开,首先对孤独死亡的人数进行统计,然后扩展到关于社区和政府机构对芝加哥居民脆弱性或安全性的影响的研究。在第一章中,“独自死亡”揭示了完全的社会隔离的出现,即缺乏与朋友、家人以及正规支持系统的沟通联系,使得众多芝加哥市民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处于不安全和没有得到保护的情境之中。有两个问题贯穿本章。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可以解释那么多芝加哥人在热浪中独自死去?作为第一个问题的延伸,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能解释悲剧发生以后,为什么仍然有那么多芝加哥人独自生活,而不与社会发生联系?

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我到芝加哥进行了历时16个月的田野调查,大部分时间我与那些孤独的、贫穷的以及没什么社会关系的人待在一起。不幸的是,关于城市居民的孤独,尤其是老年人和穷人的孤独现

33 象,当今的学者几乎没有人对它进行研究,更没有人去研究这种现象的本质。不要说认识这些老人和穷人,光是找到他们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在我寻找独居老人住处的过程中,下面几种途径大有收获,它们包括与居家老人打交道的一些社会服务机构、识别和帮助身体虚弱老人的城市机构、老人集中居住的一居公寓,以及旨在给自立老人提供陪伴和帮助的一个社会组织。在我整个田野考察的过程中,我访问并认识了40多位老人,他们跟我分享的经历让我对老人孤独和隐居现象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与大多数民族志撰写者一样,我与少数线人关系良好,并将非常详细地叙述他们的故事,是因为他们展现了城市中年迈的、孤独的、贫穷的人群的核心特征。

很准确地搜集到重大事件中孤独死亡者的第一手资料是不可能的。<sup>36</sup>热浪中的死亡者有些好几天都没有被发现,这显示了城市隔绝现象的一些特征。发现死者后,新闻媒体立即对死者进行了报道,提供了死者的其他信息,一些死者的邻居和亲人在这个特殊时期也和媒体进行了沟通。但是我在本书展示的大多数热浪死者的信息来自我的调查,是很少被引用的资料,例如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提供的孤独死去且无亲人认领的死者的个人信息;法医局整理的数据;警方关于死者现场的描述。最后,我亲自调查了一些死者的生平。我去了死者生前居住的地方,尽可能和他们的邻居、房东、大楼管理员以及亲戚朋友做了交流。<sup>37</sup>

在第二章“种族、空间与脆弱性”中,我关注是否存在着一些和空间相关的特殊条件增大或者减少热浪致死的风险。一些流行病学的研究显示,社会交往是决定热浪下生存脆弱性的关键因素,我调查了哪些社区环境有助于形成有效的支持网络,而哪些环境让那些脆弱的居民处于被剥夺和孤独的境地。我考察了北朗代尔(North Lawndale)和小村(Little Village),这两个地区都处于芝加哥城西,彼此相邻,风险因素相似,而热浪中死亡率却迥然不同。我将解释特殊的社会和生态环境是如何对当地居民的健康和福利产生影响的。<sup>38</sup>

这一章的研究基于1998年7—12月我在这两个相邻地区所做的

六个月的日常观察,以及 40 多次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访谈,访谈对象包括当地居民、商人、政府官员、宗教领袖、社区组织者、警察和相邻的人群。这两个社区一个几乎全是拉丁裔,另外一个几乎全是非裔美国人,空间上的邻近使居民很容易相互搬迁。我在这两个社区花了好多天,来研究这些外表差异太大以至于不会相信他们是邻居的居民们。宗教机构和社区组织是我了解北朗代尔和小村的主要途径,它们成为我研究社区关系的基础。在北朗代尔,两个街区俱乐部邀请我做客,通过这些机构我认识了一些居民。

第二章中的邻里对比同时成为我研究有关热浪死亡率的公开辩论的基础:虽然两个社区都很脆弱,为什么芝加哥的非裔社区死亡率是各族中最高的,而芝加哥的拉丁裔人社区死亡率却最低?北朗代尔和小村这两个社区个案研究展示出芝加哥社会生态环境的差异如何影响集体生活以及邻里间的社会支持,并最终决定了社区对热浪风险的抵御能力。

灾难中政治的、科学的和媒体的报道激发了我写作第三、四、五章。由不同政府机构组织的各种委员会、听证会和官方调查表明政府中的某些部门卷入了灾难管理,它们扮演了帮助居民对付热浪,但同时又提高了死亡率的双重角色。在第三章“灾难中的政府”中,我没有按照社会科学研究惯例,即不重视灾难发生时的政府,而是研究了政府机构在灾难发生时的反应。除了探讨市政府不同机构对热浪和卫生紧急事35件的反应态度,我还询问了政府的项目和政策是否和如何导致那么多芝加哥人在热浪中处于危险境地。更具体的是,我实地访问了警察局和老年事务部的政府雇员,并且访问了消防局和救护人员,力图评估再造后新的地方政府结构和精神是如何影响各部门为城市穷人、老人、需要照顾者提供服务的。问题不在于市政府的新形式在服务城市居民方面与过去比较是否有效,而在于需要照顾的人群,特别是那些可怜的老人的能力和社会资源能否与当代城市政府的紧急项目、原则和社会服务战略有良好的匹配。

在第四章“公共关系治理”中,我考虑了作为灾难中紧急政治反应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即城市的公共关系运作在危机中的表现。通过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对政府部门在暴力事件中推卸责任的方法的分类,我描述了政府官员如何花言巧语地避开了因灾难所受的责任,并把公众批判的声音引向其他组织。

在第五章“引人注目的城市”中,我叙述了对一个当地新闻编辑室的观察和 20 多次采访。采访对象包括记者、编辑和为一家芝加哥的主要媒体报道热浪信息的经理。实地考察的目的在于观察主流媒体对灾难报道的过程。这种调查也打破了探究灾难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研究常规。虽然这一章从对新闻界整体报道的内容分析开始,但不只是简单地展示记者们对事件报道的维度,或者是专注于分析这种新闻报道形式的成因。恰恰相反,本章分析了热浪事件新闻和信息的文化生产过程,描述了媒体是如何利用组织结构和职业实践把这次公共卫生危机转化成一个公共新闻事件而报道出来。作为“公共领域的守门人”,媒体完成了至关重要的文化重建的工作,而不仅仅是为观众报道重大新闻。社会科学家已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研究过新闻编辑室,但是近几年来,他们很少能解释社会的、技术的和组织的环境是如何在这个数字化时代改变新闻的收集方式的。仔细观察热浪事件背后隐藏的故事,为我们观察大城市新闻媒体新闻产生过程提供了一个视角,这个视角很难通过其他方式获得。

在本书的结束部分,我回顾了最近的芝加哥热浪事件,并解释了为什么在热浪中即使是最有效率的政策也不能排除灾难将会来临的风险。对灾难造成死亡这一现象的社会剖析,证明了只要存在极度的脆弱、孤独、贫困这些城市环境的典型特征,像“炎热”这种外部因素还会继续造成灾难。后记“永远在一起”,提供了一个令人警示的关于人们之间互不关心所带来的可怕后果的故事。



## 第一章 独自死亡：孤独的社会生产

2000年夏末，我与热浪的死难者们做了最深切的个人接触，那时 37  
他们已经去世五年了，所以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会面。县政府的一个  
团体向我发出了热情的邀请，这些人为“人们自生自灭的神秘城市”工  
作着。这个邀请使我获得了难得的机会。

在获邀请的几周前，我看到一篇文章，文中介绍旧金山越来越多的人  
人在孤独中死去，但旧金山的穷人和老年人口比芝加哥少得多。在这  
一年的上半年，旧金山官员发现了许多孤独死去的事件，其数量与前十  
年的总量相当。文章指出：“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孤独中死去，没有人为  
他们举行葬礼、接收他们的遗产或者去追思他们的过去。有时，当政府  
官员找到继承人时，尸体已经在太平间待了几个月。”<sup>1</sup>在旧金山，公共  
事务管理办公室负责此类事件的调查，并将死者的资料保存五年以备  
查阅。这篇文章几乎是在芝加哥热浪五年后发表的，所以我想知道，库  
克县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是否还把它们在大灾难的调查记录保存下来  
了。我打了个电话，确认库克县实际上保留了这些灾难的资料，并从  
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将文件编目存档。当地官员说，在90年代，  
他们每年差不多有1000—1200个调查案例——几乎每天要完成3个。  
1997—1998年，案例总量猛增到1370个；而在1998—1999年——有  
数据记录的最近一年——总量是1562个。当天我就给库克县公共事  
务管理办公室写信，申请查阅这批档案。

不久，我就坐在县行政大楼第26层的会议室内，周围有差不多 38  
160份官方报告和装满私人物品的盒子——手表、钱包、信件、退税单、  
照片和记事本——这些都是在热浪死难者家里或者身上找到的。在调



查的前五年时间里,我跟一些死难者的邻居、朋友还有家人交谈过;仔细考察在热浪死亡率异常高的社区;拜访死者的居所和临时居住的旅馆;花时间在太平间寻找死亡证明并访谈首席法医鉴定人;查阅警察局记录、公共卫生档案和流行病学研究文献;读了上百篇相关新闻报道;看了电视台的许多报道;采访了护理人员、警察、医院处理尸体的工人和热浪那一周的幸存者。然而,只有死难者档案让我以一种亲近的、人性化的态度来看待这些孤独的人们:在密封房间中,他们的生与死显得没有分别。

公共事务管理者对房间的描述很准确但又非常简略,用直白的缩写表达来概括死难者的寒酸:“房子有装修”,很多报告是这样开始的,显示了死在城市一居公寓的基本情况;“蟑螂滋生”和“非常杂乱”,这也很常见。多数报告中包含了调查人员拍摄的现场照片:其中一些显示出无人打理的样子,几乎没有人生活过的迹象;还有一些照片里堆满了各种物品,仿佛说明在孤独的世界中物质商品已经代替了人类的陪伴。<sup>2</sup>死难者年轻时候的照片和纪念品使我从这些破败场景中稍有释怀。比如,有一个男人,死去的时候旁边有两张年轻时穿军装的照片,还有一枚表彰他二战时地面作战行为模范的铜星勋章。然而,这些以往的生气勃勃和成功荣誉被打破了:现实是,人们的安全是如此转瞬即逝,城市的苦难深渊是如此深不可测,而掉入深渊的人们又是如此无人关注。

死者的私人信件表达了由孤独而产生的交流渴望,进一步暗示了死难者没有社会联系的苦楚。在热浪的几周前,一个上北区的旅馆住户给他住在不远处却感情疏远的朋友写信:“你有时间的话,请来我家找我吧,”他写道,“如果你来这个城市并且方便的话,我希望能见到你。可以的话,给我写信吧,我很乐意听你的事。”就在7月前,另一个死在相同旅馆的住户收到了一封远房亲戚的来信,写信人预见到了死者的不幸,尽管死者那时才53岁。信中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当我知道你的困境和疾病时非常难过,对我来说,我们应该好好相处,并且成

为朋友。在我们生命快结束的时候，一切应该有所不同的。”

调研热浪使我对一系列著名的书籍和学术出版物熟悉起来。这些书籍和出版物都热情地称赞那些生活丰富多彩并建立交际网的独居者，而无一不忽视独自生活的难处，尤其对老年人来说。一些著名的作者，诸如罗伯特·科尔斯(Robert Coles)、阿莉·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和芭芭拉·迈耶霍夫(Barbara Meyerhoff)已经出版了精彩而富有影响力的论著，讨论老年人即使与家人和朋友分开也一样的有活力；甚至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因20世纪90年代研究美国越来越多的人独自打保龄球而被大众推崇的学者，也强调说，相对于其他群体，退休老人是这个国家最活跃的参与者。然而，这些鼓吹年长者独自生存而保持活力的作者们没有一个证明他们的研究对象是有代表性的还是特殊的。事实上，霍克希尔德说明了她的文章有趣的地方正是因为文中的研究对象并不代表多数的老年人，但是其他的作者只是简单地避开了这个问题。<sup>3</sup>这些研究做出了许多重要工作，说明了人们可能老有所为的一些必要环境，但是书中很少提到被剥夺了这种机会的老年人。那些离群索居的老人与以上书中出现的老人一样没有代表性——但是，他们在文献中的被忽视留下了一个知识空白，而我面前的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的档案恰能填补这个空白。

科尔斯的书《老龄化和自立》(*Old and On Their Own*)是那些作品中最新的，也是唯一关注老年人独居问题的书，该书收录了美国老人幸福老年生活的图片和文字记录。他在书中描述，那些老人的成功是因为他们能够在独居期间“坚持——并尽可能维持那些高于个人的隐私、独立、权力和家庭规矩等的生活追求”。<sup>4</sup>科尔斯提供了许多年长者的照片和故事，这些人努力地度过每天独自老去的挑战，而他们最后都胜利了。他们成功地，按照有些人的说法，“躲避了……子弹”——身体机能的下降、无聊、失望、孤独、疾病、瘫痪、体力不支和向死亡的不不断接近。科尔斯和他的被调查者都不曾否认独自老去的困难，然而，《老龄化和自立》中的描绘几乎没有注意到在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档案中那些显

而易见的现象。这就好像是这些最孤独、最容易受伤害的老人的故事被剪辑了,因为他们破坏了书中乐观的格调或者也有可能他们这些例子很难被纳入这类书中。

科尔斯和摄影师删去那些生活最凄惨的例子,仅仅把这些现象都当作不存在,或者说是我们都无法正视的阴影。长寿意味着有新的机会去创造,去建立或者发展有意义的关系,为社会、家庭、朋友做贡献,而如果只强调独自老去的后果或者被孤立所产生的异常问题就显得误入歧途了。然而,如果强调长寿而不去严肃思考生活的质量,或者让那些幸运的独居老人的成功蒙蔽了我们的双眼,以致不能看见那些由于大部分时间独居而遭受更多生活苦难的老人,那么这同样也是误入歧途。

当我发现警察关于热浪死难者的记录材料时,那些《老龄化和自立》中的种种描述和我所了解的芝加哥故事之间的不和谐感越发引人注目。在库克县太平间档案里,有一份芝加哥警察急促之中填写的报告。报告显示,许多死难者的死亡环境突显了他们生活的孤独和尊严的丧失。

#### **男性,65岁,黑人,1995年7月16日**

调查官发现门从里面用门链锁上了。敲门和打电话都没有反应。调查官……切断了链子进入房间。调查官发现死者背部着地躺在里间卧室的地板上。(邻居)最后一次和死者的说话是1995年7月13日。附近居民没有及时发现死者。死者身体已经完全僵硬。调查官不能确定如何找到死者家属。

#### **女性,73岁,白人,1995年7月17日**

死者已经隐居10年,从来不出门,今天被儿子发现,送医院前已经死亡。当调查官进房间时温度计指示华氏90度以上,没有通风,除了儿子打开的窗户(死后)。可能是中暑死的。10年前被查

出有心脏问题，但从来没有治疗。

### 男性,54岁,白人,1995年7月16日

调查官了解到……死者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了。……附近家属都无法联系上。死者的房间热得令人不舒服。患有糖尿病,负责的医生不详。死者有一个女儿……姓氏不详。死者多年没有见她。尸体被送到库克县太平间。

### 男性,79岁,黑人,1995年7月19日

自1995年7月16日星期日开始,敲死者的房门和打电话,都没有反应。死者生前很安静,常自己待着,有时不开门。……房东……没有任何死者亲属的信息。……门链挂着。调查官可以看见死者在沙发上,身上有苍蝇,有很浓的尸体腐烂气味。经房东允许,调查官切断门链,叫来法医鉴定人,批准移走尸体。……暂时不知道死者的亲属。

这些记录都不足以说明受害者的死亡,但是用来描绘死者的——“隐居”、“自己待着”、“不知道死者的亲属”——还有死者被发现的环境——“门链挂着”、“没有通风”、“身上有苍蝇”、“尸体腐烂”——是对死者所处的抛弃、退隐、孤独状态的残酷而简洁的证明,隔绝状态被证明在芝加哥热浪中不但是致命的,而且是广泛存在的。然而,像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的这类报告文件,其引起的关于这些房间中的生活的问题比其解决的还多。

这一章通过对个体孤独背后的群体机制的分析来研究热浪之谜的第一个层面。有两个问题引导着这个调查。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成百上千的芝加哥人在热浪中独自死去?第二个问题是,从热浪时期延伸到如今,为什么有那么多芝加哥人,尤其是老年人,独自生活,社会交往有限,而且日常生活缺少网络的支撑?

1. CLASSIFICATION (Check One)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DEATH <input type="checkbox"/> SUICIDE <input type="checkbox"/> ATTEMPTED <input type="checkbox"/> SUBG SUICIDE			INJURY TO <input type="checkbox"/> CITIZEN OR <input type="checkbox"/> 5087 PUBLIC PROP			INJURY <input type="checkbox"/> TO CITY <input type="checkbox"/> 5088 EMPLOYEE			2. BEAT/AIRT ASSIGN 2546		3. BEAT OCCUR 2535	
8. ADDRESS OF OCCURRENCE						APT. NO.		7. DATE OCCURRED		8. DATE REPORTED		
9. VICTIM'S NAME			10. HOME ADDRESS		APT. NO.		11. HOME PHONE		12. BUSINESS PHONE			
13. PERSON REPORTING INCIDENT TO POLICE			14. HOME ADDRESS		APT. NO.		15. HOME PHONE		16. BUSINESS PHONE			
17. PERSON DISCOVERING VICTIM			18. HOME ADDRESS		APT. NO.		19. HOME PHONE		20. BUSINESS PHONE			
21. NAME(S) OF WITNESSES			22. HOME ADDRESS		APT. NO.		23. HOME PHONE		24. BUSINESS PHONE			
25. TYPE PREMISES WHERE OCCURRED/VICTIM FOUND			26. CAUSE OF INJURY (INSTRUMENT OR WEAPON)		27. REASON (ACCIDENT, ILL HEALTH, ETC.)							
28. REMOVED BY			29. REMOVED TO		30. NAME/PERSON AUTHORIZING REMOVAL							
31. SOBRIETY OF VICTIM (Check One)			32. EXTENT OF INJURIES (Check One)			33. FIRST AID GIVEN BY			34. MEDICAL AID REFUSED BY VICTIM			
35. NAME AND ADDRESS OF ATTENDING PHYSICIAN			36. PROP. INVENTORY NO.									
37. NARRATIVE (THE INDICATED SOBRIETY OF VICTIM OR WITNESSES IS THE APPARENT CONDITION, WHEN REPORTED)												
IN SUMMARY: R/O'S RESPONDED TO CALL OF CHECK THE WELL REMK												
AT ABOVE ADDRESS, UPON ARRIVAL, R/O'S NOTED THERE WAS A SUSPICIOUS ODOR												
EMANATING FROM THE HOUSE WINDOWS. FURTHER THERE WAS SEVERAL BAGS WORTH												
OF UNDELIVERED MAIL AT THE FRONT DOOR. BT 254D WAS CALLED ON SCENE												
AND R/O'S WENT INTO RESIDENCE THROUGH THE FRONT WINDOW. UPON ENTRY,												
R/O'S OBSERVED THE INSIDE OF THE HOUSE TO BE EXTREMELY HOT AND THE												
WINDOWS WERE SHUT. A SMALL FAN WAS RUNNING IN THE VICTIM'S BEDROOM.												
VICTIM WAS FOUND IN BED LYING FACE UP AND PARTIALLY DECOMPOSED.												
THERE WERE NO APPARENT SIGNS OF FIGHT PLAY. ALL DOORS WERE LOCKED												
AND CHAINED FROM THE INSIDE. STATION WAS OUT OF COOKER SEALS AND R/O'S												
SEARCHED RESIDENCE THOROUGHLY. R/O'S SPOKE TO INVESTIGATOR COLLINS AT 2040 HRS												
NEIGHBORS (BOX 13) STATED THE LAST TIME THEY SAW VICTIM WAS 12 JULY												
AT 1200 HRS. ENG 35 ON SCENE TO ASSIST												
I HAVE READ THIS REPORT AND BY MY SIGNATURE INDICATE THAT IT IS ACCEPTABLE										<input type="checkbox"/> CONTINUED ON REVERSE SIDE		
38. EXTRA COPIES REQUIRED (NO. & RECIPIENT)			39. DATE INVESTIGATION COMPLETED			40. SUPERVISOR APPROVING			41. CLEARING			
42. REPORTING OFFICER (Print or Type)			43. REPORTING OFFICER (Print or Type)			44. SIGNATURE			45. SIGNATURE			
SIGNATURE			SIGNATURE			SIGNATURE			SIGNATURE			
CPD-11.406 (Rev. 9-83) RACE CODES: 1 - BLACK, 2 - WHITE, 3 - BLACK-HISP, 4 - WHITE-HISP, 5 - AMER.INDIAN/ALASK. NAT., 6 - ASIAN/PACIF. ISL.												

图 15 一份警察报告记录了死者家里的环境：“怪异的气味”、“没有打开的邮件”、“出奇地热”、“窗户关闭”。

这些问题有重要的社会和符号意义。在美国，关于“好的死法”的多数观点强调死亡过程应该发生在家里，因为对家里设施的熟悉能让临终者感觉舒服些。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应该是群体参与的，有许多在场的家人和朋友陪伴。而当有人在家独自死去时，这样的死可

以看作是被社会抛弃和失败的强有力的证据。事件发生以后,死者所在的社区可能会被耻笑,而通常社区会做出一些事后的补偿性解释,或者举行特殊的活动来重新夯实邻里关系。<sup>5</sup>

在美国,独自生活或缺乏亲密与持久的社区关系紧密相关。尽管 43 有大量证据表明,美国人在参加社会组织和社区活动中表现得非常活跃,但大城市中的一些人孤独生活的现象一直都被关注着。美国社会学在国际上的一个特色就是,研究个体的孤独与社区危机关系的著作十分受关注,该领域六本畅销书中的五本都是针对这些问题的,其中包括《孤独的人群》和《追寻寂寞》。<sup>6</sup>此外,过去 20 年来,美国社会科学中影响最广的著作中的两本,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的《真实的弱者》与罗伯特·帕特南的《独自打保龄球》,都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即社会孤独是众多不同社会问题的根源。谈论社会孤独,就像是会触及美国学术文化的中枢神经。<sup>7</sup>

## 独自生活

老年人独自生活而后孤寂地死去这一问题并非芝加哥独有。世界各地中独居的人数都在增加,这已经成为当代的一个主要人口趋势。<sup>8</sup>在美国,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最可靠的统计,独居家庭的比例,在 20 世纪稳步提高,从 1930 年的 7% 到 1995 年的 25%,而同期独居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也从 2% 提高到了 10%,美国独居人口总人数已经由 1970 年的 1090 万提高到 1996 年的 2490 万,其中 40% 多的人是 65 岁以上的老人。<sup>9</sup>正如图 16、图 17 所示,美国独居家庭及独居老人的比例自 1950 年以来一直在飙升,这些数字在最近 10 年肯定会更高。但是,很少有人针对这些人临终前的日常生活进行研究,对他们的生活体验也知之甚少。<sup>10</sup>我们甚至对那些独居的、无子女陪伴的、丧偶的、无社会关系网络的高龄老年群体了解得更少,而这个群体正在快速增长。

区分独居(living alone)、孤独(being isolated)、隐居(being reclu-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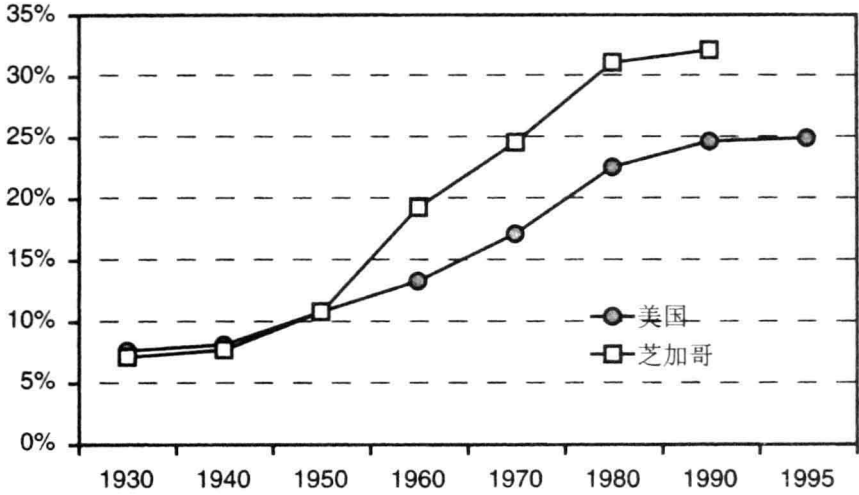


图 16 美国和芝加哥独居家庭的比例。资料来源:《美国统计摘要》(1980, 1989, 1999), 美国人口普查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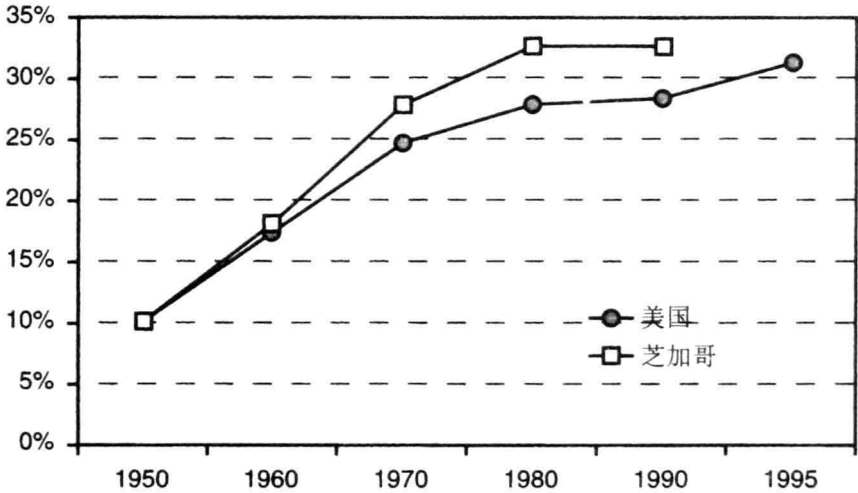


图 17 美国和芝加哥 65 岁以上独居老人的比例。资料来源:《美国统计摘要》(1980, 1989, 1999), 美国人口普查局。

sive)和孤单(being lonely)的概念是很重要的。我把它各自做了定义:独居是指一个人在一所房子里单独生活;孤独是指缺乏社会关系;隐居是指大部分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常出门;孤单指主观上的寂寞感觉。<sup>11</sup>独自居住的人,包括很多老人,他们并不孤单,而且也没有丧失朋友圈子。这点很重要,因为很多积极嵌入社会网络的老人比那些



与社会相对分离的人健康状态更好、更长寿。孤独或隐居与独居相比，<sup>45</sup>有更多的负面影响。不过，独居老人往往比与其他人住在一起的老人更容易失望、孤立、贫困、产生对犯罪行为的恐惧，而且他们不能及时获得周围人的帮助。此外，独居的老人更容易在危机情况下受到伤害，因为周围没有人帮助他们认识到危险，及时提供应急关照或者启动救助网络。<sup>12</sup>

孤独和隐居的人数难以测量。首先，鉴别并联系孤独者和隐居者非常困难，因为他们一般与研究人员和救助网络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系很少。其次，研究者已联系上的孤独者和隐居者往往在研究过程中发生社会联系上的转变。在调查与统计中，孤独者和隐居者属于一个比较难于统计的社会类型，这些人经常拒绝陌生人家访而且不太喜欢参加社会活动，更无法被研究者追踪了。在学术研究中，低估老年人的孤独或隐居的程度是常有的事，这是由于很多学者研究的样本实际上已经与外界的相对联系比较多了。比如，最近一本关于晚年孤独的书就仅仅基于一个参加过老年大学的群体而对孤独和隐居现象的普遍性进行了归纳，<sup>13</sup>甚至在对老人健康状况的医学研究中，那些医生和研究团队无法接触的人们往往也被排除在外。

这些方法上的问题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孤独者和隐居者在总人口中甚至是老年群体中的比例至今没有系统的数据。<sup>14</sup>但是，另一个原因是，尽管国家对这些孤独的社会现象长期以来都很关注，但很少有学者或研究机构对真正孤独的人群表现出研究兴趣。美国的不少市政府越来越多地意识到，独自居住及隐居现象的增长将对社会服务提供者和公众健康计划提出很多新的挑战，而这部分地是由于公共部门或警察局提供的死亡报告。芝加哥最大的老年人权益倡导组织之一的主任说：“有成千上万的老人孤独地生活着，而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sup>15</sup>

尽管在城市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没有意识到，但没有任何社会关系的独居的普遍性和危险性在热浪期间的死亡模式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对这场灾难曾做过深入流行病研究的作者称，“在芝加哥 1995 年的高





图 18 热浪时,一位年老的芝加哥人在密歇根湖边散步。资料来源:《芝加哥太阳时报》,安德烈·钟摄影。《芝加哥太阳时报》授权许可,2002年。

- 46 温中,能够促进社会交往的相关行为,不管是参加了一个俱乐部还是养了一只宠物,都会降低死亡的风险。”独自居住“将会使死亡的风险加倍”,并且“那些不是每天都出门的人更有可能死亡”。<sup>16</sup> 身体健康情况

差甚至卧床的人,如果没人照顾,在热浪中的死亡率最高(图 18、图 19)。

47



图 19 停电后,一位年老的芝加哥男人正在自己家中纳凉。资料来源:ABC7, WLS-TV 友情提供。

## 孤独的社会生产

尽管热浪的流行病学报告指出了灾难中社会孤独和死亡率的关系,但他们并没有深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芝加哥人独自生活,孤单死去。调查热浪的政治委员会(political commissions)给出了两个主要的结论:第一,和历史比较,目前更多健康状况欠佳的人独自度过老年生活,高温对他们脆弱的生活充满威胁。第二,很多独居的人以自立生活为荣,他们倾向于避免向他人求助或者接受别人的帮助,因为这样做与他们自己能照顾好自己的信念相矛盾。结果正如受热浪袭击的各州州长的报告中说的那样,“风险最高的群体反而最不愿意得到政府的帮

助”。<sup>17</sup>

这些解释都有合理的成分,我将在本章中认真对待,但是它们都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那么多芝加哥居民会在热浪中孤独死去,也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众多独居者还在保持独居。城市评论家简·雅各布斯<sup>48</sup> (Jane Jacobs)认为,“让人们变得如此孤独可是很不容易的”。美国人个体化与社会分离达到如此极端的地步,这个现象仍然很神秘。<sup>18</sup>深入了解造成芝加哥人对热浪如此没有抵抗力的那些条件,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楚城市的社会变迁,这些变迁使城市中的孤独现象越来越明显。

本章关注四种趋势,所有这些有助于说明日渐增长的贫困和老年人群的脆弱性。

- **人口变迁**。独居人数增加,特别是伴随着残疾、行动障碍和社交障碍的老年独居人数增加。
- **与犯罪有关的文化条件**。源自日常生活中的实际暴力与感知暴力的“恐惧文化”与美国人尤其是老人和男性中长期的隐私保护、个人主义、自我独立相结合。<sup>19</sup>
- **空间转换**。公共空间和政府住房体系如公共住宅群或一居公寓的退化、强化或者消失,尤其是在那些贫困、充满暴力和疾病集中的地方。
- **性别差异**。男性老人,尤其是没有子女的单身的那些烟酒或者毒品成瘾的男性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容易丧失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中关键的部分。

总之,这些条件对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形成了新的潜在的风险,对城市的日常生活造成非常严峻的挑战。本章对这些条件相继进行讨论,然后展示当这些条件集中在孤独老人聚集地区时的巨大破坏力。我们从独自变老的讨论说起,之后描述一个在热浪中勉强维持生存的芝加哥老妇人的案例。接下来,讨论犯罪和暴力对城市老人孤独状态的影响,这些老人的日常行为和社会活动被恐惧以及种种不安全的因素所包围。最后,本章对老年公寓与一居公寓这两种特殊的社会环境

的差别进行评估,分析 20 世纪 90 年代这些场所的公共空间情况以及其居民的集体生活。

## 独自变老

如果说热浪是孤独所带来危险的最生动表现,那么对一些熟悉这些问题的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来说,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在 1988<sup>49</sup> 年,联邦基金会(Commonwealth Fund)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独自变老:概况及预测》。这是一份广泛散发的研究报告,报告强调美国社会普遍的老龄化趋势,重点指出 85 岁以上高龄老人急速增长,而这类老人非常有可能变得孤单、脆弱,不能也不愿意离开家门出去活动。<sup>20</sup> 据粗略统计,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65 岁以上的美国人中大约有 1/3 是独自居住,而 80 岁以上的长者中,超过一半是独自居住,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这一比例还在提高。

独自变老这种现象引起政府部门和服务机构的关注,他们发现独居的老人多数是女性,而其中 2/3 的人已经丧偶。阶层地位是孤独和独居的决定性因素。研究显示,三个贫困的老人中就有两个是独居的,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情况,因为贫困的老人比那些经济有保障的人健康状况更加堪忧(44%对 22%),在洗澡、穿衣及其他日常生活方面有更多的障碍(34%对 17%),每周至少一次情绪非常低落的比例也比较高(47%对 24%)。孤独和沮丧的结合经常导致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因为独自居住会导致沮丧,进一步降低和别人沟通的能力,继而又加重自己的沮丧,如此反复下去。<sup>21</sup>

膝下无儿无女的老人会比有儿女的老人更容易变得孤立无援。与儿女的关系是维持一个良好社会关系网络的关键,当孩子去世或者远离年迈父母的时候,老人在照顾上受到的损失是其他亲朋好友所无法弥补的。那些非裔老人更有可能在生命的暮年变得孤单,因为有调查显示,儿女死亡的或者服刑的老人中,黑人比白人的比例要多得多。就

与儿女的疏远程度来看,男性老人比女性老人也高得多。<sup>22</sup>那些有精神问题且烟酒或毒品成瘾的人,尤其是那些没有得到相应照顾的人,也有可能老年孤单,因为他们常常使得自己和亲人朋友的关系变得窘迫并且很难融入到社会团体中。

紧张或疏远的家庭关系是历史上老人孤独的一个共同话题。“独自变老”报告表明,所有独居老人中,18%的人在有需要时没有亲戚可以帮助他们度过几天时间,28%的人无法找到为他们提供持续几个星期帮助的人。尽管大多数孤单的老人经常跟他们的家庭成员交流,但还有 27%的人没有儿女,6%的人没有电话。在那些有儿女的老人中,60%的儿女最多一周看望老人一次,20%的人最多一年看望一次。在那些更需要精心照料的 85 岁以上高龄的老人中,他们得见自己儿女的频率比其他老人也没有明显的提高:他们中的 32%能每月见儿女一次,75—84 岁的老人中这个比例是 24%,而 65—74 岁的老人中,这个比例是 22%。2/3 的老年人没有儿女每月的定期看望。

也许老年孤独这个话题中最惊人的发现是老人与他们的家庭和朋友失去联系的程度。生活在贫困线下的所有的独居老人中,1/3 每两周都不和朋友以及邻居见面,1/5 的人从不与朋友进行电话交谈。那些没有儿女或者跟家庭成员疏远的老人更容易老来孤独,远离社会的支持。而在美国,汽车的普及率较高,家庭成员经常一起开车出去玩,老人则更容易与他们失去联系。研究显示,对于老人来说,与朋友或家人空间上的距离是影响社会联系及社会救助的决定性因素。芝加哥往大移民期间,1950—1990 年,芝加哥的总人口数量减少了 100 万,很多人丧失了他们一半数量的邻居,这使得老人有更多的可能性变得独居。移民和分家是 48%的芝加哥市民、35%的 65 岁以上的郊区居民声称没有家庭成员照料的原因之一。<sup>23</sup>

很多老人有专门的居住环境,大多数的老人还是住在公寓或者自己的房子里,这是很多美国人度过余生的地方。尽管很多孤独的老人忍受了数十年的边缘化或者疏离感,但大多数人终生都在迁移,这在美

国人看来是正常的。下面的保利娜·扬科威茨的故事可以说明，芝加哥这种城市中的孤独超出了一般的社会过程和个人经验。死亡，不一定非要受到伤害，还可能仅仅因为独自一人居住。

## “我差点就死了”

保利娜·扬科威茨在热浪中幸存了下来，她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这个城市独自变老的一些基本特征。在保利娜 85 岁生日时，我 51 第一次见到她，当时我被“老年小兄弟会”(Little Brothers Friends of the Elderly)指定为她一天的陪伴者，这是一个旨在为老人找到志愿者陪伴，并邀请老人到组织中心过生日、过感恩节和圣诞节的非营利性国际组织。尽管在那天之前我还是她的陌生人，当我从她已经生活了 30 年的东北区公寓接到她之后，我很快就变成了她关系最近的伙伴。

我和保利娜通了电话，接近中午的时候我才到她家，她正等着我。她住在一个安静的居民区，满是芝加哥常见的三四层小公寓楼。她家的社区，是城市移民搬进搬出的重要地段，这个地方在她居住期间变化很大。原来的白人聚集区现在变成了有很多亚裔居住、墨西哥裔不断增长的混合街区。这个城市的一角还是她的家，但是她感到不太舒服了，因为邻居们都不认识她。“他们是很好的人，”她解释说，“但是我不认识他们。”她的情况和成千上万的芝加哥人、全国各地上百万的老人一样，在他们的一生中，周围的环境变化很大，很多老朋友纷纷离开。

还有个让保利娜感到不舒服的原因是她身体大不如前，这一点随着年龄的增大越来越严重。膀胱问题经常使她小便失禁，腿脚不便的她必须拄着拐杖行走，这极大地限制了她的活动空间。对广播和电视中经常报道的那些犯罪的恐惧使得她不怎么出门。“芝加哥简直就是个射击场，”她跟我说，“因为走得慢，所以我简直就是个活靶子。”她非常了解自己的这些弱点，在外界威胁面前尽可能少暴露自己，而把自己关在一个三层高没有电梯的公寓楼里。她出去和回家的时候楼梯都会

给她带来很多困难,但是她更喜欢住在高层,因为“比一楼要更安全些……住在一楼我怕有人突然闯进来”。由于有一个家庭护理人员,有送餐服务,有一个领政府津贴的照顾者每周帮购物或者干些杂事,她就更没有什么理由离开家了。“我大概一年只出去六次”,她说,“其中有三次是老年小兄弟会组织的庆祝活动。”

52 老年小兄弟会是美国为数不多的几个旨在解决独居老人问题并帮助他们建立社会关系的组织之一。在1997年,该组织在芝加哥曾经对独居老人进行了8000次以上的登门拜访和11000次的电话访谈,邀请至少2000个独居老人参加各种节日的庆祝活动,举办了不少于1800次的生日庆典。“问题在于”,该组织在一篇报告中明确指出,“孤独和寂寞……我们的角色就是变成这些老人的永不分离的家人和朋友。”<sup>24</sup>

我知道,老年小兄弟会能联系上这些老人是不容易的。在生日庆祝会之前,我帮着保利娜下楼都很不方便。在下楼梯的过程中,她还因为某个难于启齿的问题而转身回到房间。她痛苦的表情和叹气声都能让我感到她走路时的痛苦,但是外出也让她很有兴致,她甚至催促我尽快到达活动中心。我当天本来还要接其他两个老人到俱乐部参加活动的,但是,当我到达他们的公寓门口时他们却告诉我决定待在家里。

保利娜来参加这一聚会还有个动机,就是她两个电话聊友中的一个,埃德娜,当天也在。她们两个住的地方仅有几个街区之隔,但她们仅在老年小兄弟会组织的活动中见面。她们两人见到对方都异常兴奋,以至于埃德娜在聚餐之后跟我说要跟我一起送保利娜回家,这样她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待在一起。

埃德娜相对来说出门的机会更多一些,不过,她们两个都承认电话是她们与外界联系的主要方式。保利娜有两个经常联系的电话密友,其中一个关系非常亲密,但彼此相距很远。有几个朋友和自己的家人也偶尔会给她打电话。保利娜有两个孩子,都不在本州居住,但是会不定期地回来看她,并且每周都会给她打电话。尽管过生日时两个孩子都会打来电话祝贺,但是他们都不能亲自前来。



保利娜其他的陪伴主要就是媒体，如电视和广播，还有就是各种邮件中收到的奇闻怪事。她的一个邻居把邮件带到她的公寓并且留在了她门外擦起来的箱子上。这样她不需要弯腰就能拿到。最近，保利娜开始给电视脱口秀的现场打电话，她喜欢讨论政治丑闻和地方问题。热浪时期，她和她的朋友经常彼此联络以确保他们能照顾好自己，正是这些社会联系使得她在1995年的热浪时期活了下来。 53

保利娜知道我在做关于热浪的研究，在其中一次对她的访谈中，她说她想要告诉我她的故事。“我曾经那么接近死亡”，她轻轻地说，保利娜的公寓一到夏天就会非常热，因为只有一个空调，而且在三楼。但是空调“很旧，制冷效果不好”，热浪即使没给她带来什么危险，也让她在公寓里热得很不舒服。她的一个朋友告诉她，如果在房间里太热的话，最好走到屋外去，所以在热浪最热的日子里，她早上很早就起床了（那时候外边比较安全），去当地的食物杂货店买樱桃，“我最爱吃的水果，但是很难买到新鲜的，所以这对我来说非常棒”，并到有空调的商店乘凉。“当我走下楼时真的是精疲力竭了，以至于想直接掉头回去”，她回忆道，“但是我还是走到了街角，乘上公交车到达了几个街区以外的商店，到了那儿时我几乎不能动了，我不得不斜靠在商店外的墙上，让自己休息一会儿。”但是商店里的冷气让她重新恢复了活力，使她能买上一大袋樱桃并乘公交车回到家。

“爬上楼几乎是不可能的”，她回忆，“我又热，浑身又是汗，而且太疲惫了”，当保利娜回到自己的公寓时，以最快的速度给她的一个朋友打电话，当她们开始聊天时，她感到手开始有点麻木和肿痛，这种感觉马上蔓延到她身体的其他部分，提示她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我叫我朋友不要把电话挂断，但是我却把电话放下并且平躺下来。”几分钟后，她的朋友还未挂线但听筒还在地上，而保利娜站起来，用水冲了头，用电风扇直吹向床，再次躺下，用湿毛巾放在身上和脸上。这时，她才想起来，她的朋友还等着，保利娜起身，接起电话表示她感觉已经好多了，并谢谢她的朋友一直等在那边，之后挂了电话。最后，她再次躺下来，



静静地休息了好一会儿。不久,她就完全恢复了。

“现在”,她说,“我有一种特殊的方法对抗炎热,或许你会觉得好笑,我最喜欢去一趟加勒比海邮轮”——就一个人,她没有离开家却几乎能做所有的事儿。“我拿了几条毛巾把它们泡在冷水中,之后把它们放在我的眼睛上,我就看不见了,我躺下来并用电风扇直接吹,湿毛巾和电风扇的风给了我丝丝凉意,我想象自己处在环岛旅游的‘邮轮’上。只要一热,我就这样做。你都会惊奇那有多么的舒服,我的朋友们也都知道我的‘邮轮’,所以当他们在炎热的天气给我电话时都会说:‘嗨,保利娜,你的旅行怎么样啊?’他们有点嘲笑我,但是这种方法却使我活了下来。”

保利娜的这个事例不是特例。威斯康星大学的教授沙伦·基夫尔(Sharon Keigher)对芝加哥的老人们进行了多年的居家风险研究。其研究提到了一个通过芝加哥紧急服务系统项目确认的女性案例。她对这名妇女薇奥拉·库珀的解说显示出,当极度贫困伴随的时候,孤独生活会多么困难。

类似风险……还有薇奥拉·库珀,一个一直独立住在小公寓中的70岁的瘦弱黑人老太太。她非常热情,带着缺着牙的笑容在大厅把我们迎了进去。她的三间公寓里摆放着破旧的家具,脏乱,寒酸。这套公寓花去她每月490美元收入中的250美元作为租金,这和之前紧急服务人员发现她时她所居住的一个公寓相比并没有多少改善。

她被老鼠咬了脸,得了感染,在医院紧急护理了8天才回家。她是在房间睡觉的时候被老鼠咬的。两年前的一场火灾使紧急服务中心决定维修她的房间,而且认为搬迁没有必要,虽然后续服务记录下了她所居住的恶劣环境。

幸运的是,一个被市政府指定的私人机构提供给她一次搬家

的机会,并给她配了一些家具……她现在居住的地方离她常去的教堂太远了。在最初的几个月,她没有自来水和抽水马桶,而她在这所房子中唯一的朋友也在几个月前死掉了……孤独、病痛和绝望,生活的恶劣环境使她的身体每况愈下。<sup>25</sup>

## 暴力和孤独

保利娜·扬科威茨和薇奥拉·库珀仅仅是20世纪90年代独自生活在芝加哥的11万老年人中的两个;尽管在与社会融合方面有很多的障碍,但是保利娜在城市东北部居住比那些生活在其他地区的老年人更安全。那些暴力犯罪较多的地区对本地居民的活动产生了真正的障碍,而这段时期,芝加哥正是美国最危险的城市之一。1995年,在所有人口超过35万的美城市,芝加哥抢劫率排第六位,严重斗殴事件排在第五位。而到1998年,谋杀案件已达到全国最高水平的698件,超过纽约差不多100件左右,尽管芝加哥人口还不到纽约的1/3。

更重要的是,就在热浪发生的一周前,芝加哥经历了一系列谋杀事件,从而使生活在犯罪发生地的人们高度紧张。从7月7日星期五到7月13日星期四,城市共发生24起谋杀事件。在《城市谋杀随着温度计上升而增多》的头条新闻下,《芝加哥论坛报》声称每年夏天暴力问题上升的现象已经开始,“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区,该地区发生了异常高的致命的暴力行为”。<sup>26</sup>接下来的一周内,同一地区也接连出现了与热浪相关的异常密集的死亡。虽然这些死者不像是枪击的目标,但是住在暴力区域的老人拒绝在热浪期间离开他们的家,他们有理由认为,他们在街道将会面临潜在的风险。

最近几年,有一些研究成果显示,生活在暴力和生活状态持续恶化的城区的老人比那些生活在稳定地区的老人更孤独,对犯罪更加恐惧。<sup>27</sup>在这些经济落后、政治上被忽视的街区产生恐惧和孤独有以下原因:缺少商业场所和服务把人们吸引到街道上来;不利于出行的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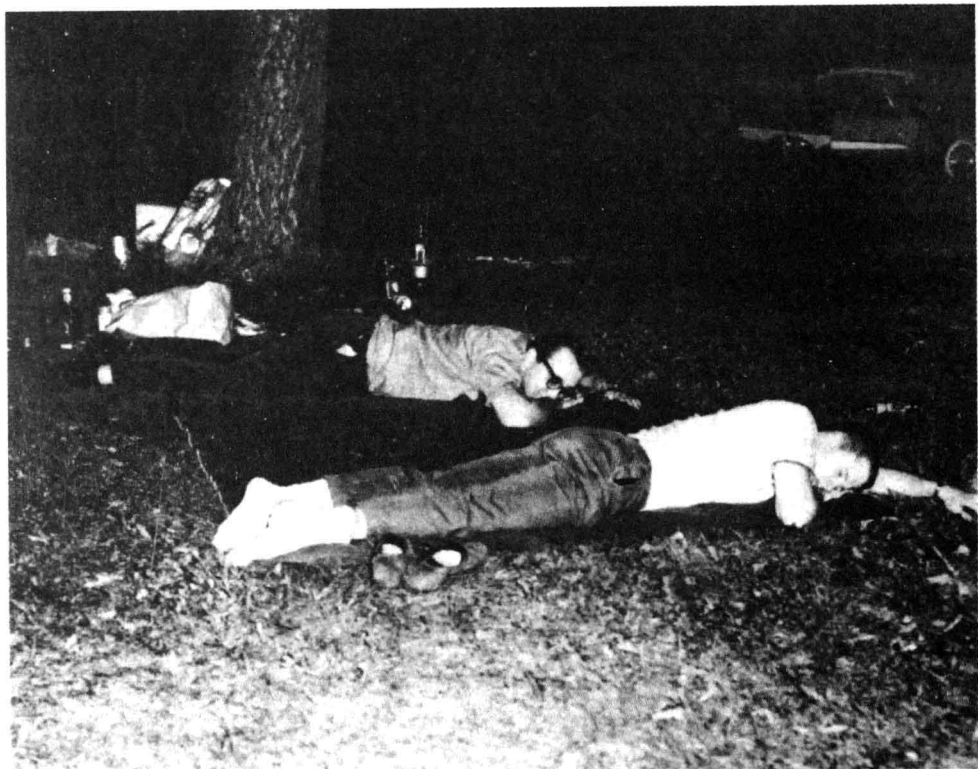
如破旧的楼梯、高低不平的人行道和不能发亮的路灯；杂乱无章的街道对心理上的负面影响；忽视当地基础设施的冷漠的政府部门；高犯罪率导致的信任感与社区互惠关系的崩溃。<sup>28</sup>更极端的例子，正如社会老年学家埃斯蒂纳·汤普森(Estina Thompson)和尼尔·克劳斯(Neal Krause)指出，公共空间恶化而产生“规避行为”“在老年人中如此流行，以至于很多人生活在‘自我软禁’状态中”。“即使人们由于对犯罪的恐惧而仅仅部分地减少了自己的户外活动，他们仍然比那些较低恐惧水平的人们失去了更多面对面接触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对获得帮助十分重要。”<sup>29</sup>

## 56 恐惧文化

美国城市的老年人不是唯一通过减少他们在公共场合的活动时间和社会联系以降低来自街道的风险的人群。近十几年，包括伊莱贾·安德森(Elijah Anderson)在内的一些社会学家表示，社会规避和隐居已经成为那些生活在高犯罪地区的城市居民必不可少的保护策略。<sup>30</sup>此外，那些生活在相对安全地区的美国人也受媒体所报道的犯罪和风险的恐惧文化所影响。像芝加哥这样的城市，一种对犯罪的普遍关注已经成为日常文化层面中的重要部分，在人们日常活动时空中扮演关键的角色，很多人不敢在夜晚出门或是到访“危险区”，这也在影响着人们对住房、工作和孩子教育的地理选择。<sup>31</sup>

根据那些关于热浪的评论，热浪期间城市中多数公园和沙滩在晚上空空如也，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芝加哥人对城市生活风险适应的一个指标。在整个城市中，特别是在那些高暴力犯罪率的地区，人们宁愿在酷热的房间中忍受，也不愿意像他们的父辈那样走出房门共同避暑。“如果在那些闷热的晚上睡在公园或待在屋外，你简直就是疯子，想自杀或是一个无家可归者。”鲍勃·塞克特(Bob Sexter)在《芝加哥太阳时报》的文章下面放了一张照片，上面是在1964年一个宜人的夜晚，两

个男人在港口边休息。“芝加哥人在以往的炎热日子里也有数以万计的人一度靠这种方式避暑。”<sup>32</sup>



57

图 20 1964 年热浪期间,有人睡在户外。资料来源:《芝加哥太阳时报》,《芝加哥太阳时报》授权许可,2002 年。

例如,在 1955 年那特别强烈的热浪期间,数以千计的家庭带着他们的寝具和食物在户外的公园、沙滩上搭起帐篷,或者只是简单地把帐篷搭在屋外的门口。在当时,只有少于 10% 的芝加哥家庭有空调,而这个行之有效的简单做法使 1955 年的死亡率仅仅是 1995 年热浪期间的一半。艾伦·埃伦霍尔特(Alan Ehrenhalt)说,在 20 世纪 50 年代,芝加哥贫民区的街道和公共场所强有力地支持社会活动,还为市民提供安全的空间聚集在一起。埃伦霍尔特描述了布朗泽维尔(Bronzeville),一个芝加哥的黑人聚集区。作为 20 世纪 50 年代城市环境的一个典型,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公共空间”。夏天的傍晚,漫长的社区节日,街区内的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参与,最后活动结束了,人们“睡

在防火通道消暑”。<sup>33</sup>

对这种带有浪漫甚至怀旧的观点持谨慎态度是有理由的。如果说,夏天睡在户外的景象常常被作为一个主要因素来描绘城市衰退,老年芝加哥居民对此具有强烈而深刻的记忆——包括那些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住在城市贫民窟的居民——这种记忆是很难抹去的。<sup>34</sup>一个从50年代后期开始住在北朗代尔的70多岁的非裔美国人尤金·理查兹,回忆起早期的日子,“天气变得越来越热,整个街区的人都会去加菲尔德公园,然后人们就睡在屋外,我们也带着毯子和枕头出去,人们睡在长椅上或草地上。我们把狗留在院子里,就是这样”。我问尤金人们是否在1995年的热浪时也去公园,他疑惑地看着我,轻笑着说:“去哪?现在?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不,不,不,没人能在那儿睡觉,我在晚上甚至不会在那儿附近走,太危险了,你不要觉得自己有多幸运,凌晨两三点还在外面的人,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你要小心。”

热浪期间的这种心态的另一个证明是,许多芝加哥的老人不愿打开他们的窗户并且拒绝配合那些跟踪调查他们并试图帮助他们的志愿者和城市工作者。虽然极端天气状态市长委员会抱怨这种行为是一个老人保护他们的独立和拒绝面对自己弱点的一个标志,这里面还有更多的问题并没有揭露。把陌生人拒之于门外已经成为独自生活在城市中的老人生存的一种策略。“如果有人到了我家门外,我也不会开门”,一个70岁的老妇人在当地教堂的一次谈话中对我说,“你不知道门外是谁,只有透过门洞来说话。”

社区中行为不端者、私人公司、邮购业务和推销员都一再把老年人当作牺牲品,而老人们抱怨在日常生活中时常感到四面楚歌。骚扰者可能是当地的流氓,这些人在月初时候总是特别关注社会保障所给老人们邮寄的支票;可能是推销员,试图劝说老人花掉本已有限的金钱。老人接触这类骚扰而形成的印象导致他们对外界越加猜疑,尤其是当有突然来访的和不认识的人敲门的时候。

犯罪学家很疑惑,为什么那些在统计学上比所有其他社会群体更少受到犯罪侵害的老人们都对犯罪有着极度的恐惧。<sup>35</sup> 不过芝加哥的老人可以解释他们的担忧。许多我访谈过的老人承认他们不太可能被抢劫或被劫匪破门撬窃,但他们也给出理由说他们对被伤害的后果考虑得比较多,而这类考虑,年轻人和身体健康的人都不会在意。经济不稳定是他们恐惧的一个来源。靠固定而有限的收入生存的老人们大部分时间担心日常的生活,对他们来说,一场抢劫或撬窃则意味着用在食物、医疗、租房、水电等方面费用的减少。在芝加哥,经粗略的估算,有16%的老人处在官方公布的贫困线以下,而且急需住房,这些都是为什么老人们关注犯罪风险的充分依据。<sup>36</sup> 人身不安全是忧虑的另一个原因。据我所知,老人特别关心他们自己的健康,他们意识到自己体弱多病,容易受到伤害或攻击,他们担心孱弱的身体不仅不能使他们自己顺利逃脱,而且恐怕还会因遭受突然袭击而导致伤亡。 59

媒体极度渲染着犯罪,尤其是当地电视台的新闻报道充斥着城市中的暴行和危险。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娜博格传播学院(Annenber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前任院长乔治·格巴纳(George Gebner)认为,“人们由于看了过多的有关暴行的报道而导致怀疑自己的邻居也有问题,推测犯罪率正在攀升,过高估计自己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的风险”。<sup>37</sup> 在热浪期间,芝加哥电视台把人们对犯罪的忧虑和盘托出。一家本地电视台在7月14日下午5点播出了这样一则新闻,“持续的热浪给了小偷们良机”,新闻镜头中出现了警察正在劝诫居民们关好门窗注意防盗。

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老人往往都是媒体的忠实听者或观众。广播和电视新闻有关犯罪的报道、城市犯罪故事的各种消息,都增添了老人对犯罪活动的担忧。巴里·格拉斯纳(Barry Glassner)对老人问题、媒体传播和言辞上的威吓的综合分析与芝加哥的热浪产生了强烈的对照。“充分的证据证明,在一个国家内老人们由于在电视屏幕上经常看到如此多的谋杀和伤害,受到惊吓不愿离家一步,有一些老人

变得很孤单,由于得不到充足的锻炼,他们的身心健康逐渐恶化。最坏的个案里面,老人营养完全失调……因为他们害怕出去买食物和生活用品,他们实际上一直待在家里等死。”<sup>38</sup>

这些从城市公共生活中退出的压力变得尤其危险,因为它们和另一个美国文化的本质特征形成了合力,即对独立和自主的理想化和推崇。<sup>39</sup>那些自己主宰命运无需他人帮助的独立自主的精神已经从战场上的神话变成了美国人的流行想法。美国人不仅否认他们的命运被其社会关系所决定的程度,而且同时也贬低那些依赖别人的人,在历史上女性和老人正是这种人。老人,尤其是男性老人,在面对着维持自身价值的挑战,因为社会歧视那些依赖别人的人。对于男性老人来说,以往支撑家庭养活别人的角色随着老化而失去,所以老化的主要挑战就是尽量避免成为别人供养的对象。许多老人发现,保持孤独和拒绝帮助是保住自己脸面的最好方法,孤独远比受辱好得多。

尽管充斥着暴力的社区造成的恐惧和孤独最严重,不安全感渗透到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结果是,一个小范围的风险意识扩展到了整个芝加哥,影响着一幢幢的楼房、街区、住房设施。对居民来说,用墙壁、路灯、警告系统来保护他们的邻居、街道、房屋,用邻里守望和犯罪控制小组来监视社区,这些都已经成为了习以为常的做法。有入口控制的社区具有先进的监控系统,这已经十分普遍了;在那些遭遇夜盗和暴力风险更高的贫困社区,出现了简易的家庭安全系统;私人警报系统和安保人员逐渐在美国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增多。<sup>40</sup>

公共空间的消失伴随着犯罪活动的增多,在热浪死亡率骤增的地方造成了孤独和隐居,比如老人公屋和一居公寓。在这些专用住房中产生的危机理应引起注意,因为老人公屋和一居公寓在历史上是贫困老人安全和社会支持的重要资源。<sup>41</sup>由酷热所诱发的这些问题一点儿也不奇怪:事实上,在1995年夏天很早以前,居民和社区活动家就已经向市政官员发出过潜在危险的警告,提醒他们关注这些住房中隐藏的风险。



## 最坏的组合

芝加哥房屋管理局弗兰纳里老人公寓(Flannery Senior Housing building)离卡布里妮-格林(Cabrini-Green)只有几个街区,这个住宅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这个城市最为反复无常的工程项目。在热浪期间,这个有 126 个单元的住宅楼没有几户居民有空调,尽管居民组织主席亚瑟·钱伯斯(Arthur Chambers)游说芝加哥房屋管理局在一层的公共活动室内安装空调,但是在 1995 年还是没有人工制冷设施。更糟糕的是,7 月 14 日,周五,这个大楼的供水系统已经坏了,因为太多的当地消防栓被违法地打开,而且大部分居民被热浪困住。“非常不幸的是,这些人得受热浪的罪”,钱伯斯告诉《芝加哥太阳时报》记者,“这是一个真正的耻辱,很不幸,因为连日的热浪,许多老人已经去世。”玛丽·丁格尔,弗兰纳里的另一个居民,同样地也搬走了。“我希望我能搬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这个 71 岁的老人自嘲道,“我不想看见自己最后的岁月在这里度过。”<sup>42</sup> 尽管公众已经认识到这些居民的危险,住宅楼里还是发生因热浪而死亡的事件,而这样的反应在热浪侵袭时期的芝加哥房屋管理局老人公寓比比皆是(图 21)。

芝加哥地区缺水和空调的不足只是老年公寓中的老人们受到伤害的部分原因。他们还承受着由房屋管理局新政策导致的系统性的犯罪浪潮的压力。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芝加哥房屋管理局用 58 栋大楼收容了大约 10 万在城市各处被驱散的居民,包括残障人士和老人。1990 年的残障人士法案(Disabilities Act)使烟酒和毒品成瘾的人士也能获得社会保险,这使房管局允许这些人入住老年住宅。不幸的是,对这些人的接纳恰恰是对其他老人和他们已建成的社区的灾难。低收入 62 的瘾君子们继续从事偷取钱财的犯罪活动,而低收入的老人们则把个人的财物封闭在非常小的房间里,这种混居毁掉了楼内的集体生活。

热浪发生之前的四年间,城市老人公寓的条件助长着芝加哥犯罪





图 21 警察从城南一栋公寓移走热浪罹难者的尸体。资料来源：《芝加哥太阳时报》，布赖恩·杰克逊(Brian Jackson)摄影。《芝加哥太阳时报》授权许可，2002年。

活动的趋势(图 22)。在这些特殊单元里的居民忍受着暴涨的暴力犯罪率,尽管房屋管理局家庭计划的整体犯罪率以及城市其他部分的整体犯罪率都在下降。这迫使他们不仅无法享受曾经支撑社区生活的公园和街道,而且还不能在他们自己公寓的公共活动空间内活动。

1995年3月,热浪来袭前的数月,芝加哥房屋管理局报告了在1991—1994年之间的犯罪率情况,在其住宅内的一类犯罪(根据司法部的分类,包括谋杀、性侵害、伤害严重的攻击、抢劫、偷窃、入屋盗窃和暴力的盗窃)增长超过50%。<sup>43</sup>组织建构和领导力发展组织,一个由芝加哥房屋管理局的租户和顾问组成的机构,报告道,“在这些公寓里居住的老人比住在护理住宅或者私人住宅里的老人更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他们在很多时候被他们的邻居所伤害。”报告还称,偷窃、入室抢劫、武装偷窃,以及其他的暴力犯罪的发生率在年轻的残障人士聚集的住宅特别高……这似乎表明是年轻的残障人士在折磨这些老人。<sup>44</sup>

就现在情况看来,居住在这里的老年居民也在发出同样的抱怨: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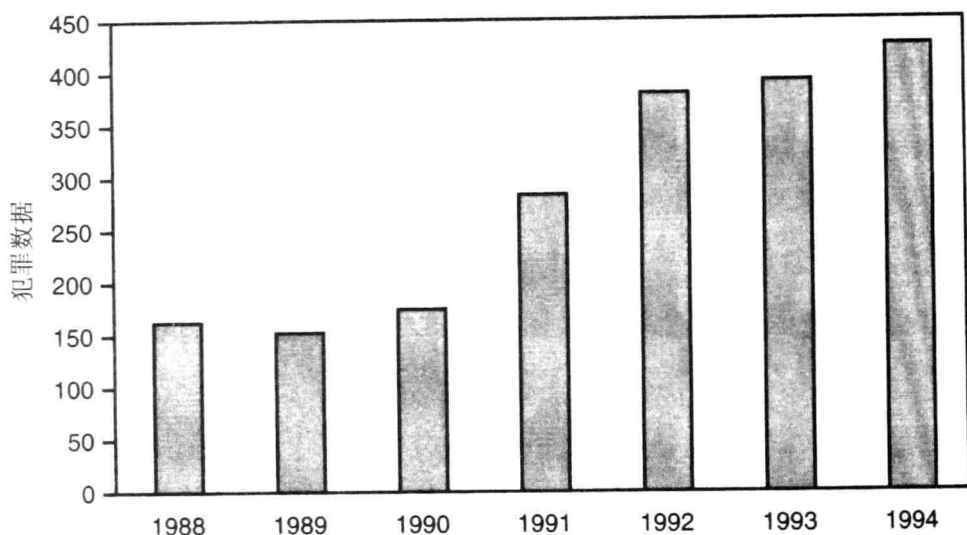


图 22 在 1988—1994 年,老人们居住地的一类犯罪数据;一类犯罪(根据美国司法部的分类)包括谋杀、性侵害、恶性伤害、抢劫、偷窃、入室盗窃、盗窃车辆。资料来源:组织建构和领导力发展(1995)。

们感到被困在家中,担心一离开家门,也可能被攻击或者遭遇入室盗窃。除非有人在场,否则他们使用一楼的公共大厅也觉得不安全;导致芝加哥人孤独现象的公共空间的恶化在这里加重了。大多数居民,他们都想走出房门,但是他们要和邻居一起保证公共场所、电梯和大堂的安全。由于无法改善这些建筑内部的居住安全,芝加哥老年事务部在近期开始了一个计划,帮助居民建立邻里守望小组。市政府也在提供安全服务,并鼓励老人和贫困人口配备一些比如手电筒、手机和袖章一类的物品,用来巡逻保护他们的住所。

然而,在市政府为自己造成的老人安全问题出谋划策的同时,那些已经饱受困扰的居民用自制的安全设施把他们的家园封闭起来防止外来的侵扰。在我们去拜访一位女士的时候,她已经在门上楔上了一块金属,当门关闭的时候,会发出很大的声音来使邻居知道。“它是我的报警器”,她很自豪地说,“它很有用。”据我接触的一位社工说,有另一个老人把电线装在他的门上,一旦有人碰到就会触电。

老年公寓普遍存在对附近年轻住户和他们那些贩卖毒品的伙伴的顾虑。在一次访谈中,近西区的一位住户愤愤地提到了顶楼的一处很受欢迎的阳台已经被一帮年轻人占用了。这些人首先找了一块空地用来作为聚集的地点,然后决定偷走那里的一些家具甚至是灭火器。她解释道,很多老年人不想扩大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担心这些年轻的邻居们会报复告密者。现代美国社会普遍对年轻人和瘾君子恐惧,使这个情况更加复杂了,很多住户都认为年轻人是麻烦,而不敢接触他们。尽管他们感到很沮丧,居住在这里的老人已经不能重新得到这个阳台了。“现在”,年长的一位妇女叹息,“没有人再使用这块活动场所了,它是空的,死的。”

把芝加哥最危险、最具威胁性的群体放到一起居住,产生了众多的麻烦;房管部门那些臭名昭著的无人打理的住宅也存在大量问题。这两者掺和到了一起。“就大多数来说”,芝加哥老年事务部的一个前任委员这样解释,“老年住宅的维护很差”,电梯出故障是经常的事情,从而使老人和残障人士下楼变得很困难。在一栋大楼里面,我拜访了一个令人难忘的诊所,对一些看病的居民来说,他们没法到达这个地方,因为电梯在这一层不停。在另一栋建筑里,电梯没到顶层就停了,使得居民们必须走楼梯。

然而,热浪的到来,的确使芝加哥房管局调整了一些政策。灾难后,当局答应给芝加哥每一栋住宅的公共活动室安装空调。全市的居民都由此迅速获益。2000年,新的房屋委员保证动用数百万的预算更新修理老人住的地方的设施,但是这个投资是否能提升居民的安全目前尚不得知。1996年,老年事务部举行过一次听证会,听证会上居民得以发言表明他们对危险的同住安排的顾虑。房管局认识到了他们的住房政策导致的问题,并承诺老年住宅不再接受滥用药物者的申请。但是,现有滥用药物的居民还是得以继续居住,而他们对老年住户造成的恐惧也将持续。

## 一居公寓危机

在热浪期间，芝加哥房管局老化的房屋不是芝加哥最危险的地方，有证据显示，城市现有的一居公寓，特别是集中在上城区和南卢普以及西卢普地区收费公寓的居民，热浪期间死亡率最高。举例来说，在这个城市东北部的一个区域中，医疗记录表明，大约 26 个中暑死亡者中的 16 个，住在一居公寓中，并且其他几个案例也居住在只有一个卧室的 65 住房中。尽管没有发生在临时旅店和共用公共卫生间的双间公寓死亡的官方记录，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报告的 160 件中的 62 件死亡事件是以“房间”列出的——作为此类旅店居住者的代号——也就是说，这些死者被发现的地方。

发生在一居公寓的死亡事件与住在这里面的人有关，这些人主要有这样一些特点：低收入；与社会联系非常少；身患多疾（包括精神和肉体的）；沉溺于药物；极少治疗和得不到社会服务的支持。在芝加哥的一居公寓人群中尤为集中。一项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关于旅店住户的调查显示，77% 的人是男性，33% 的人年龄在 55 岁以上，60% 的住户是失业者，38% 的住户重病在身（大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93% 的住户是单身。<sup>45</sup> 一居公寓的住户都处在无家可归的边缘，他们大多数人搬进旅店，只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所有其他的住房机会和耗尽了所有的社会支持资源。处于这种情况下的人往往注定在所有的健康危机中都会面临高死亡率。但是旅店住房的情况会随着住户的情况而发生变化，同时，这些住户也对至少给予他们住房的人带来危险的社会环境。

在 20 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一居公寓成为城市中单身和寻找便宜住宅的穷困家庭的重要选择。同时，在美国，无家可归的情况曾经很严重，一居公寓对流浪街头的人来说仍是至关重要的资源。如果管理和维护得当，这些住房，尽管不能进入房地产市场，但也可以成为城市居民有效的住房来源，对那些需要新的联系和支持的人来说，也可以满足基

本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中期,查尔斯·霍克(Charles Hoch)和罗伯特·斯莱顿(Robert Slayton)做过一项有关芝加哥一居公寓住户的调查,多数此类住户在他们的单元内感觉很安全,他们通过与其他住户的互惠性交往关系而保持自主状态。然而,对大多数,尤其是年龄偏大和身有疾病的住户来说,旅店住宿变得越来越不可行,与此同时,它变得越来越必要,因为这些住户的住房机会越来越少了。近年来减少仅存的旅店公寓和其他供穷人居住的低成本住房的政治压力,冲淡了关于一居公寓正在出现危机的公共讨论。因为害怕大范围的住宅调查只会促使政治官员和房地产开发商更倾向于将单元房转变为有市场竞争力的家庭住房,旅店住房的倡导者大部分还是坚持他们自己的立场。通过一位在东北区政治活动家的调查,这些考虑解释了在热浪中为什么没有人对旅店住户进行分析或是评论。

旅店住户支持者的理由是有足够根据的,在过去的50年内,政府的两项决策减少或者说是降低了旅馆住房的成本,并且影响了住户的生活质量。房地产经营者和邻里组织额外的压力已经促使旅店的拥有者变卖了他们的房产。首先,在20世纪50—60年代之间的更新计划和在70年代的城市发展计划导致了許多老旧的一居公寓的破坏和转型,它们既不是城市也不是联邦政府建立或是援助的。自那以后产生了许多新型的旅店式公共住房。在60—80年代,芝加哥失去了85%在西麦迪逊的一居公寓,48%在南州街地区的单间公寓,在近北区失去了84%的一居公寓,仅在这三个地区就总共超过7000一居套间。就全国而言,历史学家保罗·格罗斯(Paul Groth)认为,“20世纪60年代后,在美国的大部分地区,估计大约有百万房间已经关闭、转产和破旧”,用一个更保守的、来自美国住房统计调查局的数据,克里斯托弗·詹克斯(Christopher Jencks)声称,在全国范围内单间出租公寓的数量,在1973—1989年已经减少了32.5万间,但是尽管如此,还是赞成这样的观点,“大多数的老旧的一居公寓在20世纪60—70年代早期已经破旧了。”<sup>16</sup>这些公寓逐渐破损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

在 1973—1984 年之间，芝加哥大概失去了 18000 个一居套间，大楼建筑规定限制和妨碍了旅店拥有者去兴建短期的旅店，到 80 年代中期，芝加哥仅仅剩下了 11822 个旅店一居套间。

其次，在 70—80 年代，由于心理卫生政策改变，精神病人群大量进入了住房市场，尤其是一居公寓。格罗斯解释道：“福利部门倾向于市中心的人群，尤其是倾向于老人，使旅店成为永久居住的临时住宅。”<sup>47</sup>到 70 年代，旅店居民的人口基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家庭离开，许多人，包括白天工作的劳动者和移民工人指望着腾空的旅店房间，当他们到城镇后发现一居公寓不是被不安定的人群占据，就是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的空房。<sup>67</sup>

在 90 年代，在看守所和旅店公寓之间流动人数的激增，给一居公寓的居民和工作人员增加了新的负担。这些一居公寓成为了其他保护性机构对人员进行隔离的场所：精神和生理病患者、药物滥用者、寻找临时工作场所的毒品交易者、无法找到其他住房的假释犯和缓刑犯，他们和贫困的老人们居住在一起，而这些老人以前是旅店公寓居住人口的主体。这些以男性为主的住户成为了一个“不可能的共同体”，他们尽管可以整合和保护一些人，同时又隔离和伤害了一些居民。<sup>48</sup>

在他们的统计中，霍克和斯莱顿认为，80 年代大多数旅店提供了体面的集体生活和居住支持，同时他们发现，现在一居公寓以前的居住者“无法合作维护旅店脆弱的社会秩序……从而威胁到旅店住户总体的代际平衡，而正是这种平衡保证了旅馆的安全”。依据访谈，他们发现“半数在旅店的住户……抱怨那些疯狂的新住户代替了原来的老住户，”并产生了这样一个公共印象，居住者已经被“疯狂的人们”所取代，他们引起警察的关注或者游荡在建筑物的行为，使其他住户感到不安。<sup>49</sup>

住在上城一居公寓快 30 年的鲍勃·格雷布罗坐在位于三层的房间里叹息道，环境“变得越来越糟糕”。虽然他过去常常与其他旅店居住者有些交流，一系列不好的经验最终使他对周围的人感到不信任：

我不打扰别人,别人也不要来打扰我,这是我的交往方式,一个月我可能喝一打啤酒,只是为了消除无聊而不做任何事,我没有任何我想要去的地方。

我从来不在晚上出去,因为街道很乱。当我拿着支票去取现金时,年轻人都在街上游逛,这里每天都有抢劫,出去实在是太危险,甚至是在大白天,想要抢可以不分时间——你知道,当你去取钱的时候,这太可怕了,但是又不得不去,不然你又能去哪里呢?

68 在 20 世纪末期,旅店环境的恶化,又使一居公寓面临另外一种压力:高档化,以满足上城、南卢普和西卢普地区日益增长的住房需求,在这些地区,旅馆可以轻易转为昂贵的物业或者是以可观的价格出售给开发商。到 90 年代,许多城市旅店的拥有者,包括大多数具有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的业主,已经为如何给这些被社会遗弃的人群提供体面的住宅管理和维护服务而殚精竭虑。旅店业意识到,他们被要求提供一个安全网,而政府、健康关爱提供者和家庭都没有参与,他们也有充足的理由放弃努力。正如一个受过良好教育,且以公正、宽容并且支持旅店住户而著称的旅馆经理告诉我:

这是家族生意,从我小的时候就开始为此工作。相信我,我为此做出了很多牺牲。我父亲现在还和我一起工作,我们投入了许多。但是,你能想象经营它的感觉像什么吗?我必须是保安、警察、咨询顾问、医生,并且还是旅店的经营管理者。你能想象那种感觉,那是多么的混乱啊?相信我,有许多人想要买这幢建筑,并且有许多我可以做的事情,我必须说这几年之内是不可能的,但我想我最终准会放弃。

旅店住宅的质量和结构仍然差异很大。在芝加哥,联邦住宅基金补助了大约 1000 个单元,大多数获得公共补助的建筑维护得很好,配



备了训练有素的工人,还开发了一些项目进行职业培训和药物依赖治疗,以及为工作生活进行适应性训练。大多数收费公寓完全没有这样的服务。一居公寓对于穷困的芝加哥人来说是比较实用的,然而,开发商施加压力,试图拆掉这些住宅并建立更多的产权物业,而与此同时,城市内部对一居公寓的政治支持非常薄弱,这些都威胁到仅存的数千个单元。<sup>50</sup>虽然最近的证据表明,最成功的一居公寓是那些获得联邦政府直接补助和支持的公寓,但是现在在全国住房政策的倡导者和政策专家看来,期望政府在住房上给穷人提供很多帮助是不现实的,所以他们争取让私人部门采取一些替代措施。

尽管城市中有许多体面的旅店住宅,一些一居公寓却非常寒酸,可以与150年前英国工业城市的“供人住的牛棚”相比。<sup>51</sup>东北区一个比较大的旅店住宅中,至少有两个人在热浪期间去世,经理们用胶合板将大楼隔成数百个小间,每个小隔间只可以放下一张床、一个衣橱和一把椅子。这些木头隔间比混凝土天花板矮数英尺,但是住户和他们的财物还是在有锁的房间内,铁丝网连在墙与墙之间,当作天花板使用,没有其他东西。外墙有少数窗户,每层都有消防通道,但是这些只给居住在建筑物里的居民提供了很少的通风,在底层暗淡的公共空间中没有空调。<sup>52</sup>

与非营利的一居公寓不同,旅馆公寓业主没有给住户提供医疗和职业支持;管理规章以宽容和尊重为基本原则,从而不干预住户的生活,住宅中这么多的住户也并没有严重的疾病。<sup>53</sup>那里的健康危机并非不普遍,附近的一居公寓即有人死于热浪,“我非常惊讶,[一居公寓的死亡率]并没有太高,”一位来自东北区的市议员告诉我,“我确信,那些人是不健康的,而且也没有医疗保障,我猜测90%的住在简易屋和单元公寓的人没有医疗保险,并且他们一直就有健康问题。”地方政治领导人和社区居民近年来致力于改善一居公寓的条件,从这个街区救护车出现的频率来看,一居公寓的居民们并没有因为热而使居民处于风险之中。



我们坐在一个简易公寓的大楼前面的台阶上休息，这里有一位叫洛兰·兰杰的五十多岁的老人，死于中暑。经理告诉我们，在中暑人群去世之前他曾闻到一股臭味，他解释说，洛兰的例子特别典型，他试图帮助她维持健康。

她自己一个人住，大概有半年多了吧。她一直是本人和家人来付房租的，除此之外，我没有见过她的家人。她总是待在自己的屋子里，甚至连后面的走廊都不去，实在是太封闭了，她买东西也是自己去的，她的世界里只有她自己。

70 她的毛病主要是心理上的，病了也不接受帮助。我曾想要送她一台电风扇，是一个装在窗台上的风扇，但是她拒绝了，她没钱去买。我说，“我可以免费送给你。”她还是没接受。有的时候我完全看不到她，敲敲门，没有人应答。第二天我又去敲，还是这样子。于是我就拿钥匙把门打开发现她躺在床上。我叫来了法医鉴定人和警察，他们送她去医院，这时候她的亲戚来了，不断地指责我。

尽管经理确信是因为洛兰的疾病而使她不能得到帮助，他也解释，主要是毒品上瘾者以及楼房里不安分的年轻住户所带来的不良社会环境所导致的。

我时常要防范毒品出现，年轻人都无法无天，人们害怕有毒品在大楼里流传，有流氓在走廊里走动，这更让人感到可怕。女人晚上不敢去卫生间，因为他们在楼里闲逛。

酗酒、滥用毒品、精神病在旅店内非常猖獗，这也增加了住户社会来往的屏障。酗酒在夏天尤其危险，会导致脱水，正像肺病一样，会使人意志消沉进而导致孤立。严重的酗酒和毒品依赖被认为是心脏病的

致命因素，尽管依据五百多份尸体解剖资料，在中暑死亡案例中，因酗酒而导致的死亡小于10例，仍然有很好的依据怀疑很多的热浪罹难者有长期酗酒的经历。服用治疗精神病药物的人同样导致中暑死亡概率的增加，因为抗生素和其他一些安定药物会破坏人体的保温能力，引起高温紊乱。<sup>54</sup>

## 警戒信号

对许多一居公寓住户的调查显示，恐惧和孤独在老年住户中是普遍存在的。保罗·罗林森(Paul Rollinson)1986年对13个芝加哥旅店内的53位老人进行了民族志调查，发现“旅店的环境很容易在老人中造成地理上的孤独”。<sup>55</sup>罗林森描述道，旅店内的公共场所是“喧闹甚至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晚上，“人们经常在大街上闲逛”，“吸毒随处可见”，住所“非常小(平均只有225平方英尺)，零星装潢，昏暗，肮脏，无处不在的病菌……地毯破旧满眼是洞……电梯陈旧不堪，完全被人忽略和缺乏维修，经常不好使”。<sup>56</sup>

对于老人来说，病痛限制了他们的活动，这样的状况使得他们与社会少有沟通，甚至去走廊也是件困难的事。1991年出版的市政府报告中对一居公寓有这样的陈述，“身体上的障碍被看成理所当然的事，长长的楼梯，沉重的门，昏暗的灯”，然而，“这些对老人和残疾人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困难”。<sup>57</sup>建筑内部的环境解释了罗林森的发现，81%的住户都不出去活动，83%的人都不接受朋友和邻居的帮助。<sup>58</sup>霍克和斯莱顿发现，36%的旅店住户没有个人支持网络，同时，他们注意到，老人仅有最少的对外交往和最小的个人支持系统。<sup>59</sup>

同时，罗林森的民族志和芝加哥调查报告在中暑死亡越来越多的前几年就提出了警告，特别是，调查者认为，旅店老人住户关心炎热所衍生出的问题。在他们的统计调查中，霍克和斯莱顿的研究表明，34%的住户抱怨在没有任何迹象的情况下天气突然热起来了。<sup>60</sup>罗林森发

现只有一半的住户有电风扇,许多房间的窗户是封闭的,在最热的天气里也不可能打开。沙伦·基夫尔在1995年危机来临之前就对一居公寓的中暑死亡进行过报道。在1988年的高温热浪中,基夫尔注意到,“一位黑人老年妇女曾在高温的袭击中死亡……她的窗户由于电话线的原因是关着的,尽管管理人员相信,即便她可以行动,她也无力把窗户打开”。<sup>61</sup>罗林森的访谈对象告诉他,“很多住户去世后,没有一个邻居叫警察把尸体搬走。”<sup>62</sup>在芝加哥此次的高温期间,住户发现许多尸体在旅店的房间里。与一居公寓有关的数据在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无人认领的档案中非常突出。

与许多死亡案例集中的一居公寓形成对比,在几个街区之外的雷克弗兰特(Lakefront)获得联邦补助的一居公寓住宅群中,居民们避免了天气带来的危险。这些住宅维护完好,有比较大的空间,走廊里有舒适的空调,资金可能由公共基金和第八区住房津贴提供,雷克弗兰特的经理们足以帮助住户应对紧急情况,例如热浪,并帮助他们保护个人健康与安全。大约在这次灾难一年以后,在雷克弗兰特住了很长时间的格雷格·波特回忆,是大楼的社会支持环境和周到的服务使他活了下来。

呵,我知道,我们处在105度高温和90%湿度的麻烦之中,哦,我们没有交流电照明,只能住在楼梯下的休息室中,我有一个电风扇,那是唯一能使热气冷下来的好东西了。

我觉得很热,就去了地下室,在晚上我们五六个人一起玩牌,白天的时候,我就去走廊,那里很舒服,凉快,棒极了。我是说,如果有中央空调,肯定是最好,但现在没有,这样,是最好的了。就是这样的情况,你看到了吗?我们有办法来到这个地方,这是我唯一喜欢的事情,这里每周七天24小时开放。

首先,灯光很昏暗,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的,天气太热的时候,灯火一管制,我们就去那里,有的时候是24小时没有电,实际

上是 26 小时，那是 26 小时没有电呀！有一次我去买东西，回来把冰冻的东西放在冰箱里，它们全都化了，一片一片的。周五停电，周日来电，但是来电的时候，就一切都太晚了……很多人都在忍受着这件事，而我被送进医院，这场灾难来得又这么近，我希望上帝让我永远都不要经历这种事了。

我们做了一件好事，一件让我印象很深的事，人们的关系变得更亲密了。哦，是的，它非常有意思。我们来了，嗯，我们像家庭成员一样变得非常亲密，呵，很多人变得越来越难以接近了，但是彼此的帮助会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服务员属于救世军(Salvation Army)，他们来了。哦，感谢上帝派来了救世军，因为他们拿来了食物，态度非常好，他们送来了汉堡，许多吨麦当劳的汉堡，哦，还有柠檬水和餐巾。他们对待我们很不错，真的，真的，就像我们是受害者一样。是的，我们确实就是这样。

消防队来了，医疗人员也过来检查一切是否正常，是的，我必须承认……在德尔马(Delmar)有一个管理员，我的一位好朋友，<sup>73</sup>他总是在这里，帮助并确保每个人都过得很好，他做的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我是说，我必须对此给予正确的评价，因为这是名副其实的。

与在一居公寓独自忍受着高温的住户们形成强烈的对比，格雷格的报告解释了这些有国家补助并配备专业人员的旅店住户是如何创造一种可以形成群体团结和支持的社会政治条件。大厅的空调给予了住户一个安全的可以交流和放松的场所，小组成员可以要求当地的支持机构给予特殊的服务；也可以现场求助政府。这些资源对于附近商品房的住户们来说都是可以获得的。

问题是，像雷克弗兰特这样的设施所造成的社会整合，是以很多人被排除在外为条件的。考虑到城市中只有 1000 个旅店单元获得了公

共支持,人们没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前往。20世纪90年代后期,有如此多的人申请获得政府补助的住房,以至于半公共的公寓经常拒绝将更多的名字列入等待清单中。那些确实被列入名单的人必须通过一个仔细的筛选程序——这个程序被用来剔除那些使用违禁药物的申请者,或者是那些有证据表明具有难以管理的行为问题的申请者——才能获得一个房间。这个程序可以保护那些住进了混合结构的住户,但是,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被拒绝者更有可能集中在那些更缺少支持、更具有危险的旅馆中。基夫尔发现,剩余的住房寻觅者更倾向于申请有政府补助的或者芝加哥住房管理局的住房,但是他们成功的机会很少。<sup>63</sup>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雷克弗兰特造了许多房屋;而到2000年,却没有项目复制雷克弗兰特模式,以为成千上万个处于无家可归边缘的芝加哥一居公寓住户提供住房机会。

74 在一系列的访谈中,雷克弗兰特住户都表示,不只是他们的管理人员和社会工作者都检查并鼓励他们来到有空调的大厅来,而且警察和消防部门的官员,以及当地的社会服务机构,如红十字会的人也经常来访,带来食物和冷饮。收费一居公寓的住户获得的支持则远远更少。“我们被问到,我们来到这个旅馆住的情景”,一位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的调查者回忆,“但是经理告诉我们,他们不会检查住户:‘那不关我们的事。’不管怎么说,我现在已很熟悉那些建筑。我会把车停在百老汇(Broadway)和劳伦斯(Lawrence),就花整天的时间走着去调查个案。许多人住在这样的旅店房里,过着无声无息的生活”——他朝屋里的死亡报告档案点点头——“于是就那样了”。

## 孤独的性别差异

尽管这里距人们独自生活和死去的东北岸和芝加哥其他地方的一居公寓有几英里远,但是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对城市隔离的生产过程和结果做了概略的调查。调查人员花了许多天调查芝加哥所有住着社

会遗弃人群的社区,发现孤独的原因和结果都不同于政府的解释。他们认识到,市长委员会关于城市中几乎每个地方都有中暑死亡者的结论,包含了真相;但是,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个真相背后隐瞒的东西。一位调查者和律师告诉我,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的工作倾向于关注那些有条件容纳孤独和隐居者的城区。组员拜访旅店住宅过于频繁,以至于大楼经理经常准备好调查者想要的材料,甚至他们的帮助会干扰调查者的工作。

州县官员所做的死亡记录也为关注孤独模式提供了有用的信息。悖论在于,老年妇女比老年男子更可能独居,但是更少可能与社会失去联系,这种情况在热浪死亡档案中也得到了清晰的展示。我发现有 56 位尸体无人认领的中暑死亡者是由州县政府安葬的。这 56 人中的 44 人,大约 80%,是男性——这一有力证据显示,男性在危机中由于社会孤独而遭受的苦难,与他们在独居人口中的比例是不相均衡的。<sup>64</sup>

许多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可以预测在城市中孤独死去的性别特性。在《养老金政治》中,安·舒拉·奥尔罗夫(Ann Shola Orloff)在评论 19 世纪欧洲和北美洲人口模式时表示,一旦不再工作,单身或鳏居的男人在同家庭成员保持紧密联系时就存在困难。当代美国城市研究 75 显示,这些趋势将继续存在。在美国城市社会网络的研究中,克劳德·费希尔(Claude Fischer)发现,在所有的群体中,“男性老人,从社会交往的角度说,是最孤独的”;根据芝加哥的霍克和斯莱顿的一居公寓调查显示,1980 年 78% 的旅店居民和 82% 的旅店老住户都是男性。<sup>65</sup>

有许多原因能够解释,在与亲戚和朋友们维持亲密的联系上,男性比女性有更多的困难。芝加哥受到热浪影响的一代居民中,社会行为习惯抑制了男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的培养。历史上,教育和儿童抚养过程中的性别模式是鼓励女孩儿发展获得支持性社会行为和家庭关爱的能力,而男孩儿被要求将更少的精力用于社会交往。另外,劳动的性别分工要求妇女承担大部分的家庭责任和建立友情的责任,而男人则要

求在工作场所建立核心的关系。当他们不再有能力工作时,男人不仅失去了养家糊口的能力,而且由于工作网络的失去而逐渐依赖家庭的社会联系和支持。<sup>66</sup>当成为单身后,鳏居和离婚的男人经常遭受每况愈下的身体和心理疾病的折磨。而离婚的女人和寡妇更愿意在社会网络中得到支持,减轻由于社会地位的改变而受到的疾病侵扰。有孩子的比没孩子的男人更倾向于和他们的家庭重新融合为一体。同更愿意给孩子们提供直接照顾,并且与那些年龄相仿的人保持密切联系的妇女相比,单身男人这种独立的个性难以改变,无法变得更依赖他们的孩子。如果他们与非正式社会网络变得疏远,男人经常排除在由当地政府和社会服务机构所发起的计划之外。<sup>67</sup>他们更易于被刑事司法系统跟踪,而不是由福利社会的安全保障网络所接纳。

男人在面对亲密关系和友情时常有特殊的情绪限制。一方面,因为传统模式下的男子气概和追求个人自主独立的情形不利于亲密关系的培养。这种男子气概的文化加深了他们个人生活时强调独立性和超然的态76 度,这并不意外。罗伯特·鲁宾斯坦(Robert Rubinstein)在书中尖锐地以单独生活的老年男人为标题,《奇异的路径》(*Singular Paths*),一开始他就介绍,“诚然,我们所访谈的男人们对于我们来说,作为单一的人:在我们研究中出现的人,是一群值得人们记住的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风格、世界观和社会环境,并有强烈的生活取向。”<sup>68</sup>假如大多数单身男人都有独特压力的经历,男人在工作或他们的家庭关系中投入的责任感会面对各种不同的困难,尤其是他们无力达到社会期望并承担义务时,更易感到羞愧和屈辱。正如埃利奥特·列葆(Elliott Liebow)在《泰利的街角》(*Tally's Corner*)中所展示的街角社会的穷困黑人男性。他所观察到的是,“给他们的避难所可以使他们不再遭受失败的经历或情境”,并且尽管“传统的社会底层的邻居们是作为在一起有紧密联系的社会阶层”,“转瞬即逝可能是最显著的特征并且是渗透在这些社会角落”的男人的性格中。<sup>69</sup>就像失落,沮丧并且忙于迁移,可能导致孤独的恶性循环,特别是,当男人分享饮酒的快乐时,

在他们的亚文化世界中普遍存在这种感觉。羞愧、耻辱和疏离会影响男人和他人的关系。最悲愤的感觉来自主流社会整体性的反对和边缘化。

虽然在我的田野工作中，不可能观察到在脱离关系并失去向外发展的能力时，这些男人变得情绪化的过程。保持自己的性情，挣脱社会的束缚，在我见过的许多男人身上都是显而易见的。据一居公寓住户鲍勃·格雷布罗所言，一生的反对、排斥和失败教给他对人的不信任，而保护自己的方式就是独自生活。

我曾经总是被人怀疑。我只是，像我所知，我不能和人一起做事。我曾经遇到的每个人都是自由人。对的，每个人看起来都无所事事，他们让你用一些方式来帮助他们，并且你做了——你知道，如果你是很容易做成的话，你不会再看到他们。当你需要帮助时，你当然看不到他们。对的，在这里工作的人就是这种方式，所以，我只得远离他们。

没有人能带给我些什么，我也不要求别人去做什么，没有人愿意去做什么。这看起来有点儿麻烦。我最后帮助的老兄，他向我索取许多；你知道，向我索取珠宝、手表。我有一块手表。那是我女友的手表，我要给你看一下，当然，这个手表也承载着我过去的历史。不过，这个女人，她也向我索要东西。我让她在这里做饭，<sup>77</sup>当我没有注意或我在浴室或其他什么地方时，她在我这里很随便。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我很难使自己在这个社会中有安全感，并且在变老时，政府就让你自行消失。他们对此并不忧虑。我没看过医生，今年76岁了，我不知道我的身体是否有些毛病，我最后一次看病是在1985年，我做了一个前列腺手术，吃了药。大部分时间不好痊愈，是老毛病，我的膀胱和前列腺都有病。当你变老时，许多疾病都会随之出现。你感到不舒服，但没有办法能治愈。



我还是希望身体能够变得好起来,你知道,生病或疼痛有多难受。这可能是唯一困扰我的问题——健康问题。这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你身体健康,你就知足了。

鲍勃的话,和我在那些旅馆中遇到的男人所说的非常相似,它们证明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即老年男人在察觉到朋友和机构的遗弃和虐待时,他们也会主动远离社会。鲍勃不仅与旅馆中的其他居民没有来往,而且也不接受药物治疗和政府的服务。他相信,政府愿意让他自行消失。他与家庭的联系已经是40年前的事了,而且鲍勃隐居在他的房间,除旅馆经理外其他人根本不知道他。

虽然独居的男人遇到了更多的孤独和失去社会支持承担的风险,但是重要的、值得强调的是,像保利娜·扬科威茨和薇奥拉·库珀这些都是单身、与社会有较多的隔阂且遭遇最可怕的后果的妇女,占这个群体的大多数。比如,《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文章有一种观点,人们发现无助的或者在家中死亡的人员中,老年男人意外死亡率最高,在旧金山的案例中,妇女占统计的51%。<sup>70</sup>这是与热浪死亡率分布非常相似的类型。如果我们用统计校正年龄来对年龄变量进行控制的话,男性死亡率是女性的两倍,但是,在所有受害者中,女性占45%。导致老年人独自生活和死亡的社会压力和空间限制,也在孤独的性别差异方面发挥作用。

78 与我们业已谈到的要素相比,还有更多的因素与孤独的社会生产有关。通过检查人口统计的趋势、文化变化、居住安排和性别模式,我们能解释为什么在热浪中一些个体会死亡。我们能够评估,是否存在更广泛的社区或邻里条件,与城市居民的脆弱性或安全感有关。对于这件事情,特别是关于城市地区的生态是如何影响居民的健康和福利的问题,将留待下一章的社会剖析。

## 第二章 种族、空间与脆弱性： 都市邻里和支持生态

7月21日，芝加哥仍然处于这个星期热浪危险的沸点上。由美国 79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到达该市进行一项  
紧迫的流行病学调查，以研究与中暑死亡相关的风险因素。这个项目  
雄心勃勃，迅速制定了调查计划，正如一个帮助他们进行协调研究的市  
政府官员解释道，“疾控中心能力突出，经验丰富，他们的到来就像一支  
战斗队。”案例控制研究设计要求研究者进行配对比较，在找到一名热  
浪死难者的同时，必须在同一个街道或者社区找到一名年龄相仿并且  
住在附近的幸存者。在控制年龄和区位因素以后，流行病学家就可以  
判断一系列个体水平的因素——例如独自居住、有身体健康问题，或者  
有空调——是否影响一个人在热浪中的存活能力。而科学研究的挑战  
性在于证明个人特征在大灾难中是最关键性的因素。但是，“主要目  
标”，首席研究员简·西门扎(Jan Semenza)和他的合作者随后写道，  
“在于识别公共卫生战略是否可以覆盖处于风险中的人群，从而在未来的  
热浪中避免死亡。”<sup>1</sup>

由于有大约700名热浪死难者散布在芝加哥各个街区，疾控中心的  
研究团队不得不进行随机抽样，以获得足够多的死难者样本，从而保  
证研究发现的可靠性。但是也不能太大，样本太大会耗尽他们的资源。  
研究人员——包括了大约80位成员——决定访问和调查420对死者和  
配对者；他们访问死者的朋友、亲戚或者邻居，请这些对死者足够熟  
悉的被访者回答一些与死者有关的问题，如他们的社会网络、医疗条件  
和日常生活规律；同时为每一个案例完成一份标准化的调查问卷。“工 80

作非常繁重”，西门扎解释道，“我们不得不进行 800 次访谈，很明显，我们不可能亲自完成。我们得到了各种机构的支持。我们接触到那些愿意走出街道的各种人群。完成这些问卷非常困难，尤其是对死者亲属进行调查。这是一项悲痛的工作。”研究团队获得了死亡证明、警方报告，以及一份在 7 月 14—17 日去世的死者的姓名和地址名单，这些死者年龄在 24 岁以上，死亡证明说明中暑或者心血管疾病是死亡的主要原因、辅助原因或者潜在原因。<sup>2</sup> 这份官方记录指引研究者来到死者生前的居住地；到那里之后，他们通过投掷硬币的方式决定他们的行进方向，然后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去寻找配对者（或案例），直到找到配对者。

运用这种方法，疾控中心在 7 月 21—8 月 18 日完成了 339 个研究配对，或者说是 678 人，另外还有 33 个死者没有找到配对者。在进行统计分析之后，疾控中心团队研究了提高危机中死亡可能性的一系列风险因素，研究发现最终发表于最具声望的美国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其中最重要的结论是，如果城市居民没有每天出门，具有健康问题，经常睡在床上，独自居住，没有空调，交通不便捷，附近没有社会联系，他们将更加脆弱。<sup>3</sup> 这些研究发现在国际公共卫生机构和医疗实践者中广为传播，而且也影响着热浪盛行的美国城市的疾病率和死亡率的防治战略。

然而，流行病学研究没有超越对人口风险因素的讨论，没有分析社会环境条件对提高或者降低居民们在热浪中的存活概率的影响。在同一区位中挑选配对者加以比较，疾控中心的研究者们没有探究热浪死亡率的邻里差异或区域差异，以及导致这场灾难的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sup>4</sup> 如果生活在资源匮乏、制度性联系缺乏，而在政治上又被忽视的邻里或者社区之中，疾控中心的分析将无法发现这些因素。疾控中心的

81 研究将公共卫生机构的关注目光转向那些在热浪面前非常脆弱的个体，而不是关注这些问题更有可能集中出现的区位空间。最近几年，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在常规情况下社会生态和城市地区的政治经济对居民的卫生和福利的影响<sup>5</sup>，但是很少回答在极端事件中这些条件是否

改变着卫生风险。热浪之中，死亡率存在清晰的区域差异。但是，（正如我们将在第四章和第五章讨论的），关于这一事件的官方和媒体说法，例如总结性的声明所提及的，“城市的所有社区都受到灾难的影响”，他们对这种社区差异视而不见。

社会学理论和定性研究技术使我们可以进行另外一种流行病学研究。我们在研究极端事件下或者日常、典型情形下的城市卫生时，不会止步于调查个体层面的信息，而是要加入一个区域或者社会生态层面的分析。人口统计学家和地理学家能运用人口调查的统计资料或邻里关系数据来评估特定地域条件——如土地利用和发展模式、种族隔离、暴力和微观气候——在灾难中对卫生风险的影响。地理学家卡伦·斯莫尔(Karen Smoyer)举例说明，1980年圣路易斯(St. Louis)，热浪“低死亡率的地区主要位于凉爽的、有很好的空气流通的城市南部和西部。”高死亡率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人气很旺的商业中心地区和房屋较少、人口衰退的区域。这些发现与卡伦·斯莫尔较早时候的、涉及热浪脆弱性的地理学的研究相契合。研究显示，灾难的死亡率与邻居之间来往少、低质量的住宅条件、房屋周围缺乏植物和聚集的城市热岛效应有重要的相关性。<sup>6</sup>

1995年芝加哥灾难中的死亡率的空间分布和其他城市相比，有一些共性，但也有不同的特点。<sup>7</sup>芝加哥的社区地图显示，热浪死亡率最高、遭受最严重打击的社区(图23)集中在城市的南区和西区，历史上是非裔美国人聚集和被隔离的地带。<sup>8</sup>尤其令人震撼的是，这个地图显示的高死亡率社区，始于南部的伯恩赛德(Burnside)和西岸，一直到达北部最富裕的、居民在防暑方面没有什么困难的地区。虽然某些非裔 82  
美国人聚居社区在热浪中的死亡率非常低，但是，在芝加哥的黑人隔离区，有非常清晰的死亡聚集现象。

最严重的高死亡率地区位于卢普(Loop)地区中南部，始于近南区最南边，向南一直延伸到老的黑人居住带和新非裔美国人社区，例如伍德劳恩(Woodlawn)和查塔姆(Chatham)，东部和更远的南部；另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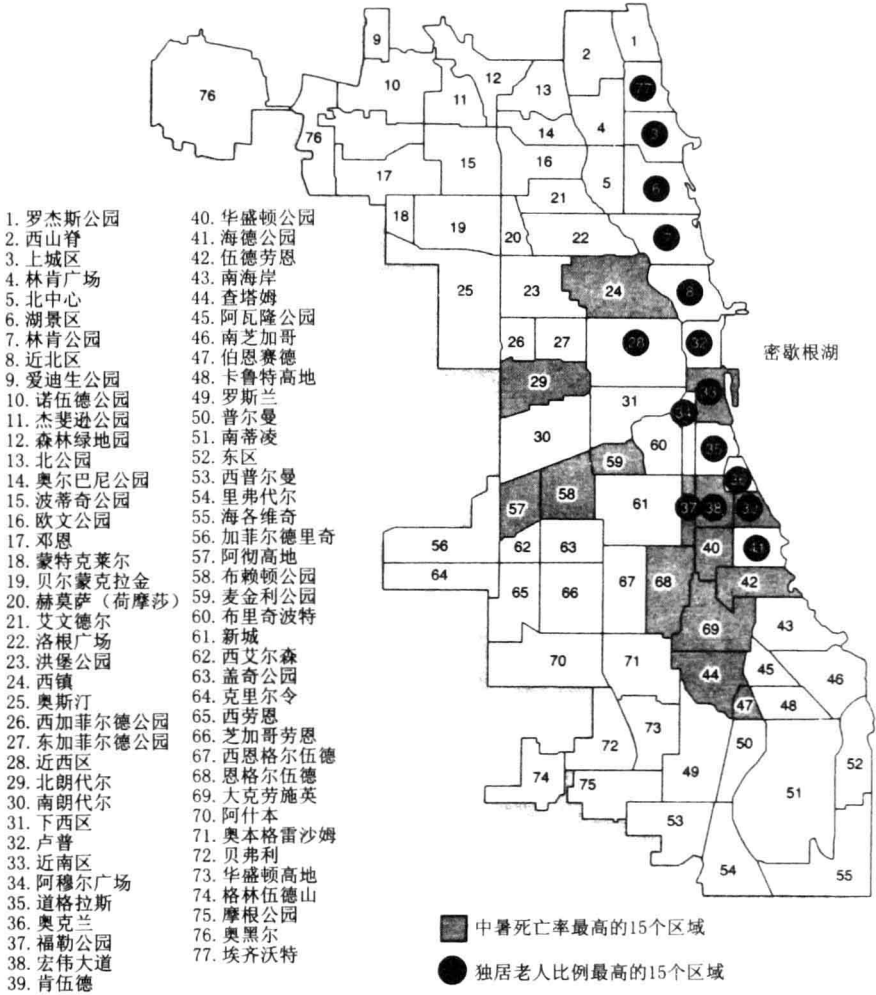


图 23 芝加哥中暑死亡率最高区域和独自居住的老人比例最高区域分布。比例最高的前 1/5 已经标明在地图上。

高死亡率地区是近西区和卢普地区西部，延伸到城市西部。正如图 24 和图 25 所示，这两大块地区都有较显著的高贫困率和暴力犯罪率。<sup>9</sup> 另外一块高中暑死亡率聚集区接近东南部，正如图 23 所示，老人集中区域和独居老人区域是有不同的。表 3 显示高热浪死亡率的社区是非常明显的。在热浪期间，死亡率最高的 15 个社区中，有 10 个社区非裔美国人占 94%—99%，另外一个社区黑人占 77%。<sup>10</sup> 其余 4 个社区有其他不同的原因。西镇 (West Town)，大部分是拉丁裔和波多黎各人地区，面临中暑死亡率增加的风险，因为这里有更多的人居住在芝加哥房

屋管理局提供的老人公屋中，比城市里的其他社区要多。阿彻高地 (Archer Heights)、麦金利公园(Mckinley Park)和布赖顿公园(Brighton Park),这三个在西南部邻近的社区，特别脆弱，因为在这三个地区到处存在的红砖和黑瓦的建筑增加了室内的热度。<sup>11</sup> 因为历史上波兰社区聚集在此，特别是麦金利公园和布赖顿公园，这两个社区已经存在很多年了，由于大多数拉丁裔居民搬入，老白人居民和新搬入人口出现了文化和语言隔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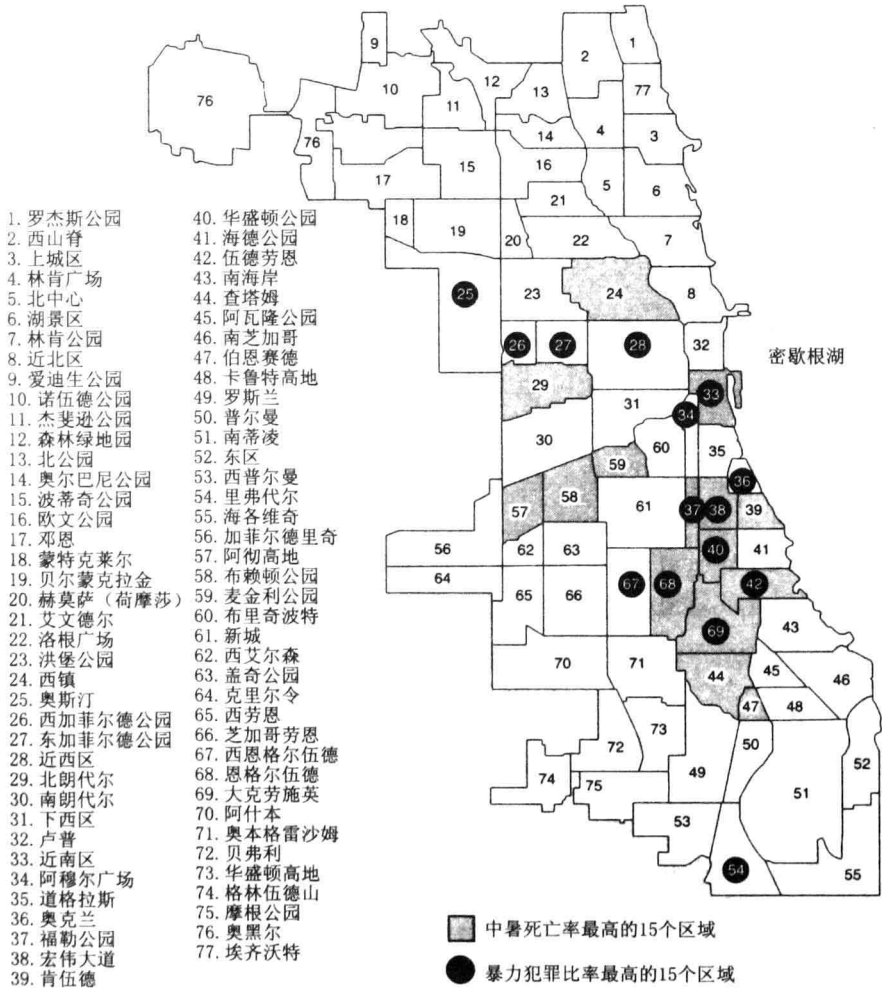


图 24 芝加哥中暑死亡率最高和暴力犯罪比率最高区域分布。比例最高的前 1/5 已经标明在地图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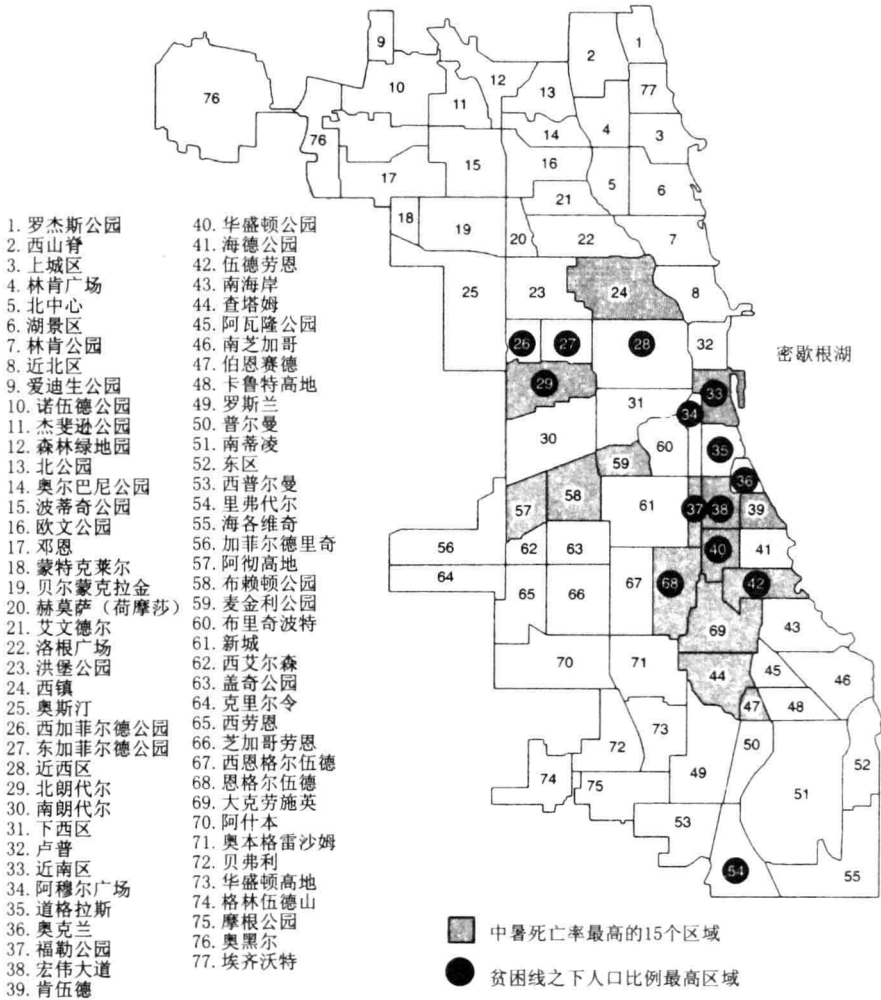


图 25 芝加哥中暑死亡率最高和贫困线之下人口比例最高的区域分布。比例最高的前 1/5 已经标明在地图上。

85 地图表明,中暑死亡率和一定的社区条件之间有一个清晰的相关性,伊利诺伊州的研究者们使用与斯莫尔相似的统计研究方法,对死亡率变化的资料来源有了进一步的研究。在这场灾难之后,沈铁福 (Tiefu Shen)和他的同事在伊利诺伊州公共卫生部门发现,相对于其他地区,有着较高的暴力犯罪和高比例的老年人居住者的社区,在热浪期间最有可能发生中暑死亡案例。<sup>12</sup> 这个研究小组并没有验证这是否与社区中处于贫困线以下居民的比例有关系。因此,这个研究并没有给出与区域有关的剥夺和脆弱性的信息。公共卫生研究同事确信在社

区层面的死亡率风险存在着较显著的区别,但是他们没有做进一步研究,而是将这一疑问留了下来。

表 3 芝加哥中暑死亡率最高的社区

社区	每 10 万人中 与中暑相关 的死亡人数	黑人所占 百分比	65 岁以上人 口百分比	1960—1990 年 人口流失率	1994—1995 年之间犯罪 率排名(77 个社区)
福勒公园	92	99	19	64	1
伍德劳恩	73	96	18	66	8
阿彻高地	54	0	21	13	56
大克劳施英	52	99	18	39	15
华盛顿公园	51	99	11	56	2
宏伟大道	47	99	14	55	3
麦金利公园	45	0	13	21	46
北朗代尔	40	96	9	62	18
查塔姆	35	99	19	16	30
肯伍德	33	77	15	56	31
恩格尔伍德	33	99	11	50	13
西镇	32	10	9	37	38
布赖顿公园	31	0	15	15	50
伯恩赛德	30	98	6	0	21
近南区	29	94	13	34	5
芝加哥	7	39	12	22	—

数据依据 521 个热浪死亡案例计算,参见伊利诺伊州公共卫生部(1997),及芝加哥资料汇编(1995),芝加哥市公共卫生局(1996)。

然而,在热浪过去后的几年里,没有任何关于以区域风险为主题的官方报告或研究报告,而且有关中暑死亡的卫生风险的公众讨论和政策辩论没有超越个体层面或人口层面。在芝加哥和圣路易斯出现的热



浪,一个粗略的定性证据表明社区的一些特性,如贫困、老龄化、缺少绿化和高犯罪率,与热浪高死亡率密切相关。尽管人口统计学家拿出大量数据证明这种联系,但没有任何研究解释邻里是怎样陷入危险或者怎样在盛夏保护其居民免受热浪的威胁,也没有定性研究识别,在城市地区,有些重要的环境条件没有纳入标准的统计数据之中。<sup>13</sup> 缺少这些

86 研究的部分原因在于,就邻里是如何影响居民健康和安全的相互关联的因素进行研究,需要大量的田野调查,需要对当地居民、相关机构和公共场所进行考察。在没有定性研究的情况下,缺乏这类研究的条件,研究社区层面活动是不可能的。这类研究包括居民使用人行道和公共场所的方式、促进社会交往的商店所扮演的角色、居民保护自己免受当地危险威胁的策略,以及社区组织和机构影响死亡率所提供的社会保护措施。

如果要复制疾控中心研究热浪时所用的资料,并使之可以在社区层次上进行分析,必须花费大量的人力、资源和时间。<sup>14</sup> 然而,聚焦于特定社区的小规模项目,也可以加深我们理解极端事件及常规条件下的空间、健康和风险之间的相互关系。将疾控中心所运用的案例控制方法和历代城市社会学家所使用的方法结合起来,我将注意力转向关注芝加哥两个在地理上相邻、在人口统计学上高度相似,而在热浪中死亡率截然不同的两个社区。比较案例研究缺少大范围的资料,也不能像疾控中心的流行病学调查那样预先设定变量,这无疑很难在社区社会环境和导致居民独自死亡的特定环境之间建立所有的联系。但是,对两个社区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将会探索出理解区域脆弱性或保护能力的新型方式,反过来,可以帮助我们洞察到社会和生态条件是如何影响到居民在热浪中的生存能力的,这点在传统调查中是无法测量到的。<sup>15</sup>

## 配对

正如疾控中心的流行病学家一样,我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寻找

在这次灾难中相似的条件却有不同结局的配对案例。因为,以前有关热浪死亡率以区域为条件的研究强调贫困、犯罪、老年居民和缺少绿化的重要性,所以我搜寻两个在人口层面测量条件相似却又死亡率反差很大的居民区。<sup>16</sup> 西区(West Side)有一个相邻社区的情况似乎提供了 87 相反的材料:北朗代尔,19 人中暑死亡,相当于每 10 万人 40 个的死亡率;南朗代尔(俗称小村, Little Village)地区 3 人中暑死亡,比 10 万人中 4 个的死亡率少,比北朗代尔少了 10 倍。这两个区域相似的不仅仅是地名。在 20 世纪 90 年代,北朗代尔和南朗代尔的微观气候相似,独居人口数和生活贫困的老人的数字也几乎一模一样。这个社区里,很多人被认为处于中暑死亡的高风险中,它是由自然天气状况所控制的。

表 4 北朗代尔和南朗代尔的不同特点

条件	北朗代尔	南朗代尔	芝加哥
老年贫困线	26%	22%	16%
低于贫困线的 2 倍	71%	62%	41%
贫困线	44%	22%	18%
65 岁及其以上人口	4029	3965	334046
老年人的独居人数	956	1256	106792
65 岁及其以上人口比重	8.5%	4%	12%
现今老年人口独居率	24%	31%	32%
少数族裔人口	99% (96%黑人)	94% (85%拉丁裔人)	58%
中暑死亡人数	19	3	521
热浪死亡率	40/100000	4/100000	7/100000

资料来源:芝加哥资料汇编(1995);Lawlor, Almgren 和 Gomberg, 1993。

据大部分观察者指出,这两个社区人口最大的区别就是当地居民由不同的种族组成。在北朗代尔,96%的人是非裔美国人,然而,在小村,85%的常住人口是拉丁裔美国人。公共卫生研究者发现,芝加哥地

区的非裔美国人在热浪中死亡率高,而拉丁裔美国人却在热浪中有较高的存活率。热浪之后,政府官员、记者以及学者一直被这样的问题所困扰:两类社区都生活在极端贫困和高风险之中,为什么拉丁裔美国人比起黑种人、白种人会有更高的存活率呢?<sup>17</sup>

表 5 第 10 和第 11 警区总体犯罪率报告,1994—1995 年

暴力犯罪	第 11 警区	第 10 警区	芝加哥
数量	4714	2973	218894
犯罪率	10/100000	4/100000	8/100000
城市排名 (在 77 个社区中)	18	59	—

资料来源:芝加哥市(1996)。第 11 警区包括北朗代尔的大部分地区,而第 10 警区包括小村和北朗代尔的一小部分。

虽然对了解这两个社区的人来说很容易分辨这两个社区,然而,对一个仅仅从报告中来看北和南朗代尔的局外人而言,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两个社区在热浪中会有如此不同的死亡率。如表 4 显示,北朗代尔和南朗代尔这两个地区独居的和生活贫困老人的数量几乎都一样。在小村有 1256 名老人独自生活,占当地所有老人的 31%,在北朗代尔有 956 位老人独自生活,占当地老人的 24%。每一个社区都有特别的风险因素。与芝加哥其他地区比较,这两个地区贫困程度很高。在北朗代尔,有 71% 当地居民收入达不到贫困线的两倍,44% 的收入在贫困线之下,在南朗代尔,有 62% 的当地居民收入不到贫困线的两倍,22% 的收入在贫困线之下。<sup>18</sup> 如表 5 所示,北朗代尔地区犯罪率更高,但是要说明的一点是,在 1994—1995 年期间,这个地区的犯罪率并不是芝加哥地区犯罪率最高的五个地区之一。小村地区高风险起源于这样一些人,这些人被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称为文化或语言的隔离者,这与芝加哥地区居民在热浪中的死亡率的人口统计学图表正好相符。在小村地区,大约 46% 的老人是白人,因为年轻的一代都离开了当地,然而在大都是非裔美国人的北朗代尔地区仅有 2% 的老人是白种人。<sup>19</sup>

对这两个地区以及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不同的死亡率最显而易见的解释,集中在不同种族构成上。<sup>20</sup>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有两个很流行的论据试图做出解释。第一个解释是,拉丁裔人习惯了炎热的天气,有办法应对,因为他们之中很多人都生活在炎热的拉丁美洲气候之中。一个拉丁裔美国人提供的消息证实了这一点,他告诉我说生活在南方边境地区的人很习惯炎热的天气,你必须知道在墨西哥南部、古巴、波多黎各,平均气温在华氏 85—90 度之间。第二个解释是,拉丁裔老人们得益于几世同堂和大家族的紧密纽带关系,他们在平时和有危机的时候能保持紧密的联系。正如另一位消息人士所说的,在芝加哥地区存在三种人群:白人、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其中拉丁裔人不是孤立的一个人群,而是比起其他种族来有更加紧密的家庭纽带。<sup>89</sup>

关于“种族”的基本论点,当我与芝加哥人一起讨论热浪的时候他们也常常说起这些,他们认为拉丁裔美国人身体上有些特别的东西保护他们免受中暑威胁。<sup>21</sup>一位拉丁裔美国人提供给我的信息:“我猜我们天生就不怕热。我们的皮肤或基因里有一些特殊的东西使得我们对于热的感觉相对舒服一些。”另一位被访谈的白人妇女,她常和老人一起工作:“拉丁裔美国人的新陈代谢和身体化学反应使得他们更能适应高温。”这些争论没有一个能够准确解释北朗代尔和小村地区在热浪中怎么会有不同的死亡率。这些种族的论点植根于神话而不是科学之中,它不仅不能够提供有关拉丁裔美国人在基因或身体特质上耐热的科学证据,而且也不能区分拉丁裔美国人的种族标志,使得多种多样的有拉美祖先的人群保持一致,包括小村地区的居民。

文化上的论据只关注对高温的适应性和家庭纽带,这个答案也不令人满意。因为社会科学家和社会服务提供者有所区别,族群所特有的关爱文化这点也没有足够证据说明关爱照料活动和日常生活是这一种族的内在特点。关于拉丁裔的老人由于代际网络以及大家族纽带而与家人和朋友有紧密联系,这一点乍看起来好像很有说服力,尤其是考

考虑到传统上祖父母们在拉丁裔社区中的角色。不过,至少有两个原因需要仔细思考。首先,最近关于墨西哥裔老人的一份报告显示,当地出生的墨西哥裔老人与不在美国出生的墨西哥裔人相比,倾向于与他们的子孙们更少接触。<sup>22</sup>这很清楚,单纯的种族不能解释死亡率上的区别,他们生活所处的社会环境能够解释大部分的文化变迁。其次,许多学者争论说非裔老人也是或曾经是世代的家庭网络和大家族的关系纽带中有威望受尊敬的长者。<sup>23</sup>另外,仅仅是种族孤立的因素无法解释老人得到家庭网络上的支持。

另外有一种说法,一些群体更适应高温是由于他们的成员曾经生  
90 活 在 热 带 的 气 候 里 , 这 似 乎 是 更 好 地 解 释 芝 加 哥 非 裔 老 人 死 亡 率 应 该 低 一 些 , 他 们 之 中 大 部 分 出 生 在 美 国 的 南 部 地 区 , 他 们 的 祖 先 就 在 非 洲 , 这 与 生 活 在 这 个 城 市 的 其 他 族 群 的 人 一 样 。 但 是 , 正 如 我 们 所 见 , 非 裔 老 人 在 所 有 其 他 种 族 中 却 拥 有 最 高 的 死 亡 率 。 最 后 , 关 于 地 区 死 亡 率 的 不 同 的 种 族 解 释 都 忽 视 了 在 热 浪 故 事 中 最 重 要 的 一 点 : 小 村 社 区 的 社 会 环 境 不 仅 包 括 拉 丁 裔 人 , 而 且 也 包 括 那 些 在 文 化 和 语 言 上 处 于 隔 离 状 态 的 白 人 老 人 , 这 些 人 同 样 处 在 死 亡 的 高 风 险 之 中 。

与此同时,这些发现显示,与小村地区的社会联系相比,或者说与芝加哥一般的非裔相比,北朗代尔地区更加淡漠。我们必须解释为什么这个事件会发生,而不是简单寻找少数族群或种族的原因。因为如果社会支持活动在种族间和种族中是不相同的话,那么关于关爱网络和帮扶系统的一场激烈的争论需要我们更加细致地观察这两个社区的社会环境。<sup>24</sup>

## 贫困的社会环境差异

对这两个社区的观察只需几分钟时间,或者是在格玛克(Germak)路上随意开车对这两个地区沿着向西的铁路分界线观察。“这两个社区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正如沿路两边的居民所说。大部分

的居民和外来的观察者区分两个地区主要通过当地居民明显的种族特点,但是,另外的区别比起种族特征更具深远的意义。首先,北朗代尔和小村在生态特征上不同。罗伯特·麦肯齐(Robert McKenzie)称之为在环境的选择、分配、适应性的作用下,人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联系,或者说,人们和组织空间配置形成了当地的生活。其次,这两个地区在社会形态学上也有不同。马塞尔·莫斯将之定义为社会的物质基础,也就是,通过土地、人口的数量和人口密度,组成了集体生活的基础。<sup>25</sup>一个社区的社会生态是当地生活的基础,也是社会网络生长发展或枯萎消失的土壤。<sup>26</sup>因此,城区如北朗代尔和小村,不仅可以通过当地居民的特征来区别,而且可以在社会、自然环境的结构上来寻找不同。

91

关于城市贫困,美国最流行的传统思维关注的是贫困人口和他们的个人特征,而不是地区和社会生态特征。这种逻辑在有关他们自我剥夺的贫困文化的争论中非常明显。不过,它也反映出更多的自由理论,在城市社区的社会规范的空间环境上,有较多的研究成果。<sup>27</sup>虽然当代大部分城市学者争论说高人口密度降低了邻里之间的聚合性,但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人口高密度和拥挤上做了区分,人口密度高和拥挤则压制、扼杀了社区生活。根据雅各布斯的观点,人口密度和公众活动是有朝气的邻里之间社会网络的先决条件。相邻城区的居民没有舒服安全的街道和人行道,不从家庭出来到公共场所参加活动,这些人就更可能逐渐被隔离并产生社会距离感。

本章主要讨论社会生态的地区差别以及它在文化实践上的作用,这在很大部分上解释了朗代尔地区在热浪中死亡率的差异。当地的社会环境对于居住的老人有强烈的影响,这些老人因为行动不便增加了去社区以外地方的困难。在北朗代尔,危险的生态,如被遗弃的建筑物、空地、商业颓废、暴力犯罪、破旧的基础设施、低人口密度和家庭成员的分散,降低了公众生活的适应性和当地帮扶系统的强度,使得老人更倾向于自己一个人生活。但是在小村,繁忙的街道、众多的商业活

动、居民集中以及相对较低的犯罪率提升了社会交往、集体生活和公众活动,为年长者提供特殊的福利,他们更可能离开家庭去使用附近的生活福利设施。<sup>28</sup>在热浪的日子里,这些当地的条件通过限制北朗代尔或者创造了小村的社会交往,直接影响了两个社区居民,帮助脆弱的芝加哥人在热浪中存活下来。

## 一个被遗弃的社区

92 尽管最近经济发展有复苏的迹象,但是在北朗代尔主要的大街和大部分居民区,依旧有几十年来被工厂、商店和居民遗弃的废墟,以及在小马丁·路德·金 1968 年死后产生的纵火暴乱所遗留的痕迹。北朗代尔地区最大的大道和许多小区街道的自然环境充斥着一些木板或倒塌破旧的建筑,面临倒闭的餐饮连锁店、店名招牌已经褪色歇业的商店、长满杂草的空地、打碎的玻璃、非法倾倒的废弃物,这一切都告诉人们这一地区的衰落。北朗代尔地区失去了将近 50% 的房屋供给(从 30243 间跌到 15686 间),在 1960—1990 年间有 60% 的人口流失率,这一系列事实在社会和生态方面对剩下的居民产生了极大的破坏性。<sup>29</sup>

伴随着社区加工业、商业和居民入住率的降低,当地的基础设施变得越来越差。在 20 世纪早期,北朗代尔地区对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移民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中大部分被铁路沿线的雇主所吸引,如西部电力公司,西尔斯洛巴克公司,麦考密克收割机公司(国际收割机,后来成为国际纳维斯塔公司)。当俄罗斯犹太人大批到达附近时,在 1910—1920 年之间,人口从 46226 成倍增长到 93750。1930 年,这个地区到处都是居民和商人,是普通城市人口密度的两倍。罗斯福路(Roosevelt Road)变成芝加哥犹太社区商业和文化的核心,60 座犹太教堂迅速建成,这些教堂很多现在都存在。南到道格拉斯公园,北到加菲尔德公园,东到富兰克林公园,教堂为稠密的街道提供了庇护所。由石灰岩和砖块建成的豪华房屋和公寓为社区增添了不少雅致。

在 1930—1940 年间,犹太人是当地的主要群体,但是大部分当地居民租房而不是买房,从来没有深深地植根在这个地区。例如在 1939 年,北朗代尔地区 81% 的房屋是出租的。<sup>30</sup> 在 1940 年,仅仅 380 个非裔商人居住在北朗代尔地区,但是当第二次南方黑人移民潮带来成千上万的黑人定居在芝加哥西部,整个城市的白种人对这刚刚开始“入侵”感到紧张,担心这些移民会改变或伤害他们的邻里关系。一旦非裔移民潮到了北朗代尔地区,超过 75% 的白种居民马上搬迁,离开了他们的邻居,仅仅 20 世纪 50 年代就有大约 100 万黑种人取代了白种人。<sup>93</sup>

表 6 北朗代尔地区人口,1950—1990 年

年份	人口	人口变动率(%)	白人比率(%)	黑人比率(%)
1950	100489	—	87	13
1960	124937	+24	9	91
1970	94772	-24	3	96
1980	61523	-35	2	97
1990	47296	-23	2	96

到 1960 年,北朗代尔完成了美国城市历史上最快速最彻底的种族转变过程,在仅仅 10 年之间,从几乎 90% 都是白人 to 超过 90% 的非裔人(表 6)。<sup>31</sup> 虽然这个地区的人口组成变了,但是当地的企业和第三产业继续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成千上万份工作。一个老居民告诉我:“绝大多数人可以走着去上班,如西尔斯公司、纳维斯塔收割机公司、西部电力公司,这些公司都在主干道上。”在北朗代尔的黑人社区不存在贫困问题,占主导地位的产业经济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支持朗代尔地区的家庭,还提供足够的薪水使这个社区的公共生活和商业活动富有活力。一位老居民厄尼·斯图尔特回忆说:“那时,邻里之间经常走动,这里有很多商店、肉类蔬菜市场、洗衣店,什么都有。”



## 转折点

这个地区的命运在 1950—1960 年之间发生了重大改变,芝加哥工业衰退的第一阶段削弱了北朗代尔地区的经济基础。曾经拥有 14000 名员工的国际收割机公司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离开了这里;西尔斯洛巴克公司关闭了在霍曼大道最初的西尔斯塔(图 26)。1974 年,其全球总部也从北朗代尔搬去卢普(Loop),有近 7000 个岗位随之消失。当西尔斯搬离时,它下属提供 3000 个工作岗位的分发中心也在 1988 年搬离该地区;西部电力公司逐渐将其设施转移出北朗代尔地区,调整其员工队伍到霍桑(Hawthorne)工厂,该厂曾雇用 43000 名工人,1984 年关门大吉。到 1970 年,1950 年在这里建成的工厂中约 75% 的企业都相继离开,1980—1990 年期间,北朗代尔地区经济几乎没有增长。企业搬迁影响到除劳动力市场以外的其他方面,包括损害了当地银行、小的商业企业、食品店、饭店和娱乐业的经济基础。第二条商业链条的缺失使得当地经济雪上加霜,失去的不仅是工作机会,还有商品、资源和社交场所。朗代尔居民不仅没有邻居可以走动,也没有地方上班工作。一位老住户告诉我:“商店的歇业影响了一切,从此以后,人们出门没事可做。”

北朗代尔商业组织和当地经济的衰退使得这一地区的公共生活更加恶化。<sup>32</sup>如简·雅各布斯所说,在人行道两侧众多的商店和其他公共场所是通过正式社会控制建立公共安全的基本的必要条件。商业组织使得居民出行逛街或在人行道上散步,有助于顾客、商人、公共生活的参与者或观察者之间的社会交流。同时,简·雅各布斯进一步解释道,商店和饭店使得“商店经营者和其他商人之间建立起联系,这些商人常常是社会安定和规则的重要拥护者,他们痛恨抢劫,为顾客安全而焦虑”。因此,他们在保持周边的公共秩序环境中扮演重要角色。<sup>33</sup>街道和人行道是城市“最基本的器官”,如果它们失去了活力,那么就将成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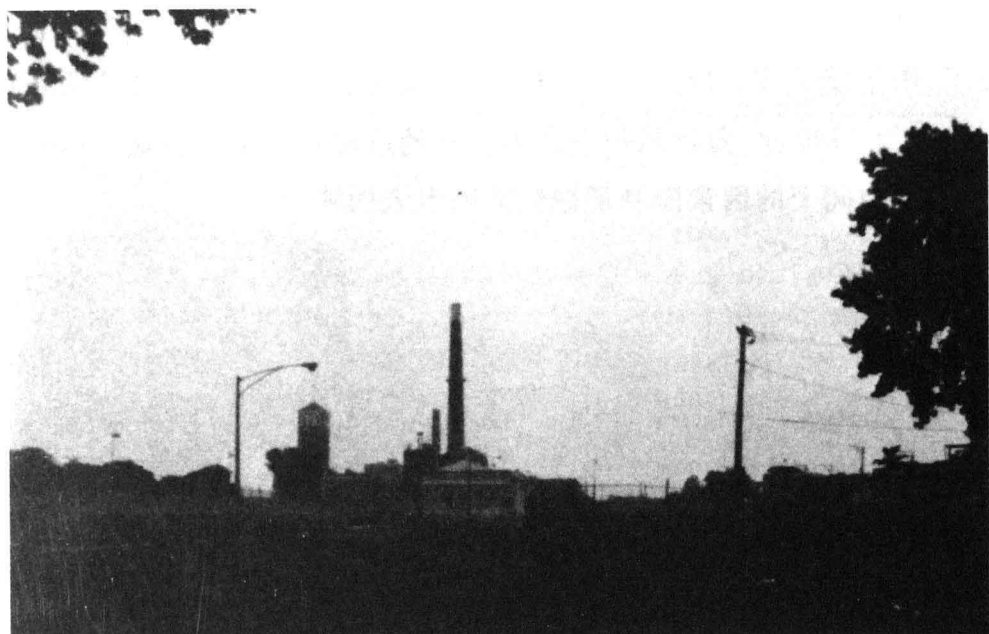


图 26 北朗代尔在最初的西尔斯塔的一个开阔的空地。凯特琳·扎罗姆(Caitlin Zaloom)摄影。

暴力、不安全和恐惧的来源。到 1970 年,由于工厂和商店的流失降低了这个地区公共生活的基础,在接下来的 30 年里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糟。

寥寥无几的就业机会,没有多少生意可做的商店,其他公共娱乐设施也很难吸引当地居民留在这个地方。1968 年暴乱之后,消失殆尽的基础设施使得当地居民逃离北朗代尔,几乎就像几十年前犹太人到这里来一样迅速。在 1970—1990 年之间,几乎有一半的人移居他处,只留下空荡荡的房子和那些承诺留下或无奈留下来的邻居。这个地区陷入了衰退的循环圈,政治学家韦斯利·斯科甘(Wesley Skogan)指出了衰退的典型特点:“当许多社区变得不适合居住时,偶尔碰面的人之间感觉不舒服或不安全,许多居民试图搬走……中产阶级的家庭和成员最先搬离,迁入的人往往是没有结婚的和暂时居住的‘候鸟’。那些行动上不方便的人将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去其他地方寻找朋友或者不与邻居接触。”<sup>34</sup>伴随着这些居民的离开,北朗代尔社区经历了与芝

加哥的前几代白人相似的经历：家庭和延伸的亲属网络在空间上分隔开了，由于孩子或父母去其他非裔社区、郊区甚至是大城市之外的地区居住。到1990年，曾经居住在北朗代尔地区的非裔家庭在这个地区分散开来，空间上的因素限制了他们照顾老人的能力。



96 图 27 北朗代尔一个居民区内空旷的场地。凯特琳·扎罗姆摄影。

在1995年，大部分芝加哥贫穷的黑人看起来很像在战后拥挤的衰退地带(Rust Belt)\*的贫民区，没有家庭或大家庭的网络植根于当地的生态环境之中，这些设施有助于建立像50年代或60年代那样的紧密联系。<sup>35</sup>移民和分散改变了家庭关系纽带的性质，与以前相比，人们现在偶尔用电话交流或者偶尔登门到访。一旦危机发生，这就会有很大

---

\* 衰退地带(Rust Belt)是指美国中西部诸州，东起俄亥俄州，西至艾奥瓦州，北至密歇根州。这些地区曾经是美国传统制造业中心，现在衰退了。衰退，是指美国传统制造业的相对退步。比如底特律乃至北部密歇根州曾经是美国最大的汽车生产中心，现在，美国汽车工业已开始向南方转移。美国新型的高科技产业则集中在东西海岸线，中西部人口在不断下降，也说明该地区衰退。(译者引自<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0046338.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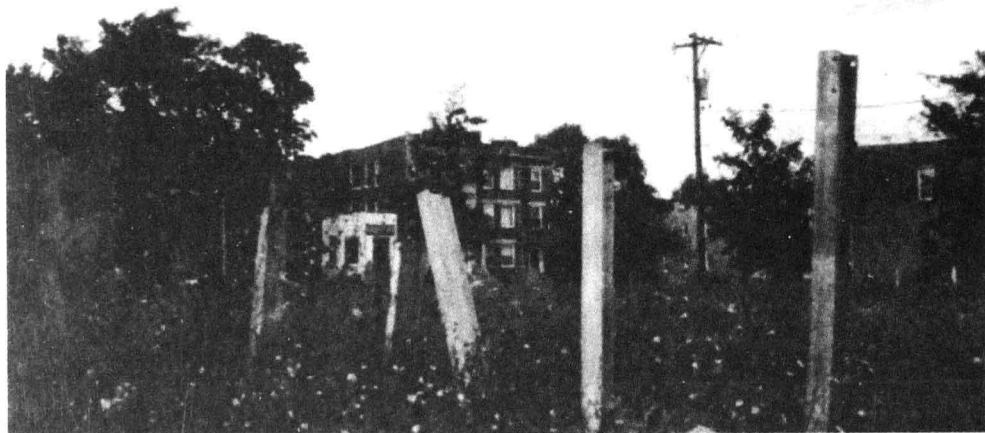


图 28 曾经繁华的北朗代尔的一块空地。凯特琳·扎罗姆摄影。



图 29 在北朗代尔,奥格登大道(Ogden Avenue)曾经是主要的商业要道。凯特琳·扎罗姆摄影。

97

影响,如果他们住在附近,人们既容易又方便给他们的亲戚提供紧急帮助或者平时就提供帮助。正如第一章提到的,这一点对老人尤其重要,

如果他们住在同一个区域的话,家人就有可能来探望他们。在热浪期间,整个芝加哥家庭网络空间分隔加重了非裔老人的脆弱性。<sup>36</sup>在北朗代尔,危险的社会生态就是由数十年的废弃和疏忽造成的,致使老年人处于更高的风险之中(图 27、图 28 和图 29)。

## 日常生活的暴力

在北朗代尔地区,衰竭的物质基础已经影响到邻里生活的每个方面。当我提出要求住户描述一下他们所居住地区的主要街道的时候,“像遭到过轰炸似的”(bombed out)一词就脱口而出,正像社区报纸中编辑解释的那样:“北朗代尔看起来像个战场,已经被轰炸过一样。什么基础设施都没有了。”萨拉·琼斯曾在北朗代尔住过 40 多年,她用了同样的话来形容街道的场景:“16 街道几乎是没有用的,奥格登大道也很萧条了,这里原来是一个汽车交易市场,现在只有我们几个人了。”一些街区已经离她很远了,另一个老居民也有同样的描述:“你没有房子,除了这些空地以外,什么都没有了。……在这里你只看到这些土地,但已经看不到人了。你看看,没有商店开门营业。罗斯福大道曾经是商店林立。”她的说法很容易验证。按照一个地方发展组织的话,在 1990 年,北朗代尔有 40% 的土地是荒芜的。一个 30 多岁的女士抱怨说,住在这样一个困难的地区,资源如此的贫乏,公共生活也只有一点点:“食品商店没有,没有像沃尔格林一样的连锁大超市,没有药店,在这里什么都没有……在这条街上,从这里到 26 街(小村主要的商业街),26 街是你唯一能感受到生活的地方。其他的地方就像是被废弃了一样。”<sup>37</sup>

在热浪期间,正如他们的日常生活一样,较为年长的居民们很少有动力离开房屋寻求减轻压力或在公共场合寻求社会关系帮助。这个地区缺少社会和商业的吸引力来招徕人们,特别是想走出家门的老人。<sup>38</sup>人们不能通过步行购买所需商品,居民们只得开车到几英里远的地方

去购物,买一些新鲜的蔬菜和药物等等。<sup>39</sup>达西·贝克也住在这里,正如她所说的,“我从来不在这个地方购物。”一些老人走着去购物,或者是体验一下当地的街头生活。无论是白天,还是在晚上,人行道上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在一次访谈中,在附近医院为老人治病的一位护士说,在社区,缺少所需的物资才是真正的公共卫生危机。“社区内有一大堆问题存在,高血压、糖尿病、肾脏病什么的。社区的居民缺少营养,这是一个大问题。我想,老人们缺少锻炼,也缺少正常的食物(这是有责任的),我在咨询上花了不少时间。有人说,散步是不安全的,我也不知道,我如何告诉他们什么时候散步是不安全的,他们不愿意走出自己的家门。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说,他们喜欢许多东西,如喜欢蔬菜,但很贵,食物购买确实是一个大问题。”<sup>40</sup>

北朗代尔不仅缺少让老年人走出家门所需要的成熟的公共空间、基本资源。他们也承受着当地社会网络和空间的压力。不法药物的急速发展使非正式的经济代替了正式的商业经济,毒品贩子和帮派为了地盘和市场分割导致的暴力冲突使北朗代尔在白天和晚上,都成为一个危险的区域。1995年,邻近地区有许多犯罪点的一群居民告诉我,<sup>99</sup>贩毒者出没在这个地区的一些角落。“他们在这个街区不分白天和晚上,都在街上”,一位居民强调。尽管老人知道年轻人住在那里,自己就会觉得安全些,但他们害怕的是,这批团伙在互相火拼时,他们可能会碰上麻烦。

这儿确实时常会有一些麻烦。根据芝加哥警察局和公共健康部门的统计,在1994—1995年,北朗代尔地区平均每10个居民就有1人犯罪。<sup>41</sup>当地的警区,其中心办公室靠近北部的边界,东西两侧是加菲尔德公园,我见到的当地所有官员认为该地是:“周边地区中最危险的区域。”一天,一位官员嘲笑洛杉矶的警局在调查辛普森(Simpson)时办事不力。根据他们的经验,谋杀应当被定罪。一个当地的警员告诉我,“在第11区工作一年是一种职业锻炼。”“如果你在这里工作过”,另一个退休官员说,“你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了。”

在我访谈第 11 警区期间,弗雷德·汉德勒(Fred Handler),一个有高学历的资深官员,给我看了电脑上对该区域犯罪的统计数字。这些数字让人感到吃惊。我们决定查看从热浪爆发之日起前一年的数据。在第 11 区,有 10 万居民,超过 1.2 万人因服用大麻被逮捕,平均每天有 23 人次。单独在这一年,这个地区由于毒品交易被警察起诉的居民比较多。市议员迈克尔·钱德勒(Michael Chandler)抱怨,“在这里,自由市场上,毒品自由交易,警察和市长也不干涉。”回到电脑,弗雷德查到第 11 区热浪时期有关犯罪的一个报告。在 1995 年 7 月 12 日,天气非常热,毒品交易少了许多,但至少在这个地区仍有人被逮捕,<sup>42</sup> 134 人因服用毒品被逮捕,178 份斗殴事件报告,95 起盗窃,51 起抢劫案,50 起袭击案和 2 起谋杀案(图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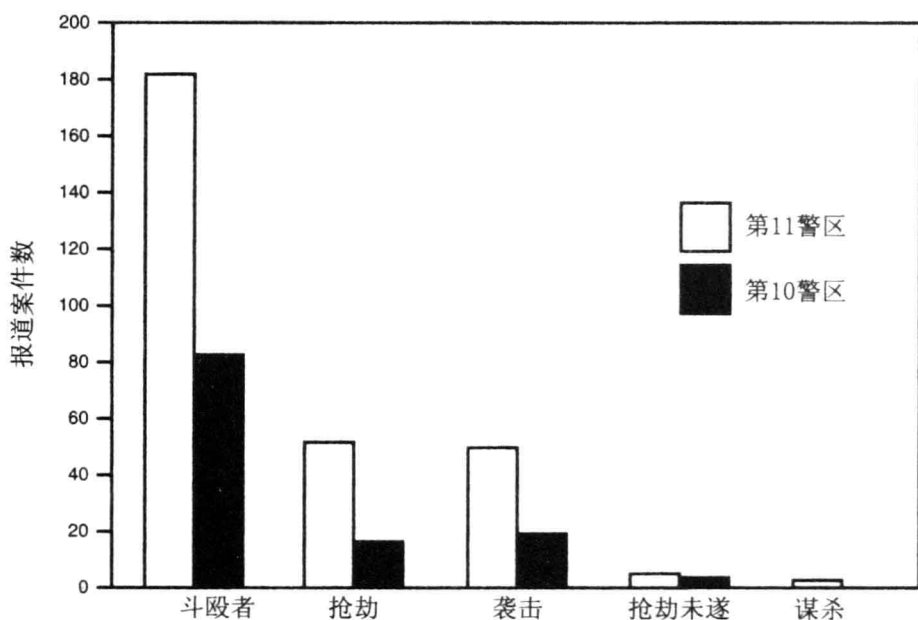


图 30 1995 年 7 月 12—19 日,第 10 和第 11 警区每 10 万居民犯罪率报告。资料来源:芝加哥市警察局。

如此之多的犯罪现象发生在北朗代尔,令住在这里的大多数居民感到非常吃惊,你也无法要求这些与毒品和暴力犯罪无关的居民感到安全。100 “住在这里的 97% 的人与枪支和毒品无关。”市议员迈克尔·钱德勒告诉我,“只有 3% 的居民与此有关,他们走在街上,除非我们组织



起来和采取积极的措施。”如果他们全住在北朗代尔地区，那么与毒品交易和其他犯罪做斗争相对较容易，但是，有一个居民告诉我，“有好多个不是来自这个地区的家伙在此进行毒品交易和倒卖海洛因，我们无能为力。”

北朗代尔的人们难以对付暴力和毒品交易，建立更安全的邻居关系的另一个理由是，这个地区的社会生态吸引和培育着危险的地下交易活动。社会科学家一直在讨论，在主流社会中，没有受到尊重、没有正式工作的年轻人将会被引诱到毒品交易中，因为毒品交易可以提供收入，得到社区和社会的承认。<sup>43</sup>但是街头上的毒品交易也来到了北朗代尔，因为这个地区的空间环境适合毒品交易。空旷的角落和田地，长满杂草的开阔地，废弃不用的建筑物伴随着昏暗的街道，这都为毒品交易者提供了安全保障，同时，也使当地居民感到不安全。在北朗代尔地区，经济、政治和废弃的建筑物表明，当地居民无法承担起责任，或者说，无法加以控制。这一地区由地下交易市场组织起来，并由犯罪团伙加以管理和控制。这一地区的时空条件处于危险之中，以致北朗代尔的居民每天都在体验着、承受着极端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压力，只得待在家中寻找保护。<sup>44</sup>“在这里，安全是最大的问题”，一位居民告诉我。邻居们对空间重要性的理解推动和引导着当地的组织。 101

邻近北朗代尔的居民对这个不安全的世界的感觉，就像一个妇女解释的，在她家附近的一条街上，有两个年轻人被杀害几周之后，“每个人都非常害怕这一件事，歹徒可能驾着车，来回射击，即使你不是歹徒，也不是他们一伙的，但你也担心这样被射杀。”<sup>45</sup>达西·贝克，一个在北朗代尔住了40多年的人告诉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她所住地方的问题尤其严重，“如果你1995年站在这里，你能看到每个角落都有人在售卖毒品……一群人，……在你家的前面站着毒贩子，在你的园子里藏着毒品。我们花了不少钱用来种花草，他们却用来在我们的房子前面藏毒品……子弹在我们的街区乱飞，你不可能在外面坐很长时间，我们原来习惯于整个晚上坐在外面，只是聊天或者做些其他什么事情。



但是现在，一切都已经改变了。”

## “这里所有人都得谨慎”

当北朗代尔社区试图维持一种和平和稳定的邻里关系时，街上的种种行为表明，居民为了避暑而无法反对他们自己过集体生活的基础。伊莱贾·安德森(Elijah Anderson)已经认识到，“这种持续不断的危险意识助长了人们的恐惧和不安”，<sup>46</sup>最容易受伤害和害怕的人保护自己的方式就是待在家里。小心谨慎的人发现，在当地所有居民中间，对他人的恐惧限制了老人的公共活动，也限制了那些更年轻和健康的人来支援老人。<sup>47</sup>“恐惧使人们无法外出”，市议员钱德勒解释说，“这是真的。”

生活在恐惧中，甚至以此为中心来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是居住在一个街上到处是毒品交易、公共基础设施衰败的高犯罪率地区的结果。老年人对于暴力就在身边这种状况尤其敏感，他们不仅容易成为街头

102 犯罪的对象，而且在受到攻击时更容易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许多北朗代尔的中年居民认识到，就像萨拉·琼斯所说的，“这里，最严重的问题是人们都害怕出去”。然而，温特夫人，一个70多岁的北朗代尔居民，用更客观的视角来解释，虽然“在这里，大多数和你谈话的人是害怕的，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对危险注意得不是太多”。与她居住的地方相隔几个街区，厄尼·斯图尔特试图理清那些已经变成当地环境嵌入的犯罪处理过程，“对我来说，那是谨慎，不是害怕。这里的每个人都是非常谨慎的”。厄尼的谨慎逐渐成为日常习惯并定格在他的生活中。在几个街区之内，他认为邻居是安全的，但是，他在这个地区很少到外面走动；而且，像其他大多数当地的老年人一样，他很少在晚上出门。在他的同辈中，尽管厄尼身体健康，富有活力，希望从家里出去能走几个街区，但与其他老年人相比，这可能使他感到更危险。

弗里曼夫人，一个快到 80 岁的老人，她是那种人的典型代表，在自己的房子前，周围都是熟悉的年轻人会让她感到舒服，但是，她不喜欢远离自己的小区，且尽量避免与陌生人打交道。她住在一个街道上，像这个地区的其他居民一样，经常看到贩毒的和吸毒的人出入，其中许多人是她认识的。弗里曼夫人对街上遇到的孩子表示很友好和慰藉，关心他们交往的意图和他们结识的同伴，“这里的孩子都认识我，而且他们不会和我捣乱”，她说，“他们不和我捣乱，他们对我了如指掌，告诉他们的朋友不要和我捣乱，他们告诉他们的朋友不要做什么。”但是担心离开屋子太远会被偷窃让她感到不安全。她坚信，当地的年轻人看着她并等待机会闯进她家，当一个邻居看见一个当地的男人试图强迫打开她家后门的时候，她更加确信无疑。“离开你的房子是很难的”，她告诉我，“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社区关系里，有人在看谁出去了，然后就会过来抢劫你。”

长久以来，北朗代尔的居民以内敛化、自然化的策略来应付犯罪。尽管是新来者，也不得不被教会如何应付所面临的危险，当地居民传递着保护策略的知识。玛丽修女，一个 30 多岁的黑人修女，来自非洲，工作和生活在当地教堂，总结了她从邻居那里听到的信息：“不要在晚上出去，不要自己一个人出去散步，不要站在空旷的建筑物旁边，到处都有危险。如果你想去商店购物，你一定要来叫我去商店买东西……并且，你知道，我相信，在白天和晚上同样会有危险。甚至当你站在一个杀人的地方，白天和晚上也没有什么不同。” 103

在访谈中，一个 30 岁左右的非裔牧师迈克尔讲述了一个差不多的故事。

直到他们告诉我事件的真相，我才感到害怕，啊，这里不安全。这些人在角落等着偷东西。他们可能会引起麻烦……他们可能告诉我那里会有流弹。他们可能会打群架，在交火中我可能被射中。当你走在街上时，他们就会过来抓你，你说恐惧吗？我没经历过，

但是人们总是这样告诫我……那些和我一起工作的人，总是告诉我小心点儿。不要穿过小巷，那会有危险。你永远不知道……我没有经历过这些，但是我身边的人有这种经历，我与其中的一些人交谈过，从电视上看了一些报道，我保持警惕，不过开始的时候我没有这个意识。

这个建筑，已经被枪打过几次了。窗户在前面，已经换过了。他们开枪射击，不仅是打算射击教堂，而且彼此射击，然后子弹就飞来了。如果我们在办公室，可能有一颗子弹刚好会击中你的脑袋。

这个地区的帮派暴力和毒品交易，改变了社会与自然环境，减少了公共生活对住在这里的人的吸引力。这个地区衰败的自然生态为老人增加了一些特别的危险。芝加哥老人抱怨诸多的困难，破旧的人行道、摇摆的楼梯和不发光的路灯使街道漆黑一团。<sup>48</sup>老人担心摔坏，他们很清楚，当他们的身体变得虚弱的时候，街上某一个障碍物就可能使他们受伤或致命。在北朗代尔，市政府很少整修街道、人行道、小巷、空地，也顾不上帮助人们修理他们的房子、门廊、楼梯等，这种自然境况使得

104 当地的年长者感觉很不安全并且增添了他们出门的危险。在街上行走的这种恐惧的社会成本在高温时是致命的，那些北朗代尔的居民建造起来用以保护他们安全的障碍物，相反却成为他们高温死亡的根源。

## 邻里瓦解中的社会纽带

在北朗代尔，限制社会交往机会的压力既不可能不使社会团结在一起，也不会使邻里间的社交行为变得不受欢迎：当地居民努力克服其环境所造成负担，并且相互支持。在北朗代尔的几个街区之间的短期居住和长期居住，有相当大的变化。一些住户拥有自己的房产，居住的

稳定性很高,其他居民则居住在闲置、租赁和多次转手的房子中。在比较稳定(如果不是有较少暴力)的地方,我观察到一个显著特征是,自20世纪50年代就已居住在这个街道上的许多居民,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此,并使其生活与这个街区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不仅知道这条街区出现过的主要事件以及问题,而且知道参与这些事件的人。<sup>49</sup>他们几乎没有他们需要恰当处理当地问题和关系的资源,但是至少北朗代尔某些街区的居民详尽地熟悉他们的邻居以及邻里关系,这些是最凝聚社区所特有的。北朗代尔的居民所遭受的不是来自对邻居了解的缺失,也不是来自组织的瓦解,而是来自超过他们回应能力的当地压力和挑战。

在我最初访问该社区期间,我做了这样的观察,一个长期住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街区的住户,这里有三个空旷地,两个被留弃的建筑物,以及在一行行坚固石灰岩建筑映衬下的盛行的毒品交易,这些都引导着我们走进她的街道,坐在她的门阶上,开始听她讲住在她周围的每个家庭的故事。她声称,“我知道这条街上的每个人”,并且她可以说出她在这条街上看到的几代人。事实上,对邻居和邻里间的活动保持密切的关注,是北朗代尔居民过去常常减少暴力和其他当地社会问题的弱点,以及减少社区其他成员能够信任的判断的策略之一。最重要的区别是居民有更少的理由与社区年长的成员相协调,而不是其他成员。因为与他们自己相比,关在屋子里的人和那些从不与人打交道的隐居者对他人的威胁更少。对许多住户来说,住在暴力区域内应该知道该场景,但是他们需要这些实际的知识以便能够避免危险,也能参与公共生活。<sup>105</sup>

纵观北朗代尔,有两个主要的正式社区参与的渠道:教堂和街区俱乐部。居民们开玩笑说,两个机构存在于如此多的成员中,以至于每个人可能都想到他们的邻里是地球上最神圣最有组织的地区。例如,1998年,在北朗代尔,一份由一个社区组织编写的当地服务目录,列出地区周围120个教堂和73个街区俱乐部。<sup>50</sup>那么为什么在热浪期间,这些机构不能保护该地区最易受伤害的住户呢?

## 教堂和街区俱乐部

非裔美国人的教堂,从上千人的大型教堂,到中型规模的教堂和仅有很少宗教成员的临街店面,很长时间以来,通常是黑人城市社区中社会生活的主要据点之一,特别是对芝加哥的黑人而言。<sup>51</sup>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当福利改革立法和其他城市政策取消联邦对城市穷困者的支持,并对地方组织授予更多责任的时候,教堂在低收入黑人城市社区中,作为一种可能的重建资源,再度出现在众多政治的、学术的争论中<sup>52</sup>。在北朗代尔,有很好的理由去近距离观察教堂在社会救助系统中扮演的角色。当宗教机构试图支持贫穷的住户时,通过考察宗教机构所面临的挑战,我们能够认识到基于信仰解决城市危险和贫困问题所存在的潜在长处和缺陷。

并不是像北朗代尔这样的多教堂地区的所有居民都属于当地的信众,虽然地区教堂经常帮助会众以外的人,对他们来说积极地追寻需要帮助的人还是有困难的,即使他们愿意这样做。为那些限于流动并极其需要的人提供保护和援助服务是一项艰难的工作,甚至对于那些有明确计划来做这些的组织也一样。就像市长委员会研究热浪所得出的结论,这可能是真实的,当他们“通过人们已经知道并信任的网络对那些孤独和恐惧的人伸出双手”的时候,提供救援是最为有效的。<sup>53</sup>但是除非也有财政和物质资源方面的支持,否则地方团体,例如地区教堂不能有效地做这些事情。

106 其他情况使得通过教堂保护脆弱的当地居民的任务变得更为复杂。北朗代尔的居民,像所有城市地区的居民一样,经常到城市的其他地区参加教堂礼拜,而不是附近地区。类似地,北朗代尔的教堂经常有大量的成员来自城市的其他地区。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的居民普遍已经知道,最靠近教堂的领袖专心于社区工作,从而维持着北朗代尔之外的会众与地方宗教领袖的联系。但是这些地方的积极分子,他们的职责

或者业余爱好就是援助和保护其他人，往往不需要教堂的保护和支持。居民在他们的地区之外参加教堂活动，但与居所附近的教堂关系网联系很少。如果他们积极地参与的宗教团体因为太远而不能在正常时期或者紧急关头如热浪时提供社会支持，当地的教堂团体不太可能留心去照顾他们。

一般情况下，影响教堂对地方社区贡献的，不是缺少社会责任，而是缺少时间和资源。大多数教堂的牧师不是作为全职的宗教领袖来聘用，并且，成为教堂领袖的人忙于做他们自己的事情。宗教官员和积极分子不得不做其他的工作，并且把“上帝的工作”放在他们的业余时间。为那些生活在极度贫穷中的人们，特别是那些需要帮助购物、煮饭、打扫等帮助的孤寡老人提供适当的帮助，比大多数教堂提供的联络工作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北朗代尔地区的教堂和以教堂为基础的社会网络确实在热浪期间帮助了不少当地老人和病人，而且他们的努力确实保护了许多脆弱的住户，但是北朗代尔教堂所运行的情况——包括许多居民不参与、不同的宗教团体和领袖的不一致、这个地区的极度贫穷和削弱公众生活的危险环境——使得这些机构不可能填补城市社会网络的缺口。<sup>54</sup>教会在支持邻里的社会、政治甚至是经济活动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当他们与其他地方组织、州政府合作时，他们甚至变得更为有效。但是，提供这些关键支持服务的充足水平需要人力和财力，具有额外传教任务的宗教组织发现很难有效提供这些。

帮助支持地方社会网络的另一个主要的机构是社区俱乐部。很长 107  
时间以来，它已经是芝加哥邻里社区的一个核心部分，但在近几年变得更为大众化，因为当地政府积极推动它们。<sup>55</sup>作为一个由居民组成的以坚持地方控制、建立公众行为标准以及资产保值为目的的机构，社区俱乐部是邻里构建社会凝聚力的一个关键资源。这些组织能够提供一个正式的体系，在紧急事件如热浪中，推动居民努力去相互调查，或者为了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去合作。“我们在一起，有网络，确信为社区带来

社会服务,并满足我们的需求”,一个已经将北朗代尔的许多社区俱乐部组织成一个大的团体的地方领袖解释说。但是,社区俱乐部要想成功也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和人力资源。有一些条件在如人员流动、贫穷和北朗代尔地区的暴力地区内很难得到。

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社区俱乐部的最基本的资源必须是有一个由活跃居民组成的核心团体。这些人扎根于他们的街区并依托于此,他们愿意花时间和精力与来自街上试图控制这个区域的危险人物做斗争。这种社区组织模式的拥护者鼓励居民“回到街上来”,就像讲述的一个故事,一小群老太太通过坐在外面折叠的椅子上,写下所有经过本地的汽车牌照号码,以此来驱逐毒贩子离开他们的街区。“你只需要一些愿意献身的人们,就能打退那些毒贩子并且重建你们的社区”,一种邻里重建项目的声音强调。

虽然有大量成功优化邻居关系运动的例子,<sup>56</sup>但是要把人们拉回到街上实际上是一件困难的事,并且居民们不得不通过强有力的激励去斗争。如果他们划定边界,自己又不住在这里,毒贩子将会报复社区俱乐部,用各种恐吓的方式威胁居民,例如用一种我在田野工作中几次看到的策略:摘下社区俱乐部的标志,象征性地拒绝居民们到街上的要求。<sup>57</sup>在她稳定的街区,多萝西·格雷厄姆(Dorothy Graham)告诉我,她怎样发起一个在街上清理其中一个空旷地方杂物的计划,并且将它转变成一个社区花园。

108 草和枝叶,有的地方已经三至五英寸高,我带上一把锯和一台除草机过去剪掉它们,你知道,我需要去邻居那里借一些除草设备去除草。它们那么高。

现在,我在那里干活儿,清扫,这时,某个愚笨的人走过来,让我停下来,因为他的团队需要这些枝叶做生意,他告诉我:“你不应该剪那些草。”

我问:“为什么不?”



他说：“我们需要那些草。”

他们喜欢开阔的杂草丛生的地方，那样他们有地方藏毒品，当警察包围过来并抓住他们的时候，可以使警察不能蹲下来寻找毒品。

我们这里有很多毒品、娼妓、流弹，像其他人一样，我过去曾经很满足，但是之后我们开始觉醒。

因此，我看着这个年轻人，告诉他，“我不关心你要什么草地，当你站在这里的时候，你已经站在错误的地方了。你要你所需要的东西，我们要我们需要的东西，现在我们需要一个干净的社区，如果剪掉这些草拿走了你们的什么东西，我感到抱歉。但是，我会继续做下去。”

他滑稽地看着我，然后走开了。

在这个地区承担义务并以这种方式勇敢地站在年轻人面前，如果她不是已经对这个地区有如此大的兴趣，多萝西可能不会愿意这么做。

北朗代尔许多街区的麻烦是：居民的高流动率不仅耗尽了这个地区老居民保留下来的情感归属和财产纽带，而且还分解或者撼动了当地社会网络，因此，邻居们不像其他社区那样，像对待自己那样对待其他人。城市社会学家和城市规划者已经争论了很久的是，居住的稳定性是社会凝聚的关键因素之一，许多对此的解释是，各种事件和问题所花的时间和所分享的经验，都是为了发展关系、责任和强有力刺激集体行为或社会支持的互惠关系。<sup>58</sup>在北朗代尔，居民外迁以及经济断层的10年，已经破坏了社区的稳定，77%的房屋被临时租居的人所占。那种促进建立强有力的街区联合会的情况只存在于那些最稳定的街道中。

强有力的街区俱乐部致力于建立凝聚力和维持本土控制力，但是因为他们很少参与到邻里中最需要帮助的老人和年轻人中去，所以他们不得不朝向他们的目标去努力。我曾经参加过街区聚会，到场的和组织的人大多数是年龄在40—70岁之间的女性，还有一些中年男性和



更年轻(二三十岁)的女性,但没有小于 35 岁的男性或者很年长的居民参加。温特夫人告诉我,她曾经努力尝试过想让她的那些年龄较大的邻居去参加街区聚会,但由于“人们从不在晚上出门,并且由于他们过于恐惧以至于没有足够的人去参加邻里间的聚会”。多萝西,一个住在离此地几个街区远的女性,曾帮助这个地区建起了其中一个最强大的街区俱乐部。但是,她指出,“我没有一个定期的街区聚会,因为老人不可能总是外出……他们不应该在晚上出门。”但是只有在参与者知道谁能提供帮助并知道如何有效地去做的时候,街区聚会对于较年长的居民来说可能是一个不错的资源。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北朗代尔,就连最有活力的邻里交往都被西区日常生活的压力所覆盖。1995 年的热浪证明如此多的危险以致难以控制。

## 南朗代尔:成长中的小村

只需穿过北朗代尔南边的一条街,就会立即看到景色的变化。尽管对南朗代尔(小村)的简单统计显示,其社区与北朗代尔拥有同等比例的贫困老人、独居老人,还有生活水平低于贫困线两倍的居民,但这两个地区的社会生态状况截然不同。空旷的场地和废弃的建筑在非裔美国人地区很普遍,这使得人们更加关注熙攘的人行道、活跃的商品买卖和承载超负荷住户的居住场所。公众的评论集中在涉及这两个地区各自的主要人群的种族认同上,然而比较小村和北朗代尔公共空间是同样极端的。北朗代尔的社会形态削弱着这个地区的集体生活、熙攘街道的物质基础、密集的居民容量、临近的家庭居住,还有在小村繁荣的商业推动的公众活动以及本地区居民中非正式的社会支持。尽管许多居民对该地区的犯罪以及当地犯罪团伙活跃的关系网感到担忧,<sup>59</sup>小村在 1994—1995 年间的暴力犯罪率在芝加哥 77 个社区中排第 59 位——差不多低于北朗代尔的暴力犯罪率三倍,比芝加哥地区的一般水平低两倍多——在正常时期,暴力犯罪并没有明显地危及公众生活

的质量。<sup>60</sup>年长的居民从这些生态环境中获得了特殊利益,由于他们周围的福利设施和重要公共空间,这些地方吸引老人从家里走出来,走向街道。一旦来到这些公共场所,这些老人就开始与邻里、附近商店的经营者、社区的社会团体以及提供援助的这些人建立社会交往,而这恰恰是不能外出的老人难以建立的。

在热浪期间,小村的老人受到了两方面保护,避免了被隔离的危险。首先,街区通过相关安全措施鼓励老人来到公共场所,正是在公共场所中与社会的接触有助于他们得到其所需的帮助;其次,这些地区的商场、银行和其他商业中心给老人提供了安全和空调设备,使他们从炎热中得到缓解。比起那些市政部门在热浪时期官方建立的降温中心,老人更愿意去他们平时经常去的社交场所,在那里他们感到更加舒适。在热浪时期留在小村最脆弱的拉丁裔白人老者同样受到了当地社会生态的保护。这一地区丰富多彩的公众生活吸引体质虚弱的老人走出家门,推动了社会互动、人际关系网和健康行为。 110

小村和北朗代尔生态基础的不同,使得在这两个社区之间建立起了一道严格的有形边界,进而加深族群区分。小村的居民解释说:“我们和北朗代尔的居民之间有一条固定的界线。”政治组织者、教会领袖和商业开发者同样认为:“如果我们在靠近北朗代尔或者在当地筹划活动的话,人们不会来参加。”因为,“到那里去就好像是去了外国。”这两个地区在象征意义上的分离刻画出这两个地区在种族和生态上的差异。<sup>61</sup>在20世纪50年代,正如艾伯特·亨特所写的那样,南朗代尔地区的白人住户将该社区更名为小村,“在穿过本地区的铁路上放置很多醒目的大招牌,如“欢迎来到小村”,试图和邻边的北朗代尔社区区分开来,<sup>62</sup>这正是他们想要避免的耻辱。20世纪50年代之后,这一地区的主要人群从白种人变为拉丁裔种人之后,本地的居民对于要和朗代尔区别开来的行为意图表现得更加明显。小村地区有许多标志来声称该地区是小村,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标志是在第26街(或墨西哥街)东入口架起了一个拱门,这是社区的主要商业干线,用“小

村”文字欢迎游客。



图 31 在小村的第 26 街,商业活动支持了繁荣的街区生活。图片来自罗娜·塔尔科特。

游客只需走几步路跨过这道拱门就能看见这个社区,特别是感受到在商店、人群和活动之间的缝隙中洋溢着繁忙的商业气氛。正如当地的拥护者和商业开发者先后告诉我的一样,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第 26 街(图 31)可称作是在芝加哥地区除密歇根大街之后的第二个最繁



图 32 “这里的街道总是人山人海”。图片来自罗娜·塔尔科特。

忙的商业区域。就如北朗代尔地区的居民所描述的那样，他们一度欣欣向荣的商业街，例如第 16 街被称作是“被轰炸过一样”。几乎所有我



图 33 小商贩吸引着门外的顾客。图片来自罗娜·塔尔科特。

<sup>112</sup> 在小村的线民都用“忽然兴旺起来的”这个词来表达他们——相隔 10 个街区——对第 26 街及其周边的感受。在田野调查期间,我观察到,正如一位居民米格尔·拉米雷兹所说的那样,“这里的街道总是非常繁忙(图 32),从早上一直到晚上 9 时 30 分,许多人都在外面”——社区报纸的编辑丹尼尔·纳尔蒂尼(Daniel Nardini)指出:“外面活动的人太多了,却没有足够的空间了。”在周末,这一地区的购物人群和游客们造成的交通堵塞严重到一个小时只行进几英里的程度。除了最冷的几个月,摆摊的小商贩在街道上划分各自的区域来售卖一些水果、鲜花、墨西哥水果饮料、冰淇淋、西班牙甜甜圈和其他商品;事实上,这些小摊贩非常受欢迎,以至于当地商业主担心失去收入,并组织驱使小摊贩离开街区的运动。

包括小村在内,行政区域的市议员里卡多·穆尼奥斯(Ricardo Munoz)解释:“第 26 街是这个地区的核心。”“它把经济活力注入这个社区,而社区的居民则是流动的血液。”在小村商会主席弗兰克·阿圭勒(Frank Aguilar)看来,第 26 街上的商店和公司雇佣了 1.5 万多个

工人,而且这些人的工资消费大部分又流回当地的经济中。充满活力的人流和商品流也带动了周边街区,到20世纪90年代末,商店、小公司和当地组织开始开放整个地区,甚至包括大型的居民住宅区。显而易见的是,正如纳尔蒂尼指出的那样,“人们总是来来往往,并一直在购物”。



图34 大热天,一个家庭在院子里乘凉。图片来自罗娜·塔尔科特。

很久以来,南朗代尔被看作是一个小乡村。在当地的历史学家看来,这一社区区域是“有争议的芝加哥地区中最老的工人阶层社区,时间上可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尽管直到1869—1889年间,市政府仍没有正式合并这一地区的大部分。<sup>63</sup>当地社区表现出来的民族特有的团结一致促进了芝加哥地区最有名的民主政治机构的创立和成长。这是由地区英雄和芝加哥市长坎顿在小村第22选区建立的。那时的社区主要由捷克斯洛伐克裔人、德国裔人和1910年后的波兰血统的人,以及来到南朗代尔,为了麦考密克收割机公司和西部电气公司中相同工业工作的移民所组成,这两个公司曾经吸引人们去几个街区之外



的北朗代尔工作。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这一社区经历了它的第一个主要成长时期,但在市高架火车网络道格拉斯公园分公司 1890 年将其引入本地区之后,这一地区才兴旺起来(并于 1902 年在西北角开通了另一个站点),这正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通往闹市区和其他城市地区 113 区的通道。截至 1920 年,这一地区还有超过 8.4 万个的当地居民,“在这一地区的西南部只留有少量的空地”。<sup>64</sup>

表 7 南朗代尔(小村)的人口,1950—1990 年

年份	人口	人口变动率(%)	白人比率(%)	拉丁裔人比率(%)
1950	66977	—	98	NA
1960	60940	-9	94	NA
1970	62895	+3	86	NA
1980	75204	+20	45	74
1990	81155	+8	27	85

\* 第一次使用拉丁裔族群是在 1980 年的人口普查中,南朗代尔的大部分拉丁裔人口在此次变动之前是划入白色人种里的,在 1980 年和 1990 年的人口普查中,调查对象认为其自身既是白种人又是拉丁裔人。

南朗代尔地区的白种人,赶上了芝加哥居民利用州津贴的有利条件而搬到市郊的浪潮,并在这一迁移中,远离他们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20 世纪 60 年代(表 7)迁移到北朗代尔和小村部分地区的非裔美国人。小村人口的外迁与北朗代尔相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然而,部分是由于在 1940 年小村的房屋购买者比率为 36%,比仅有 16%的房屋购买者比率的北朗代尔高出两倍多。<sup>65</sup>小村郊区人口外流的步伐相对而言比较缓慢,这意味着,这一区域一定程度上没有对非裔美国人开放,当地的房地产经纪人除了向城市中逐渐增多的墨西哥裔社团出售住房外,还向不少墨西哥海外移民出售。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由于郊区重建计划和新建高速公路占据了从西部附近到北部边界的住房,墨西哥裔美国人移到小村生活。截至 20 世纪 60 年代末,这个地区获得了

明确的拉美身份。在这个改变中一个明显的标志是,1896年创立的波希米亚定居点(Bohemian Settlement House)作为一个主要社区组织,在1970年更名为亚兹特兰房屋(Casa Aztlan)。<sup>66</sup>

至少有两个以上的原因可以解释,小村为何免于遭受北朗代尔和其他在芝加哥地区由非裔美国人主导社区一样的命运。首先,来分析我们习惯称为种族主义的排斥和压迫的过程,不过还须对此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描述,这是因为,这些措施并没有隐含可确认的社会或法律的具体设定。道格拉斯·马西(Douglas Massey)和南希·登顿(Nancy Denton)在争论中获得了这一事实过程的一部分:与北朗代尔由于一定程度的种族歧视变成了“一个不毛之地”的同时,小村却演化为“商业活动中心”。<sup>67</sup>但是,这两个地区的差异——都是由所谓的少数裔人口组成,而且几乎没有白种人——这种差异明显扩大了并且超出了隔离的程度。不像北朗代尔的非裔美国人和一些其他芝加哥社区,在小村拉丁裔群体并没有经历过集中居住的特殊强制;机构和住户迅速并持续的遗弃;或纵火和暴力加快了当地社会生态的毁灭。<sup>68</sup>第二个关键的原因是,从20世纪60年代起,小村就如磁石般吸引着除墨西哥人、中美洲人、海外移民外,还有芝加哥的墨西哥裔人群,发展成为商业中心和居住的密集地。在白色人种和黑色人种数量下降的同时,这些城市中的群体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增长。<sup>69</sup>墨西哥裔美国人向这个社区的持续移民再度丰富了这个地区的人力资源,使得零售商和当地的小型公司,如食品店、旅行机构、医疗机构和电信公司这些商业经济获得了再生。当北朗代尔在1970—1990年间流失了差不多一半多人口时,小村的人口增长了约30%。这个地区只有少数废弃的建筑和空旷的场地,而仅存的建筑,据《芝加哥》杂志称:授权给了芝加哥“最热门之一的不动产市场”来开发。<sup>70</sup>“在小村”,弗兰克·阿圭勒对我说,“这里只剩下空地了”。在1995年的热浪期间,商业空置率约为2.5%,而市中心则是此数字的四倍,北朗代尔地区则要高很多倍。



## “这里的街道总是人山人海”

小村活跃的街道生活吸引了老人和年轻人来到公共场所,在这些公共场所,非正式的互动和偶然对他人的观察成为社会凝聚力的典型形式。我访问过的许多长者都说,在热浪时期,他们在第 26 街上装有空调的商店里休闲,就像他们平常在暑假里做的一样。不过,小村里的老人在街边比邻里的北朗代尔更为不害怕:住在一个有着繁华的商业活动和充满活力的街区,他们还是更喜欢外出步行到他们可以去放松的地方。丰富的商业资源和欣欣向荣的街头文化遍布附近地区的公共场所;我在做实地调查时,发现街上到处都是人,包括推着装满食品和小袋商品的手推车的老人。杰拉尔德·萨特尔斯(Gerald Suttles)争辩道,“街道生活是[邻里]人际关系网的一个重要纽带,同时,也是对居民相互了解的一种控制”。<sup>71</sup>对于今天的小村来说依旧真实的是,街道是社会接触和社会控制的中转站。这些公共区域相对的安全,使得小村的居民——甚至是老年白人——参与到邻里和社区事务中来变得更为容易。

但是除了这个有助于社会整合的工具性角色之外,安全的人行道、当地零售商和食品杂货商,还有充满活力的公共活动都对当地居民的健康和福利提供了关键性的好处,尤其是对于老人来说更是这样。正如社区内科医生约翰·赫尔曼(John Herman)解释的那样,“这里的人更喜欢散步,这是健康的。人们享受了更多的阳光,因此,得到了更多的维生素 D,并较少出现骨质疏松,这使得他们感觉更好”。北朗代尔的卫生工作者发现,要让年长的人锻炼身体是件难事,因为,老人感觉他们在外面活动易受到伤害,然而,我在小村采访过的大部分老人都把步行当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特别是在比较暖和的月份里。与北朗代尔的邻居不同,许多人开车去郊外或去小村的商店,小村的老人有着更充分的理由到室外活动。据在小村商会发行的时尚杂志《公司名录》公

布,1998年这一地区有大小71个杂货店,15个面包房,96个饭店,30个打折商铺和2个百货商店。除了有一个充满活力的和现金支付的卫生医疗服务市场外,还有一些非营利机构,包括许多义务诊所和为没有健康保险的居民提供可供选择的医疗服务。对于当地的老人来说,商业生活特别重要,不仅是因为吸引他们外出购买所需物品或服务,还给了他们在感到孤独或无聊时外出走动的一个借口。

用一些当地居民的话来说,作为芝加哥其中一个最大的商业带和作为专营墨西哥商品市场的小村,“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社区”,正如一个常住居民所说的那样:

小村有很多只会在不得已时才会离开小村的人,其中包括老年白种人群体:例如,我们的邻居。直到她死前的一个月,我的妻子才带她到市中心,她上一次去市中心是在1940年。在55年的时间里她没有去过那里一次,而她当时已经92岁了。

人们留在这里是因为他们喜欢步行去商店并购买食品,他们也可以去这里的面包店。小村有很多家银行[1998年,单单第26街就有7个主要的银行,这一地区还有另外6个银行,更多的银行则在较远的地方],因此,如果他们想省钱就会选择这里的银行。

这些资源使得每个人都涌向街头,正如格林指出的那样,“孩子们出来了,老人们出来了,人们忙于购物。商品的吸引力是非常惊人的。这里真的不需乘车去任何地方。你完全可以步行去做事,并且人们都这么做”。

尽管高度稠密的人口和活跃的商业部门加剧了当地居民的某种紧张,包括狭窄的生活区域和交通阻塞,但他们在家庭和邻里之间培育了亲密的社会网,并支持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公共环境。与北朗代尔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小村的当地生态强化了可能被移民弱化了的家庭和朋友的纽带。这是因为,相近的状况鼓励甚至强化了社会互动。<sup>72</sup>拉丁裔

居民没必要将拥挤的居住条件和忙碌的街区生活看作是令人愉快或是称心如意的。“人们在这里生活可是人挨人,人挤人”,贾维尔·蒙特斯告诉我,“我们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一位老居民,名叫罗莎·埃尔南德斯的20多岁的年轻女性抱怨说:“我在这里有时会感到邻居关系陷入了困境,我必须离开这里,要不然我会窒息的。”更进一步的是,有一天我在实地调查时,北朗代尔的社区领袖解释说,开放的空地和闲置的场所导致了不少邻里的麻烦。几分钟之后,小村的商会主任说,小村最大的问题是,这里基本上没有空间。

最近一些移民注意到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那就是在他们从家里过来的旅途中,他们在小村看到了许多他们的老朋友。“人们来到这里是因为家庭和朋友来自原来的村庄或城市”,一个名为莫拉莱斯的移民说,“他们很少是出于自身的考虑。”然而,同样状况提供的生态基础使得居民可以照料脆弱的、老弱多病的居民,要不然就是贫困的家族成员、干亲(compadrazgo)和朋友。一个当地的30岁的男性居民,当地三代家族成员中的第二代,叙述道,他的朋友大部分正在从其父母的家中搬出来,“但是他们与家庭的联系仍是非常密切,与那些从大学毕业后就无影无踪,而且再也没有回来过的年轻孩子相反。我的意思是,我住在与我母亲相隔两个街区的<sup>119</sup>地方,我的父亲住在[相隔几个社区之外]的地方——我的父母分居了。所以说他们一直住在这里。”

祖父母在小村的许多拉丁裔家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家庭的父母工作时间很长,并且,几乎没有时间照顾他们未成年的孩子或参与其他家庭活动。<sup>73</sup>处在工作年龄的居民,似乎为了一个低工资而长时间辛苦劳作,因此,他们会信赖自己的父母,或者其他的家族成员去看护他们未成年的孩子,帮助做其他的家务。年长的家族成员能融入到他们的孩子、孙子和曾孙子的生活中去,不仅是因为文化价值观的指导,这就如同一个服务于当地老人的拉丁裔工作人员说的一样:“对于这些老人来说……周围的人环绕着他们是有重要意义的”,而且是因为“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他们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为他们可以给家庭做点儿

什么。”“这些地方的家庭不会让年长的亲属独居”，少数拉美神职人员的其中一个成员告诉我，“他们需要年长的亲属。”格林，一个在该地区最大的天主教堂工作的人说：“放学后，在学校外面等着接孩子回家的老人的数量是惊人的。”这种情况有下降的趋势。一些给我提供信息的人抱怨说，低工资经济不可避免地使得他们的母亲变成了“一种不用给报酬的佣人”。但其他人有更乐观的看法，“我们需要认识到他们或多或少地提供了帮助”，米格尔·拉米雷兹解释道。

尽管在小村有干家务活的性别结构，但是祖母比祖父做了更多的无报酬的劳动。我在这个社区遇到的少数老人抱怨，家里人让他们干了过多的活儿。他们的经历表明，关爱的文化实践是怎样嵌入到生态和经济中的——包括了多代子孙关系网的家庭体系、繁忙的街边以及邻里的相对安全——这些在促进了社会支持的同时，甚至也产生了紧张关系。热浪期间，占主导地位的地方团体的文化特性和邻里生态之间的协作关系使得小村的居民离开家园，帮助脆弱的居民，因而将高温所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点。

在芝加哥的很多地区，对犯罪行为的恐惧和对公共场所的剥蚀使得老年居民从白天到夜晚都把自己关在家里，但在小村就连高龄和体弱的居民都感到除了深夜外其他的时间走出家门都是舒适的。就像雅各布斯所说的那样，“一条充分利用的城市街道会成为一条安全的街道。一条废弃的城市街道会变得非常的危险……在那里必须安装监视器。”<sup>74</sup>热浪期间，在小村易受高温影响的老年人本来应待在安全的家里，然而外面足够的安全使得他们有勇气走到户外，在当地商店逗留，或问候邻居，并且获得了他们所需的照顾。一个当地的天主教会领袖回忆说，“在热浪的高峰期，你不会多想关于外出这件事。你会听到关于那些由于害怕外出而把自己关在房子里的人的各种故事。但这里的夏天却不是这样。这些街道，特别是在夏天，相当安全。虽然也有特例的事件。直到夜里10点，这里的街道仍然热闹非凡。”

我们已经得知，在1994—1995年间，小村的暴力犯罪率低于北朗

代尔三倍,且低于芝加哥的整个暴力犯罪比率两倍。在社会各种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小村的居民与其他城市居民相比有着较少的担忧。在热浪的这一周里,这些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包括小村的第10警区(北朗代尔的一部分),以及包含北朗代尔的大部分地区的第11警区,两者公布的犯罪率有着很大的不同。在1995年7月12—19日期间,第10警区公布了在每10万个居民当中发生了83起斗殴,17起抢劫,20起袭击,1起抢劫未遂和0起杀人事件。而第11警区公布的数据是在每10万个居民当中发生了181起斗殴,52起抢劫,51起袭击,4起抢劫未遂和2起杀人事件<sup>75</sup>(图30)。虽然没有从犯罪和恐惧中解脱出来,但小村的居民与芝加哥其他大部分地区的居民相比,他们有很好的理由感到更安全。

对于当地居民来说,我得知,他们可以轻松地散步或者在街上闲逛的原因是这一地区在空间和时间秩序上与暴力划清界限,大部分犯罪行为发生在夜晚,而且发生犯罪行为的一些街区远离主要的街道。一般说来,如同一个居民在一个社区会议上向警官详细描述的那样,“我们这里的暴力事件大部分发生在晚上”;尽管我访谈过的一些老人告诉我,他们由于更害怕团伙犯罪而避免夜晚外出,但许多其他人发现这种常见的自我保护的策略是没有必要的。就像一个在小村度过了一生的白人弗兰克·克鲁克强调的那样,“我不害怕我的邻居。午夜,我们会从街道上步行回家。”<sup>121</sup>弗兰克的家位于更安全和有着更多中产阶级的西南角的社区,谈话中带有几分自信。他解释道,真正的问题是,在这个地区的北部,拉丁裔和黑人的年轻人走得很近,并且团伙也比较活跃。

当我在小村时,居民们觉得团伙正处于频繁活动的阶段,当邻里经济开始繁荣,资产价值开始攀升的时候,团伙活动对社区来说成为优先考虑的事。在一些我出席的社区警务会议上,居民们抱怨他们在夜幕降临后常常听到枪声,这增添了他们的焦虑。就像一个母亲描述的那样,“犯罪团伙在夜晚控制了该地区”。<sup>76</sup>然而“恰当”公共活动的普遍存在抵消了危险和混乱带来的威胁,确保了一天大多数时间里除了偶

发的暴力事件以外的一个安全的环境。“尽管存在着犯罪团伙，人们在街上仍感觉是安全的”，当地拉丁裔的天主教领导人莫拉莱斯神父说，“当你四处走动时可以看到众多的人们都坐在前台阶上。”来到街道的人有着警惕的双眼，确保邻里安全，正如雅各布斯所说。“在邻里，我们都互相照看着”，詹姆斯·格拉博维奇，另一个常住在这里的白人说，“我们会将所见正在发生的事相互告知或是报告给警察。”

## 集中化的教会组织

除了小村邻里的非正式联系外，强有力的教会关系网也成为保护当地居民的一种重要的形式。热浪时期的教会贡献了当地的力量来保护老年人，这样在小村，哪怕遇到一些与高温相关的问题，甚至是在没有宗教组织的情况下，孤独和脆弱的社区老人仍处于较少的危险中。经粗略估计，这个地区有 20 个教会，小村不像北朗代尔一样拥有很多宗教组织。<sup>77</sup>但在小村，有一定规模、财富以及集中的这些组织，允许教会关系网吸收和援助大量当地居民。就像北朗代尔的教会难以了解和照料隐居的老人一样，小村的教会力图将独自生活的老人和甚至是那些曾经活跃的成员集中到一起。

当地宗教组织的种族特质改造了这个社区，这些建筑以前是波兰人、捷克人和斯拉夫人居住的，现在成了拉丁风格的。西班牙语是这里的主要语言，拉美语种成为主导，因而服务呈现拉美风格，并且文化事务已经基于拉丁传统。尽管几乎没有一个教会领袖是拉丁裔人，但大多数神职人员和管理者都能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许多教堂在宗教生活中用英语或波兰语为参加活动的白人成员提供特殊的服务，但是，这个区域的宗教领袖强调，当地的许多变化已经使得常住居民之间变得疏远，而且神职人员既缺人手，又不能获得缓解附近独居老人困境所需要的文化资源。“我们这里有很多独居的常住居民。”莫拉莱斯解释。“常住居民中不仅有拉丁裔人。我们有时无法为他们提供[服

务],这是一件憾事。服务对这种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除非有人在机构里担任一定职务,否则有许多限制使我们不能多做什么。这对于志愿者来说也是一件困难的事。”就像北朗代尔的教会一样,大多数小村的宗教组织虽然通过努力工作来帮助当地的老人,但仍认识到这项工作需要时间、金钱、组织和劳动力,而这些都是他们无法提供的。

正如北朗代尔一样,小村的教会在邻里生活的许多领域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之后的社区里,宗教组织重点强调帮助海外移民和说西班牙语的人去应对压力以及在芝加哥生活和工作的需要。除了提供社会的、政治的、职业的、卫生服务这些与北朗代尔一样由教会提供的项目之外,小村的宗教组织还提供了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课程来帮助新移民连接当地的社会和经济网络,而且,给那些难以融入城市环境的、来自农村地区的新成员提供建议。在一个面临着完全陌生的政治和社区组织的城市,很多新移民发现天主教会是最常见的,并且是稳定和支持的信任来源。

北朗代尔和小村的宗教组织之间最明显的不同是,拉丁教会的相对集中,这主要是天主教,以及通过芝加哥的大主教管区在结构上紧密联系并支持。尽管大部分神职人员是近几十年搬到这里成为邻里的男性白人,但教会的领袖、成员人数和支持网络与北朗代尔相应的宗教中心相比,更多地植根于社区生活中。大多数的教徒、神职人员、管理者都居住在这个地区,通常都在步行到教堂的范围之内,这为以社区为基础的项目提供了一个生态基础以及传递大量支持性服务。“教堂是社会化的中心”,莫拉莱斯说,“在教堂人们成为朋友。”

然而,开支也好,收益也罢,都源自社区教堂和天主教堂之间的联系。与北朗代尔小规模教堂不同,小村的天主教堂从中央大主教管区得到实际的资源和支持。这些资源在困难时期就显得尤为有价值,能帮助当地宗教组织维持其服务和工作,尽管相对剥夺了许多成员的权利。但是大主教的支持是有条件的。作为代表并为一个大规模的宗



教组织负责,小村的天主教堂努力满足当地居民不断变化的需求,如同更多的基层教堂所能够做的。我所遇到的小村的一些居民保留对福音教派的赞许,因为他们觉得新教堂更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当我在做田野调查时,这些皈依者成为强大的天主教小村宗教社区的少数人。

随着大规模的教堂在区域内的扩散,居民很容易找到称心如意的地方表达宗教信仰,或者从事一些社会活动。大部分教堂每周都很忙,因为他们要管理教区学校,主办许多的事务和项目。詹姆斯负责有几千教徒的一个教堂,当我们坐在教堂学校外面时,他解释说,“不同的晚上,在教堂外面的会议大厅,我们能举行八种不同的活动。许多人与我们保持着联系。周日早上我们有一个小型的波兰人弥撒,这是用波兰语的。我们也有用英文做的弥撒,规模比较大,可能有一百多人参加。还有两个西班牙语的弥撒,这是最大型的,有四五百人参加。”每周周日的主日弥撒,来参加超过一万人,小村的大多数住户,都走出家门,到当地的教堂里去。据在圣迈克尔教堂服务的格林说,“在总主教区,我们是最大的西班牙天主教堂,第四大波兰天主教堂。每周日大概有五千人到教堂来。从早上7时30分到下午4时30分,我们每一个半小时就有一次弥撒。复活节时,我们大概有一万人,圣灰星期三(大斋首日)时,有一万五千人。这里的每一个仪式都在此规模之上。” 124

然而最重要的是,当地体弱居民应对诸如热浪等问题的能力,以及承受城市边缘人群的日常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地问题的严重性所决定的,而非当地教堂的规模。尽管社区具有一些共同特点,但是小村社区遭遇贫穷、面临转型的挑战还是和北朗代尔有很大不同。居住在小村的孤独老人数量明显多于北朗代尔,但是他们遇到的主要困难是语言障碍、地位变化(在邻里地区成为少数族群),而非多种不安全因素,诸如街边的恐惧、地方资源的缺失、文字生疏等,这些都威胁着北朗代尔的老人们。

小村社区的领袖有充足的理由来为当地拉丁裔的老人建立正式的社会关系网。在1990年代,本区的拉丁裔居民首先体验到了芝加哥其

他种族群体所见证的一切情况：家庭分离的危机、郊区化、年长者和年轻人之间日益增长的社会和空间距离。与芝加哥多数其他社区典型的社会实践和移民策略相适应，在小村的拉丁裔上班族开始往城郊迁移，离开父母和其他年迈的亲戚去寻求自己的美国梦。在我们的访谈中，芝加哥地区的社会工作者表达了这样一种想法，拉美两代家庭的纽带实际上看不见了，或者说在他们的工作中见证拉丁裔代际之间的分隔已经成为毋庸置疑的统计趋势。<sup>78</sup>一家服务机构的主任对我说：“由于没有人喜欢谈论这种隔离所带来的一切危险，老一代的拉丁裔人已经开始单独居住。”1995年热浪期间，因为通过临近的家庭和朋友关系纽带而得到保护，居住在小村社区的拉丁裔老人不喜欢为下一代设定好方向。在普通拉丁裔人之间，族群上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在小村一样的地方建立代际之间的亲密关系，但是拉丁裔家庭的社会轨迹和空间分离已经对这种关爱文化构成威胁。

如同指导案例控制研究的疾控中心流行病学家，当在芝加哥西部  
125 完成田野工作时，我寻找很多办法来确定，是否在北朗代尔和小村所观察到的有关威胁和保护的资料在其他地区也会很明显。在其他地区的随机观察中，我发现了在高温导致大量死亡地区其生态衰落的形式，以及有着更好存活率的地方其相对坚固的社会形态。实地调查表明三大社区高温导致的高死亡率，例如，通过商业带和公共空间可以恰当地反映北朗代尔的风景。

地区 1：一个几乎没有商业活动和根本没有零售店的小地方。很多的街区都用废弃和破旧的房子作为分界线，空旷处堆满了碎石块和垃圾，以及很小的教堂门面。[那里]只有一个商业带，里面只有支票兑现服务和几家空闲的商店。

地区 2：主要的商业机构在减少，只有一些小的零售店和几处旧的工业建筑，马路很宽，街上几乎没有街道生活，有很多空闲的店面，以及大片空旷的空间。

地区 3：许多建筑物曾经用来开店经商，但是窗户是加宽的，标志已经很破旧，甚至褪色、破裂，唯一的商店是一家小杂货铺和支票兑现服务处。除了这些实际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商店——只是空旷的空地。感觉这个地区已经被废弃。街道的一边看上去很荒凉。

这些表象的描述应当被谨慎地对待，因为这些并没有反映那些老人或其他居民对这些空间的深层理解。对芝加哥地区的每一个社区不间断地进行人种学研究是不可能的，但是研究暗示了一系列生态背景和社会进程，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不同状况的地区会有不同的热浪导致大量死亡的概率。另外，大范围的城市废弃以及贫困的生态影响已经改变了许多芝加哥社区的社会环境，这些在人口数据上并没有显示出来。

一旦确认了这些社会生态条件，我们就可以结合更多标准的人口统计数据来考察城市相关条件的现实意义。<sup>79</sup>比如表 3，有这样一些地区，如：福勒公园、伍德劳恩、华盛顿公园和恩格尔伍德等地，都有着较高程度的废弃——在 1960—1990 年间，一些地区已经外迁了近 2/3 的居民，15 个地区中有 10 个地区外迁 1/3 的居民——这表明暴力犯罪已经影响到了年长居民的生活。表 8 显示了一个相反的例子：1960—1990 年间，21% 的居民离开了这个城市，10 个社区中有 2 个社区的热浪死亡率最低，这个社区基本上只有 11% 的人去世，其余的死亡率为 16% 和 13%，也都低于这个城市的死亡率。此外，3 个非裔美国人社区有着明显低的死亡率，而里弗代尔 (Riverdale)、奥本格雷沙姆 (Auburn Gresham) 和卡鲁特高地 (Calumet Heights) 在几十年热浪时期的死亡率仅在 0%—10% 之间——芝加哥非裔美国人地区罕见的典型。

正如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流行病学的研究确认热浪死亡率的个人层面风险因素，人种学关于社区层面社会环境的评估，影响了基于一系

列灾难之上的芝加哥地区居民的生存能力,社会生态状况加剧了在非常事件和正常时期的健康风险。低死亡率地区的特殊性不在于其民族或种族的特性。据表 8 可以推断,在 10 个地区中,热浪期最高存活率在 3 个地区有超过 90% 的人是非裔美国人,据公布有 2 个地区 39% 127 以上是拉丁裔美国人,5 个地区主要是白种美国人。但是在大多数案例里,他们并没有受到生态消耗、当地基础设施的破旧和商业的萧条、人口的减少以及高暴力犯罪率的影响。<sup>80</sup> 另外,小村获得了持久的活力,同时其他城区却衰退了。

表 8 芝加哥中暑死亡率最低的社区

社区	每 10 万人的中暑死亡率	1960—1990 年人口下降百分比	黑人所占百分比	1994—1995 年整体犯罪率排名(77 个社区)
贝弗利	0	10	24	70
阿什本	0	4	10	62
里弗代尔	0	5	98	11
东区	0	11	0	54
卡鲁特高地	0	10	93	39
蒙特克莱尔	0	10	0	61
奥本格雷沙姆	3	0	99	19
加菲尔德里奇	3	16	13	60
西劳恩	4	13	0	65
南朗代尔(小村)	4	-33	9	59
芝加哥城	7	22	39	—

资料来源:基于伊利诺伊州公共卫生部(1997)521 个有关高温的死亡数据,芝加哥数据汇编(1995),芝加哥市公共卫生局。

高死亡率水平的地区也拥有独特的生态特征。以前关于热浪死亡率的研究表明,严重贫困、老人集聚、破旧住房、低程度绿化地区的居民尤其容易受到极端夏季炎热气候的影响。伊利诺伊州公共卫生部门发

现,高犯罪率的芝加哥社区,1995年,居民面临不断加剧的死亡威胁。<sup>81</sup>这一分析增加了一些特殊地区的风险因素,其中一些地区,例如公共空间的质量、街道商业活动的水平、网络和机构支持的集中化程度,涉及地区的社会形态;而其余的一些社区,例如居民的减少、老人独居的盛行以及相关人口水平的状况。

这种方法的首要贡献在于,它加深了我们对在热浪期间不同社区以及不同群体不同经历的理解。作为一个有代表性的现代卫生研究和公共政策的讲述,很多关于热浪时期特殊群体卫生绩效的讨论,被归因于种族和民族,种族的差异成为对种族大量死亡率的解释。社区的故事表明,芝加哥非裔美国人在热浪时期高死亡率的关键原因在于,他们是社区中处在隔离和衰退城市中的唯一群体,这些社区伴随着败落不堪的住房、空荡荡的街道、废弃的商业设施、人口下降、破旧的人行道、公园以及街道和资金匮乏的机构。<sup>82</sup>暴力犯罪和活跃的街头毒品交易市场,需要这些生态环境,在这样的地区,如此的生态环境加重了人们使用公共空间以及组织有效支持网络的难度。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在热浪期间,遭受最严重孤独和脆弱的居民,如北朗代尔社区,是由于其社区成员对其的不关心。有更好的理由相信在芝加哥,大多数贫困的、被抛弃的、处于危险中的居民孤独至死,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这些环境阻止他们离开并寻找安全居住的地方,并阻碍他们从安宁和繁华地区获得社会保护。

芝加哥官员可能还尚未证实在1995年到来的热浪时期,社会生态状况威胁了西部和南部地区的居民的健康,但是他们足够熟悉这一地区健康和脆弱性的典型形式,由此推测至少有一些地区,极端的天气将证实产生最大的破坏。当芝加哥的居民和社区临时制定生存战略来抵制这场难以忍受的天气时,城市应急机构也迅速做出政治回应来弥补这些漏洞。提供应急医疗和社会服务支持的协调计划,对于成功干预公共卫生事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正如下一章所表明的,对于大多数城市应急机构来说,跨越这种障碍是非常困难的。

### 第三章 灾难中的政府： 赋权时代的城市服务

129 通常情况下,由于城市政府很难认识到气候炎热的危险性,所以无法主动制定预防计划。热浪一开始,护理人员和警察对紧急医疗预防或死亡报告做出了灾害管理的回应。气候炎热及热风暴的受害者需要及时且简单的干预解决办法,例如用冰敷或静脉注射的治疗。高烧或虚脱现象时间越长,病人可能死亡或者对身体造成永久性的损坏也越严重。城市卫生和消防部门一旦看到异常的气候和特殊情况,就应当启用紧急服务网络,尽快提醒当地居民采取预防措施,并向当地政府报告和寻求专项帮助与支持。在芝加哥,与其他美国城市一样,消防部门管理着医疗系统(急救护理部门)并负责应急回应的项目。<sup>1</sup>由于身处城市服务运输系统最前沿,消防部门和警察局的工作人员经常在第一时间内看到突发危机。对他们来说,挑战之一就是如何说服上级长官、媒体记者和城市管理部门认识到问题并动员资源做出适当回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克服存在于为脆弱的市民提供公共支持道路上的持续障碍,在热浪的政治历史上,这些障碍是显而易见的。

克拉克·史丹顿(Clark Staten),一个从消防部门退休的长官,是一位工作了20多年的医护工作者,参与了1983年、1986年、1988年的热浪事件的应急管理行动,他对1995年的热浪事件记忆犹新。1995年,史丹顿直接指导城市应急系统和研究所(Emergency Response and Research Institute),一个评估应急回应计划以及监督芝加哥应急

130 服务网络运行的地方智库。他解释说,在热浪期间,工作过的辅助医疗

服务人员认为,消防部门和城市政府服务传递项目做得不好,反映出城市政府服务的系统性缺陷。“我曾在热浪将要袭来的时期,和我在得克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的朋友跟踪了这个问题,开始时死亡趋势呈分散方式,到后来在这里死亡呈集聚方式。”在7月13日,周四,即第一次死亡报告出来之前,史丹顿所在的部门曾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提醒居民和城市机构要高度重视热浪的侵害。“由于气温和湿度处于危险水平之上,空气质量下降,感觉不到结束的迹象,在一些地区,应急系统和研究所向人们发出强度警戒信号……近来的热浪已经导致了美国中西部和西南部地区一些人死亡,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中暑甚至死亡。”<sup>2</sup>史丹顿已经连续两年担任芝加哥消防局公共信息官员,他向媒体释放了这一信息。因为根据他的经验,“如果事先向外宣布好的消息,城市将会有好的反应,缓解人们的紧张情绪。但是,在周五前,当我们告诉媒体时,事件基本上已经扩散了。”

在周五,史丹顿仍然与医护人员保持联系,并密切观察这种回应,消防局每天接到多达1000个求救电话,当时已有188个芝加哥居民死于热浪。史丹顿说:“第一个发现热浪袭来的人应该是急救系统的监督官员,因为他们最早从几个不同的部门得到了相似的报告。我听着扫描系统里无数的急救电话打来,消防部门不得不说,‘对不起,这里已经没有救护车了。对不起,这里没有救护车了。对不起,这里没有救护车了。’救护人员说,‘我们有一位病人快死了,我们有一位病人快死了,我们有一位病人快死了。’然后,你听,‘对不起,几个小时之前,我们这里只有一辆车了。噢,我们在法医局,我们已经是第17个了。’”

对急救系统大量的需求伴随着库克县太平间容量的爆满,导致城市应急救治系统的过载和延迟。芝加哥卫生救治设施的观察者早就发出警告,目前地方服务基础设施至少存在着两个严重的问题:第一,56辆急救车和接近600个医疗服务人员对于城市需求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很难满足日常或额外的需求,在正常情况下,一般7分钟回应时间常常被拖延到20分钟甚至更长。<sup>3</sup>消防部门中长期存在分工,消防员的



数量是医疗系统工作人员的 7 倍,因此急救医疗工人们常常向行政机关和城市议会抱怨,自己属于次级服务系统,留给医疗人员很小的空间来获取新的公共资源,即使是他们比消防部门多拥有 50% 的电话。<sup>4</sup> 第二,城市医院和外科中心一般都集中在北部,使得相对来说较贫穷和污染较严重的南部和西部地区处于被冷落的境地,而这些地区的居民恰恰对应急救护系统的需求量是最大的。一位护理人员解释说:“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抱怨很久了,部分原因是很多医院满了,不接纳新的病人,这是首要解决的问题。”

当热浪侵袭芝加哥时,事实证明,城市应付危机提供的救护车和医护人员是远远不够的,这样,消防部门不得不提供自己的设备和人员给予医护人员援助。城市医疗中心放满了急救设施,已经超出了它们承受的负荷,23 个地区的 45 个医院不再接收新病人,以至于到热浪袭来时,很多人都无法得到及时的治疗。<sup>5</sup> 在东部和东南部地区,这个问题尤其严重。据一份伊利诺伊州参议员的报告:“在 1995 年 7 月 13—16 日期间,23 家医院中只有极少数医院可以提供救治服务。在芝加哥南部和东南部地区的医院,只能通过消防车来接送病人。”<sup>6</sup>

罗伯特·斯凯茨(Robert Scates)是一位热浪来袭期间负责南部急救服务系统医疗人员的副主任,他认为常人很难理解在热浪来袭期间政府究竟都干了什么。

通过收听收音机,我注意到城市医疗系统极度忙碌。几乎在同一时刻,工作人员接收到很多电话,一次又一次,然后,消防员和消防车分别到各个求救者家里,医护人员总是处于急救状态,一直忙到第二天。正式的工作时间是从第一天早上 8 点忙到第二天早上 8 点。但是,有些医护人员会连续工作 26、27 甚至 28 小时。我的意思是,温度高达华氏 100 度,医生一直工作不能休息,即使急救室里有空调,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医生得一直走来走去,不停地出汗,这比在桑拿工作还辛苦。



图 35 医务人员救助一位中暑得病的同事。资料来源：《芝加哥太阳时报》，布赖恩·杰克逊摄影。《芝加哥太阳时报》授权许可，2002 年。

这座城市医院的工作人员注意到他们身上也出现了一些症状。一家南部诊所的主任说：“医护人员总是第一时间赶到急救现场，其实他们工作强度很大，也已经出现了脱水现象，他们差不多快要变成病人了。”<sup>7</sup>（图 35）

在医疗系统工作 30 年，如今已是当地消防员联合会医疗急救服务负责人的医生斯凯茨深知，在应急状况下，急救系统应如何做出反应。他说：

这是消防部门应该做的事，首先，当他们接到求救电话的时候，应把当天歇班的人召集回来，并尽可能多派救护车出动。当时我们总共有 59 辆救护车，但是其中有 3 辆是固定指派到奥黑尔机场（O'Hare Airport）的。所以，城市可用的救护车只有 56 辆，他们本应该额外再配 15 辆救护车的，如果还是不够的话，他们可在

能力范围内组建一个联合援助预警系统 MABAS (*Mutual Aid Boxed Alarm System*), 并从郊区额外召回 70 辆救护车用于城市, 可以从西北郊区得到 30 辆, 从西南郊区得到 40 辆, 所以我们有能力在市区安放 145 辆可用的救护车。同时, 我们本应该组建额外的消防部门。如果上述计划都无法实现的话, 我们还有各种类型的无菌水, 我们应该先让大家冷静下来, 但这需要一些人来启动。

我非常关注这一领域的事, 所以, 我及时进行了监督, 医务主任和消防部门副消防委员 (*deputy fire commissioner*) 有权对救护车的安排和联合援助预警系统回应做出决定。消防部门的消防委员, 雷蒙德·奥罗斯科 (*Raymond Orozco*) 在城外休假。我起床后就打印了一份由我负责领域的报告, 并向医务主任回了个电话, 但是医务主任告诉我副消防委员要求我停止这种过分担忧的想法, 他们认为, 情况并没有我想得那么糟糕, 并对我安排的工作置之不理, 所以, 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在这时, 我在收音机里听到“我们接到病人求救电话”, “我们破门而入, 发现有人死于热浪”等报道。于是, 我立即给医务主任打了个电话, “让我再试试吧”, 他给了我与上次相同的答案, “停止这种过分担忧的想法”, 于是, 到现在, 我打给副消防委员电话, 我做了尝试。当我再打电话给他时, 他一接电话就说: “鲍勃, 我知道是你, 但我不会听你的”, 然后挂了电话, 真是直截了当, 简短扼要。

城市应急回应系统不仅需要政府官员相信消防部门和医疗系统负责人的报告, 并且他们本身也需要把这些至关重要的消息报告给上级部门。在热浪期间, 医务人员抱怨, 消防部门和消防员对医疗系统工作的不熟悉阻碍了信息的传递和减缓了城市的反应能力。

街区的医务人员无法激活上级部门对事件详情的了解, 但是广播和电视对热浪较高死亡率的公开报道还是引起了市长理查德·M. 戴利的关注。斯凯茨回忆道: “当抱怨声不断传来, 媒体大量报道死亡率

数据时，戴利市长让奥罗斯科迅速从佛罗里达州赶回来。事实上，死去中的很多人本应该能够被抢救过来的，我们本该投入更多的人力，给他们打一些液体，使温度降下来。”有一些问题使得做出回应的速度大大降低。消防部门没有集中监管消防员或求救服务系统，机构分散，每个部门单独行动，缺乏有效的配合，很少向上级部门汇报数据，对许多要求急救的请求都没有回应。而且，许多医务人员说消防部门的管理，有时候由消防员自行处理，没有做出回应或者向市政府要求额外的资源，因为他们不相信来自第一线官员的报告。史丹顿解释说：“问题是，他们能否倾听了解问题的人的看法，回答是否定的，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拿速度和效率当回事。” 134

消防部门高级官员告诉我另外一件事。在州参议员听到热浪这一消息时，芝加哥消防局局长很平静地说，城市脆弱的应急回应来源于医务人员、警察和其他社区层面管理者的失败，按照他的说法，他们没有发出危机信号。“没有人发出指示，告诉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员或物资供应。”他向参议院反映：“消防部门告诉我们，任何事情都需要我们自己来做，我们需要运行这个机制，但是没有人这样来做。”<sup>8</sup>在消防部门之外的人几乎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件事。但是很清楚，这与不少医务人员在他们工作期间的证实不符合。

罗伯特·瑞卡(Robert Raica)，一名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和医务人员，建议废除委员会的职能，“他们并非坦率承认自己做错了，而是归罪于街上的普通人。看起来似乎是在命令层面上存在着信息障碍。”<sup>9</sup>或许，城市医务人员最严重的指控是芝加哥官员和消防局领导拒绝呼叫更多的救护车和医护急救人员，因为政府再造运动已经造成了财政紧张，没有资金用于即便是像热浪这样关乎健康的卫生危机。斯凯茨批评道：“城市政府官员只关心所谓的节约资金，而以牺牲人们的生命为代价，消防部门的领导漠不关心城市市民生命。”斯凯茨、史丹顿和其他医疗人员抱怨说，在热浪期间，城市拒绝更新和扩大其急救医疗系统，不愿召回休假人员和申请额外的救护车，反映了城市政府的资金取

向为成本控制第一,不关心市民的生命保护。斯凯茨说:“不是我们不愿花钱,而是想要用最少的投入来获得最大的绩效。其实,这种说法是非常可笑的,如果连人都失去了,怎么会有人去创造财富,去节省所谓的投入成本呢?消防部门相信这样一条规则:成本开支控制在预算的  
135 5%内,会让人们认为他们是好的管理者。只要你秉持这样的准则,你不花钱,甚至把钱退回去,市长就会赞许你。”斯凯茨和他的同事坚信,实践中所持的准则已经不再适合机构设立的宗旨。“我们本应该负责照顾病人医疗的,可我们却成了消防部门。”

据当时的卫生委员希拉·莱恩(Sheila Lyne)称,尽管这样,消防部门的不作为对于城市急救回应速度的影响是很小的。她解释道:“消防部门由于救护车到达现场的时间过长而受到批评,但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如果生病已经非常严重的话,就算救护车来得及时,也无力回天,所以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其他的城市官员也指出由于城市医疗系统反应过慢而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大,但是,目前流行病研究表明,对与热浪有关的病进行迅速而有效的急救是非常重要的,会提高病人被挽救及病后恢复的可能性。据一篇发表在《内科年鉴》(*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上的文章称,1995年热浪期间,芝加哥卫生官员与内科医生并没有人对热浪的急救进行系统的培训和学习。许多病人入院后并没有动用卫生治疗设施进行及时救治。<sup>10</sup>由于急救系统没有及时回应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负责城市急救系统的消防部门并没有向社会发出警告信号,政府也没有意识到危机的存在,以至于在死亡数字节节攀升之前没有一个地方对热浪采取预防措施。一位来自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研究人员发表的一篇报告指出,如果能够联系和支持脆弱的芝加哥市民的话,就能挽救他们不少的生命。“其实,当时芝加哥的社会工作者发现,热浪发病率有下降的趋势”,但是城市政府并没有派出足够的工作人员去社区详细了解情况并维持这种趋势。<sup>11</sup>

据当地记者报道,戴利市长一家人在热浪袭来的那一周正好在密歇根度假,当时并没有人向他报告死亡人数。“我们能做什么?”,一位

市长资深助理向媒体质问，“我们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事”，<sup>12</sup>其他几个部门的高级官员包括卫生部门和消防部门的官员在热浪期间很多都在外地度假，他们掌握的信息还不如普通公众了解得多，就像卫生委员莱恩说的那样，没有人向政府发出报警信号。

那一周我正在休假，尽管我离热浪所袭击的地区不远。我周五晚上返回芝加哥看见热浪袭来这条消息，但到周五晚上我并没有得到实际数据。周六，我到办公室，没有人告诉我有关热浪的信息。周日，我试图得到热浪的一些具体情况，有人从市长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将用一个办公室作为冷却站隔离室，这些情况也没有引起我的足够重视。周一上午，我到办公室发现桌上有一张来自公关人员的便条，因为，每一个芝加哥人都已经知道死亡数据了，而我掌握的数据仍然少得可怜。

直到7月15日，周六，库克县法医局的场景已经同样引起了报社 136 记者的关注，他曾经低估城市应急系统和研究所发布的早期预警信息。到后来，市政府官员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认为应该有所行动了。直到那一周的周末，消防部门才召集更多的消防员和救护车，而这时候事态已经相当严重了。媒体在促使政府尽快做出回应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尽管医务人员和警察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卫生部门的一位高官强调，“如果不是媒体拍到一辆辆巡逻车上装满了尸体，我们也不会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然而，即便如此，市政府的大多数公共行为仍旨在增加否定死亡源于法医局的公关活动，维护着服务传递系统，指责城市社区的其他成员——包括热浪的死难者——引起了危机。

7月18日，周二，《芝加哥太阳时报》报道：“市政府似乎忽视了在热浪期间所应秉有的道德底线，库克县出现了大量死亡现象时，政府才开始运行应急计划。”<sup>13</sup> 尽管有些高官辩论说，当时芝加哥没有人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市卫生部门虽说几年前就制定了热浪应急计划，但

是在热浪期间却没有认真执行过。政府在热浪期间的反应激怒了一些市民、积极分子和政治领袖。斯凯茨对消防部门拒绝对公众负责感到恼火,他指责,与主要的医务官员和已经辞职的官员一样,市政府已经被自己所制定的公共政策的目标所“侵蚀”。<sup>14</sup>

美国国家气象局在一份官方的报告中对疫情情况做了重要的评估:  
137 “尽管国家气象服务部很早就发布了预报、警告、气象报告建议和报告书以及关于这一事件的大量的新闻报道,这些信息仍没有被人们所知并且被有效地用来防止中暑死亡……城市官员既没有经验,又没有应急反应的处理能力,并将它转化为热浪的自然特征对人类的影响。”<sup>15</sup>

在这次事件发生一星期后,被芝加哥消防部门同事的报告惹怒了的该州医生和共和党州参议员罗伯特·瑞卡召集了一次听证会来评估政府的危机回应能力。该参议员召集芝加哥市长办公室、卫生局、警察局、消防局、运输管理局、房屋管理局、公园区、联邦爱迪生公司(城市供电所)、私人救护车公司、伊利诺伊州公共卫生部、伊利诺伊州应急管理机构 and 库克县医院的代表参加。一些社区组织和倡导组织也参加了会议,并做了发言。

在他的公开信中介绍了委员会的调查研究结果,参议员罗伯特·瑞卡写道,“作为一个急救护理人员,芝加哥消防部门和伊利诺伊州参议院公共卫生与福利委员会的主席,我对失去许多生命深感不安,有必要举行听证会去调查在热浪危机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听证会的目标应当是确定政府官员和公共卫生服务提供者们在热浪危机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并且应该在现在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防止这样的悲剧事件以后再次发生。”<sup>16</sup> 最终报告是一份包含 21 项列举状况的文件,该文件被委员会当作政治文件发表,用来处理以后的炎热灾难。这份文件用简洁尖锐的语言指出了城市在回应危机时存在的一系列弊端和缺点,地方政府在危机时无准备状态以及城市机关无法协调他们的行动。这份调查报告的亮点是,指出了在城市服务系统和医药卫生回应系统中存在的问题,这在其他危机面前是不明显的。下面的文字披露了最



危急状态下的情况。

- 一些城市部门,例如芝加哥警察部门在周末雇用了更多的员工来帮助处理危机。芝加哥卫生部门和消防部门被证实没有雇用额外的员工。

- 消防部门没有危机时期的公告,也没有招集额外的员工,因为 138 为没有可启动的运行机制来回应危机。

- 当需要急救时,救护车超过 30 分钟出现在求援地的例子至少有 55 例,甚至有一例超过了 70 分钟。

- 1995 年的 7 月 13—16 日,23 家医院在大部分时间里处于关闭状态(急诊室拒绝接收新的病人)。救护车需要将病人运送到它们管辖范围几公里以外的处于开放状态的医院,这加剧了应急卫生服务系统的压力。

- 在热浪危机中,芝加哥地区的 18 家医院同时都处于关闭状态,芝加哥消防部门证实说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此多的医院同时处于关闭状态。

- 在热浪危机中,芝加哥消防部门请求使用空调车来为学生和其他人建立一个便捷的空调车站。而这些空调车,或者是不可用,或者是过了很久才来。

- 很明显,芝加哥卫生部门没有意识到危机的时间长度,在这个地区,医院的危机超过了 7 月 15—16 日的周末。

- 库克县的法医鉴定人接到了无数个要求验尸的请求,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处理能力。芝加哥警察局帮助将受害者的尸体运往太平间;无论如何,做这些事的工作人员都不是在履行自己正常的职责。

通过调查报告,委员会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本来每个人都有充分的努力去保护库克县居民的健康和生命,但是,作为一个应急整体系统

来说他们是失败的。”<sup>17</sup>通过对这次事件的反思,一些城市官员同意这样的评论。芝加哥公共卫生局的副局长、极端气象状态委员会主席约翰·威廉(John Wilhelm)解释道,“在整个事件中,人人都很忙,警察在忙,消防人员在忙,我们都在忙,公众服务系统同样也是,但是我们没有协调”。卫生委员希拉·莱恩也同意他的观点。她回忆到,当一位新闻官员向她简要介绍城市情况时,“我记得我对他说,‘你知道,我不认为我们做得很好’。”

### 139 灾难中的政府

如果芝加哥市对热浪危机的反应确实存在严重的问题,当我们置身于当地政府的典型行事方式和城市的脆弱性时,难以想象在这场危机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城市的反应能力表现了当地政府处理城市问题的基本特性;其中的一些方式在政府再造时代是特殊的:用来自私营部门的技术和价值体系进行行政管理,并使之适应公共部门发展的需要。私营部门定位于竞争的市场来提供商品和服务,企业行为的判断来自市场中的每一个参与者,包括高级官员、行政管理人员、雇员、合约企业,甚至是接受服务的公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芝加哥市政府是一个典型的企业部门,具备以下特征:(1)对管理质量和效率的重视;(2)政府将自己的各项服务空前地向私营部门转移;(3)像个性化顾客或公共物品市场上的顾客那样对待公民;(4)这种管理战略要求公民成为城市服务的“理性消费者”;(5)给接近并运用城市规划和政策信息的顾客给予奖励;(6)这种体制差异化地赋予那些已经拥有各种形式的社会和文化资本的居民以越过官僚系统而实际发挥作用的权力;(7)有效惩罚没有社会技能和资源来获得自己所需的公共物品和资源的公民。在媒体严格审查的情况下,管理公众舆论是治理的主要目标,重新设立的当地政府尤其关注它的公共形象,以及城市主要公共空间的公共形象。公共关系专业人员和城市规划者在当地政府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他们的工作是城市政治的主要组成部分。<sup>18</sup>

几乎没有理由相信,芝加哥早期的治理模式会产生一个有效的回应机制来应对这一危机。关键不在于比较重组后的政府和过去的政治机器,而在于比较现有项目管理技术和城市弱势群体应对紧急风险的需求。

以往对政府在危机中的表现的报道,把政府描绘成一个当灾难来临后或可确定的危险到达时才有所反应的机构。然而,福利国家也成了分层的机构,它们的目的是提供社会保护,但却加剧分离和不安全,并且,历史上在极端的环境事件会造成很高死亡人数的情况下,国家在提高或降低风险方面会起到关键的作用。<sup>19</sup>要想了解在热浪危机中城市各部门是否承担了应有的责任,就必须将城市的危机管理方法置于20世纪90年代芝加哥政府治理与社会保护的基本模式中考虑。

1995年热浪袭击芝加哥的时候,政府正因实施了一项示范性改革而受到当地的支持和国际的赞誉。市长办公室精简,压缩了一些机构,把由全职的、内部人员提供的服务通过契约交给私营部门,重新进行新的项目管理。芝加哥通过一场有效率的市场改革运动吸引了大量的旅游者、会议的筹划者和商人。尽管90年代只有在经济繁荣时进行投资才能带来这样的成果,芝加哥在这时已经开始表现出了它的经济复兴。为了准备1996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市政府开始进行大量的美化工程:清理街道、人行道、城市商业中心周围的公园,在街道安装设计好的路灯,在主大街种上树木。戴利,与他上一任的父亲一样,把芝加哥装扮得质朴和繁荣,却不在乎这种质朴和繁荣的表象之下到底发生了什么。<sup>20</sup>

或许最重要的是,戴利已经着手使芝加哥两大市政改革项目:一个是非常糟糕的公共学校体系,被《芝加哥论坛报》1992年出版的图书调查称为“国家的败笔”;另一个是警察局,它将在戴利的任期内接受人权组织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的调查。在真正的企业政府精神中,戴利把学校体系的领导定位于首席执行官而不是监管者,并在

以后通过解雇高层的管理者来精简该机构。1995年3月《经济学家》以“大管理者”这标题称赞戴利,将之誉为一名有能力的领导者,具有财政能力的管理者,通过他的持续的标准与贫穷债券改革,从城市私有化服务业赢得了几百万的财政盈余,把城市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  
141 1995年夏天来临的时候,芝加哥展现出了一片人人工作的繁荣景象。<sup>21</sup>

但是,当这个公共系统开始用它们解雇掉的而不是因贫穷或疾病失去工作的人员数量来衡量效率的时候,地方政治气氛忽略了对经济繁荣中没有获益的芝加哥居民的关心。芝加哥在市中心美化工程中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当地的政策研究行动小组批评这种做法,认为该做法减少了用在对中低收入人群至关重要的发展经济和社会优先权的公共预算。根据1990年的人口调查数据,芝加哥大概有39.6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贫困人口达到40%以上,这些情况使芝加哥在美国排在人口集中而赤贫地区的第三位。地方政府不可能有足够的能用联邦和州政府所给予的资源来解决这种不平等问题,这将无法解释希望戴利行政管理团队对贫穷来发动完全的战争。但是,根据社区资本预算组织的调查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城市政府并没有将其财政收入再分配给城市中的穷人。社区资本预算组织是当地监督城市预算和收入再分配的组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芝加哥的所有选区中49/50(98%)“没有充足的资金来进行基础设施的维护……城市计划将它几乎一半的经济发展资源用在特定的10个选区……而最底层的10个选区只得到不足5%的资源”。但是这个结果发布时几乎没有引起公众注意或关切。在20世纪90年代,似乎解决城市不平等的方法不在人们的考虑之中。<sup>22</sup>

20世纪90年代繁荣的芝加哥对贫困和隔离的回避是热浪事件重要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因素。芝加哥委员会报告和高级官员将政府在热浪危机中的弱反应能力归结为对认识隐藏在异常气候背后危机的严重失败。一个有效的、对外在威胁的回应机制要求运用危机干预策略的知识时刻关注潜在的危险;但是,城市一些机构的行政管理机构和市政

官员仍然坚持认为，尽管国家气象和公共卫生机构发布了警报，但他们仍没有意识到城市面临的危险。芝加哥卫生部门的一位高级官员解释道：“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们不知道有关这一切。”国家气象服务部门通过对这次灾难的研究后发现，市政府对热浪给人们健康可能带来的伤害没有足够的认识，而这种认识的失败导致了市政府不能有效地回应。报告指出，“社区在7月的热浪中完全没有准备的一个原因是，当地政府和区都没有认识到不寻常的炎热所带来的致命伤害”。<sup>23</sup>

可以肯定的是，芝加哥的高级官员不了解特殊气候和社会环境混合在一起所形成的潜在危险。但是，仔细观察城市危机管理战略会发现，大城市的结构条件问题是危机引起政治反应的主要原因，包括对高温致死的官僚主义的认识、对公众在危机中的抗议做出一致的努力以及基本的卫生工作。<sup>24</sup>当前城市治理流行模式的五个重要特征在热浪危机中得到了明显的证明。

1. 对准军事化组织在主要卫生和支持服务上的授权，例如消防和警察部门，这些部门的行政管理系统和高级官员并不总是在面对新需求与这类“软服务”时能保持节拍一致。<sup>25</sup>政府机构在能力和责任问题上的政治分工造成了监督关键的卫生和福利项目的组织性的力量不平衡。

2. 不同城市、乡村、州和联邦机构在服务方面缺乏一个有效的系统来加以协调和监督。这主要是源于能产生重要功能的复杂却分离的政治结构，在该结构中没有明晰的责任机制。<sup>26</sup>

3. 缺乏政治决心和公共义务，而这些决心和义务是对需要帮助的贫困和脆弱居民进行保护的基本资源，这些居民的情况已成为城市生活普遍的、可接受的、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一些特征。

4. 城市居民(包括老人和体弱多病的人)都将成为公共物品的积极消费者，老练的公共服务“顾客”将比在社会保护上有权利的“公民”在市场上更为有利。这种市场治理的模式造成了系统性的公共服务错

位,最没有能力、最需要公共服务的人却最得不到它。在芝加哥,这种错位对于贫穷的老人甚至造成了日常生活的生存危机。

5. 根据公共关系和依靠形象工程的治理实践转移了城市问题的注意力。在一些案例上,比如这次热浪危机,这些形象工程表现为官方的漠视。官方拒绝去认识各种状况的严重性,这不仅使城市官员不去关心处理问题,而且使受害的居民更加隐蔽和脆弱。

对这次灾难的政治原因的分析可分成两个部分。这一章将分析上面所提到的治理模式的前四种,在热浪危机中是怎样削弱市政府为芝加哥居民提供有效服务的组织能力的。通过对代表着整个国家面貌的城市工作者实际状况的调查,这一部分将揭示官僚机构日常工作条件和国家机构的公共服务是怎样阻碍了地方政府提供居民所期望的社会保护。第四章将仔细分析第五种治理模式,公共关系的政治,探索城市危机中的管理活动并把这种模式运用到相同的环境中去。

如果热浪危机显示出目前的政治挑战涉及为脆弱的居民提供紧急的治疗和支持,危机带来的更深层的问题则涉及现代政府部门对家庭、朋友以及它自己的收入不能满足其社会和医疗需要的孤独居民的保护。<sup>27</sup>目前,出现的许多对城市老年人群的威胁,例如缺少社会支持、家庭关爱,缺少专业的医疗服务,昂贵的药品价格和灵活的交通等,以上种种要求超出了当地和联邦体系计划能承受的范围。<sup>28</sup>

最后,围绕热浪问题的政治争论表明,在政府应当保护、支持老人和弱势群体责任范围上产生的分歧。在“福利改革”迅速蔓延的时代,任何地方的公民和政府官员都不得不去再思考他们赋予政府处理公共卫生和福利事务的范围这一基本的问题。例如,1998年尼加拉瓜的洪涝灾害造成了近一万人的死亡,当总统车队通过政府长期忽视的高危地区给予象征性的帮助时,公民们集会抗议并高喊着“谋杀”。但是,当芝加哥和美国其他一些地区发生危机时,对于个体责任主导的政治文化并没有相应地提升对危机的重视。然而,“热浪危机要求我们在将来建立起一整套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体系,因为我们有相当多的老人独

自生活”，<sup>29</sup>美国公共卫生协会的前任主席、芝加哥居民昆廷·扬(Quentin Young)这样说。随着老龄化，孤立、严重不平等、家庭分离和住房不安全等因素的趋势增强，像芝加哥等城市的居民将要决定他们能够接受怎样的威胁以及期望得到怎样的政府保护。

## 面对热浪：责任政治

芝加哥大多数评论员，包括当地媒体的杰出人物，都认为让政府承担大灾难全部责任的作法是可笑甚至是幼稚的。《芝加哥论坛报》专栏作家约翰·卡斯(Jone Kass)，热浪危机时他在城市议会工作，发表社论认为：对政府回应能力的批评只不过是在发表批评者自己的意见而放弃自己的责任。他写道：“抱怨政府官员，这是避开了很多人所感受到的，在父母年老时不赡养他们，让他们独自生活的负罪感……因不可抗的自然灾害而批评市长，既是不公正的，同时也错误地转换了讨论框架。这种做法不仅假设政府能够采取措施，尽管这是有争议的，而且政府应采取措施防止灾难的发生。”<sup>30</sup>《芝加哥太阳时报》编辑辛迪·理查兹(Cindy Richards)也同意这种观点，“现在的时代是”，她认为，“邻居们互相帮助，关心楼上的邻居，为楼下生活困难的邻居购买食物，当他们的妹妹不能照看小孩时帮助照看。不仅如此，当老人遭受炎热天气时，居民和社区活动者不是在问他们能做些什么来防止死亡的发生，而是在追究为什么城市政府不做得更多。不幸的是，多年以来我们经过不断地改革政府来期望政府这位‘大哥(Big Brother)’将照顾一切。……看来，适应孤独是我们将要重新学习的一项技能了。”<sup>31</sup>

在1995年时，对于戴利市长几乎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并且市政府对于芝加哥公共政治的强硬支持使得任何强硬的反对声音都难以出现。政治活动家们对于这次危机的关心并没有胜过对家庭和社区应该在保护自己弱势成员上更负有责任的争论。但是，除了政治活动家们坚持认为他们的工作人员在尽力地处理这次意外事件以外，一部分持



反对意见的政治团体拒绝让城市政府跳出这个陷阱。社会团体和一些积极分子正代表着这样一些人,这些人大多受热浪争论问题的影响。事实上,城市政府在一些特殊的方式上忽视了它们保护居民和保障公共卫生的责任。政府的这种保护能力被谈及“政府”和“国家”时所用模糊的词汇所带来的分离导致混乱,这种微妙的区分很容易被对城市有所抱怨的城市居民接受,并且成为政治体制中大量的人员和管理机构的区分标准。

在像芝加哥这样的城市中,分散治理的市政府组织的复杂性与官僚体制的缺点结合在一起,超大城市、县、州和联邦司法这些都增加了准确描述政治责任范围的难度。另外,正如查尔斯·佩罗(Charles Perrow)所说的,这种复杂性在于它自身是对公共安全的一种威胁。因为这种复杂性增加了意外和不可预期行为发展到灾难性后果的可能性。<sup>32</sup>例如,在热浪中,库克县的法医鉴定人已经判断出基于医疗原因的死亡率,并且发布了官方的死亡报告;芝加哥老年事务部为需要救治的年长者开放了空调活动中心;伊利诺伊州议会举行听证会来调查城市应急项目的性质;国家气象服务部门在灾难开始时发布了特殊的炎热警报,所有这一切都是政府应对热浪危机做出回应的一部分。

在这样复杂的政治领域里工作,各类组织试图评估当地政府为这次灾难应负什么责任,并将争论从一般意义上的福利国家应该怎样保护它的公民,转移到实际上政府和官员是怎样在履行义务上失败的。都市老人在行动(Metro Seniors in Action)——芝加哥一个代表一万多老年人的组织——抱怨说,城市政府不仅忽视了他们在热浪中请求采取特殊支持计划的诉求,并且拒绝了为城市提供志愿者的请求。该组织的发言人西德尼·比尔德(Sidney Bild)说:“我们通过与市政府的接触,了解他们在做什么,并且催促他们尽其所能来帮助老人。越来越多的老人独自生活,所以城市公民的个人责任是一种给予。但是,除此之外,在都市的环境中,确实有一些事情是公民不能为他们自己所做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市民组织想要有所作为是困难的。因此,市

政府应当走进市民组织当中,并对他们说‘我们将要与你合作,但怎样才能实现这种合作?’一个市政府并没有计划,但是我们愿意号召人们,并且我们这样做了。”比尔德认为,尽管市政府熟悉高温的危险性并有应对高温的计划,但没有一个城市领导者直接采取措施给予相关的公共政策回应。“尝试过协调,但是协调颇有几分喜剧的味道”,他这样评论道。

都市老人在行动组织对警察局不能有效训练和指导资深官员、社区关系官员感到不安。政府部门允诺在 25 个地区每个区内都安排资深官员、社区关系官员。比尔德解释道:“资深官员意味着他要对年长者负责……关注他们的福利、安全、健康,这是所需要全部工作,并且是全部的职责所在。”都市老人在行动组织的通讯报告说,1995 年 2 月期间,即在热浪发生四个月前做了一次关于老人小组的报道,“警察局长承诺将要完全恢复老人公民小组,并且为每一地区指派一名受过训练的资深官员,这些官员每月都将见面一次。约瑟夫·马拉托警官(Sgt. Joseph Maratto)将会协调这些官员的工作。事实证明,警察局长的这些言论不过是在安定民心。”都市老人犯罪(Metro Seniors Crime)委员会的主席艾琳·纳尔逊(Irene Nelson)解释道:热浪危机“验证了我们最坏的打算”,因为在热浪之前,该组织就曾发出警告,说明老人小组已不能像预期的那样正常运行。“我们从一些资深官员口中得知,不管警察局主管对公民做出怎样的承诺,事实上并不存在老人公民小组,他们在从事一些与老人无关的工作,并且他并没有与马拉托警官见面。”<sup>33</sup>

由于警察局错误的组织配合,行政管理者和一些官员并不想承认他们阻碍了都市老人在行动组织努力为公众创造良好条件计划的活动的执行。在通讯中,都市老人在行动组织声称,“若是老人公民小组在 7 月开始完全运行,许多与炎热有关的死亡就可以避免”,因为官员们将会躬身于街头,发布关于危险气候和要求人们关心年长者的警告。<sup>34</sup>但是,消防局作为当地政府提供卫生和社会支持服务的又一重要机构, 147

没有一个部门激活应急干预项目。都市老人在行动组织开始怀疑市政府承诺建立的老人小组是不是在其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在发挥作用。

## 组织性的匹配错误：社会保护与社区警察

对当地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警察局错误地设置老人小组管理者并使其制度化来掌管疾病预防和安全生产工作，这些也表明该组织和芝加哥替代警务战略（Chicago's Alternative Policing Strategy, CAPS）共同存在的一些问题。警务人员是芝加哥城市街道形象最主要的组织部分，是政府部门最重要的代表，并保证城市政府法律法规的实施。长久以来，警察在保护城市居民方面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正如历史学家埃里克·门克宁（Eric Monkkonen）所说的，警察已特别地参与了社会控制和对城市贫困人口的规制。<sup>35</sup>像医疗机构一样，在热浪危机时，芝加哥警察处在做出回应的第一线。在城市中有大量的尸体需要检查，但是没有一个机构帮助将尸体移入太平间，只能将检查和运送尸体的任务交给警察局。在灾难处理中的警察官员告诉我，这一经历非常难忘，“这是（他们）所遇到的最困难的事情”，而且是“可怕的、让人难受的工作”。

在平常的殓尸过程中，警察局派出的法医鉴定人检查每一个尸体。在热浪期间，警察们异乎寻常地繁忙。“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星期”，一位在城市南部工作的法医鉴定人这样告诉我，“我们打了一些电话，我想是三个吧，一些公寓里窗户和门都紧锁着，没有空调、没有电扇，只有恶臭的空气，只有死亡。”当警察到达死亡现场时，仍然遵循着调查的一般程序：向邻居和亲戚询问最后见到死者是什么时候？死者的社会活动和住院看病的历史，在房间里搜寻谋杀的证据。警察有责任将他们的发现记录在官方的报告上，并将其复印件交给法医局。

一旦警察完成了调查，他们就负责把尸体打包并送入太平间（图 149 36）。这是一项无论在体力上还是情感上都很艰难的工作，而且尸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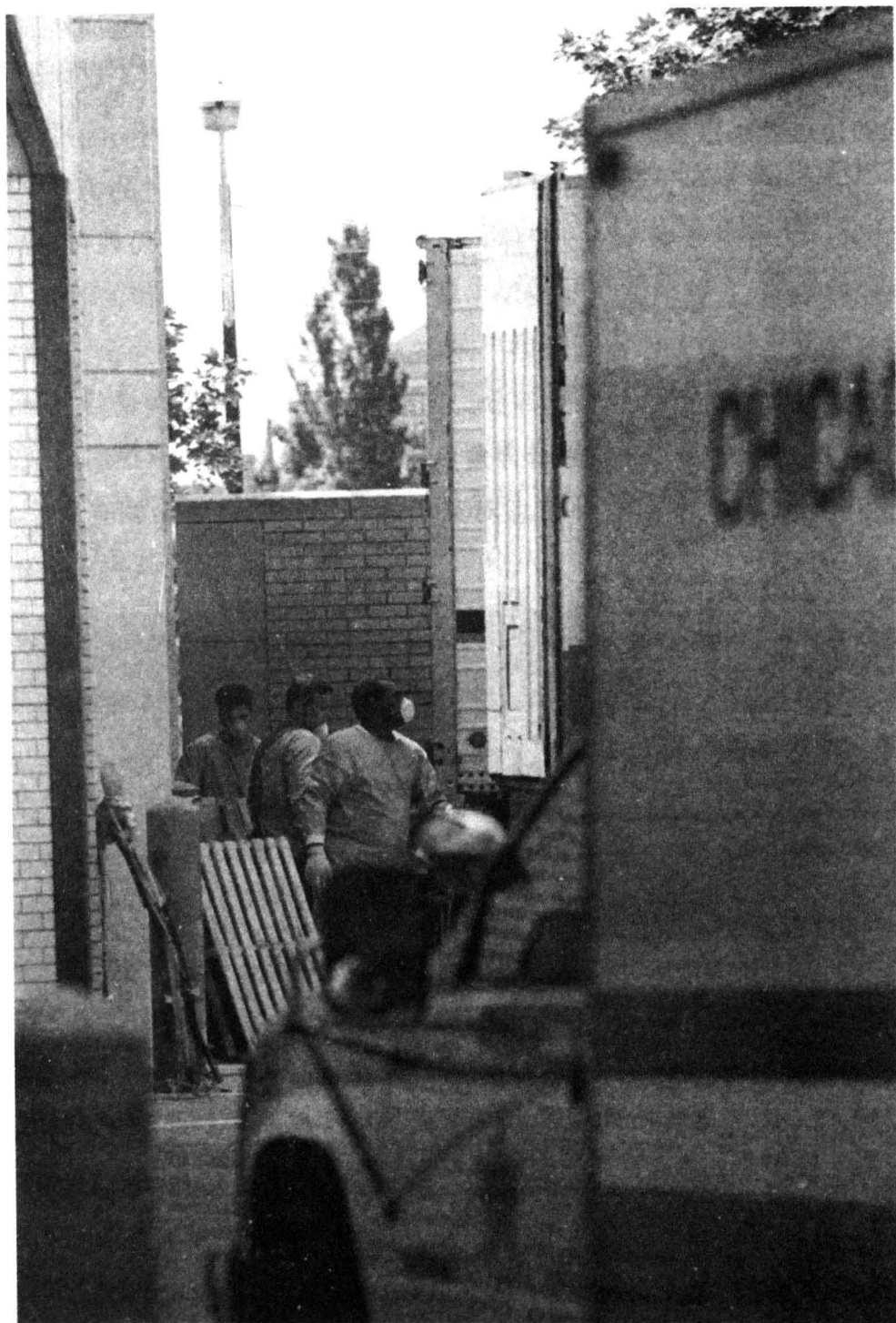


图 36 库克县太平间存放尸体的冷藏卡车。许多死难者由警察运过来。资料来源：《芝加哥太阳时报》，鲍勃·戴维斯(Bob Davis)摄影，《芝加哥太阳时报》授权许可，2002年。

的状况和炎热的天气使其变得更为困难。运尸车造成的交通拥堵加剧了这种困难,因为这种状况延误了将尸体运送到法医鉴定人那里的时间和传送警察报告的时间。一个记者记录了这种场景:“我们到过无数个杀人现场、见过无数不寻常的案件,但是从来没有像这样的场面。以前的时候,看见警察在检查尸体,20分钟他们就离开了。而现在,要等一个半小时,长长的队伍等在停车场周围。”<sup>36</sup>当警察在等待的时候,许多官员义务帮助工作人员搬运尸体。这些工作很枯燥,没完没了,但它是组织城市灾难管理的重要部分。如果警察局的明确职责仍然是帮助死者,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暗含角色就是运用官方的知识找出造成死难者死亡的信息。而这种信息对灾难的科学研究和政治调查都十分重要。



图 37 用手推车把死难者运进库克县法医局。资料来源:《芝加哥太阳时报》,《芝加哥太阳时报》授权许可,2002年。

但是,如果指派给警察异乎寻常程度的工作,这将会失去工作的本来意义。对于芝加哥警察来说,特别是在社区新系统和维护邻里治安方面,他们被期望做除了执行法律以外更多的工作。20世纪90年代,芝加哥与美国其他一些城市一起用精心设计的监管计划重组警察力量,这项计划被用来平衡主张增加政府法规和命令与主张增加社区组

织的不同观点在警察改革上的争论。社区导向的警察服务(包括数十亿美元的联邦预算项目)是1994年犯罪法案的一部分,将为城市提供充足的联邦资源,前提是这些城市对社区警察发展项目感兴趣并有能力将其执行。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减少了用在其他城市服务的资金,这阻碍了20世纪80—90年代之间对贫困人员支持计划的形成及其连贯性。社区警察发展项目为城市提供了新的财政诱因,扩大警察的监管能力并鼓励当地政府重建执法机构。芝加哥市成功地获得了联邦资金,并把警察局的预算从1991年的6.29亿美元提高到1995年的8.17亿美元和1998年的9.23亿美元。这种状况与城市政府削减员工和在服务上资源枯竭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充裕的资金使得警察局在10年中将其全职职工人数增加了1000人。

表9 20世纪90年代芝加哥城市管理机构的全职人员

机构	1991	1995	1998
警察	16243	17441	17752
卫生	2160	1750	1684
人力资源服务	1074	580	474
住房	345	255	195

资料来源:亚历山大(Alexander),1998。

虽然芝加哥替代警务战略与其他一些新的社区警察计划相似,但是它的显著不同是分派给警察的大范围的服务传递以及社区责任。芝加哥替代警务战略的设计不但使社区警察成为城市基础服务的经纪人,例如基础设施的修护、遗弃楼房和空地设施的关闭与清理,清除涂抹乱画,而且还提供很多警员与居民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在芝加哥的计划下,所有的警官,不是特殊的单位,都是芝加哥替代警务战略的一部分。此外,他们希望传统意义上的法律执行者成为邻里工作的组织者、社区领袖,与城市其他机构的联系人,如果有需要,成为服务的提供者。这些服务的核心是保护城市老人与体弱多病的居民,他们需要特



别的关注与照顾。芝加哥警察局早在 1982 年就已经开始实施为老人设计的特殊照顾计划,这是由老人城市居民服务部门所创立的。但是,在芝加哥替代警务战略以下的部门承诺对城市老人尽义务,并且在危机时照顾他们。警察工作的改组使得工作人员个人联系居民越多,就越熟悉他们辖区居民的各种情况。这些工作者在芝加哥替代警务战略的政治合法性起着重要的作用。作为警卫人员或是安全护卫者的社区警官的神话,使得对芝加哥的辖区领袖进行平等对待成为一大难题,这对项目普及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热浪作为项目的一大重要的检验,就警察工作改组的困难性最早发出了信号,但改组仍要继续进行;相关的研究显示,这样的考验仍将出现。<sup>37</sup>

芝加哥在 1993 年 4 月建立芝加哥替代警务战略,当时在四个警区开始实施试用性计划。截至 1994 年的 12 月份,即在热浪到来的前六个月,这个系统已经在所有 25 个城区实施。理论上,城市社区警察,特别是老人行动组织应该能够通过网络与周边的社会团体、当地老人一同去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那是作为芝加哥替代警务战略必须做的一切”,工作在北朗代尔的市议员迈克·钱德勒(Mike Chandler)解释说,“他们可以通过对这些人进行筛选来提供政府帮助。你不能等到出现了热浪才想到有很多的老人需要帮助。”可是在整个灾难过程中,没有一个系统内的领导意识到所在机构的责任和能力,没有通过履行职能来保护体弱多病的市民,没有实行传统意义上法律规定的责任,却寄希望于形成新的援助计划。一位芝加哥替代警务战略官员告诉我:“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发现什么,所以没能做出反应。”他说话的语气与灾难后消防官员的语气出奇地相似。

在整个热浪过程中,这个城市的人认识到,如果社区警察能够作为服务提供者和社区工作者成功扮演他们的角色,他们必须通过训练来了解和演练在常规警务策略之外的危险情况。芝加哥已经改进了原有的训练计划,试图扩展警察实践的范围。但是,一个对新计划报告做出最全面分析的作者认为,“事实上,每一个我们所见的有志于这项事业



的训练者都对为期三天的技能训练持消极的态度”。芝加哥的工作人员对于社区警务计划感到心烦意乱，因为大多数人都“只想做‘他们被雇佣时规定他们要做的’，警察不想做‘管些鸡毛蒜皮的小警察’。在最初的时候，处理人们所关心的事务听起来太像是社会性的工作，人们的所有问题都被推到他们的身上，由他们处理”。<sup>38</sup>

在我实地考察过程中，所见过的大多数警察不仅对于新职能中作为社区工作者持怀疑态度，而且不愿放弃旧有的工作方式。<sup>39</sup>警察经常告诉我，他们加入这个团队是因为他们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或“帮助社区”。然而，很少有人希望就像女性社区工作者那样去处理邻里关系。警察组织培养了一种阳刚气质，要冒很多危险。同时，社区服务责任的推行也在威胁这个系统。确实，一旦这个部门的每一个成员适应了巡查街道的危险工作，他们似乎不喜欢社区工作处理社区的邻里关系和满足老人服务要求。在新的系统中，警察害怕工作分派给每一个人，而这些原本是那些没能完成任务或是服务行业的人的工作。

在实践中，全体警员身处芝加哥最为危险、犯罪者经常隐藏的社区——独居而且破旧的住所，对于传统治安警力的极大需求，使得警察几乎不可能去应对上级赋予他们处理社区邻里关系的工作。甚至作为社区治安的先决条件，在几米之内的小范围内巡查都是很难完成的。尽管在芝加哥警区中有如此高的犯罪率，警察局并没有指派全体警员去解决犯罪活动，因此使得在高犯罪率地区的工作者履行了更多的职责。正如工作在北朗代尔的一位办公人员解释说：“即使我们希望能够从一开始犯罪就着手制止，我们也无法跟上犯罪速度，这里发生的犯罪案件太多了。”

如同警员一样巡视，坐在办公室工作过后，我终于在第一时间明白了为什么在警局中甚至是最善意的成员都难以完成作为哨兵或是社区领导者的工作，特别是当他们所负责的是城市中犯罪率较高的地区时。与问题导向的邻里关系警务管理相比，这种实务活动将允许警察正确鉴别孤独老人、具有特殊需要的人们，以及当地的紧急事件，这些都要

153 求警务工作者既要有效率地完成工作,又要掌控一定的空间界限,在特定区域内与居民培养起感情。在高犯罪率的地区,警务工作者们对犯罪报告做出快速的反应,并且从控制中心到通过电台联系的汽车都要求提供紧急服务。正当我们驱车快速驶往辖区边境时,我们已经事先分派好下一步要去应对的一个紧急任务,很明显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去做到一名警察的服务与职责。佩带枪支的警察告诉我:“在其他地区,他们可以略微空闲一点。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负责我们所有的辖区。”在整个八小时的工作时间里,我们紧急处理了两个电话,剩下的时间我们都花在其他地区。

可以肯定的是,有许多其他警务工作者能够通过讨论会为社区警务邻里关系做好服务。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每个月在芝加哥 279 个辖区举行会议,这已经成为经常性的协调和合作计划,是政府和市民、社会团体集体讨论的地方,同时也是社区关系办公室提议处理正式事务的地方。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警察工作的组织文化和职业挑战使得培养社会服务和在社区担负哨兵工作的热情变得困难。正如斯科甘和他同事的报告所说的:“许多警务工作者对处理与犯罪无关的事件特别没有兴趣,对于警务工作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旧观念。对于他们来说,问题的解决并不十分像警察的真正工作。”<sup>40</sup>在整个热浪中,当地警务工作者和老人服务小组在保护孤独和体弱多病老人上的失职,并不简单的是警察部门没有意识到这是个严重问题并积极采取回应的结果。它也是一种下属难于完成芝加哥替代警务战略服务传递体系的征兆,该体系设计仅仅是理论工具,却难以实施。正如消防管理部门,疲于管理护理人员,负责公众健康一样,警察被迫从一个准军事组织转型去满足一个本不属于自己负责的新的服务要求。

## 有害的忽视:容忍剥夺的政治意愿

154 当都市老人在行动组织发表关于警察部门的特别声明时,南部社

区的一个组织的领导者征集了批评城市回应力低下的一些材料，讨论了在他们所在的芝加哥地区长期服务的不足。住在黑人人口较多的第六区的市议员约翰·斯蒂尔(Alderman John Steele)，抱怨在他所居住的城市已经忽视了居民的健康与福利，无论是热浪之前还是热浪期间。市议员博比·拉什(Bobby Rush)批评城市议会“权力的傲慢自大”，并宣传，“城市行政机构缺乏行动，市长戴利擅长踢皮球的心态导致了服务老人的芝加哥安全网陷入财政上的无底洞。当老人在他们的辖区内面临死亡时，冷酷僵化的机制只是一个空架子，因为城市没有激活任何机制提醒公众注意热浪危险的严重性。”<sup>41</sup>

作为黑人政治授权的工作队成员和联合抨击城市议会拒绝对卫生危机承担责任的非裔美国政客，罗伯特·斯塔克斯(Robert Starks)，东北伊利诺伊州大学城市规划研究项目的教授，对城市委员会没有为非裔老人提供更多的应急卫生服务感到非常愤怒。在《芝加哥旗帜新闻报》(*Chicago Standard News*)的一篇社论中，斯塔克斯说，“城市对危机无力的回应，简直就是在犯罪”，他同时要求城市几个主要部门负责人辞职。<sup>42</sup>在充分的讨论中，他认为，“对该负责人来说，这是生性太冷酷了。他们说，他们不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他们没有受到警示。但是，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知道，在这个社区的人也知道，就是城市政府没有听到。”

南区领导者们变得非常愤怒，但并不感到惊讶，他们看到了在热浪中被城市漠视的非裔老人。他们说，这样的漠视，是政府的一种典型做法，拒绝承认对日益增长的老年黑人提供援助的必要。他们可能已经惊奇地发现，许多政府机构里为老人服务的官员和街区工作者都同意这一点。据唐·史密斯(Don Smith)说——1989—1995年一直作为部门主管——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办事处就一直处于困难之中，因为联邦政府缩减了安全基金，住在芝加哥的老人以及独居者的数量也在增长，这都增加了部门的负担。芝加哥老人服务社，也就是当地政府部门的第一个特别关注城市老人的机构，尝试一个给人印象深刻、范

155 围扩大、革新的援助和创新计划。然而缺乏足够的资源使得它不可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老人需求。

城市服务工作者普遍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工作,并且不可能满足他们辖区服务对象的需求。“我们部门一个月要接到超过 8000 个要求帮助的电话”,一个提供信息和助理服务的工作人员在这个机构的报告中说到,“所以你就理解我们需要做多少事”。<sup>43</sup> 面对安全保障基金的缩减,20 世纪 90 年代芝加哥老年事务部被迫增加对于私人基金及其他资助机构项目支持的依靠。但是,在 90 年代中后期,额外资金再分配计划的紧张迫使芝加哥的一些部门财政短缺,尽管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增加了财政预算。正如政策研究行动组织在其关于城市预算研究中所提到的:“芝加哥的城市计划优先考虑低收入居民,相比较,公共安全更取决于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补助金。不幸的是,对于芝加哥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居民的补助金数量在最近几年大大减少。”<sup>44</sup>

警察部门机构膨胀到其历史最高水平的同时,老年事务部却在减少其全职员工以及雇用一些更为廉价的兼职人员和临时工。政府为了他们的人力资源服务已经与许多私人机构签订了长期的服务合同,但是,在 90 年代,芝加哥老年事务部已经把它们的主要项目外包给私人和非营利组织,这些私人和非营利机构同意在少许预算提供的条件下,接替州政府的工作。当我与社会工作者、家庭服务提供者在一起时,就清晰地了解到,对芝加哥贫穷老人的低水平的服务是由一个特定的结构和日常标准所决定的。获得城市合同的具有竞争的市场提供了不正当的刺激,使机构在低估服务的开销的同时高估他们的能力。我所观察的机构已经在努力完成他们的职责,竭尽全力提供服务,或是接受了超过他们所能承担的工作。“许多企业性的政府促进了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戴维·奥斯本(David Osborne)和特德·盖布勒(Ted Gaebler)在《改革政府》一书中写道。<sup>45</sup> 在特定的条件下把更多的公众服务交给私人部门可以促进支持水平的提高。但是竞争会破坏服务提供者的工作环境,如果仅仅为了促进效率而不考虑时间和人力资源的

156

需要来提供有质量的关爱。“我所服务的老人喜欢看到我，”曼迪·埃弗斯(Mandy Evers)，一位快30岁的非裔妇女对我说，“问题是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见他们，你根本想象不到在这里，我得照顾多少人。”

如同曼迪和她在芝加哥最大的社会服务机构工作的同事们所认为的，孤独的老人为了保持尊严，往往不愿接受别人的帮助，远离人们的交往、关注和支持。当了解了独居老人常常对于陌生人表现出谨慎，提防被骗，社会工作者改进工作方法以取得他们的信任。如果像通常的联系方式那样仅仅用电话沟通的话，难以维持联系与信任。问题是组织中的人数太少，忙不过来。正如一位接受调查的机构主管所说的：“我们为超过我们工作量两倍的人提供服务。”每年他们至少要拜访老人两次，但是就我所了解的数据来看，所能做到最好的是一年一次。如果老人向政府或是服务机构强烈要求的话，他们可以得到更好的帮助，但是曼迪和她的同事帮助安顿的老人很少有人有这样的要求。

不足的基金和社会援助机构人员的短缺使得孤独、无家可归的老人处在正式网络援助的边缘，但是城市和私人机构的工作者的标准操作实践使他们进一步疏远了居住在声名狼藉的非裔美国人社区和住宅项目中的芝加哥老人。就像芝加哥其他的行业和组织一样，社会工作者和个案调查的主管通常都讨厌对芝加哥黑人区进行家访。事实上，这种世俗的眼光限制了城市对许多体弱多病非裔美国人，特别是老人和残疾人提供帮助的能力。换句话说，地方政府划拨给卫生和人事服务的资源由于受到街区执行政策的官僚化的影响而减少。

我已经了解了一些个案调查的工作者，包括一些非裔的工作者，都不喜欢到这些“没人去”的地方，因为他们相信，在那些地方他们的人身安全会受到威胁。<sup>46</sup>虽然他们的机构指派他们去这个地区中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服务，但是工作者个人仍然有权自主选择服务的对象。当他们在组织中有足够的经验或是有能够帮助他们的同事外出时，他们就可以规避他们认为过于危险的工作。我所见过的一些在芝加哥的社

会工作者愿意去见服务对象,但也仅仅是在特殊的情况下。通常情况下服务对象需要生活必需品是他们愿意在一大清早造访的原因。我所见到的每一个机构都有一个固定并且不成文的规定,即造访非裔美国人或十分贫穷的人都在中午之前,有很多工作者是在上午10点之前就去。“当我要去这个城市的这些地方,我总是最晚就在早上八点前就离开了”,曼迪告诉我,当我见到她时她正在为西部地区的一些低收入房屋工程赶工。“我认为,如果我到的时间比较早的话,我就可以避免见到那些帮派分子和麻烦制造者。无论他们晚上做了什么,他们总是这个时间在睡觉。但是在中午时分,他们就会出来了,而我也必须离开了。”

当我观察其他的社会工作者做同样的早间拜访时,我问一个城市项目的主管她所在的部门下属是否也是把工作放在早晨。“我们当然是这样做的”,她回答说,“我们要确保这些坏家伙还没起床,这样工作会顺利一些。”这项服务策略对于芝加哥的老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他们也是同样的在这个时间出去。然而只有早间的造访策略限制了当地黑人居民的服务选择。这使得芝加哥大多数麻烦地区的居民和当地的服务机构之间的社会距离拉大,在整个热浪过程中孤独的老年人与城市工作者之间的隔阂加深。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南部地区的政治领导人指控说市政府忽视了当地居民的需求,为什么他们中的一些人仍没有放弃这一点。<sup>47</sup>

## 赋权时代为服务买单

芝加哥政府持不同意见者对于被抛弃和脆弱的人所说的浮夸之词与当地政府宣扬的赋权和消费者至上的言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政府机构促使他们自己作为信息的供应者来为市民提供服务和项目,市民成为公共产品的精明的购买者。城市服务的消费者只有当信息充分时

158 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政府机构通常会租用昂贵的广告和利用市场营

销厂商来宣传他们的工作。<sup>48</sup>正如一位官员所说,芝加哥需要政府援助的居民必须也能够通过激活关系网络来做出他们需要的援助选择。原则上来说,原有的官僚主义政策会使城市居民受挫,但是许多的服务提供者确信政府的市场模型在服务传递程序和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之间形成了政策不匹配,使得孤独老人和体弱多病的人没有能力来要求他们所需要的政府援助。

对于城市政策和公共健康计划的研究显示,当地政府所签的合同使得他们更多地关注精英机构的需求而不是拥有最少资源、影响力最小的居民。<sup>49</sup>据当地社会工作者和个案调查主管所说,最低教育水平与政府和教堂等机构没有多少联系,拥有最少资源的芝加哥居民也是最能够评论公共利益的人,从医疗卫生到社会保障收入,他们接触的都是如此。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是企业型政府的无价之宝,前者以能力的形式处理复杂的官僚障碍,后者为服务提供者和社会帮扶系统建构网络形态。但是这样也出现了其他的一些非典型的社会特征,最脆弱和最需要帮助的老人却没有机会要求公共物品,当其首次的要求尝试被忽视之后,他们不能提出更强烈的要求。社会和空间地位使他们无法被服务提供者看到,也无法接触到有关项目的信息网络。福利历史学家罗伯特·哈尔彭(Robert Halpern)认为,“这已经不言而喻,最需要帮助的恰好也是最少有机会接触这些服务的人”。<sup>50</sup>一个服务传送系统将会促使不公平的出现,甚至是更糟糕。

斯泰西·吉尔(Stacy Geer),一个为芝加哥老人提供服务的经验丰富的律师,他在20世纪90年代花了大量时间帮助老年人争取安全及基本生活品,诸如住房、能源。他坚持认为,企业服务系统和孤寡老人之间的政策错位,是导致在热浪过程中芝加哥老人如此不堪一击的主要原因。“只有完全意识到了服务传递系统能力的老人,才有活动能力走出家门,与他们的家庭、教堂、邻居,或是帮助他们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的人建立联系。”她指出,在一些情况下老龄化进程潜在认为,老人是健康的,他们有一定的经济来源确保他们生活。吉尔解释说:“随着



老年人越来越脆弱,他们之间的联系也随之解体。当他们的需求增加了,他们就更没有能力去满足这种需求。在老年事务部,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以及教堂的老人俱乐部名册中的人,都将这些组织作为他们口头沟通和表达的通道。我知道,通过为老人社区工作,你就要为同样的工作机构服务。”<sup>51</sup> 政府官员,包括一些老年服务部的成员都同意,有活力的老人在炎热的夏天去空调中心或是叫朋友和当地机构帮助他们。然而,在边缘化的过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老年人,而社会网络结构水平和政府计划则在其次,与此同时,是服务的传送水平。因为他们通常都不知道如何通过社会网络来获得帮助。当有危机出现时,那些在他们日常工作的环节之外,更是如此。当然,在热浪过程中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当有活动能力的和被及时通知的老人在使用设在城市官方的空调中心时,孤寡老人都在家里;而前往受资助的旅馆中被保护的老年人则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照顾。

## 日常能源危机

可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甚至与之联系最为密切的城市的居民也不知道当他们需要最基础的生活用品(如家用能源和饮用水)援助时到哪里去申请。在芝加哥,援助计划由联邦预算担保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项目(Low Income Home Energy Assistance Program, LIHEAP),对拖欠债务的消费者的市场模型管理战略使得贫穷的老人处于长期能源危机中。面对逐步上涨的能源成本(甚至在狂涨的 2000 年),削减政府补助金减少了老人固定的收入,城市中的老人对于他们公共福利的消耗成本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更加关心费用的降低。当伊利诺伊州中等收入的家庭在冬天每个月花费他们收入中的 6%用以取暖时,低收入家庭的这一比例占到接近 35%。<sup>52</sup>

我开始理解,为什么贫穷的老人如果有空调的话就不能在夏季负担他们实际的开销。来自于疾控中心的流行病学家估计,“如果每个家

庭都拥有一个可以工作的空调的话,那么,在热浪中将会有超过 50% 160 的人会得到保护”。并且这也是一项行之有效的公共卫生战略。<sup>53</sup>然而,每天与生活挣扎的老人解释说他们不能使用空调,即使他们有空调,因为这将使得他们的能源开支处于人不敷出的水平。伴随着现金需求的压力,电费的开销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提供空调运行计划的受益人是单位而非是安置的个人。但是每天的能源危机还是巨大的,甚至是在中等温度的时候也是这样。我所见过的情况最糟糕的老人每天关掉电灯,利用电视来为房间照明。当他们没有支付账单时害怕失去能源。然而,对于政策制定者和政府来说这都看不见,看不到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巨大危机。

1978 年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门创立的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计划于 1980 年全面运作,该援助计划授权给各州,它们改进了自己的评判标准,并且经常提供基金。在 1985 年,LIHEAP 的预算上升到 21 亿美元,州使用这些基金来补助贫穷人们的住房暖气和空调。<sup>54</sup>可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开始,政府支持计划以及财政拨款都开始调整,钱变得少了,热浪到来的那一年跌到了 10 亿美元,而且议会又加以削减。伊利诺伊州,与其他州严寒的冬天一样,不仅不能在夏季提供能源补助,而且在冬季用于援助的基金也早已用尽。据芝加哥老年事务部的工人所说,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计划是一个包括所有需要帮助的老人,但却永远不能使其得到援助的计划。

如同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计划一样的计划属于传统政策的范畴,总是说能够提供的,这也就不奇怪社会保障政策的再分配标准了,特别是共和党开展活动要求削减能源补贴。1995 年 7 月 17 日的那一周,当热浪死亡的人数还在统计的时候,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来终止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计划,并且最终提出一个折衷的方案,从预算中规定提供一亿美金,即大约 10%。在 7 月 19 日,伊利诺伊州商贸委员会举行了听证会,州官员发表声明,无论联邦的法规怎样规定,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计划的过冬基金将削减 25%。几个月后,美国众议院的 161

议员在参议院列席了会议,拒绝 2500 亿美元基金用于教育、卫生和居民服务,除非当地劳动部门完全取消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计划。这项计划虽然最终削减了大量的基金,但还是保留在会议议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历史学家特德·斯坦伯格所指出的那样,像美国国会这样的部门调整了对于贫穷人口的能源援助政策,增加了联邦政府承诺给在灾难中受到贫穷威胁的保险公司和房屋所有者的津贴数额——即使直接削减的这些社会保障项目本来必须用于支付能源开支。据斯坦伯格所说,“新的预算意味着贫穷的人在灾难中将要花费平时两倍的金额,才能与平时的生活水平相当,他们只有通过减少社会支出来保持同平时一样的生活水准”。<sup>55</sup>

1995 年,已经签署了能源削减之后,在热浪期间和热浪之后,一个更为基本的生活问题,也就是水资源的缺乏成为芝加哥最令贫穷老人们关注的地方。由于没有其他的降温良方,芝加哥低收入青年人在热浪期间打开了 3000 多个消防用水龙头,对此当地警察做出了积极回应。芝加哥城派出警察严厉打击不听劝说打开水龙头的青年人。很快,当地记者声称,一场“关于水的战争”在街上展开了。在芝加哥街上闲逛的上百个人在寻找水龙头,警察与年轻人展开的枪战,为的是一项最基本的公共生活必需品。<sup>56</sup>城市供水部不能提供水资源的供给,使得许多居民在足以在街上被热死的情况下处于缺水的状况。同样,水资源的短缺使得芝加哥住房建设当局倍感压力,这些公共住房,在电力不足的情况下,用电的水泵关掉了,留下了一些不用电或水的工程,住在近西区的洛克威尔花园工程的居民已经一天多没有水了。而住在兰道夫塔南部的居民抱怨说,他们已经连续三天多断水了。在南区被破坏的水龙头导致缺水的范围在扩大。“我感到焦虑不安而且非常的热”,一位非裔妇女在摩根公园对当地的一名电视记者说道。“看看我们,这太可笑了,我们没有水喝,没有水来冲厕所,我们什么事都做不了!”(图 38)

在芝加哥的人没有想到城市储存了饮用水。当地政府通过了一项



图 38 一位芝加哥牢骚满腹的居民告诉记者，她的家在热浪期间停了水。资料来源：ABC7，WLS-TV 友情提供。

政策将要开始关闭没有能力为饮用水付费的居民的水龙头。贫穷和生病的老人收入固定并且太少，不足以支付水费。在这个典型的企业家精神导向的州，芝加哥水利部门决定对拖欠费用的用户采取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切断他们的水源并课以重税。这项决定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实施。城市官员希望采取一项与他们平时停车收税类似的策略，即取消债务人使用资源的权利，这可以帮助水利部门从城市中收取大量的税收。<sup>57</sup>可是他们没有考虑到水不像汽车那样，水是生活的必需品，并且这种惩罚性的政策将会破坏原本生活就已经贫困的芝加哥居民们的生活。

可以预见的是，这项政策将会造成城市贫穷老人大量的伤亡，其中包括我曾经见过的一些老人。在 1998 年的一次讨论中，一个水利部门负责关闭水龙头的雇员告诉我，他不能做出例外，将断掉一个病得十分

严重的老人家里的水。病人的医生已经打电话抱怨了,因为这种情况并不寻常:“我总是被要求那样,始终如一。每天来我这里的人都是这种情况,那我能怎么办?”这名行政人员认为,停止供水作为一种对用户不负责任的普遍现象,政府的这项政策已经危害到了人们的生命,而政府答应会制定特殊的政策来保护这些老人。

## 福利国家和极端事件

极端事件和灾难是对政府、社会的极大挑战,但是这些潜在风险导致生命的死亡和社会的不安定,对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严峻的挑战。正如公共卫生学者罗德里克·华莱士(Roderick Wallace)解释说:“极端事件——紧急,我们的生活受到限制,包括个人与社区。控制这种极端事件的发生及结果是有效政府有能力的标志,这样的政府一个保留‘天命’的政府。”<sup>58</sup> 当一个政府不能控制危机时,它可以利用它的经验做一个新型社会保障的领导者,但是这样做要求一种公开的评估,来评价政策是如何支持或是如何危害它的选民们。在热浪之后的几年里,芝加哥已经扩展了在热浪危机中需要援助的老人计划,改进了跟踪孤寡老人的系统,并且当天气恶劣时与老人联系,继续救济金资格审查,注册新成员服务。这些计划将有助于保护芝加哥在未来热浪危机中的老人,然而他们只是开始考虑其他城市缺失的政府服务传递系统。

同时,在这一章中探讨城市政府的四种特征:(1)主要卫生和支持服务授权给类似军事机构,这些机构却并没有这种设计。(2)缺少一个有效的在不同机构之间组织和协调服务项目的系统。(3)公共系统未能提供足够的基本资源,例如健康关爱、能源补贴和对体弱多病人群的社会保障。(4)体弱多病和年迈的市民将成为公共物品的主要消费者,而公共物品不足将继续威胁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这些组织机构的改变,政策的优先考虑和基于市场导向的改革都使得今天的政府更为普遍,而热浪事件说明人们仍需长远地思考政府的职能。

在芝加哥，如同其他城市一样，这些改革的普遍性和合法性在极大程度上归因于城市管理的能力，通过复杂的市场营销以及公共关系工作，作为计划有效性分析的依据。无论常态的城市政策还是突发的事件，有想象力的项目可以弥补政府工作的不足。在热浪过程中，如同在下一章探讨的那样，城市对于危险环境最有效的回应不单是一个公共卫生计划，而且是项公共关系活动。

## 第四章 公共关系治理

165 芝加哥是一座有很多故事的城市,而关于这座现代大都市最大的传奇却与1979年的那场暴风雪有关。这场猛烈的暴风雪将整座城市掩埋在尘埃与冰雪之下长达数周之久。虽然历史学家们对这场暴风雪的政治意义并未下定论,芝加哥民众却一致认为,这场灾难至少导致了一个变化,那就是迈克尔·比兰迪克(Michael Bilandic)市长任期的终结。<sup>1</sup>最近的一项对芝加哥政治的研究,简明扼要地揭示了当年的事件如何影响了1979年市长的人选,在那次竞选中的主要人物是迈克尔·比兰迪克与处于劣势的竞争对手简·伯恩(Jane Byrne)。“直到临近竞选,比兰迪克政府对城市的治理都平静无事,大家都认为他能够连任成功。但是,在1979年,当两次巨大的暴风雪袭击芝加哥时,政府的反应却表现得迟钝与反复无常。在这一点上,芝加哥运输局设法维持原计划中丹瑞安(Dan Ryan)的路线畅通,而近南区黑人居住区的车站却被忽视了,因此,这项措施将往返上下班的非裔居民排除在公共交通系统外。尽管伯恩竞选班子的资格受到怀疑,2月1日,她还是赢得了19个黑人选区中15个的支持。”<sup>2</sup>芝加哥人逐渐相信,对于极端天气的应对失误使得比兰迪克竞选失利。当1995年炎热天气来临时,市政厅里每个人都知道要处理这场危机所要押下的筹码是非常大的。

不同于高温,这次暴风雪之所以会表现出这么大的政治破坏性,其中有一点就是因为它妨碍了城市中人们之间的来往和商品的流通,切断贸易往来,使得学校被迫关闭。它还给芝加哥最有权利的选民带来诸多不便。换言之,热浪只造成了城市中跟政治没有多大关联的一小部分人的危机,而相比之下暴风雪带来的却是全局性的灾难。1979



年,比兰迪克陷入了与一位非常有公信力的竞争对手竞选市长职位的困境中,并且他的政治对手还利用这次城市管理上犯下的过失来对他的执政加以批评。然而在1995年夏天,理查德·M.戴利市长刚刚成功地颁布了一条命令,即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可能性的情况下要进行重新选举。正是热浪在时间上的巧合,加上本有可能提出政治反对意见和批评威胁政府执政合法性的反对者缺席,使这场大灾难的政治影响降到了最低点。 166

不过这场热浪和那场暴风雪对政治影响最显著的区别在于,1979年比兰迪克政府不仅没有处理好极端的天气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妥善处理好公共关系回应问题。比兰迪克和他的助手们对于及时回应社会组织和媒体记者显得无能为力,而他们正是需要政府对于如何解决这场雪灾做出立即回应的人。在市长坚持说城市中受灾严重的地区的雪已经被扫除之后,一些经过深入调查的报道却戳穿了他的谎言,他们声称仍有一些被宣布已经清理的区域还被数英尺的冰雪覆盖着。出于对市长企图掩盖在管理上失职行径的愤怒,芝加哥的选民用自己的选票给了比兰迪克的欺骗行为一个严厉的惩罚。

由于大部分的选民在1995年已经使用上了空调设备,戴利就无需过多担心在地方精英中毁掉自己的名声。而戴利领导的政府也在芝加哥历史上前所未有地在公共舆论上投入了更多。市政府是为民众服务的,所以一旦出现了像无情的热浪一般的糟糕的公共性事件,就有可能威胁到政府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誉。在热浪出现前的几个月,芝加哥正在进行一场强有力的公共关系运动,这场运动旨在使其重新获得自1968年一场灾难性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以及遭受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济滑坡后所失去的地位。另外,为了发动一场吸引游客和商务人士的全国性市场营销运动,市政府投入巨额的资金来推介这个社会项目。芝加哥市预算专家杰奎琳·利维(Jacqueline Leavy)认为,在戴利市长的领导下,城市在媒体和广受关注的广告上进行了“一场富有智慧的、有战略性的投资创新”。同时也“建立了一个媒体机制,告知

民众芝加哥市政府关注公共问题”。芝加哥许多市政机构与主要的公司签署了市场营销或广告服务的协议，比如警察局将其公共关系项目作为一种全民模范。<sup>3</sup>这一系列项目在城市中的效果是可见且显著的：167 不论是在打着公共项目广告的道路两旁，还是在城市经营的电视制作团队播报政府在公共事业上所作所为的有线频道里。

一直以来，有策略的象征性政治行为对统治城市政权有重要价值。但正如政治学家蒂莫西·库克(Timothy Cook)所说的，如今，“政府中的每一个部门相比 40 年前都更专注于媒体，并在其中投入更多资源”。<sup>4</sup>自从道格拉斯·凯特(Douglass Cater)1950 年创造出“公众政府”的概念，政治学家就一直用它来描述新闻记者 in 政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sup>5</sup>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公众政府已经成为政府本身的一种标准化行为。新闻媒体是一种政治机构，但在信息时代，政府要解决和操纵媒体不断的观察与监督，其本身也成为了一个新闻机构。正如哈佛大学公共政策学者马丁·林斯基(Martin Linsky)和他同事所说的，“当今的政治权力的运行都遵循这样一条规律，就是拥有能够熟练地解决媒体问题的政策制定者会使政府运行得更好”。<sup>6</sup>

政府将公共关系项目视作有效且合法的政治行为的关键，而这些项目对界定问题或是形成一种框架和产生政治支持是很重要的。然而好的公共关系与好的政府之间的联系并不总是很明显，因为统治政权有时同样需要用复杂的图像或促销的项目来增加他们自己的利益或掩饰严重的问题、有分歧的立场。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声称，“这种有意做出的公众形象，在一种虚假的公共利益的旗号下运行”，它加强了占优势政治团体的合法性，并且获得了民众名义上的认可而掩盖了真正的批评和担忧。<sup>7</sup>热浪期间，公共卫生出现危机而引发一场复杂且棘手的公共关系运动时，从惯例上如何象征性地建立一个高效、有影响力、有回应的政府的形象，对于避免一场政治灾难显得尤为重要。

市政府从其通常制作和提供重大新闻的身份上获得了好处，在对

事件状况进行公开通报的时候,政府运用其组织上的资源进行关键问题的定义和界定。<sup>8</sup>面对如此严重的一场灾难,保全市长的名声和威信并非易事,而这部分要归功于戴利明确地保证使城市免受危机侵害,并且承诺在他任期内有能力对付这些突发问题,这使得他在芝加哥的政治地位迅速提升。戴利,作为市长候选人,在市政府第一次竞选成功时曾大胆地宣称:“我们再也不能对芝加哥的问题视而不见。市政府应该负起责任,因为管理一个城市得由市长来承担责任……我不会坐等灾难的降临。”<sup>9</sup>如果说比兰迪克曾因为没有扫除街上的积雪,以及剥夺了非裔美国居民的出行权而丢掉了职位,那么对于一位面对南部没有料想到的数百人死亡,且医疗系统瘫痪局面的市长来说又会如何反应呢?市民和媒体是否会认为戴利和他对城市的管理应该对这场灾难负责呢?还是责任更加分散了?

城市并不是芝加哥唯一享有司法权的政治实体。库克县,伊利诺伊州以及联邦政府也都参与城市的治理,并在灾难的管理上起着关键的作用。例如,它们可以提供天气警报、查找死者、分发紧急救援资金用于能源和基础设施的修复。而且,这座城市有理由相信,它的大部分选民不会认为可依靠的政权对于这次事件是负有责任的。这些人都坚信,在美国政治文化中个人责任和决定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由于有了比兰迪克丢官的先例,戴利的治理不得不在地方政府最需要对方问题负责的这么一种普遍观念中进行。所以在这次事件中,是政府接受了比任何其他政治实体更多的质疑和拷问。联邦政府(通过全国气象服务)和伊利诺伊州政府(通过州参议院)事实上要对危机过去后的热浪进行官方报告,而二者都将维护其自身在灾难中的地位,并同时指责政府失职。但正如政治组织应该对管理城市负直接责任,地方政府(尤其是市长办公室)正面临着对这场惨重的人间灾难负担责任的公众压力。尽管市政府早先曾承诺对整个城市的保障负责,当灾难袭击芝加哥时,戴利政府却努力想要挣脱责难。

## 否认、推卸和辩护

当城市忽视了协调紧急出现的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如危险的热浪),政府的管理机构却实施了一系列的公共关系运动以抵赖其危机后果的严重性,为公共卫生系统的崩溃推卸责任,为维护城市对这场灾难的回应做辩解。在夏天,戴利市长通常将周一作为休息日,但随着7月14日的那个周末在热浪中死亡的人数上升到100,并且据法医鉴定人埃德蒙·多诺霍预测,在未来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会有更多的死亡报告,市长与主要的助理和委员会成员通了电话,通知在7月17日周一早上八点召开会议。地方媒体报道说,“戴利市长进入了一种政治损失控制模式”,而完全忽视了飙升的死亡率会给民众造成一种政府并没有准备好应对这场危机的印象。<sup>10</sup>卫生委员希拉·莱恩回忆道,“媒体希望知道我们做了什么和为什么会发生”,所以市长和委员会成员准备好了符合逻辑的一套说法。

戴利的公共关系团队当天组织了两场媒体报道活动。首先,记者们将会造访一家位于北区的超市,那里的食品供应因为电力的中断受到了破坏(图39),同时,宣布市长将举行一场有关联邦爱迪生公司电力输送失败的听证会。经过市长助理的测算,这一活动将注意焦点集中于公共服务的提供及安抚已经因市区电力供应不足而愤怒的居民。其次,官方将在五个城市老年人服务中心之一,举办一场新闻发布会,撤销城市政府中不能有效应对危机的机构,并且就市民应如何度过热浪危机做出建议。

这场新闻发布会也将弥补戴利市长在上一个星期五所造成的形象损失,他当时告诫媒体不要把形势看得过于严峻。戴利说,“天气的确很热”,他也承认这是第一起由于高温而引起的居民死亡事件,“天气太热了,但是我们不要夸大死亡的比率。……我们芝加哥总是很极端,也正是如此人们才会喜欢芝加哥,我们喜欢极端”。<sup>11</sup>尽管这些言论是在



图 39 一个杂货店的雇员把一些变质的食品放入垃圾桶内。在热浪期间,商店没电了。资料来源:《芝加哥太阳时报》,布赖恩·杰克逊摄影。《芝加哥太阳时报》授权许可,2002年。

法医鉴定人认识到高温致死的严重性之前发布的,但当死亡率和得病率快速上升的时候,还是给世人造成了戴利冷酷无情的形象。

市长举行了周一的媒体见面会以寻求信息沟通和理解。戴利恳求媒体能够放松一些,“这是现实,没有人想到会出现这么高的死亡率”,当听到一位平民主义者的呼吁时,戴利谴责联邦爱迪生电力公司无法为民众供电且并未在断电后的十分钟内向人民发出警示。他坦承,“民众都很愤怒,他们很受打击并且想尽快过上正常的生活。在断电期间,我的办公室与联邦爱迪生电力公司一直保持着联系,但我对他们的反应很不满意”,他威胁说,“这件事情还未结束”,他将着手展开调查。<sup>12</sup>



图 40 在接到批评,市政府没有在热浪时期避免大量市民死亡时,市长戴利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左边是城市消防委员雷蒙德·奥罗斯科(Raymond Orozco),右边是公共卫生局副局长约翰·威廉(John Wilhelm)博士,后来成为市卫生委员。资料来源:路透社,休·奥格拉奇(Sue Ogrocki)摄影,友情提供图片。

在戴利发言之后,卫生委员莱恩、公众服务部委员丹尼尔·阿尔瓦雷斯(Daniel Alvarez)、消防委员会委员雷蒙德·奥罗斯科、警察局局



长马特·罗德里格斯(Matt Rodriguez)都出席了记者新闻会,他们中的每一位都为市政机构对于危机的应对做出了强烈的辩护。面对努力工作以后出现这样的结果,罗德里格斯和奥罗斯科的回答令媒体感到震惊,因为他们声称,“我们的部门虽然很忙,但是还没有因为这场热浪而不堪重负”。<sup>13</sup>不久前曾对市长助理表达了自己关于政府对这次事件管理的担忧的莱恩,则代表了官方的另一种观点。“我们起到了紧急的警示作用”,她坚持认为,“用直接的话说,我们能做的都做了”。<sup>14</sup>她怀疑性的评论只会停留在幕后,相反,自从这场危机开始,市政府都在努力寻找一种规避政治灾难的策略性做法。官员们都害怕自我批评会加剧对政府的攻击。<sup>15</sup>

当丹尼尔·阿尔瓦雷斯接过话筒的时候,新闻发布会最火爆场面到来了。同戴利市长一样,这位公众服务部委员曾在上周五由于其言论激怒了民众。当记者们询问政府对老人的支持计划时,阿尔瓦雷斯明白政府既没有开放城市中的许多纳凉中心,也没有计划帮助老人。<sup>16</sup>然而,当戴利试图通过支持民众对联邦爱迪生电力公司的愤怒以迎合民众的口味时,阿尔瓦雷斯却大胆地将那些受害者的死亡说成是民众自己的责任。他声称,“我们正在谈论的是那些由于自我疏忽而死去的人,我们已经做了一切可能的事情,但他们甚至没有想接受我们的帮助”。<sup>17</sup>尽管这激怒了市民和死难者的家人,阿尔瓦雷斯的观点却很好地描述了这样一种普遍的政治现状,即个人由于行为缺陷而陷入麻烦,而政府却无力控制这种状况。在公众服务部的委员看来,这场高温并不是一个政治事件,而是一场社会灾难。

芝加哥的官员们希望危机能随着温度恢复到正常而消失,然而,在7月18日的那个星期二,城市中仍有关于死者尸体被运往库克县太平间的报道。在库克县法医局里,首席法医鉴定人埃德蒙·多诺霍宣布由于高温而死亡的人数达到376人。由于还有一百多具尸体在等待检查,他警告,死亡人数肯定还会继续攀升。在斯普林菲尔德市,州参议员第一个出来呼吁通过听证会来调查官员的责任,世界各地的记者也



纷纷到芝加哥报道夏天的这场事件。尽管城市仍然面临着公共卫生危机，戴利和他的委员却再一次选择了为自己辩解。<sup>18</sup>

到星期二的时候，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阿尔瓦雷斯试图责难死难者自身的做法起到了事与愿违的效果，委员们抢在媒体之前对他的这番言论表示道歉。当记者注意的焦点集中在那 100 具存放在太平间的尸体时，城市的新公共关系战略还是否认首席法医鉴定人关于死者与高温有关的发现。在记者的眼里，市长提出了“到目前为止最强硬的评论”，市长对多诺霍的验尸结论持有不同意见。戴利告诉媒体，“每天都有人由于身体疾病方面的原因死亡，我们不能把过去八九天死去的所有人都归咎于高温。如果是这样，那么在夏天死亡的所有人都是死于高温了”。<sup>19</sup>

正如我们在介绍中看到的，首席法医鉴定人多诺霍坚持认为他的  
173 调查是有根有据的，拒绝为了政治私利屈服于市长的压力而放弃自己的科学原则。尽管他在尸体被运往太平间的时候收回了最近的一篇名为《疾病控制中心》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一些当尸体开始运到太平间后，政府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但这些政府应该实施的防止因热浪而攀高的死亡率继续上升的方案，仍然闲置在他们的办公桌上。多诺霍对政府的紧急情况应对没有做出评价，也不想与政府产生任何冲突。他对于一向与其关系友好的市长突然质疑自己的权威性且对危机不够重视而感到惊讶。这位法医鉴定人是首批记录这一危机事件的人之一，即城市的雇员认可官方统计的高温死难者报告的同时，他们的老板却在请求忽视这一事实或者更改记录。“这些尸体是由芝加哥警察局送来的”，所以，他断言，“我们工作的前提是芝加哥市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面对政治上对他越来越大的压力，多诺霍保持了其圆通的态度。“市长有资格提出疑问，我们则乐意去核对这些数据……但这些人如果不是因为高温，是不会去世的……我认为我的标准是公正的，而且也是科学的。”他还总结道：“事实上，我们很有可能低估了死亡的人数。”<sup>20</sup>全国各地的法医鉴定人和高温灾难专家们最终都接受多诺霍的调查结

果,政府当他们开始评估状况时与疾控中心官员们所做的一样。但对公众来说,这种不公开的争论仅仅是学术性的,而且由于戴利的否认,法医鉴定人多诺霍的结论从未受到过媒体的关注。<sup>21</sup>市长不能控制新闻对于危机的报道,但市政厅的象征性权力,与接近新闻工作者且具有对于事件定位的组织能力,使戴利的职位成为公众和科学争论中参考的中心点。

从这点上来看,政府中一位高官回忆说,“市长为多诺霍感到头疼,他想要多诺霍闭嘴”,市长拒绝给法医局打电话和一同完成计划。伴随着多诺霍和建立一种可行的公共决策努力的争论让政府的官员们感到焦躁不安。卫生局一位资深官员在报告中说,“那次热浪是在我任期内唯一的一次闭门召开,并且注明禁止媒体参加的会议。我们在市政厅和办公室之间来回奔走,每时每刻都在开会。我们不得不出一种关于高温致死的符合公众意愿的说法。”即使出于这样的动机,但对于市长来说,在许多联邦专家支持法医鉴定人多诺霍的时候,想要继续批评死亡率的科学结论也是不太可能的。 174

一些官员重新叙述了当市长办公室意识到法医局所公布的高温致死数据的合法性时召开会议的情况:

我们当时正与疾控中心小组一起开会研究控制事态发展,我们刚开始不久,市长办公室就派了一位律师来为市长辩护。那个律师处在两难的境地,要么他支持市长,显然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做法,要么他就得辞职。当然,市长办公室对中暑致死的报告感到很愤怒,并且我告诉他,实际的死亡率比他听到的还要高。我向他解释非正常死亡的概念,然后他回答说:“所以,我们不能百分之百肯定这些人死于中暑。不可能一个一个地去证实的。他们也许都是被人杀害的,不是吗?”我说:“是的,我们不能得到每一例死亡的确切原因,但找不到其他可能出现的死亡原因,而且流行病学家也正是这么想的。不管怎样,我们都知道并没有上百个杀人者。”紧接

着,律师转身去问坐在房间里的疾控中心一位成员:“我们俩,谁说的是符合事实的?”她告诉律师,我是对的,这样会议也差不多结束了。当我回到卫生局去找委员时,她已经接到了市长办公室的电话,被告知没有人看过那些数字,所以任何人都不准说什么。

在周末,戴利发表声明,他“并不否认有人死亡”,他也承认如此密集的死亡事件必定与中暑有关,但他从未为其最开始的否认做公开的更正或公开官方统计的死亡数据。相反,他的下一步行动是为市政府做辩解,多诺霍提出的死亡“与高温有关”的说法表明死亡是理论上的,并且“所谓”与高温有关的死亡更多是气候所致,而非社会或政治因素所致。多诺霍从气象学的角度而不是从社会或政治上强调这个问题的决定因素。7月20日,星期四,在约翰·汉科克(John Hancock)中心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戴利发布了一项新的高温紧急计划(几乎与失败的那个计划没什么区别),将重点放在未来危机的防治上,对指责他忽视保护城市南区非裔居民的批评不屑一顾。他声称,在这次事件中,黑人和白人死亡的数量是相等的(但比例上不相同),并称赞自己和其他政府官员一样组织了一次有效的应急处理。他说:“我的委员,我的决定和城市雇员们都很出色,我没有收到任何负面的评价。”<sup>22</sup>

尽管市长对死难者表示哀悼,<sup>23</sup>但他认为“中暑致死”与自然灾难本身是由天气引起的,所以没有人能够对高温致死的事件负全责,也正如一位卫生局官员所说的,“政府不能保证不会出现这样的热浪天气”。<sup>24</sup>的确,没有人因为天气原因而责怪政府,只是通过强调自然原因然后得出灾难的不可控性的结论,戴利和芝加哥的其他政府官员却将这种因自然原因导致灾难的论调置于瞩目的地位,从而偏离了大众注意力,并推脱了自己在危机中的责任。常用的语言已经将热浪以及其他大自然的极端状况归为自然灾难,尽管这种分类看上去是无害的,但它还是为这个事件提供了很强烈的政治意义。根据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对分析框架的研究,政治学家德博拉·斯通(Debo-

rah Stone)解释道：“我们有两种解释世界的基本框架：一个是自然的，一个是社会的。在自然的世界中，我们把现象的发生理解为‘不是直接的、不可定位、不可引导、纯粹物理性的’……一个人无法确切地说出行为的所有内容，只能是偶然性的。这属于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范畴。从政治上看，如果一个人被指责不负责任，那么辞职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没有人能够对必然发生的事情负责。”<sup>25</sup>从文化上看，这种自然的视角也很好地解释官员们对危机的言论，因为一直以来，中暑致死被看成是被默认好的关系，并且被当作是那场灾难的科学性解释。

有一些批评者认为，热浪致死事件反映出某些政治上或社会上的失败，所以这次事件也反映了管理和控制方面的问题。他们有义务站出来反对已经为事件所定好的论调。中暑和能源比政治和贫穷更受政府的关注。应对热浪失败了，把责任则归咎于自然、主要的电力供应商——联邦爱迪生电力公司，如果可能的话，还包括死难者的家属。戴利继续断言，如果年长者的家人和邻居忽视自己帮助和关心的责任，政府所能做的也非常有限。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说：“我们必须呼吁所有年长者的家属给老人打电话，亲自过去看望自己的父母或亲戚。这是必须做的事。”这个言论激起了至少几家媒体的记者报道，戴利“将责任推给了老年死难者的家人”。

据一位高级助理说，市长“一直说着诸如‘你们要照看好自己的邻居，这才是问题所在，你们应该这样做’之类的话。他这么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将责备和责任泛化了……但我敢肯定的是，他这么做是出于让大家停止责难他为每个死难者负责的策略。”一些经历了断水、医院急救室对新病人拒收的城市南区的居民，感到被不公正地责怪了。一位热浪死难者的孙子告诉一家地方媒体记者：“我觉得家人的确有责任互相照看，但我也相信，政府应该对那些他们明知要独自居住应对危机的人们负责。”这个家庭的一个朋友也说：“这不仅仅是一个邻居的责任，政府也应对此负有责任。”

为避免这样的负面评价，市政府需要想办法来改变对其在事件中

作为的批评。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对市政部门的特定批评做出常规性及政治性的回应,现行的和政治性的评论观点一般是政府的有限性和个人及社区履行责任的必要性。随着时间的流逝,市政府也从中受益,因为市长这个职位在危机期间主导了新闻报道。一旦尸体被移出了太平间,奇怪的景象从大众的视野中渐渐消失,这场灾难也就失去了其意义。共和党的州参议员在7月26日星期三举行有关高温危机的听证,但记者们对调查失去了兴趣,地方报纸也只是将此类报道放在都市交通的版面上。对市长来说,责怪自然的不可抗力和爱迪生电力公司的做法带来的最大威胁来自一些芝加哥的市议员。他们要求市政理事会举行这场灾难的听证会。戴利政府内部的一次(调查死亡原因的)审查必定会成为头条新闻,这将带给城市地方领导们一场戏剧性一幕,即清晰地描绘出包括市长办公室在内的各种政府机构是如何在应对危机中失职的,但这等于是打开了对政府政策更为广泛批评的大门,包括这些情况,如城市政策支持那些体弱多病的老人,提供紧急医疗服务,组织社区警力计划。更为严重的是,批评将把注意力集中在许多大大超出人们视野范围的一连串城市问题上来。

我们并不能确信从热浪出现到8月1日的那个星期二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就在那天,市议会中曾要求举行灾难回应听证会的议员突然安静了许多。第四十四选区的伯纳德·汉森(Bernard Hansen)市议员曾要求市政委员会对灾难反应给出一个解释,但他后来却声称调查已经不必要了。“我已经不知道在现阶段,什么样的解释能够满足公众的需求”,他说:“所有的部门首长都被媒体询问过,还包括数量不少的公众质疑”这种观点上的转变却没有受到媒体的关注,电视没有报道,而是仅仅出现在《芝加哥论坛报》的都市版上,报纸的头条却是“喧闹市议员的法律追溯——热浪的详细调查”,这也表现了影响力的减弱。<sup>26</sup>

市议会对市政府各部门的领导进行一番调查后很清楚,戴利市长继续推行其计划,将注意力转移到提供电力的联邦爱迪生电力服务公司,这个电力公司在提供电力上出了故障,戴利曾指责其造成了大部分

的损失。毫无疑问的是,爱迪生公司在热浪袭击下瘫痪了。市政府的怂恿或多或少起了作用,芝加哥市民的确都指责电力公司在这么酷热的天气下让他们用不上空调、冰箱、电灯和电视。

热浪过后,伊利诺伊州商务部曾让其工作人员深入调查爱迪生公司存在的主要问题。州政府聘请了失效分析协会(Failure Analysis Associates)来指导这项研究,在1995年12月对公司在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做出了公开的谴责。在几天之内,戴利市长催促市议会来收集他们所听到的有关爱迪生公司的传闻。尽管市议员之前取消了对市政府的调查,因为其他的政党已经对政府机构做过审查,但他们的标准却突然改变了。12月14日星期四那天,由私营业主、居民、市议员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市理事会能源与环境委员会进行了五个小时的论证,以查证爱迪生公司所造成的损失。电力公司又一次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市政府则成为民众拥护的对象。

戴利市长没有去追查热浪中自己的行政管理团队的一些情况,而是组成了委员会来研究热浪的影响。加入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一些在芝加哥公共医疗领域的资深专家,有一个老年病学家、多名内科医生和一个气象学家,但是没有一个社会学家加入分析灾难产生的社会原因。市长助理曾至少邀请了一个芝加哥媒体作为代表参加,但是被媒体拒绝了。

这个调查委员会曾在1995年夏末及秋天多次召开会议,他们分成了几个小组,每个小组着重研究危机的不同方面。市长办公室在11月178  
公布了最终调查报告,但报告显示,参加者只是作为市长极端天气状况研究委员会的成员,并不是对热浪危机进行研究的委员会,而且从文件的标题上看不出任何与热浪有关的内容(图41)。这种委婉的语言使其在官方有了交待,但却没有引起公众的关注。类似的方法也有助于市政府通过灾难的公开声明,表面上揭示事件的原因,而隐瞒了事件的真相。<sup>27</sup>

事实上,最终报告是一份内容丰富但不连贯的文件,包括了对城市 1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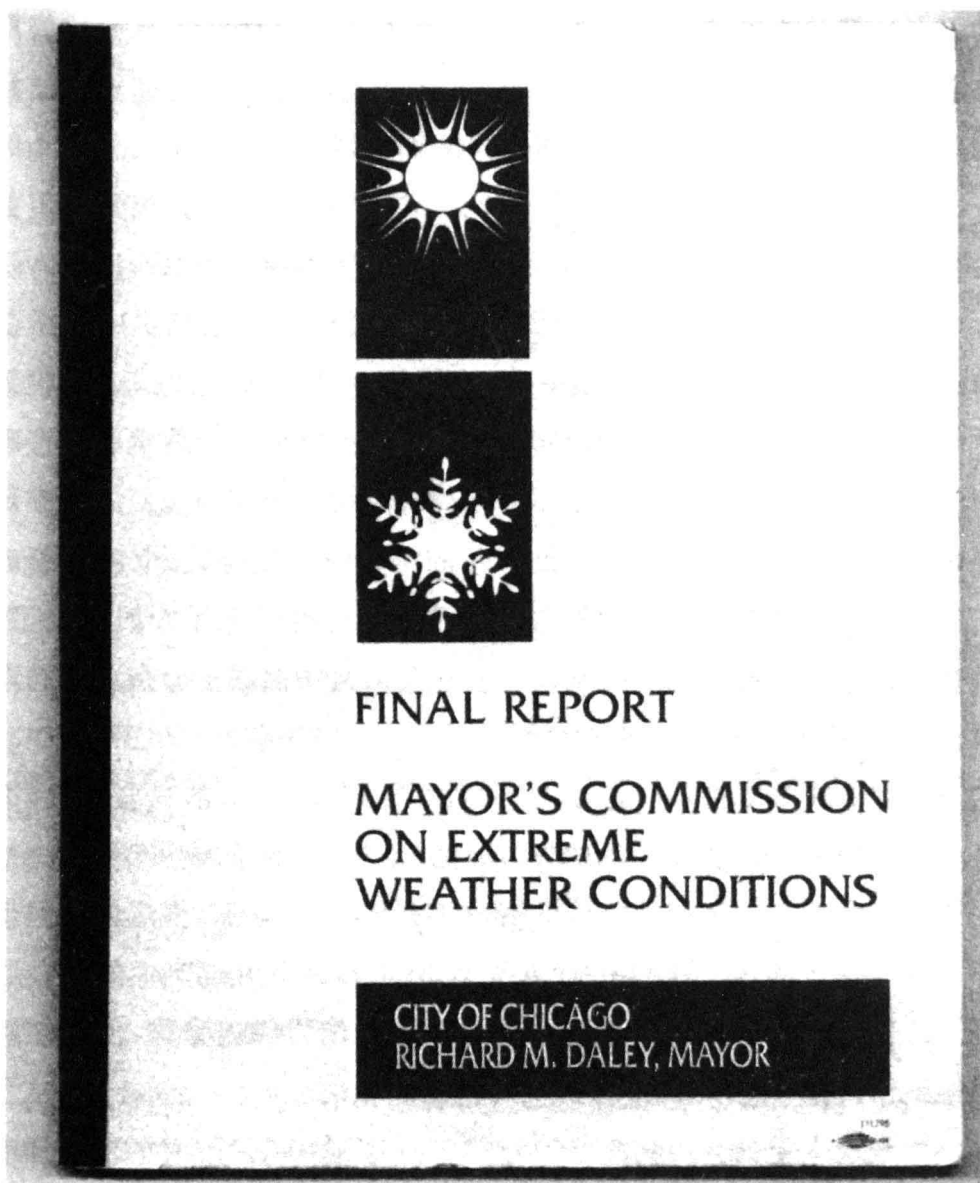


图 41 热浪：市长官方报告，文件的封面没有直接涉及热浪，这样，很少有记者和市民注意这一出版物。

机构和服务提供者有用的信息。它确认了热浪死难者，列举了个人体弱多病容易遭到热浪攻击的因素，但是报告中热浪死亡率的信息夸大了死亡人群的结构和热浪对不同群体的相对影响，从而掩盖而不是揭示灾难背后的社会群体结构因素。<sup>28</sup> 例如，市长办公室提供的行政简报表明，非裔美国人和白人的死亡人数相同，但是在报告文件中不重要的



位置(第12页)显示,美国非裔黑人的死亡概率比白人要高。<sup>29</sup>相似的是,一份仅有的相关研究的概要中就解释说,“几乎芝加哥的所有社区都受到了影响”,这好像是说,这个城市的几乎所有社区都被贫困或犯罪所影响,因此它掩盖了相邻区域死亡率的巨大差异。<sup>30</sup>

操纵和发布这项报告的市长办公室,很乐意用这份报告来进一步增强热浪可以用来开脱市政府为这场危机所应负责任的解释。行政部门简报将这次灾难界定为“一次特殊的气候事件”,并将城市定位为“这次热浪灾害最有价值的教训之一是政府自身不能单独处理这件事”,尽管没有人评论说它应该如此。<sup>31</sup>这些词汇——“政府不能单独处理这件事”、“气候灾难”和“特殊”——在讨论城市在这次事件中的角色问题时会成为反复出现的主题。而且,政府官员接受这次灾难的采访中使用的也恰恰是这些词汇。另外,这个报告宣称,体弱多病的芝加哥市民并没有要求政府的帮助。它还说,“提交给市长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指出,处于最危险境地的人也许最不希望或接受来自政府的帮助”,<sup>32</sup>委员会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方案,而是敦促个人和组织自我预防,要求非政府组织通过它们熟悉和信赖的网络来接触那些最孤立和有恐惧感的人们,这些网络包括社区组织、教会或犹太教堂、民族自治组织和其他建立在组织基础上的社区。<sup>33</sup>最后,市长办公室想运用这种报告发表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在引起争论的城市听证方面达成一致意见,不过,这变得越来越困难。

## 摆脱危机

180

从某些方面来看,芝加哥政府在对热浪所带来的潜在政治风险进行管理时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创造性。城市官员为界定和叙述这场灾难,使用了多种多样、辞藻华丽的政策主张。并且,在市长委员会关于恶劣气候状况的报告中,市长办公室为支持这场危机的观点建立公共档案拥有了强有力的组织机制。<sup>34</sup>当我考察政府对公共事件回应(这些

公共事件包括政府被指责纵容而导致了灾难的发生或是无力阻止灾难的发生)的历史时,很明显的是,市政府对热浪的反应遵从一种保持距离和拒绝的模式。20 世纪的历史已经使我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负责监管和治理邪恶的政府通过制定老于世故的政策拒绝或推卸责任。社会学家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的著作《国家的拒绝:知晓暴行和苦难》和一篇发表在《人权季刊》上的论文,证实了政府用来避免对公共事件负责的一系列特有手法。因此,怀疑政府侵犯人权和犯下了暴行。<sup>35</sup>科恩认为一般的拒绝方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文字拒绝:事实或事实的认知被拒绝。

解释拒绝:粗略的事实并没有被拒绝,然而,与其他人表面上看来的现象不同的是,他们给出不同的事实描述,真正发生的则是另外一回事。

暗中拒绝或拒负责任:将责任推给其他力量——有名的或无名的——意味着这与政府没有任何关系或超越了政府的控制。

拒绝声音或使其沉默:利用政治权威使不同意见的报道保持沉默。

现实语言拒绝或重新命名:使用委婉语言掩盖事件的意思等等,这些都是为掩饰、预防和用辩解的话语转移责任的日常伎俩。

公共记录的拒绝:利用政府的符号权力来界定政府对事实的看法。

模式拒绝:声称这个事件是特殊的和反常规的,是历史未曾有过的。<sup>36</sup>

尽管最严厉的批评指责芝加哥政府的“犯罪”是“公共政策的谋杀者,”但是几乎没有人认为,应该将对热浪灾难失败的管理导致的缓和冲突与直接自杀等同起来。然而,有意思的相似之处是,这不是与冲突的初始行为相关,而是与公共关系对忽视或拒绝批评的回应有关。

表 10 政府对热浪的反应

181

拒绝模式	芝加哥反应
文字拒绝	戴利告诉记者不要大肆渲染,并且质疑法医鉴定人的统计。
解释拒绝	戴利拒绝接受医学权威的发现和死亡报告的挑战: “你不能将任何事情都算在热浪身上。”
沉默	卫生局官员:“她已经接到了来自市长办公室的电话,命令说任何人不允许看那些数字,我们不允许说任何话。”
拒绝责任	市长委员会:“政府自身不能做所有事情”和“处于危险中的大多数人也许不希望或接受帮助”。市政府和市议会的替罪羊是联邦爱迪生公司,倾听公共物品提供者而不是城市居民的反应。市长委员会利用自然逻辑将热浪定性为“天气事件”。
批评受害者	阿尔瓦雷斯:我们讨论那些因为自我疏忽而死亡的人们。
委婉语言和重命名	戴利将关于热浪的报告取名为“市长委员会关于极端天气状况的最终报告”。
孤立(强调热浪的特殊性)	市长委员会将热浪定义为“特殊的天气事件”。威廉:我们习惯了炎热的夏天,但确实不习惯于如此史无前例的炎热天气。直到 1995 年这个夏天,我们才将炎热天气视为灾难。

资料来源:拒绝模式:科恩,2001。

正如表 10 所提到的,城市政府对灾难的反应包括了科恩所有拒绝策略列表中的主要因素。第一,戴利市长用语言加以拒绝,呼吁居民和记者不要对库克县法医局的死亡总体报告小题大做。第二,当太平间里的情景使得否认死亡变得不可能时,这个城市用另外的解释拒绝死亡率的猛增与炎热天气之间的关系。戴利的“你不能将所有事情都与炎热天气联系起来”的言论挑起了持续到今天的关于这场危机是否“真的存在”的争论。第三,在这个城市产生了几种说法,比如,其他党派

或力量,包括联邦爱迪生公司和自然界本身,都应当为这场危机负责。这种态度仍是官方对这场事件的解释。第四,一个主要官员责怪死难者,“一些人死亡是因为他们忽视了保护自己”。<sup>37</sup>另外一些人批评家庭成员,是因为他们离开了自己的亲人,才致其死亡的。第五,政府官员助理命令其他部门的领导者避而不谈他们发现的死亡总数,因而关闭了科学权威机构提供危机信息的大门。第六,市长办公室用了个委婉的标题:“最终报告:市长委员会与极端恶劣天气状况”,以此来转移人们对危机的评论和来自城市灾难的一般分析。第七,也就是最后,市政官员使用独特而奇怪的语言解释说,“我们习惯了炎热的夏天,我们不习惯于遇见真正特殊的炎热”,将这场灾难定义为“特殊的气候事件”,其目的在于表明,没有人有理由认为政府应当为炎热灾难做好准备。尽管这个逻辑不能解释政府已经开始设计,然后又放弃了自己的热浪应急方案,但它提出了政府的公共职能这一关键问题。<sup>38</sup>

在热浪期间,根据负责监控芝加哥公共卫生机构状况的城市雇员的报告,我们可以看出市政府轻视危机以及质疑死亡报告的做法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减弱了他们呼吁内部警告和启动应急方案的努力。下面是那段时期卫生局一位重要人物的说法:

当戴利拒绝首席法医鉴定人的报告时,他确定了接下来的六个月中这个城市应该做的所有事情。你应该知道,那里有九辆放着尸体的冷冻卡车停在太平间外面,一长串的警车运送着尸体。而且这个市长——美国第三大城市的市长——拒绝承认人们正在走向死亡,而后再拒绝承认这些死亡与热浪天气有关。可以想象一下,在热浪中,市长为稳定其他城市雇员和机构的民心的定位,以及他的这种定位是如何限制他们工作的能力的。一旦市长认为死亡率被高估了,其他政府雇员就不可能再说什么。我们被迫找其他所有途径来重新认识这个问题并讨论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市

长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将我们发现的事情完全公之于众。

这个城市的公共关系运动不仅仅影响到人们关于热浪危机的公共知识,而且改变了当地政府公布公共卫生灾难事件细节的组织能力,在这样的机构中,这场灾难纵容官员不负责任,否则它会有一个有效的回应。 183

当公共政策学者在解释媒体管理技术对当代公共部门管理者和机构来说是必要的时候,他们是十分正确的,但还没有证据证明良好的公共关系有助于建设更好的——不仅仅是更受欢迎的——政府。公共政策学者莫迪凯·李(Mordecai Lee)指出,“更有效的办法是,当代公共管理者们需要像企业家一样行事,尤其在政策过程的问题界定阶段”。<sup>39</sup>但是我们会问,对什么有效呢?在热浪期间,居于主导地位的芝加哥官员使用他们的公共关系技巧维护其机构正统性,以政策企业导向和问题界定工作为视角,以调和的方式替代城市的应急卫生反应的改善。与1979年的雪灾不同,市长和他的政府为热浪没有承担主要的政治后果责任,所以这样看来,政府在转移责任和为自己失误的处理方式和不作为做辩护这两方面的活动是非常有效的。公共治理允许城市管理机构来避免一场政治灾难,但不是用来协调一种充分的公共卫生预警机制。

在这个城市还有其他一些成功的公共关系活动的结果。在这场危机期间,政府采取了沉默的行为方式和政治拒绝的各种方式,阻止城市机构启动应急程序使要求解决的问题得到快速干预。如果市政府已经发出紧急警告,而非忽视死亡率报告的话,那么消防局会不会已经发布了联合援助应急系统的警告,要求更多的护理人员 and 消防队员呢?如果消防局动员了老人公寓和邻里关系计划(Senior Units and Neighborhood Relations),如果市长办公室没有要求机构隐瞒死亡统计数

字,那么卫生局会不会发出强烈呼吁呢?每一部门的政府雇员都相信,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如果他们是对的,热浪的这段历史将反映城市治理的危险,公共关系理应受到更多更严格的审查,但在热浪中,成功的公共关系活动的第二个结果是,它阻碍了社会和政治分析的进程,也就是本应有的对灾难的进一步探索调查没有了。通过公布忽视调查内容的委婉语气的热浪问题调查报告,市长办公室关闭而不是打开了讨论这场灾难重要性的大门。行政简报也表明,内容设计的目的看起来就是要转移人们对这次事件的政治责任的注意力。当市长委员会宣称,市民、家庭和社区组织需要引起重视并相互支持,特别是对体弱多病的人。“政府不能单独做这件事”这句话提出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市民免受热浪之苦。不过,这种花言巧语的态度掩盖了也许本应该成为这次危机最重要的相关性:

第一,市政府的社会保护系统被错误的配置破坏了。这种配置在项目计划与体弱多病公民(包括孤独生活而急需抢救的老年人群)面临的风险之间。

第二,当社会和政府不能对体弱多病的居民提供卫生和福利等基本保障的时候,它们控制之外的外部力量就会成为不可控制的危险。

第三,城市对付危机的公共关系活动对新闻报道热浪的范围产生了影响。一旦法医鉴定人宣布死亡数字,各地的媒体就派记者到芝加哥采访。如果这场灾难对芝加哥的市民和政府来说代表一场潜在危机的话,那么对于媒体来说,这次事件提供了一次接近公众的重要机会。灾难新闻通常被归为最流行的新闻内容,而且冷藏卡车和太平间里的尸体等一些独特的场景为记者们的描述提供了具有感染力的画面。市政府的政治运作、市长与首席法医鉴定人之间显现出来的冲突建立了暗中争斗的第二个来源,并因此引起记者们的注意。他们开始关注政府就死亡是否“确实是真的”的讨论,并从其他可能的题目和框架下转移出来。<sup>40</sup>

在理论上讲,记者们只扮演公共社会的信息传播者,而且这些信息

是他们有时间报道和有兴趣选择的关于当前事件的新闻。但在实际上,媒体采用了专业结构化过程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新闻记者利用他们的信息来源构建问题和事件。<sup>41</sup>因此,新闻采编室就成为城市信息生活的核心。和平时一样,热浪期间,在城市新闻机构内部所发生的一切,决定了人们认知或不认知他们周围的大灾难。这就是我们下一章将要讨论的芝加哥新闻采编室。



## 第五章 引人注目的城市： 灾难中的新闻机构和发言人

185 7月12日,星期三,芝加哥 ABC 电视台的“晚间新闻”节目以“一轮金黄的满月”作为开始。闷热难熬的城市居民如果误认为这是“第二个太阳”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已临近半夜,气温仍旧高于华氏 100 度,而且没有任何降低的迹象。这是一个“月光照耀夜晚的夏天烤炉”,主持人约翰·德鲁里(Jone Drury)如是说。当镜头展现出人们走在大街上时,“大地上,人们正在寻找各种可消暑的方式,炎热仍在继续,而且明天会是最热的一天”。在新闻桌和高负荷的各种制冷器一系列切换之后,镜头转向了城市南部马凯特公园的一幅生活场景。在那里,一群孩子正在水量很大的喷泉下嬉闹,以此来消暑。记者约翰·加西亚正站在他们面前直播这个城市为消暑所做的一切(图 42)。一开始屏幕上显示的是联邦爱迪生公司发电厂的残疾工人,接着是一张老年妇女的脸庞,她解释说,如果没有电,“她不得不去凉爽一点的地下室”。镜头随着加西亚的脚步进入了一家电器店,在那里穿着短裤、衬衫的焦虑的芝加哥人争着抢购空调,然后把这些笨重的东西搬到汽车里。“我受不了这热天气”,一位顾客告诉加西亚。商店的经理笑嘻嘻地对记者说,顾客并不是一两个,“买空调的人很多,看到这种情况我很高兴”。这家商店几小时前刚刚进了一批空调,现在一下子就卖了个精光。

加西亚的报道在继续,随着镜头移动,突然出现在屏幕上的是大白天身穿比基尼的游泳者们在北大街沙滩的全景,在那里足有 9 万城市居民下到水里,快乐享受着记者们所称的“天然空调”。接着是公众服  
186 务部委员丹尼尔·阿尔瓦雷斯的一组画面,他在芝加哥城市标志前坐

着,建议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最好待在家里;最后,画面又回到了演播室。气象学家杰里·塔夫脱(Jerry Taft)总结道,“非常令人吃惊”,他说,“温度远远超过了华氏 100 度——晚上 10 点钟仍是这么高的温度。事实上,对大多数人来说,明天会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天,大多数人都会感到十分难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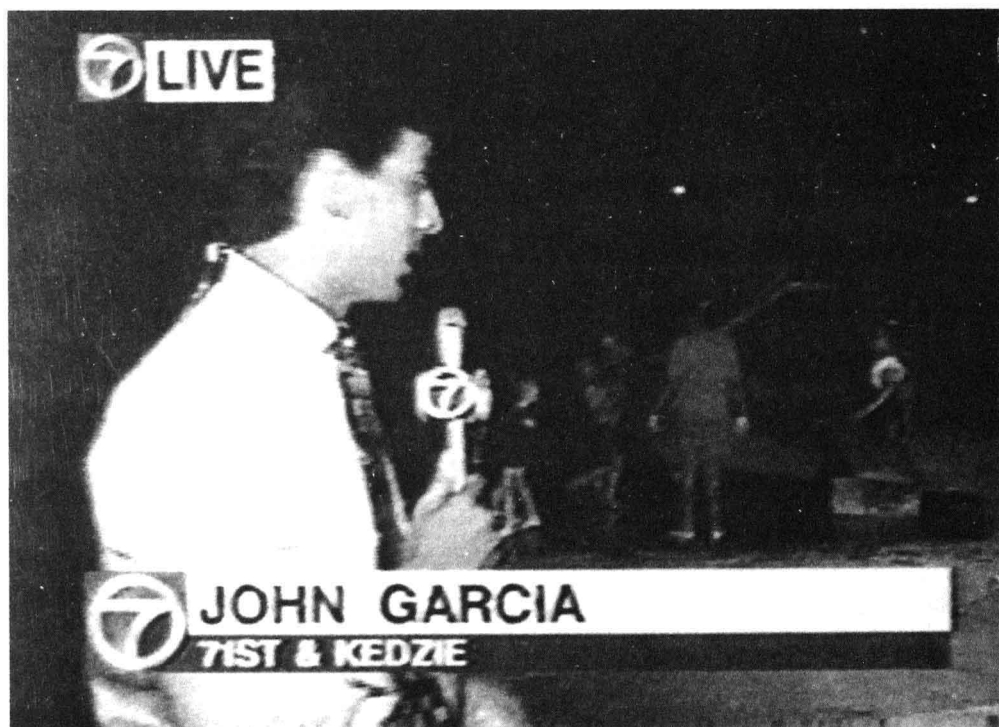


图 42 ABC 第 7 频道记者约翰·加西亚和在水中玩嬉的孩子打着招呼,持续攀升的(且在夜间也不断升高的)温度使得热浪期间的气候对人来说变得格外危险。资料来源:ABC7, WLS-TV 友情提供。

星期四与星期三晚上的节目相似。挂在雾蒙蒙天空中的太阳,还有像正在燃烧的橘黄色华氏 104 度的数字出现在屏幕上,制片人以这样的场景作为新闻的开始。德里又习惯地坐到主持人新闻桌前,先谈了谈刷新历史纪录的高温,并警告说,“热浪仍然没有结束”,镜头移到了一个挤有几十个孩子的公共游泳池,又跳到了几十个孩子在消防水龙头的水花中嬉戏的街景。大概有三千个消防水龙头被非法打开。年轻人在水中嬉戏的场景已经成为热浪笼罩的象征(图 43)。这一周

的节目从来没有出现炎热中死去的人们、精疲力竭的工人、城市官员和天气预报图等在内的画面。<sup>1</sup>



图 43 热浪期间标准的画面：青年人正在打开的水龙头喷出的水花中嬉戏打闹。资料来源：ABC7, WLS-TV 友情提供。

187 “因为天气热”，德鲁里宣称，“出现了严重的缺水问题，有时一些社区会一点儿水也没有。”当通讯员戴安·伯恩斯(Diann Burns)在报道中说，“芝加哥的热浪消失的时候，新闻机构变得忧郁了。”首席法医鉴定人埃德蒙·R.多诺霍说，两个男人，一个86岁，一个32岁，是热浪最初的受害者；一家南部医院披露，有一男性患者在恶劣气候条件下体温达到华氏108度。接下来的焦点是伯恩斯介绍记者保罗·迈因克(Paul Meincke)，他播放了在南部相邻的两个地方，一群被激怒的美国黑人居民的片段。那里打开的消防栓导致的水压损失足以阻止水供应，但是供水部门没有抢修。公寓干涸的水龙头和流满水的街道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芝加哥市民等待灾情缓解的时候，国内和国际新闻媒体跟进报

道这个事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派出记者马克·莱夫(Mark Leff)去报道中西部地区动物和人的死亡数量,并且追踪热浪风暴到东部海岸。在全美公共广播网的“关注天下”节目中,芝加哥土生土长的通讯记者艾拉·格拉斯(Ira Glass)报道了天气炎热时的一则故事,两个希望在户外睡觉的男人在警察的强制命令、乞讨者的打搅和蚊虫叮咬的疼痛之下被迫睡到屋里。

188

当天气环境变得更加危险时,两家主要的芝加哥报纸——《芝加哥论坛报》和《芝加哥太阳时报》,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来掩盖或重构这则故事。当首席法医鉴定人宣布死亡率时,记者们的制作团队改变了态度。热浪从一个关于天气的简单新闻事件转变成一个需要广泛报道的耸人听闻的灾难,这有不少原始材料可以证明。热浪死难者的尸体不断被运送到库克县太平间,而且警察每小时都在增派运送尸体的人手;政治官员开始与民众见面,并且市政府开始召开新闻发布会来回应抱怨与不满;联邦爱迪生公司生产能力在下降,成千上万的居民和商业机构都



图 44 眺望城市。资料来源:ABC7, WLS-TV 友情提供。

陷入了困境；医院对需要寻求紧急救助的病人关上了大门，救护车正在围着市区转圈以寻找空的床位；城市工人正在用水管为小孩儿冲凉；所有的路都被用上了。记者们使热浪成为一个公共问题并得到民众的广泛关注(图 44)。

## 189 新闻和灾难

正如市政府机构一样，新闻已经就报道灾难形成了一定的标准化工作流程，所以编辑一收到发生在他们地区的突发事件的报告，就启动进行广泛报道的机制。<sup>2</sup>在灾难期间，政府经常依靠当地主流媒体的报道为市民提供重要信息，包括来自相关渠道的公共卫生意见和建议。媒体的公共服务义务是受到限制的，实际上，媒体依据它们自己的专业标准和兴趣组织它们的报道。灾难事件是新闻界报道灾害时最受欢迎的方式，而且美国新闻机构也因报道此类事件而声名鹊起。<sup>3</sup>但是，像热浪这样的事件，对新闻工作者们而言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这些事件加剧了信息性和娱乐性、分析性和轰动性、解释性和戏剧性等特性的紧张关系，而这些特性在新闻文化中已变得十分抢眼。

按照传媒社会学一个非常有影响的理论，像热浪这类事件新闻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打破了通过记者和依靠日常建构新闻主要来源的常规，因此在那些使这一事件成为新闻的人，以及将要为某一事件负责任的党派之间，存在着不一致。在他们的文章中，哈维·莫罗奇(Harvey Molotch)和 玛丽琳·莱斯特(Marilyn Lester)认为，“作为有目的行为的新闻”，不寻常的事件打破了惯常的社会规范，不仅可能导致各个党派为了界定事件而相互竞争，而且能揭发爆料，在其他方面故意制造困惑，因为“事件的突然性和它不可预期的自然性意味着事件的制造者开始时没有准备，因而有影响力的人能够给出不协调乃至相互矛盾的解释”。<sup>4</sup>莫罗奇和莱斯特解释，不是所有的事件都能变成公共事件，但是那些有严重后果的新闻报道有可能引起广泛关注，这些关注是

难以预料的。用这种方式，这样的新闻事件就非常值得作为关键性历史现象来加以分析和考察。

1995年，芝加哥的热浪作为突发新闻事件符合莫罗奇和莱斯特的  
大部分理论准则。灾难是在不可预期的情况下发生的，几百个市民死亡，它很快成为当地甚至全国的主要新闻故事。主要政府官员还没有为这场危机做好准备，事实上，他们在发出不合时宜的抱怨。一些不为人所知的组织和边缘化的一些政客们试图利用这次危机推进他们参与公共政策的议程；在热浪危机平息之后，城市官员为恢复秩序做了持续努力，将他们对事件的分析作为公共档案记录保存下来。不过，这次危机中的一些要素并不符合莫罗奇和莱斯特所做出的理论预测。尽管“内部戏剧性、突发性和事件的普遍性”等特性的存在使拒绝承认这些事实变得非常困难，政治官员仍旧对这些死亡是否是“真实的”持怀疑的态度，这引发了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关于这场危机影响的争论。尽管“普遍的不重要组织可以更容易地在短时间界定的过程中摇摆不定”，通过那些未达成共识的事件，在热浪期间边缘化的政客或社区组织，诸如都市老人在行动（Metro Seniors in Action）和黑人政治赋权力量（The Force For Black Political Empowerment），也几乎没有得到主流媒体的关注。而且，如果公共机构对使热浪真正成为一个合适的晴雨表的条件保持沉默的话，这次事件就没有对城市的日常功能提供公共舆论。而这个城市发生的事故和灾难本身对于事件结构过程的经验研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sup>5</sup>人们对关于这场致命危机背后的社会或政治因素远没有进行严肃的调查或开展公共讨论。大部分报告，都将热浪界定为自然灾害和社会热点，一个小说式的、能引起人们广泛兴趣的故事，但不是应急或应急关注的披露者。

## 新闻是什么

热浪期间，面对各种各样的新闻故事来源，哪些才是新闻记者和编



辑们专业责任应该做的？根据新闻传媒一般理论，尤其是那些新闻记者自己发展的理论，“记者的真正本质是为公众寻找有用信息。”<sup>6</sup>杰伊·罗森(Jay Rosen)认为，记者“日常的智慧告诉我们，关于大家都认为比较重要的即时信息；他们用喜闻乐见的故事服务我们并使我们的认识提高；他们在高端和权威面前作为我们的代言人和监督者，提出尖锐的问题并要求快速回答；他们揭发错误行为和公共资源的滥用；他们通过像如此制作的意见栏为我们提供一系列的观点”。<sup>7</sup>实际上，新闻观众经常要求记者做出更多——也许更少——除了为他们提供信息，这些信息能够帮助他们做一个负责任的市民。

191 在报道热浪公共事件时，记者们自己不认同他们应该承担的各种职责。危机期间，当地的新闻采编室成了编辑们争论之地。他们一些人想利用人们感兴趣的故事吸引大众的眼球，另一些人则想以此来制作更多的独家报道。尽管争论双方依然各执一词，但是在新闻报道时加入更多权威的新闻素材，如感人的可视图片、煽情的标题以及更生动的故事情节上的观点却十分一致，并且这的确对报道的内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读者希望媒体能够通过展现鲜活的世界来取悦他们。正如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所言，“我们已经把让世界变得有意义的职责由上帝转到新闻工作者身上”，<sup>8</sup>而且大部分新闻组织确实扮演着这个角色。然而，主要的新闻机构，尤其是那些知名的和在社会上享有盛誉得过奖的报纸，如《芝加哥论坛报》则一直在遵守新闻行业严格、严肃报道的伦理准则。平衡市场对新奇性、戏剧性和直观性报道的需求同严格制作有质量的新闻的关系，是新闻从业人员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sup>9</sup>

我们已经看到了，当地的官员是怎样设法歪曲热浪危机，从而阻碍人们将视线转向社会和政治因素的。这一章分析了记者们，尤其是那些彻底的、多角度、对灾难进行全面报道，并且以维持高标准而闻名的新闻机构中的记者们是怎样致力于刻画灾难报道的符号性的。<sup>10</sup>研究社会问题的学者将重点放在记者是如何告诉他们的听众事实和真相



的，却很少分析记者和编辑在制作报道时的情形。这种研究方法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与介绍记者是如何处理类似情形相比，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做的更多的工作就是证明新闻机构扭曲了报道的真相或者疏忽了报道的关键问题；另一方面，对记者们行为参差不齐的现状不加分别。研究社会问题的学者趋向于将在同一个州的媒体，甚至是个别的新闻公司以同样的方式混为一谈，将媒体看作一个整体性的角色，而非一系列不同的机构。这一章以热浪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为开端，接下来并不是思考记者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制作报道的原因，而是把关注的焦点转向那些通过文化产品精心的制作过程将灾难转化为媒体化的公共事件的编辑部和新闻制作人。

尽管芝加哥的政治官员在小心翼翼地以人们可以接受的方式去处理热浪灾难，并且利用手中的权力粗暴地去干预报道。但是，记者对热浪的新闻报道并不仅仅是“权力的运用控制了真相的表达”。<sup>11</sup> 媒体批评家经常把主要的媒体看作统治阶层观点的传达者，他们更多地从新闻机构分层化的制度性报道程序和技术所折射出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其反映强势角色和事件制造者的观点出发。<sup>12</sup> 例如，当热浪侵袭芝加哥时，新闻小组就开始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挖掘典型和选取新闻的工作流程，决定哪件事有价值，选择他们应该报道的模式、配置记者、摄影师和版面编辑。通常情况下，记者和编辑们通过一个由不同的媒体和媒体组织建构起来的可信的内部网络，会很快了解其他媒体的相关报道。在开始报道时，记者必须对信息进行选择，提供专家的评论和观点，以充实或指导报道。编辑必须决定将报道放到报纸或广播的什么位置，进而确定热浪危机是应该受到人们高度关注，还是远离人们的视线。<sup>13</sup> 主编和版面编辑必须制作报纸头条和报道标题，以吸引那些注意力从不确定的读者。当热浪平息、死亡的人数得到清点，新闻组织又不得不去判定事件的严重性和决定是否应该制作或者发表一个回顾性报道。通过对记者象征性地将热浪作为公共事件来报道的社会化和组织化过程，我们可以确定影响灾难报道的外源性压力和内生性制约机制。

随着热浪的肆虐,当地和国家的新闻公司制作了成百上千的有关灾难的报道,其中芝加哥的报纸深入剖析了事件的真相和原因,并且将最丰富的编辑内容和观点整合在他们的版面上。与当地的电视相比,印刷媒体为重要问题的报道提供了更广阔、更多样化的视角,因此,报纸提供更多深度、多样性和详尽的报道就不足为奇了。<sup>14</sup> 报纸制作了比电视和广播更多内容的报道,但是多重组织结构使得编辑在形式上往往产生相互矛盾的观点或见解,以至于其他媒体的管理者很难确定它的可靠性。据初步统计,《芝加哥论坛报》在灾难发生前后共发表了 119 篇新闻报道,13 篇社论和来信,11 篇新闻摘要;《芝加哥太阳时报》发表了 99 篇新闻报道,12 篇新闻摘要,14 篇社论和来信,以及大约 30 篇相关的报道和评论。没有其他的新闻机构在调查事实、致力于事件报道的数量上能与它们相提并论。

表 11 对 1995 年 7 月—1996 年 7 月间《芝加哥论坛报》热浪报道的内容分析

构成	数量		
	正文	标题	图片
死者和太平间	58	52	35
政府的反应	37	28	14
个人及其应对策略	36	34	45
气象状况	29	50	30
政治丑闻和对死亡的争论	26	24	4
老龄化	10	6	12
孤独	9	8	4
贫困	3	2	—
犯罪和安全	2	2	—
种族问题	2	2	—

尽管报纸在新闻报道时有深度和广度,但是为编排好的版面而关注特定的地点、问题和图片的同时,也会使其他一些东西被边缘化了。正如表 11 和表 12 对报纸内容的分析中看到的,<sup>15</sup> 当地的主要报纸对热浪报道强调了死者和库克县太平间的场景;自然或者气象状况;个人

保持凉爽所采取的策略;整个城市对健康危机的粉饰和模式化的反应。有关死者尸体、太平间、用水消暑的照片尤其丰富。内容分析同时也表明,当地的新闻组织没有重视造成灾难影响的社会背景。只有相当少的报纸和图片关注老龄化、贫困、孤独、犯罪和恐惧,以及死亡率、发病率、提供关爱渠道等问题。

表 12 对 1995 年 7 月—1996 年 7 月间《芝加哥太阳时报》热浪报道的内容分析

构成	数量	正文	标题	图片
死者和太平间		37	51	23
政府的反应		38	36	10
个人及其应对策略		42	41	19
气象状况		23	35	9
政治丑闻和对死亡的争论		21	20	2
老龄化		11	8	7
孤独		8	8	4
贫困		4	3	3
犯罪和安全		2	2	—
种族问题		0	0	—

通过分析新闻内容和图片大致的分布,并不意味着报纸忽视了对灾难的社会病因进行深入的报道。事实上,尽管在自然灾难和高死亡率这个主导框架下,《芝加哥论坛报》和《芝加哥太阳时报》还是有一些人竭力做了因年老孤独致死、一些地区特别脆弱的邻里环境、尚未规范化的城市应急体系等问题的深度报道。但是这些只是全部报道的边缘部分,在发表前就被丢弃不用或者发表在少数读者能看到的内刊上。对报纸文章的内容分析有助于了解热浪报道的经济原因,但是想知道当地新闻机构为什么和怎样以不顾其他代价而报道所关注的内容,则要把注意力从新闻报道本身转向产生报道的编辑室。作为城市中最受尊敬和最具知名度的新闻机构——《芝加哥论坛报》,在对热浪进行最

全面、严肃的报道这方面无疑最具说服力。《芝加哥论坛报》对热浪的报道产生于确凿的记录和在灾难现场的记者和编辑的实地访谈,为当时的新闻报道把灾难转化为生动的场景和公众事件打开了一扇窗户。

## 发现灾难

7月15日,周六早上,经验丰富的记者乔治·帕帕约翰的办公桌上堆满了《芝加哥论坛报》(都市版)编辑准备的材料。<sup>16</sup>按照记者的判断标准,芝加哥暑假时值得报道的事件很少。当地官员很少召开周末的新闻发布会,许多商业活动停止,那些为新闻组织提供过信息的公共关系团队也放慢了工作的步伐。<sup>17</sup>正如乔治·帕帕约翰所解释的,“总的来说,周六的转变是相当平静的一次。很明显,政府在保持缄默;报社已经花了一周的时间制作它的重头戏(周末版),报道是平常你必须面对的事,但是这就是你的工作,你要编辑、充实和更新许多新闻和故事”。

乔治·帕帕约翰按照制作新闻报道的方式开始了这一天的工作。他密切关注热浪灾难,在家观看相关的电视新闻报道,开车去工作的途中收听广播,在办公室查看当天的报纸,浏览国家和城市新闻局发来的报道,选取一大堆的内容传真给《芝加哥论坛报》,同报纸的部门主管讨论,收听语音信箱,与记者同行聊天。帕帕约翰很快开始察觉到许多不同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

我在上班的路上,听到广播里说……法医局正在调查他们认为可能与热浪相关的一些死亡数字……我们依然处在恐怖中,的确太热了,这意味着什么?……但是根据我所听到的广播,看起来我们应该确信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些东西,在确信我们手里没有主要的新闻报道之前,我们不应该再追踪报道别的任何事情。接下

来,另一种要做的例行的事情是打开电脑,了解市新闻局的传真信息,<sup>18</sup>他们是当地美联社 AP(The Associated Press)的附属机构。<sup>19</sup>他们发一些信息给新闻局。你每天看这些信息。他们每天两次在更新法医鉴定人调查的死者名单,这一普通的名单在不同的地方可能会有五到十个名字,但是今天不是薄薄的而是厚厚的名单,包括整整三大本的相册……这让我觉得要完全改变报道的方式了……在那之后,我们开始了实地报道。

一个由郊区转移到市区报道的记者卢·卡洛佐(Lou Carlozo)正要开始周六下午的工作,在帕帕约翰决定改变热浪报道焦点的时候,他正在编辑室。

周六的时候我正在工作,乔治·帕帕约翰在浏览报道。他摇着头似乎在说,“一些东西是错的”,所有死者都有背景。“我在想是不是我们已经知道了灾难的罪魁祸首。是因为炎热,已经很热了。如果这些人被送进停尸间,谁知道还有多少除此之外等待被 196  
发现的人呢?”因此,很突然的……他让一些人去汽车堆里,我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说我想让你去那些地方,找出任何你能看到的东西,同尽可能多的人聊天,向那些人请教。

《芝加哥论坛报》是第一家不仅仅把热浪看作一个气象事件在报纸的天气版面上简单介绍的报纸。7月12日,周三,这一天,芝加哥的气温刷新了当地的最高纪录,温度如此之高以致影响到人们正常的生活,报纸通常会发表相关的报道。《芝加哥论坛报》的编辑也受此影响把中暑作为头条标题。在周四出版的报纸上,两名记者对居民对付中暑的策略和来芝加哥的游客以及外地人对炎热的访谈进行了简单叙述。这篇文章恳求人们不要对自己的不舒服抱怨。头条的标题是“如果你能忍受炎热,你一定是外地人”,在它下面是一张图片,一个公园的工作人

员正在用水管浇自己的身体,文章开始写道,“不要再抱怨个没完了,气温上升到周三的华氏 97 度,平了历史记录又能怎么样?……尽管好几万的芝加哥当地居民可能经历了预计一周以来热浪侵袭的第一天,但对他们许多人来说,仅仅是件平常不过的事情”。<sup>20</sup> 为了继续将热浪事件设计成带有幽默的特色,《芝加哥论坛报》编辑派了一个记者去调查当地的空调情况,这与当地和国家的电视新闻报道的主题相吻合,这篇文章同样被安排在第一版,但是,周五,当帕帕约翰和其他的编辑得到了预计死亡数据时,他们开始意识到,必须改变报道的框架,做一些实际的报道。从那时起到城市开始降温,《芝加哥论坛报》一直把热浪当成首选的主题。

乔治·帕帕约翰已经有足够能力替代编辑去建造一个“在办公桌旁”获得新闻的体系,一种同他作为记者参与报道类似的程序。他主要依赖其他的新闻媒介形成报道的情节,电台记者在快速浏览无线电故事的同时,进入直播间报道,能够快速制作和发布最新的有影响的新闻,因而广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这些广播不需要任何制作工作或时间,尽管这些报道都是简单的描述,但报纸的记者可以利用他们的观点作为更完善报道的出发点。电视新闻报道,尤其芝加哥和许多其他的城市有当地 24 小时新闻的电视台,经常提供这一事件的第一手的图片新闻,然而,他们很少有超过几分钟的报道,时间比较短。<sup>21</sup> 其他的报纸也提出对事件报道的不同角度,但是这些角度是《芝加哥论坛报》的成员可能已经涉及或者已经考虑过的。在新闻界爆发了一天 24 小时新闻报道风暴的时代,突然,报纸也开始在每天的新闻报道中挖掘特殊的内容。

编辑部本身深受其他的主流新闻媒体的影响。部分原因在于主要媒体的新闻制作者使用了传统的报道模式和主题,例如,城市居民寻找空调的报道和孩子们在水里玩嬉冲凉的情景,都是在他们同事的报道中所能经常读到、看到和听到的。他们把一系列常规故事内在化了,在组织编辑工作的参数中,这些故事容易被复制。<sup>22</sup> 记者们经历的正式和

非正式的训练只是他们由社会化到专业化的一部分。像其他职业的人员一样，他们在连续的工作中得到锻炼，当他们阅读、评论、模仿同行的作品时，在新闻报道的方法上也会不断加强。尽管记者们为公众制作了大量的报道，但他们又是最重要和最有责任心的一个群体；事实上，一些记者认为，同行是他们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和批评者。确实如此，正如曼纽尔·卡斯特指出的，当代社会的大部分成员“与媒体在一起并且依赖媒体，”在媒体中生存的日报记者们形成了一种亚文化和“恶性的信息循环”，确定其他记者们感兴趣问题的重要性，而忽视了那些可以选择的能被认为有新闻价值的想法。<sup>23</sup>

例如，《芝加哥论坛报》在热浪早期报道关注点的转变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收听广播和阅读其他报纸使帕帕约翰认识到，随着热浪报道从天气转向具有轰动性和持续性特征的大灾难报道，《芝加哥论坛报》不得不改变报道策略，并在这件事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关于空调的特写依然出现在周日的报道中，正如女性时尚版面引导人们如何在炎热中保持凉爽时的头条新闻所写的“蒸汽季节最热的时候，让人汗流浹背！但是炎热挡不住你的时尚。这里教你怎样去避免衣装憔悴和化妆褪色”。但是更多的日益增加的死亡人数统计的报道，却从来没有占据过头版头条。

7月15日，周六下午，编辑已经决定通过派记者去采访法医局和那些死亡率下降的地区，包括由办公室公布的死亡率记录。但现在的问题在于，报纸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只有很少的新闻，许多周末工作的成员没有对特大事件进行恰当编辑报道的经验和技能。正如一个有经验的记者解释的那样，“你必须理解《芝加哥论坛报》周末版是怎样运作的。确实没有很多人在那里，而且许多周末在那里值班的人都是年轻的家伙。我们有太多的‘新人’（年轻的记者只签雇佣期一年的合同）和实习生，他们能力素质参差不齐，而且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个城市”。

在周末，报道灾难时机的选择影响了《芝加哥论坛报》将其作为头



条新闻报道的方式。在周日,工作人员人手很紧,因为大多数有经验的编辑和作者正在参加一年一度的聚餐会。这是报社里的每个人都认识到灾难严重性的一天。然而,作为包括周末在内的日常程序,值班的编辑有一个记者和编辑的名单,如果需要这些人员参与到轰动性新闻的报道,可以打电话通知他们。在热浪危机期间,他们没有制作相关报道的报纸。

辛迪·史克鲁德是《芝加哥论坛报》自然科学版的主要撰稿人之一,7月她正忙于一个特殊的项目,因而在那段时间并没有参与日报的制作过程。周六正要去办公室忙自己事的时候,她被要求协助参与热浪的报道。编辑已经决定从医学和环境的视角报道,他们需要一些资深的自然科学家来审看他们的报道。辛迪·史克鲁德回忆道:

我正要走出房门的时候,我的电话响了,是都市版编辑打来的。他问我是否能来市区帮助他们协调热浪的报道。他说,你也知道,我们这里的人大部分是只有一年工作经历的新人,他们对如何判断事情发展缺乏经验,以至于他们很少关注这些事。当我去报社的那天,我跟那些接电话的人聊天了解他们在做什么。晚上,我们接到了记者们从不同地方发回的不同种类的相互矛盾的报道。我开始关注这件事,因此,我又打了几个电话。第一篇报道中关于死亡报道的导向只是非正式的一个特征。但是随着夜幕降临,越来越多的死者的发现让那篇文章几乎完全不合适了。我开始打更多的电话,我突然意识到,我们手里已经掌握了大量真实的死亡人数。这让我决心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参与到热浪的报道中来。

199

在聚餐会上,编辑们一直在担忧报纸对灾难的报道。对法医局的报道和市政厅发布对验尸报告表现出的怀疑态度的声明都让他们非常气愤。这种情景引发了不同编辑之间的矛盾。他们中许多人赞成戴利

市长开始认为死亡率被高估的言论，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个城市正在遭受真正的灾难。

新闻机构拥有大量的编辑和报道团队，严格的工作分工，却并没有整体角色的作用，而在这一制度化领域的参与者以集体和关系的方式进行运作。在《芝加哥论坛报》内部，不同的编辑和记者团队在日常的工作中是竞争的关系。在头版焦点内容和大字标题上的竞争对他们工作的成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任何新闻机构中编辑的内容和观点之间是有严格的界限区分的。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事实上，“在记者或相同压力的报纸、民意调查和类似的评论员的简短评论之间的竞争是相同的……比较一下新闻周刊杂志和半月刊的杂志，两者报道的标题几乎相同”。新闻制作是一个集体过程，“记者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相似之处，职业方面自然不例外，同样也表现在社会根源和受教育方面……遇到一些日常争论的东西总会用相同的视角去对待。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制作思想的封闭”。<sup>24</sup>可是在这些限制条件的约束下，记者在新闻报道和排版位置，以及在制作原创和不同的报道，专家的压力方面都经历了真实而激烈的争论。记者和编辑就报道的形式和内容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而忽视了主流媒体报道协调社会精英阶层的高层权力和既得利益之间关系的争执。许多记者，包括数量增长较快的杰出记者，认为这一领域内特有的专业网络和制度化结构使得新闻制作被同化，并且还会使公共空间的活力受到限制。<sup>25</sup>

在热浪报道中，芝加哥几个新闻机构中的编辑、记者和制作人最初 200 的辩论显而易见是很敏锐的。当时正在为当地的电视台、报业集团和广播站报道危机情况的气象学家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回忆了他同当地电视台制片人之间的冲突，该冲突涉及报道到底应该是人们感兴趣的故事还是公共卫生警示和新闻故事：

在温度达到华氏 106 度时的最糟糕的那天，我和制片主任赶

到制作室,我们都是提前行动的那类人,在那里我们谈到,“这将是一个影响很大的报道。人们正面临死亡的威胁。这一点你必须特别深刻地指出,在这天的其他时间我们应该和将要做些什么?是打断正常的节目顺序拉响热浪警报吗?”我确信在下午新闻开始,我们已经打乱了正常的节目单。我们插入了大量的关于极端炎热和由此而带来的严重威胁的报道。但是我依然记得,制片主任径直走过来告诉我们,她想做一个美国各地的现场报道以证明许多地区比芝加哥要热,她不停地说要同凤凰城的气象学家做一个现场报道……你知道,把热浪说成是对生命的困扰,这种方式也太矫揉造作了。“嗨,我们让争论的气象专家去决定哪里的人最热,好吗?”……我不停地在同她争辩并且告诉她,“你忽略了报道的要点。我们可能已经有很多人在医院里,我们可能已经有很多人在市政厅”。到最后却转化成编辑室里的一场争吵比赛。她大声尖叫道:“你不懂,你根本不懂!这里是电视台!”我说:“我确实懂,我明白,芝加哥现在正处在危险之中。我们的插播报道是收视率最高的,很多人将会死去,这才是你要报道的东西。”

对制片人在新闻之前腾出时间来发布公众服务通告,以及把天气预报放在新闻报道开始的决定,道格拉斯感到非常满意。在他看来,在危险的背景下,以人们感兴趣的结构和特色来报道有些不合时宜,但是电视节目将轻松的照片和严肃的主题生硬地掺杂在一起,从而使报道让人感到兴奋和新鲜。负责报道的制片人认为,人们感兴趣的报道才能产生一个好的电视节目,制作好的新闻。

早期关于死亡率上升的报道证实了大多数新闻机构开始转变了它们的报道方向,但是市长对法医鉴定人的调查报告公开表示怀疑,对它们的决定又产生了另一种影响。在《芝加哥论坛报》,政府对中暑引起死亡的处理措施进行了批评,加上法医鉴定人埃德蒙·多诺霍对事件原因的报告,这说服了一些报社的编辑。根据保罗·温加滕(Paul

Weingarten)的说法,都市版编辑,他的同事,最初忽视了中暑导致死亡的报告:“如果按一般情况来说,这开始可能是有一点不清晰的,如果可以重新定义的话,也许这确实是一起灾难事件,你知道,以前芝加哥也是非常热,而且我们大家都说,难道一个热天能造成这么多人死亡吗?”史克鲁德甚至从她的办公室感受到了紧张的气氛。“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编辑中出现了一些分歧。这里到底怎么了?这是真的吗?有更高的死亡率或更多人来关注这件事吗?这就是不断提出的疑问。正常发生的死亡事件也要归咎于中暑吗?那些本可以多活一周或者几天的人们病得怎么样?”记者格雷姆·杰林斯基解释说,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到底是事件引发了报道,还是报道在推动事件的发展。几乎一开始中暑问题就成了老生常谈。[他以主持人的声音在说话]。‘中暑’是真实存在的事情,并且对很多人来说都是真实的,然而这看起来却并不真实。它仅仅是看起来,看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成立了。有些编辑坚持认为这是比事实本身更严重的事,还有一些人在担忧人们把这事扯远了。你知道,那有点儿过火了”。杰林斯基的话表示了在把中暑作为一个公共事件的问题中,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角色。但是他们也表明,把灾难转化成新闻现场的过程迷惑了那些负责弄清事件真相的记者们。

## 谁的新闻? 官方来源和记者报道惯例

一些迷惑事件来源于新闻工作者的报道,一般的记者不得不报道大范围的事件,引发问题是因为他们大部分人不可能掌握专门技术。关键的信息来源,特别是那些雇用公关职业者来维护和管理媒体利益的当地政府官员和大型组织,在帮助新闻记者获得政治事件内部消息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能因此左右报道中的内容和事实。<sup>26</sup>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拥有与公众和媒体打交道的技巧,但是通晓媒体官方消息,常常有助于增进与提升那些在困境中的记者们对官方的信任度。正如新闻传播学者菲莉丝·卡尼斯(Phyllis Kaniss)所记述

的,记者有时会“很不情愿去批评过去曾提供过消息的人士,因为他们担心这样会疏远提供消息者,并阻碍信息的流动”。<sup>27</sup>他们培养这样的共赢关系是出于对调查对象的责任、依赖和信任。从他们私人的职业联系的角度出发,记者会学习理解并抓住共鸣点,尤其当调查对象是官员时,记者更愿意把他们的观察表述为“事实”。因为一些特殊事件偶尔寻求帮助的提供消息者可能是不认识的或者不太可靠的人,即使这样,记者在认真对待之前还是倾向于把他们的声明或观察看作不得已被证实的东西。<sup>28</sup>

最初关于中暑的报道特别困难,这是因为很少有记者知道去哪里寻求可靠的信息来说明他们的问题,并在市政厅和法医鉴定人之间证实他们的疑问或者是解决正在争论的问题。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去市政府寻求报道,但是政府办公室没有适当的渠道获得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数据,而它又是唯一一个官方信息来源,只有它适合将有关整个扩散事件的信息加以集中。<sup>29</sup>与中暑相关的死亡争论变成新闻报道中一个大的讨论热点,部分原因在于记者依赖这些组织,它们使相互冲突的公共舆论产生了一种对灾难的统一的解释。

来自芝加哥的编辑和记者的报道显示,关于死亡人数的讨论变成了一个大的新闻故事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记者自己把整个事件搞混了。在《芝加哥论坛报》,工作人员参与内部的讨论,记者和专栏作家在召开首个重要发布会的第二天,就开始报道死亡责任归咎于谁的问题,甚至在法医鉴定人逐渐收集到可以支持多诺霍的发现之后继续报道此事,从而终止了政治方面负责此事的讨论。比如说,在7月18日星期二那天,新闻头版就有两篇质疑死亡率数据的文章,一篇是由大名鼎鼎的专栏作家迈克·罗伊科(Mike Royko)写的,标题是“凶手是热浪还是媒体报道?”另一篇是以煽动性的“法医鉴定人不同意中暑杀人”为题。<sup>30</sup>文章说,法医鉴定人并没有一套综合的评判标准来说明死亡与

203 高温有关,而仅仅是引用了来自莱克县(Lake County)的法医鉴定人芭芭拉·库克(Barbara Cook)的观点,而她对多诺霍的报告持批评态

度。那么，科学的论断又在哪里呢？在随后的几天中，大批的法医鉴定人和全国的专家都发表声明支持多诺霍的论断。当库克改变她的立场的时候，只剩下芝加哥官员来面对这些论断。尽管如此，新闻工作者仍照常报道行政当局验尸的标准，并且好像科学的论断仍未下定一样。7月27日，来自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联邦官员确认了法医鉴定人上报的死亡率数据。《芝加哥论坛报》的约翰·卡斯写道，这样的确至少暂时结束了市长理查德·戴利和法医鉴定人埃德蒙·多诺霍之间公开的争论。<sup>31</sup>

两个月之后，芝加哥公共卫生官员组织的一次调查显示，死亡人数是733人，比多诺霍的数据多200人。《芝加哥论坛报》的报道则称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官员怀疑用科学得出的数据。报纸说，“一名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流行病专家称星期三那天，联邦科学家听到市公共卫生官员汇报的733人的数据时很震惊。简·西门扎博士说，‘人数非常多’，此人在芝加哥已待了一个月，调查中暑死亡数据。‘这确实是没有预料到的，我们都很震惊。’西门扎还说，有另外一批科学家将检测卫生局统计死亡人数的方法。‘我不知道他们的统计方法是否适用于此事。’”<sup>32</sup>文章继续引用其他一些支持公共卫生调查专家的话，但是又明确地引用西门扎的观点，引发了另外一场关于中暑导致死亡的争论。然而，问题是西门扎声称他从来没有质疑过公共卫生调查，而科学争论的冲突只是记者虚构的事实罢了。在一封写于1995年9月25日，署名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寄往芝加哥公共卫生局的史蒂夫·惠特曼(Steve Whitman)的信中，西门扎写道：

因一篇发表于1995年9月21日《芝加哥论坛报》上有关中暑的文章，我想在此表明我的立场。我特别想纠正发布的观点中别人引用错误的部分。

1. 记者问我在得知733人死于中暑热浪时是否很震惊，我的回答是：“公正地说，我们大家对于在近期的中暑死了这么多人都

很惊讶,绝没有想到中暑能使芝加哥这么多人丧命,人数很多。在芝加哥的历史中如此大的灾难还没有发生过。”没有任何一点能证明,我像《芝加哥论坛报》上最后所传达的那样质疑过你们的统计结果。我只是说对于芝加哥中暑的影响感到很惊讶,但并不是质疑你们的数据,我相信733人死亡的数据是准确的。

2.至于你们的方法是否合适,我是这样回答的:“我没有资格评判这样的方法是否合适,因为我没有看到书面的结果,而且我也不是一个数学家,其他人也许能够更好地来评价此事。”我没有说过你们的方法必须再由别的科学家来重新审核。我只是说我没有资格对你们的方法进行评论。

总之,我既没有对你们统计的数字表示震惊(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词),也没有认为你们的统计死亡率的方法有问题,需要由别的科学家来更正。

对于《芝加哥论坛报》明显误用我的话,并且不适当地用我的话来质疑我同事的工作,我感到难过与失望。

此致

敬礼

简·西门扎博士,科学硕士,

公共卫生硕士<sup>33</sup>

西门扎的信有效地抨击了把他的访谈变成虚假争论源头的《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只有那些发起争论的记者和政府官员才把争论当回事,他有充分的理由。我访谈过的记者没有一个报道说,他们把注意力放在死亡归咎于谁的问题上,因为他们很谨慎,以此来防止诽谤性的公共争论的产生。但是,新闻记者通常的做法是引发争论,这样就能带来可观的发行量和吸引眼球的报道,而且那些报道中暑新闻的记者们在他们自己关于死亡人数的讨论中陷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到他们自己在报道这件事中所扮演的角色。所有亚文化组织和职



业组织都发表了一些有倾向的观点，但是记者们却在独立观察和思考的情况下把他们的观点扩大到公共领域，引起更大范围的争论。尽管有一些医学和公共卫生的数据起了作用，但在高温事件中大多数新闻受众都从科学角度有了自己的认识，那就是死亡应该归咎于合法化和公平化的问题。但是，新闻报道方面对归因的肯定无论在哪里都是有价值的。这一部分原因在于它如此有戏剧性，另一部分原因还在于，新闻从不认为科学报道应像首席法医鉴定人的调查报告那样突出，<sup>205</sup>而应以自身的愤世嫉俗著称，对中暑死亡数据进行质疑的合法性持续至今。

## 不同的声音和有异议的地方

流行病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在重新定义关于灾难报道的争论中几乎难以保持独立。那些指责市政府没有保护好大部分体弱多病居民健康的活动者和社区组织，以及那些从他们选区支持者中寻求更多帮助的社区领导人也很少从主要的媒体中得到报道。他们没有办法，只能寻求小的社区报纸来表明自己的立场。比如说《芝加哥论坛报》一篇故事的标题为“居民在‘凉爽’中离开冷气中心”。公众服务部委员丹尼尔·阿尔瓦雷斯、警察局长马特·罗德里格斯和市长戴利，正如他们所说的，芝加哥人在城市官方冷气中心管理方面没有优势。在周末的时候，都市老人在行动和其他的社区组织指责市政府没有提供特殊的运输服务，然而，文章中没有引用任何一名市政官员和卫生护理工人的话，他们也没有人表明过立场。其他的城市新闻机构对此事的态度也非常相似。《芝加哥太阳时报》头版标题为“116人死亡，很少人在使用冷气中心”，它只从市政官方得到了空置的中心数目，但却引用了一名圣路易斯(St. Louis)县卫生局医疗官员的话，那个人说，“个人的行动才是最重要的”。<sup>34</sup>

当市政府对灾难的反应受到指责的报道出现在主要的报刊和电视

上时,他们常常会处于不利的位置,因为记者因职业道德得保证客观中立并且呈现事件的两面性,以此来发表不同的观点。典型地来讲,这个差异会很小,以至于反对的个案不会像权威观点那样容易对报道形成影响。<sup>35</sup>例如,7月19日,星期三,《芝加哥太阳时报》头版标题是“令人震惊的死亡人数:376,戴利要求修改市政应急计划”,并且戴利提供了主要的立场:“市政的工作已经很好了,但是我戴利本来能够做得更好。”这篇文章说明了市政对评估高温的应急反应所做的努力,提出了一些官员们业已承认的问题。但是戴利又说,“市政府已经做了非常好的工作。”这种评价,没有听到异议的声音,直到六栏新闻的最后一栏才  
206 提出不同的看法,州议员罗伯特·瑞卡让市长承诺对“整体荒唐”的应急计划进行评估,一位都市老人在行动组织的发言人强调说,“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做得更多”。<sup>36</sup>虽然批评时用的措辞比较强烈,但是他们在整个新闻事件背后的处境使他们不仅没有出名,反而对整体趋势没有竞争性。在困境的环境中,有责任的行动,超过对体弱多病市民的疏忽——这就是组织故事。

其他的新闻组织对不同的声音采取了相似的态度。在《芝加哥论坛报》上的一篇文章,标题为“戴利,助手试图扭转热浪批评”。约翰·卡斯,那时是市政厅首席记者,通过一天的新闻发布会,重复引述市政府官员和沿用政府的话,以此给市长和市议会空间来解释他们的立场并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界定争论。在总共28段的报告中,市议员阿尔瓦雷斯在24段中称市政府“做了所有可以做的事,认真对待每一件事”。仅仅在这之后,在第25段中,文章说“都市老人在行动,一个老年人藉以参加政治活动的组织,称市政厅没有为老年人提供去冷气中心的便捷交通服务,一些冷气中心不经意关闭了,而管理机构理应采取更多措施应对高温带来的危险”。<sup>37</sup>不仅不同的立场被编排在文章背后压了下去,而且反对的组织和其他非政府组织也没声音,只报道了一点点。市政官员可以在新闻报道中为自己说话了,只是没有人能够与市政官员作对,因为市政官员常常通过媒体在报道。

局外人和活动家们的声音在一些专业性强而影响力不太大的城市出版物上占据了更多的空间，比如说《芝加哥保护者》(*Chicago Defender*)，当地最大的非裔美国人报纸，还有一家叫作《南镇日报》(*Daily Southtown*)的报纸。例如，在7月23日，《南镇日报》刊载了这样一篇文章，题目是“专家们说，戴利感到高温不会持续很久”。在文章中，作者里克·布赖恩特(Rick Bryant)引用了一位政治顾问从市政厅无能力处理危机中得出的结论。顾问说，“我认为不会持续下去，大多数受伤的人根本没有自己的发言人，他们是孤独和被抛弃的，无法与外界沟通，这就是他们中许多人死亡的原因。”报纸的同一版还刊登了另一篇文章，文中指出，芝加哥59辆救护车中有28辆在高温危机中是闲置的，此报道还附带一则对当地老年人活动倡导者的采访。那人说，“因为贫穷和不会管理账单，这让体弱多病的老年人对高温无能为力。”<sup>38</sup> 207

然而，却很少有芝加哥居民或其他人读这些报道，另外一些人的观点也不容易对当地的政治讨论和国家对这件事的报道产生什么影响。很多当地的新闻报纸和周刊都简单地把高温灾难给忽略掉了。拿《芝加哥记者》(*Chicago Reporter*)来说，它是当地在种族和贫穷问题上起主导作用的发行刊物，并且在有关城市不平等的财富调查报告方面做得很好。这家杂志没有对高温问题做出明显的关注。当我问及一名工作人员这家杂志是否报道了数百位老人死亡的事件时，她平和地回答我：“你知道，我们不是那样报道新闻的。我们关注的还是关于种族、贫穷和不公的问题。”看起来，观察灾难的视角已经塑造了编辑们自己对危机认识的构架。

## 指派故事

新闻公司的组织结构会将它们的注意力和资源指向那些会产生有新闻价值的事件的地方和机构，就像特殊的新闻类型一样来完成例行的确定问题和事件的工作。比如《芝加哥论坛报》，像城市中的

其他主要新闻机构一样，拥有大量的首席记者，这些记者通常就某一地区、机构或一个问题进行报道，他们可以被用作报道任何新闻。<sup>39</sup>像高温引发灾难这样的新闻会打破报纸一般报道新闻时所采取的惯例，但是一般性的惯用做法和人员的安排也能对这样的事件进行报道。保罗·温加滕是都市版的一位编辑，他负责指派城市记者报道高温灾难，他解释了《芝加哥论坛报》首席记者对特殊问题或地方比较关注的一类案例，它的组织结构是如何影响记者报道此事件的努力程度的：

我认为这是一次大的新闻，所以我开始思考我们正在谈论的信息来源于哪里。库克县的法医鉴定人是一个很好的信息来源。我们有一个库克县的首席记者，所以他或者她可能会认识法医鉴定人，可能会有一些关系，所以我们应该让这样的人去和他谈，而不是派个不认识法医鉴定人的人。你该清楚谁是去实地采访最好的人选，也该清楚在特定的社区哪个人更合适；你该清楚谁对市政厅的结构最为了解并派他去，除非发生的事件超出他们的涉及范围。你告诉你的记者在市政厅说“戴利将对这件事采取什么措施呢？对于市民和冷气中心，政府该怎么做呢？”你让你们县里的记者说“让我们过去问问他们这里发生什么了？”你的警察领域的记者说“警员们都在干什么？”就这样写下去，一直到头。

208 《芝加哥论坛报》对灾祸的报道是有特色的，因为编辑不仅指挥他们的特派记者跟踪其目标，而且还让一大批记者到街上采访。温加滕说，编辑想要采访幸存者和死难者的家人，并确定这些人都是谁，他们过去一直在做什么，为什么他们会面临死亡。“这就要求记者，像卡洛佐和杰林斯基，开车到人死亡或是丧失体力并开始脱水的地方，并且要找到在灾难中生活过的人，这些都是标准的新闻地点中难以找到的。在高温的报道中，编辑要对搜集到的各种新闻报道地点负责，如果记者

们将要采访的内容没有确定下来，那么记者就会问一般问题。周六，在帕帕约翰看完死者名单后，他派出一队记者，每个人都带着死者的住址清单，坐车前往死者住址。卡洛佐回忆道：

我并不是非要找那些人，我已经拿到他们的名字和地址了……我被派到一个人的家中，我想这家房屋正在密尔沃基县大街上，可能过去是波兰裔人住的城镇的一部分。有一栋公寓，这个女士住在顶层，看起来就像是这栋矮房子的第三层。我到的时候天气非常热，我走了进去。在那里，华氏 120 度或 130 度的高温肯定属于正常情况。我想起我采访过的人好像是个业主联络员，她负责照看这位女士和整座房子。她住在那儿，我记得她告诉我早些时候她看见那位女士出去了，并且非常担心她，很想知道她是否需要风扇或是其他降温的东西。

这队记者和派卡洛佐出去的人在城市不同的地方都遇到了类似的情景。他们打电话到编辑办公室报告他们的发现，同时听取下一个安排。从调查过程这一点上讲，编辑和主要撰稿人有机会在他们所收集的其他信息的基础上改动或是深化调查报告。帕帕约翰记述道，“大多数时候，我们让报道爆炸性新闻的记者在回来之前当场给我们打电话，因为他会告诉你些东西，而且你也会听到些东西，或者你又有了什么新想法需要他们离开那里去付诸实施。你不会让他们就那么原路返回的。”编辑在管理他们在街道上进行报道的记者时感受到压力，因为新闻紧张的制作过程几乎没留给他们时间来协调爆炸性新闻事件的报道。 209

除了要指派田野实地记者报道高温事件外，《芝加哥论坛报》编辑们找了一些老员工来为大的新闻写稿。像许多其他的大报纸一样，《芝加哥论坛报》使用了被认为是杂志模式的新闻制作方式，由一位主要撰稿人在一组记者搜集到的信息的基础上写出整个新闻，因为新闻是需

要基本内容报道的。普利策奖的获得者和主要的撰稿人路易丝·基尔南(Louise Kiernan)说：“当我们有一则大新闻时，我们会派出很多记者。有一个人会是主要的记者和协调人，在报道高温新闻时我就是那个角色。”主要撰稿人也会自己做一些研究，虽然有时候他们不做任何的报道，但他经常参与整个过程的所有部分。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在重新叙述一则新闻的时候协调记者的工作，来筛选他们从新闻现场带来的信息，并弄清楚出现的问题。这个工作需要相当的编辑和写作能力，所以编辑们会把任务交给最有经验的记者并确定撰稿人也都在岗。因为主要撰稿人经常从他们擅长的领域来开展自己的工作，所以在高温报道中编辑们让史克鲁德来写最初的医疗和科技方面的新闻，随后把任务交给基尔南，此人曾经写过城市贫民方面的东西。大多数老记者都会参与重要新闻的写作，不管是题目还是润色或是编辑新闻的内容和结构。在报道高温事件的过程中，《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些老资格的编辑就做了类似的工作。

杂志模式的新闻制作过程需要对一篇报道有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但是这样也会让撰稿人和记者困惑，因为撰稿人没有时间到街上去感受发生的问题和事件，所以记者担心撰稿人会找不到他们报道的重点。更重要的是，记者们认为撰稿人的主观性会增加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撰稿人在怀疑从实地发来的第一手的报道时就会相信自己对情况最初的理解。撰稿人对环境、地点、人物缺乏足够的接触，这些都会让他陷入质疑，而此时的惯例和常规的体制变得更加根深蒂固了。一位在高温事件中工作过的记者指出：“当有这么多的记者都向一个撰稿人汇报的时候，情况就变得复杂了。你不知道自己的话是否被听取了，因为只有看到最后书面的报道时你才知道自己是否为此做出了贡献。所以有时你讲述了一件你看到的事件，而撰稿人在写之前就会对自己将要写的东西有一种先见。改变他们的那种先见是非常困难的，并且我认为在报道高温事件过程中那种情况也发生了。”

## 快速思考

在爆炸性新闻面前，撰稿人也面临着紧张的时间压力。像史克鲁德记述的那样，“那并不是个完美的过程，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和时间赛跑。梆梆梆，钟表走了一整夜，而新闻也在继续。在法医局采访的记者会定时打来电话报告，我也会询问他们写新闻时我想知道的问题。我会问：‘你在跟谁谈话？那儿有多少法医鉴定人？他们工作多长时间了？他们在和别的医院说什么吗？’在我和现场记者之间像这样的对话会有很多次”。

根据卡洛佐所说，在场的记者之间也会有很多交流，尽管他们工作的时间都有限。那些坐车出去的记者大约要花两个小时奔赴目的地处理采访、观察现场并且通过电话向编辑汇报情况。这大概就是为报道一个大的新闻计算好的时间。卡洛佐说，有时候记者就没有什么时间上街采访了。这个紧急的过程只容许用少量时间谨慎地思考采访或是事件，如果记者在给主要撰稿人写文章或总结记录时恢复到常规体制和新闻理念，则部分是因为日常新闻的制作体系限制了他们利用所看到的东​​西的能力。提到记者众所周知的办法，记者罗伯特·贝克尔（Robert Becker）争论道，他和他的报业同行没有对难题做出有限的回答，是因为“我们所做的是写出历史中的戏剧性，在我们之后会有一些人加入进来并完成工作”，“我们没有做太多的图表和数据分析”。杰罗德·克恩（Gerould Kern）是一名负责高温事件报道的副总编辑，他回忆说：“因为这不是科学研究，我们也没有像那样来报道它。”相反，他说道，《芝加哥论坛报》的撰稿人试图把热浪描写成“人们的一般故事和一次医疗科学事件”，所以他们更多注意“寻找好的讲述方式”，而不是更多地注意系统的知识。然而，在实践中，报纸新闻记者经常从叙述事件转到探索性的写作，他们很少在之前提醒读者，他们所报道的结论是临时性的或者不完整的。



211 由描述事件过渡到解释事件,最为普通的形式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新闻报道对官方辞令的捕捉,二是在报道新闻之前已经有了可用的大众化观点。在热浪事件中,市政官员和部分气象学家所强调的自然灾害和气候原因,看起来特别吸引了当地记者。一位记者写了一系列的新闻报道,探讨高温具有致命性的原因是什么,而忽视了危机中的其他社会原因和政治原因。《芝加哥论坛报》本地版的头版标题写道,在产生破纪录死亡率的过程中,“曾被排除在外的高湿度被证明为是真凶”。文章说,“基本上,都可以归结于此:不是温度,而是湿度。”过了几天,本地版详细说明了这个逻辑。不仅仅是高温,还有“湿度、污染、风向和其他因素——就像混凝土和沥青把城市变成了热岛一样——在决定天气是否有危险性时,这些因素被认为和温度一样重要了”。<sup>40</sup> 如果文章审慎地把问题引入到天气中,本可以呈现不同的含义,但是相反,文章提出了权威性的观点,认为这次大灾难就是气候的缘故,而并不是社会事件。在高温事件中,完全围绕自然和气象角度来组织报道是很普遍的,在自然引发灾难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记者中间还有另外一种分析方法,这涉及对处理措施僵化的报道,不过得在手头信息的基础上做出匆忙的解释和评估。举例来说,《芝加哥论坛报》首篇的主要报道是关于死难者性格特点的,这是把内容丰富详尽的街边报道和简洁有思索性的分析混合在一起的典型例子。7月18日周二版的首页出现了这样的文章,它的标题是“高温事件的死难者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拒绝任何帮助”。文章由杰林斯基和路易丝·基尔南合写,并得到了其他七位撰稿人的支持。文章开头描述了多种死亡情形:“一些人就这么简单地死了,是因为他们不喜欢电扇,不想开空调,或者害怕开窗子,因为担心坏人会进到屋子里。”<sup>41</sup> 我们认为,作者对此观点有确凿的证据和理由。其实,文章第二页就包含了由报道团队收集的大量材料,包括记者通过对其家人或朋友访谈后得到的对其中九位死难者的描述、死难者的姓名、地址和年龄。在热浪期间,《芝加哥论坛报》和《芝加哥太阳时报》都提供了死难者的名单,还

有一张标出死亡地点的城市地图。给文章提供素材和活力的报道建立了重要的信息，但是通过组织这些材料而呈现的观点是建立在不太可信的发现之上的。

在报道的第一页，也就是最能吸引读者注意力的部分，基尔南和杰林斯基提供了一个对死难者死亡时情形的总结，当然，他们没有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他们周一写报道的时候官方死亡数据是 179 人，法医局预计至少也超过 100 人。还没有人通过死亡方式来了解死难者死去的环境，然而在第二段，杰林斯基和基尔南继续说，“大部分死难者并不是由于孤独致死的，他们在黑暗、无声和潮湿的家中跌倒，是因为没有人悉心照顾他们，没有人给予本可以拯救他们的帮助”。<sup>42</sup>但是，在几小时的报道过程中，记者一直在找那些跟死难者最接近的人来提供死难者死亡时的环境的相关信息，因为他们没有什么证据说明他们的观点。作者不但从少量的报道中进行归纳，还忽视了他们的报道方法是否具有可行性。此方法以和死者朋友或亲属的访谈为基础，将人们的注意力导向“有哪些人最近联系过或者离开过，了解其生活，或法医局还没有辨别出身份的人”。然而《芝加哥论坛报》的头版是这样写的：一种未被证明的对死亡形式的总结，说明了大部分的死者在去世时其朋友和家属都在场。

新闻记者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在限制他们接近信息的固定标题下开展工作。然而，在他们掌握的事实不足或者没有时间思考时，他们可以不用快速做出决定和分析。但是在现代的知识中，官方和新闻大众都希望主要的新闻组织能针对主要事件提供一个真实的报道，同时那些记者——不管在自己的报道中还是作为权威者、批评者或专栏作者，经常都会抓住机会发起一系列的公共争论，但是在赶发有力度和刺激性的头版报道时，周二版的编辑和记者把高温灾难弄成了罪大恶极的误导性的措辞，而标题更是离题甚远。

## 213 头条和可视图像

就像媒体传播专家所指出的那样,新闻文章的中心结构并不是记者写的报道,而是那些吸引读者注意力的标题和图标或照片,这些在辅助性的文章中可以介绍主要的问题,并总结文章的主旨。标题是很重要的,因为能够让读者通过略读标题的方式抓住新闻出版物的主旨,还有,它们最能暗示出事件和问题的所在。很少有人会有时间阅读整篇报纸,但是他们却都把看一眼标题和照片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标题和照片也起着一种市场营销的作用:当运用到夸张的手法时,就能诱惑读者买份他们不知道的报纸或注意到他们会忽视的报道。在《芝加哥论坛报》,就像其他报纸一样,版面文字编辑负责想出大部分标题,记者和编辑很少涉及头条新闻的制作过程。有时这个过程会导致一些未被文章主旨证实的标题出现,没有总结好文章反而误导了读者。例如,当基尔南和杰林斯基为周二版提供报道时,他们并不知道版面文字编辑会把题目标为“高温事件的死难者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拒绝任何帮助”。这个标题是那天报纸首页最大最为放肆的文字,不仅用词明显错误,而且报道的内容和辅助性的图表互相矛盾。在把死难者定义为“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的标题下不远处,文章写道:“大部分高温中的死难者都是年长的人,很多人身体要么是有病,要么就是很虚弱。一部分人是穷人,一部分人酗酒,还有就是行为有些古怪,住在没有阳光阴暗的狭小空间里。”在下一页中,有个死亡地点分布图所做的说明,在那里版面文字编辑——也许跟写标题的是同一个人——写道:“周一,虽然在库克县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179人,但是知道其家庭住址的却只有60人。大部分死难者是60岁或更年长的男性,都生活在芝加哥的贫民窟。”<sup>43</sup>那么,为什么版面文字编辑写出一个标题称死难者是典型的芝加哥人呢?

据一名参与过热浪事件工作的版面文字编辑讲,他们写那样的标

题有个很简单的理由。他说，“他们想使文章更加吸引读者，并把他们带入整个事件的报道之中。”换句话说，头条就是被用来取悦那些不关心穷苦老年人而更关心和他们自己相似的人的读者。就像一位记者讲的，在20世纪90年代，对于报纸和杂志来说这是一种很普遍的做法，因为那时候市场调查显示，读者最愿意关注的新闻出版物常常出自于在文章标题或报道中加有“你们”或“你”这种词的媒体。把市场营销原则重新定为新闻报道守则的话，只要让他们得到关注，版面文字编辑就能保证用词的准确性。<sup>44</sup>新闻记者和编辑根本没有机会来检查自己的工作。

类似的压力造就了报纸的图表化报道过程和其他带有可视图画的新闻媒体。新闻编辑和制作人员期望摄像师和摄影记者能够呈现主要的信息，用文字表达又达不到效果的材料来表明新闻事件。但实际上，新闻机构会用图片和视频来演绎他们的报道，他们搜集最敏感和特别的图像，尽管这种惯例是将注意力集中在特别事件而不是事件和问题的典型特征上。当记者捕捉到有意义的社会活动或者不一般的事件时，那些特别的图像就会有报道价值，而新闻观众也期望看到特别的、突出的和强调的部分（图45、图46）。然而，像高温事件这样灾难性的情况可以给新闻组织提供如此多的可能性来制作壮观的图像，以至于使新闻很容易就把危机转化成可视化的景象，从而隐藏了事件本身更深层次的社会和政治特点。<sup>45</sup>

当热浪最初来到芝加哥时，它首先挑战的是摄像师和摄影记者，因为高温并不像飓风、龙卷风、暴风雪或者洪水那样，它不能直接表现出来，并且很少包含戏剧性的动作。这个问题的标准解决方法就是通过人们用凉水降温表现出来，其实这个问题在开始的电视和报纸图片中就已经出现了——孩子们在消防水龙头下玩耍，城市的居民为了避暑纷纷来到岸边。用水对付高温，或者是用自然的方法对付自然，都是可以见到的场景，这主导了最初的对灾难的报道。但当高温开始变得致命的时候，图片记者就可以得到新的和更具冲击力的材料。新闻大众



图 45 在热浪的报道中,记者拍到了死难者在尸体袋中的照片。资料来源:《芝加哥太阳时报》,布赖恩·杰克逊摄影。《芝加哥太阳时报》授权许可,2002年。

希望能够在电视新闻节目和报纸上看到表现死亡事件和死难者的图像。库克县的太平间,停放着数百具尸体,停车场的冷藏卡车装着更多的尸体,紧急处置的工作人员昼夜不停地忙碌着。这是一个看得见将要发生的报道。这很容易报道,因为对抓拍图片感兴趣的记者不用到  
215 城市中搜寻场景,他们可以在太平间的停车处等候,并且有信心得到一张完美图片:令人震惊的、戏剧性的、病态的图片(图 46)。出版商和编辑确信这样做将为他们的广播节目和出版读物增加“亮点”,于是他们将记者派遣到社区,进行拍照或摄像,以记录警察将死难者的尸体搬出居室和居民如何面对热浪的过程。根据表 11、表 12 中关于热浪新闻

报道的新闻评述的内容分析,并随着相应报道战略的实施,最耀眼的视觉因素则是尸体和太平间的图片。但是这些新闻报道的图片却没有反映死难者居住的环境。



图 46 在库克县太平间外的摄影师：惊人的图片将在他们的镜头下展现。资料来源：库克县法医局，摄影者：约翰 A. 凯利(John A. Kelley)。

新闻报道机构投入专门资源制作或展示视觉图像,并且记者工作最基本的部分就是要对新闻事件的报道进行计划。电视新闻是最能提供视觉图像的媒介,根据环境制作或获得戏剧性的脚本加以组织。因此,电视新闻的报道者总会关注如何才能将新闻事件报道得更具视觉效果。气象学家保罗·道格拉斯不但为广播也为报纸撰写热浪的报道,而且还在电视的气象预报节目中解释热浪现象:



你不得不去关注新闻图片,并考虑如何使有关热浪的新闻报道更富视觉效果以吸引读者。我清楚我们会利用相关的视觉图像来提出一套“生存建议”,用图像来描述生动的事件。同时,你也要将大部分的时间用于准备即将用于报道的图片。并且作为一名出现在电视媒体的气象学者必然要面对的一个麻烦,就是你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审阅大量的图片。与此同时,我却并没有如期望的那样花相似的时间来看地图和气象信息的预报,因为我的大部分时间已经用在制作电视节目的图像上了。

217 道格拉斯的观点得到了有力支持,因为新闻报道制作人确实强调通过图片形象来展开有关气候灾难的新闻报道,因此道格拉斯的大部分时间需要花在日常新闻图片的制作上。像《芝加哥论坛报》这样的报纸则没有必要通过影像图片来进行新闻评述,但是为使报道更加生动地吸引读者,他们仍然采用极为戏剧性的图片和引人注目的图表。史克鲁德这样总结她同事的工作:

这份报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调图片的使用。从许多方面看,热浪算是极具视觉效果的新事件,由此也就影响了我们编辑对它的报道方式……因此,你不得不将你撰写新闻的一些时间用于和图片编辑小组的合作上,并告诉他们我们报道的目的,这样他们才能够利用图片对你的新闻报道加以润色而不是简单地进行描述;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你利用图片对新闻报道进行生动描述,这是新闻报道的一个全新的制作层面。有些时候,却没有必要利用图片对整个新闻事件进行报道。图片使用作为新闻制作的一个部分,一般而言,报社的记者也需要自己完成相应的图像采集工作。这也就意味着你有责任安排好自己应当什么时候进行图像采集,通过何种方式获取,并清楚自己的新闻报道关注什么,这样才能采集到与报道相适合的图片。总之,你必须意



识到自己作为一名新闻记者，照片对你的报道能带来什么。

《芝加哥论坛报》的图片编辑在报道热浪事件期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为那时报纸需要大量的图片资料。但是，新闻记者和编辑仍然需要关注新闻报道制作过程中的相关影响因素，并且需要发现特别的报道视角，从而使图片在新闻报道中起到更为显著的作用。

## 事件、图像和新闻地点

照片和图片在新闻编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影响新闻编制的因素包括地点或广播报纸中的新闻片段。编辑和制作者总是会为报纸的头版头条寻找令人瞩目的新闻图像，而这一图像将被明确设计，用以吸引读者对封面的关注。在《芝加哥论坛报》这份报纸中，摄影师和编辑在每日的例会中就封面的照片选择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无法明确选择头版要报道的新闻事件，则只能根据头版的图片进行确定。有时候，相关的报道还没编制完成，编辑就将极具煽动力的新闻图片置于头版，类似地，也由于没有好的图片而将一些好的新闻报道延后刊登。

大部分地方及国家的新闻机构在热浪事件的报道中都展示了装有 218  
死难者尸体的袋子及太平间混乱的场面。《芝加哥论坛报》在7月17日的头版刊登了尸体搬运工从冷藏车中将尸体搬进法医局的图片，而成队排列的芝加哥警局的货车正在另一方向运送“刚被发现的尸体”的图片也刊登在了头版。7月18日头版新闻图片也是类似的：一位警官在恩格尔伍德社区从一所公寓中搬运完死难者的尸体后，疲惫地倚在自己的车旁休息，一只手套仍套在手上，而另一只手套则掉落在他脚边。7月19日的头版头条则以柱状图的形式生动地呈现了死亡人数的记录，并且新闻报道中包含了这样一幅图片：殡葬工作人员将在芝加哥房管局大楼中的尸体装入他们的面包车中。而同一天芝加哥地区的

报道版块的图片几乎相同：其中一幅是四名警察将死难者从位于南区的单身公寓中搬出，而另一幅则是芝加哥房管局大楼的居民从窗中探头注视，等待警察将他们去世的邻居的尸体搬走。在《芝加哥太阳时报》上也出现了相似的一组图片：7月17日，头版头条报道，一个俯拍镜头下的冷藏卡车停在太平间，旁边是尸体搬运工把尸体装进车子。7月18日，戴利的照片，委员阿尔瓦雷斯及由他提出却未被采用的热浪应对计划为头版图片。7月19日，头版刊登的又是一个精疲力竭的太平间工作人员的图片。死难者的尸体、冷藏车及憔悴的急救人员这些引人注目的形象，在媒体报道有关热浪的新闻图片中占据了主导，同时也成为这一让人难以忘却的新闻事件的主要素材。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新闻图片能够帮助读者理解发生在他们周围的死难者的死因，或者是在公共卫生危机的出现与城市的社会政策环境之间建立起相应的联系。这些记者制作出的耸人听闻的事件细节和死难者的形象很可能有损新闻的目标，而该目标就理论而言，即新闻机构是为了实现新闻事件的价值而设计的。

## 读者的碎片化及目标新闻

如果说热浪事件中的这种(媒体哗众取宠)引人注目的表现遮掩了社会环境对灾难处理的影响，那么编辑就有责任决定事件中的哪些方面会影响新闻读者，因为读者的行为将对危机看不见的一些特性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所有新闻报道机构所做的最多决策应当考虑什么样的议题和事件对读者而言才是具有新闻价值的；一些制度性常规工作方向 and 职业标准造成了这些选择。<sup>46</sup> 像《芝加哥论坛报》这样的报社，曾经制作过一则被读者整体接受的单个新闻报道，因此，编辑在进行新闻事件的选择及新闻地点判定时，就需要考虑到读者的结构和多样化的兴趣。尽管如此，1995年《芝加哥论坛报》曾使用了先进的出版技术为主要城市的不同地区制作了八个版面的日报，并且其中有专门针对州

首府城市的版面及相关的头版新闻事件，由此在与同行的竞争中占有优势，以吸引特定的读者群。<sup>47</sup>《芝加哥论坛报》本地中心城区的新闻为报道中的关键部分，而其大部分有关热浪报道的重要性和戏剧性体现在能够吸引中心城市圈的读者上。但是大部分居住在乡村的读者，由于比城市居民生活更加富裕，因此并不需要面对社会经济中的难题——许多城市家庭没有空调设备——这才使得芝加哥城市居民难以适应热浪气候。编辑虽然清楚乡村居民只对整个新闻事件的概要及城市中引人注目的图像感兴趣，但他们却无法确定乡村居民是否关注整个事件中的社会因素及政策环境。

州首府城市圈的新闻制作与发布制度使得《芝加哥论坛报》编辑将他们的新闻报道能够聚焦于此次热浪气候灾害，并且乡村版对有关热浪的新闻报道进行了删剪、编辑、摘录和重组，以适应乡村读者的口味。例如，在7月17日，《芝加哥论坛报》乡村版编辑以“发现马鬃的吸引力”(Finding the Mane Attraction)为题，采用了一长组展现马的外形的图片作为头版。而在城市发行的芝加哥都市版则以城市冷气中心的相关问题为头条：一位芝加哥老年妇女正忍受断电痛苦的图片取代了马的生动形象。<sup>48</sup>决定做出的基础是十分简单的，即编辑认为乡村读者看有关城市新闻报道时应当放松身心，而对乡村读者而言，市政府努力使冷气中心有效运行的信息就没有关于马的报道显得更引人关注了。

有关吸引目标新闻读者的另一种报道技术则是通过转换图片描述的人物形象，以便报纸的视觉效应能够回应特定读者群的需要，而这些特定读者群往往希望新闻能够报道与他们处境类似的人物。而这一过程常常会陷入某一人种的形象被另一人种形象所替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都市版会用非裔美国人或拉丁裔美国人的图片替换一组乡村地区的白人居民的镜头图片。以7月14日刊登于不同州府城市圈地区 220 的头版图片为例，四个拉丁裔美国人——克里斯蒂娜·埃尔南德斯、约兰达·奥瑞提兹、埃斯佩朗莎和埃利卡·埃尔南德斯——出现在西北

主要城区版；而五个白人孩子——道格·威斯纳、格雷格·霍穆特、保罗·姆罗茨、亚历克斯·奥文施因和阿什利·拜道尔——则出现在都市麦克亨利(McHenry)版。

7月14日，西北城区版发布年轻的拉丁男孩儿在《芝加哥论坛报》头版的照片，反映在热浪新闻中，特殊的种族团体为目标新闻读者的报纸战略。

221 编辑为呈现冷气中心相关新闻事件，决定对报纸新闻图片的种族构成进行改变，但这样做也许无法显著地改变整个新闻事件中的关注点。但是从细微的方面来看，对于编辑而言，他们每天所做的决定是相似的，所以这些决定也就构成了整个城市新闻的制作与传播机制，并且他们也人为地造成了大都市社区的信息沟通障碍，而这些社区其实早已从社会机制的层面上分离了。如果《芝加哥论坛报》不同种族的读者意识到报纸有关热浪的新闻报道是有差异的，这就只能部分归因于新闻机构的报道素材使读者感到了这种差异。

## 灾难事件的新闻价值：新闻事件的发生与终止

随着热浪的消退及法医局清点完最终的死亡人数，《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些记者与编辑对这次灾难事件的新闻报道进行了评估。作为《芝加哥论坛报》资深高级主编之一的比尔·拉克唐瓦尔德(Bill Recktenwald)，认为该报没能在自己的新闻报道中区分个人和社会的不同影响。事件中的死难者仍然保持着神秘的色彩，他们的死亡原因仍然使读者不甚明了。正如参与这次轰动新闻事件报道的一位新闻记者解释的那样：

这次新闻报道并没有尽可能地具体呈现死难者的生活状况——事实上这些死难者一直活在危险中。像穷人、精神病人，他们都生活得邋邋遢遢，并且还要在生活中忍受病痛和死亡。报道

已经显得“例行公事化了”，尤其是在你报道有关穷人死亡的新闻事件时更是在例行公事，并且报道中也采用了这样的一种基调：赋予穷人一种漫画式的形象。这也是一种新闻报道制作的速成形式，要怎样报道穷人，用这种方式就使得报道很容易。采用这种方式很难保证不在报道中加入责备的语调。当你在记录关于这些穷人的事件时，你已经得到了制作新闻的特别素材。而这些素材与道德密切相关，并不一定要十分准确。 222

记者有充足的理由对他们有关热浪新闻事件的报道感到不安，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报道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苦难、贫穷和孤单，而这些又被用于题为“大多数死难者曾拒绝任何帮助”的新闻报道中。但是几位参与最初有关热浪报道的新闻记者表达了他们对报道的失望，甚至有几个编辑认为报纸上的新闻报道本应对死难者给予善待，而事实上他们对热浪死难者的报道显得过于表面化。

拉克唐瓦尔德在芝加哥居住时间较长，足以使他意识到这次气候灾害的严重性，并且他对上述编辑提出的一些要求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即《芝加哥论坛报》应当回到有关热浪的新闻事件中，并重新寻找原先报道中被忽略的视角。“后来，我们发现原先的报道中存在一个较大的问题”，他说，“这是曾发生过的严重气候灾难之一。由于死亡人数接近于曾经发生在得克萨斯州伊斯特兰(Eastland)灾难的死亡人数，甚至可以认为几乎相同。我们应当注意到这点。”根据拉克唐瓦尔德的观点，其后，执行编辑安·马里·利平斯基(Ann Marie Lipinski)提出一项计划，希望派出记者去调查热浪的死难者，并对他们的生活和死因进行相应的人物志撰写，而她将对整个报道计划全权负责。这项计划出动了10名记者，每名记者将进入死难者的社区进行调查，以尽可能地了解死难者的情况。在《芝加哥论坛报》另一位资深编辑——杰罗尔德·克恩的帮助下，拉克唐瓦尔德为记者编制了一份标准调查问卷，用于记者访谈死难者子女并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这两位编辑都相信自

己手中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报道素材,并且他们希望通过这次新闻调查,能够清楚热浪事件中的各种死亡方式。同时,拉克唐瓦尔德和克恩两人想根据这次调查的结果勾勒出大约 1/4 死难者的简要情况,从而以此反映热浪事件中的主要问题。拉克唐瓦尔德回忆道:“我们想要城区地图得到死难者名单。我的意思是,由于要做到这点很难,所以我说服了领导去做这 1/4 死难者的报道——我认为这 1/4 地区——包括黑人区、拉丁裔区、白人居住区。记者们长期一同工作,相互了解,因此可以清楚谁更能深入现场,敲响住户的门,进行实地调查。你必须将合适的人置于合适的位置上。”

拉克唐瓦尔德召集报社的记者,成立了记者团,包括卡洛佐、杰林斯基、贝克尔和基尔南,还有迈克尔·马丁内斯(Michael Martinez)、梅立莎·玛丽·加尔扎(Melita Marie Garza)、洁妮塔·波(Janita Poe)、杰里·托马斯和保罗·德·拉·加尔扎(Paul de la Garza)。经历了长达三个星期的深入调查之后,他们粗略制作出了长达 100 页的死难者人物志。“我仅仅是到了那里并敲响了门”,杰林斯基解释道,“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采访方式。我在一些更加贫穷的社区终止了此次报道……因为这些贫民窟的居民几乎都死亡了,由此可见我所采访的绝大多数人和主要社区的居民都是穷人。但是我在西区的政府街结束了此次采访,而那里穷人的住所都是连成一片的。我仅仅收集了一些人物轶事及相关事件,大家都清楚,这样做的最终目的只是为这次重大事件寻找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形象而已”。当这项采访计划结束后,记者收集到了关于死难者的大量信息,并准备着手进行专项报道。拉克唐瓦尔德也从法医局得到了一份全面而详尽的死难者名单,并且他也根据这份名单界定死难者居住地。但是曾有份报道指出:“大部分的数据与统计资料自身只能反映热浪事件的某一方面,无法反映事件的整体面貌。”拉克唐瓦尔德发现:“关于死难者的数据绝大多数采集自贫民窟,而这些贫民窟绝大多数居住的是黑人与拉丁裔。”他与同事正准备制作一系列关于此次灾难的报道,该报道预计将引起轰动并

受到读者关注。总之，此次新闻制作的目的是要弥补先前该类报道的不足。

但拉克唐瓦尔德和其同事着手进行新闻报道时，却忽视了有关该报道的商业考虑，而使报道难以进行，这是他们所没有预料到的。“那时我们已经开始着手进行报道制作了，”卡洛佐回忆道，“9月份时我们不得不慎重考虑，以判定读者对于该新闻事件的报道是否仍感兴趣。”最初此次报道计划受到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但现在一些编辑都担心报道计划能否继续下去。“我们可以预见到读者不会关注这次报道……当芝加哥进入秋冬季后，还有多少人想去关注发生在夏季的这次新闻事件，人们对一则新闻的新鲜感往往只能维持一个流行期。”

最终，主编们得出结论，没有多少读者会想在秋季继续关注在夏季已报道过的新闻。虽然记者已为此次新闻报道计划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但主编们仍决定，与其按拉克唐瓦尔德的计划就整个新闻调查的结果进行刊印，不如用11个死难者的简介写一则关于此次调查结果的叙事文。最后，此次新闻调查结果刊登在11月26日的头版新闻上，标题为“热浪中的死难者：走近死亡案例”，并配以一幅北区房屋的图片加以描述；这篇报道主要基于路易丝·基尔南所拟的一份文稿，但并没有一次性就刊登结束，因为报社决定在她休假时继续刊登。虽然，克恩和拉克唐瓦尔德先前已经进行大量工作对不同的死亡进行归类，但报纸刊登报道中却没有涉及死难者死亡原因的具体分析，并且也没有证据表明对死亡的原因进行了广泛的报道。“我根据收集到的信息拟写了此次报道的稿子，然后就去度感恩节的假期了，他们是在我离开后才决定刊登这次新闻调查结果的”，基尔南解释道。

“这次新闻报道进行得并不令人愉快”，她回忆道，部分是由于她没想到新闻记者调查的结果中并没有较多的关于死难者的新信息；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她没有机会完成整个新闻稿件的写作。《芝加哥论坛报》有一位编辑承认他对最终的新闻报道极其失望，甚至有些参与新闻调查的记者感到他们制作这则报道是在浪费时间。“我们本可以做出



一期了不起的新闻”，卡洛佐不无遗憾地说。但是即使如此，在历史上曾经夺去无数人生命的危机事件并不足以制作出一则好新闻，尤其是在整个城市渐渐进入冬季，灾难已经逐步消退的情况下。总而言之，编辑计划报道的整个新闻事件已经随着热浪死难者逐步淡出人们的视线而被人们遗忘。

## 结论 城市环境中的新危险

7月29日,就在致命的热浪退去不到两周的时间,最后一位死难者尚未安葬,一股新的热气团又侵入芝加哥上空,再次对这个城市的居民健康构成威胁。这次极端天气强度较轻,持续时间较短,但是刚经历过创伤的居民及政府对这次气候可能带来的危险十分敏感。芝加哥居民采取特殊措施保护自己、帮助邻居、照看家庭成员,在热浪事件之初曾经拒绝承担责任的政府部门也实施并执行了综合性的应急计划,帮助最需要提供支持的老年人和单独居住者。人们曾经认为,政府不能确保公民的健康和福利;为了改变这种看法,芝加哥市正式宣布进入高温紧急状态,并花费数百万美元用于支持有关服务与项目。 225

在戴利市长的领导下,政府为保护公民采取了众多措施,包括建立一条热线,以便人们在需要特别服务之时,或者需要冷气中心有关的信息,或者需要其他服务之时进行呼叫;开设一家有80名雇员和志愿者的电话机构,其明确职责是给老年人拨打电话以核实他们的健康状况;运营一个包含200名员工的“热浪指挥中心”,该中心有一些专业的护士和几百名城市雇员随时待命。地方政府同时为消防局新添了16辆救护车以备在热浪期间应急使用;并与出租车公司签订合同,以确保数百辆出租车能够将有需要的老人送往冷气中心;延长老年人社区服务中心的开放时间;分发有如何保持室内凉爽说明的小册子;对有大量独居老人的社区进行挨家挨户检查的服务人员予以补贴。最后,政府部门对地方医院的急救室进行监控,腾出117间医护室,以应对因热浪而引起的疾病和住院救治;安排交通工具随时准备运送居民进入冷气中心;开放了70家冷气中心,并延长沙滩与公共游泳池的开放时间;与地 226

方媒体进行合作及时播报热浪警报、倡导家庭和邻居之间相互照顾；发布“抗击热浪”的指南，宣传应对热浪相关疾病的方法。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全面回应。

第二次侵袭的热浪与第一次相比，持续的时间短并且没有那么危险。气温与高温指数最高值分别是华氏 94 度和 104 度，并且夜间的气温会有较大的回落。气候的反常变化及两周前出现数百位体弱的死难者，使得人们难以确定城市的热浪应对体系究竟救助了多少生命，但随着热浪的减弱，芝加哥媒体报道说仅有两例死亡与热浪有关。当地的评论家则认为，政府在第二次热浪侵袭时反应特别强，仅仅是因为官员们害怕记忆犹新的灾难再次出现，但是仍有一些芝加哥的主流媒体认为政府在第二次热浪灾难中的表现未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尽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政府在第一次热浪侵袭时没有进行充分的回应，但是《芝加哥论坛报》却撰文指出“又一次……政府官员对热浪的各种过度反应不仅浪费纳税人的钱，也对政府试图达成的准备状态有害……同样值得质疑的是，城市居民是否应该承担电话员的工作，因为教会或社区机构能够完成得更好，而且更划算”。<sup>1</sup>而官方的热浪应急回应，被认为是耗费巨大、效率低下、甚至会对地方文化带来损害，已经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城市职能部门如果再做这样的尝试将不确定能否得到公众与媒体的支持。

尽管如此，1999 年的夏天，芝加哥已经做了更好的准备以应付极端炎热天气。关于热浪风险的小册子随处可见，并且媒体也频繁地刊登有关夏日炎热天气的危险预警；地方政府建立了相关的登记服务机制，允许任何芝加哥居民在所有与天气相关的紧急事件中要求电话联系或个人联系，还建立了专门针对热浪威胁的网站；公共卫生部门也开发了一套体系以协调应急医疗服务；老年人服务机构也相应补充了独居老人的名单，并利用老年社区服务中心来讲授老年人应对季节气候反常的生存策略。

1999 年 7 月末 8 月初，被气象学家描述为“强度较轻但持续时间

长”的热浪侵袭芝加哥时，整个城市着手积极行动照看独居老人与体弱的居民。<sup>2</sup>联邦爱迪生电力公司的发电机无法满足城市的供电需求。1995年，北区主要变电站供电不足，1999年则停止运转，使得大约一万城市居民断电三天。<sup>3</sup>缺水问题同样普遍。虽然政府无法提供更高水平的服务，无法提供如同1995年8月时的支持，但政府使用高温紧急计划，并鼓励家庭及社区团体的成员照看任何可能有危险的人。中西部地区气象中心总结了城市的应对措施：

芝加哥实施了极端异常天气应对方案，并于7月22日建立了“热浪指挥控制中心”。措辞强硬的新闻媒体发布消息提醒市民1995年时曾有700人死于热浪。政府指定了34家冷气中心，并为任何需要前往冷气中心的居民提供免费的班车，还宣布了对老年人和公屋居民的检查计划。芝加哥消防局局长受命负责全城市的工作。7月23日，政府又开放了31家学校，提供更多的冷气中心，警察局增派其他城市工作者去挨家挨户对独居老人进行检查……

25日，即热浪侵袭的第五天，由于自22日以来只有少数人前往冷气中心，政府通过广播及新闻媒体催促市民前往冷气中心。调查显示许多人担心他们一旦离开，房子将遭受抢劫。向老人伸出援手，使得3万多老人在7月21—25日得到探望……

7月29日，如之前预报的一样，热浪又一次突然袭击。当天，政府又启用了热浪指挥中心，重新启动极端天气应急计划……政府敦促老人拨打311电话寻求帮助，派出几百名雇员再次检查老人居所……在热浪期间，芝加哥有超过1200人被送到冷气中心，其中大约有50人因为有明显危险的中暑迹象被直接送往医院。<sup>4</sup>

虽然政府采取了这些全面措施，但库克县的记录表明，仍然有 110 228

人因热浪而死亡——这一死亡人数是该县历史上很高的一次，但低于1995年的热浪死亡人数。据官方记载，有70%的死者 and 接近死亡者在令人窒息的闷热的公寓中被发现，且其中一半以上为男性。<sup>5</sup> 大约有1/3的死难者年龄在60岁以下，这清晰地表明极端反常的炎热天气和孤独并不仅仅影响老年人。

天气只是导致两次气候灾难不同死亡率的部分原因。据中西部地区气象中心研究人员说：“芝加哥1999年热浪侵袭高峰时的情况与1995年很相似，特别体现在极端的夜间温度与湿度情况上。因此，看起来芝加哥因热浪的死亡人数由1995年的700人下降到1999年的114人，不可能仅仅是由于两次热浪天气的气候差异所造成的。”<sup>6</sup> 气象中心研究小组发现，由于芝加哥市政府采取了“积极主动”、“及时有力”的应对措施，这点“与1995年应对热浪侵袭时截然不同”，增强了公众预防热浪及相关威胁的意识，从而降低了发病率与死亡率。这一发现与相关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相关研究表明：其他城市中的执行良好的热浪应对措施体系会降低夏季极端炎热天气的死亡率。<sup>7</sup> 首席法医埃德蒙·多诺霍向媒体表示：“对芝加哥市应对热浪所做出的努力，我们应当予以A+的评价。”“但我们不能满足于已有的荣誉。我们应当再接再厉，直到不再出现夏季热浪引起的死亡为止，这才是可行的。”<sup>8</sup>

但是芝加哥应对1999年热浪侵袭的经验表明，多诺霍也许低估了社会环境的“严苛”，它使得居民对夏日炎热的气候极为敏感，而且全面的热浪应对计划是必要的，但不是灾难保护的充分因素。1999年，正是由于敏感的民众及积极有效的回应政策，使得芝加哥的死亡人数下降，但仍然有100人因为独居或体弱多病没能躲过这场气候灾难，孤独地死去。严酷的热浪天气甚至对城市的社会和经济困难带来更大的影响，但对设立预防计划的政治和文化资源没有多大影响——甚至可以预见在芝加哥不久的将来，居民与官员面对夏日的危险时不太合拍。

229 根据环境科学家分析，可能产生更具破坏性的夏季炎热魔咒，其影响将是可怕的，尽管可能并不像1995年那么严重。举例来说，政府间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近来推断认为,有 90%—99% 的可能在 21 世纪会出现“更高的最高气温,更多炎热的天气和热浪席卷全球陆地”。可能出现的结果包括:“死亡率的提高、老年人群体和城市贫民重病发生率上升”,以及对推动热浪和全球升温进程的空调系统产生更大的依赖性。<sup>9</sup> 尽管对全球变暖持怀疑态度的气候学家认为像袭击芝加哥那样极端的气候系统不会再次发生,但气象学家保罗·道格拉斯争辩说,1995 年芝加哥事件“只是下一个热点的预演”,在这一问题上他与气候学家处于同一个立场。热浪早就成为美国最致命的环境问题,并且会变得更加破坏性。

近些年,许多城市都从芝加哥热浪灾难中学到了很多,并且它们执行更加周密的计划以对极端的夏季气候威胁予以提前预防和抵制。而那些每天都会出现的危机,例如,在穷人与孤独城市居民中由社会原因所造成的慢性死亡却被忽略了。事实上,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正是美国各大城市提前发布高温警报并启动防护系统的那一年——国会却采取措施废除低收入家庭能源补助计划和撤销穷人的联邦能源支持。芝加哥市失去了许多低收入家庭可承担的住房,并且各级政府在评估社会危机和确认独自生活的老人的需求方面做得很少。社会政策工作应该有多方面的目的,因此没有一个严密的气候计划能够为其他社会领域产生出的极度脆弱性做出补偿。或许把灾难阻止计划改成仅仅是预警和反应计划会更实际一点,但是那些由于未来热浪所产生的健康威胁将持续增长。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公共政策为处于危险中的脆弱居民去处理那些社会的、生态的和心理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日常生活不安全,并且会使极端事件变得更有危险性。单一的部门,如芝加哥灾难委员会,是不能仅靠它自身就可以完成以上任务的。

## 灾难公式:城市极端条件日常化的典型危险

高温并不是我们唯一关心的事情。本书已经表明,极端外部力量,

例如,气候具有如此大的破坏性,部分原因在于当代城市中日益增长的孤独和私有化、极端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富人聚集区和穷人聚集区的扩展,使弱势居民在各个季节都面临风险。<sup>10</sup>分析芝加哥热浪是有用的,因为该事件展示并且暴露了那些早已存在却很难察觉的因素。然而,如果一个社会解剖分析的基本价值在于深化我们关于产生隔离和死亡的社会原因的认识,那么它的更深层次的贡献就在于它拓展了我们对于城市居民应该继续在什么条件下生存的认识。我总结了一个公式,它包括了芝加哥灾难的各方面条件,其他城市即使没有热浪,也存在类似的公式。

首先,城市居民中独居老龄人口增加,他们常常没有近亲,也没有可靠的常规联系和社会网络。医学进步、卫生关爱,以及为曾经有长期和稳定职业的退休人员提供的公共和私人津贴,已经使大部分美国人的寿命有所增长,但是我们的社会政策却没有随之改变。那些老人,尤其是处于与社会隔离状态、社会联系被切断、独居在家的和生病的老年男性,在晚年遭遇了社会剥夺和角色缺位。那些老年妇女,比老年男性更容易处于贫穷、生病和独自一人生活的状况中,却可能面临着相对比较少的隔离,但是绝非远离独自变老的挑战。这些老人在热浪事件中比其他群体的人面临更大的死亡危险,同样,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承受着不可见的威胁和不可言说的尊严危机。对于这种由社会的老龄化和个人化所造成的危机,我们找不到一个简单的解决方式,而且定义这些事实的当代词汇,也没有很好反映出这种关于老年人孤单地生存和死亡的令人烦恼的焦虑,这种焦虑需要细细地观察与思考。

近期关于社会资本讨论忽略了对成千上万孤独地生活着的或是遭遇健康问题的老人的社会解决方案的重视,社会资本指帮助人们获得资源、信息和支持的网络,以及互惠的联系方式。而且对于社会资本的狭隘性和技术性的要求,已经把人们从本来应该是多年网络研究的关键领域转移了出来。这些网络研究的关键,和人们所认为的不同,本来应该认识到是贫穷和窘迫(包括身体伤害和疾病)倾向于损害社会关



系的纽带。有压迫性焦虑的人(这些焦虑包括使得预算平衡,规避近距离的危险,以及在明显的不健康环境中维持活力)极有可能在他们的社会关系中表达那种压力与焦虑,并且这种行为反过来又撕裂了他们需要去维护的社会纽带。当他们处于被隔离状态时,穷人或老人失去了获得信息和调动各种资源帮助他们重新建立联系的途径。当前的策略(这一策略是想要通过给予穷人和老人在市场中选择服务的权利,或给予他们加入地区性群体的机会来建立新的社会保护方式)将会被穷人和老人每天面对的贫困和老龄化问题所削弱。如果我们想对这种隔离的幽灵,对这种陷入社会边缘的老人的特殊威胁做出一种集合性的回应,我们必须正视它们。

也许,对于这种集合性努力的最大障碍来源于灾难公式的第二个因素:日益增长的居住集中化,以及富人和穷人的社会隔离。这些富人和穷人分别聚集在互相排斥的隔离的城市的不同部分,这样会存在互相隔绝的风险。正如道格拉斯·马西所说:新的美国不公平的社会生态在于保护弱者的政治运动的增加,因为中产阶级或上等阶层居住在一个由同类人组成的社会与环境之中,这种情况比前20年的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严重。尽管近几年经济的增长和人口的增加提供了一些使美国城市恢复生机的极好的借口,但是使城市恢复生机这一信念的一个关键的、必要的条件是那些成功人士退出他们以前所生活的环境,并且去面对那些穷人和被隔离人所遭受的痛苦。根据马西20世纪末的主要人口统计趋向的报告,“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美国城市地区的富裕居民更倾向于与其他富裕人群来往,而渐渐与他人隔离,尤其是穷人”。<sup>11</sup>穷人这种被抛弃的情况则会使犯罪、疾病、暴力和隔离的情况恶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些放弃已经抛弃他们的城市的隐居者,其实并不是社会和空间安排所导致的不公平的唯一受害者。但是在芝加哥事件中,他们的命运表现了那种城市极端的可能性。

热浪中芝加哥的经历所引起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是否当代的技术 232

(这种技术把那些困难的人和他们的的问题从城市和郊区人的视线中移除)已经改变了事实,掩盖了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紧张状态,并且把那种悲伤和绝望的经历从电视和新闻王国中驱逐出去。有多少关于持续的兴旺发展和福利改革成功的言论拒绝考虑那些成千上万的被隔离的、贫困的、过度工作的,甚至是被监禁的人的生活状况?(这些人的存在好像变得很遥远,与世人不相关并且极容易被忽视。)如果我们密切关注曼纽尔·卡斯特所说“第四世界”的人们与普通市民所认为理所当然的物品、服务和信息都远离了,那么那种情绪(是关于与世界各地的行动者持续联系的网络社会的危机)会发生什么变化?

由居住在集中的富人区中的市民及选民选出他们的候选人,使本来应该致力于修正不公平和保护脆弱的城市居民的政府在这方面做得很少,这并不使人感到奇怪。联邦政府同时做出的两个计划——给予财产所有者补助的灾难减轻计划(常常以牺牲困难人群为代价)与减少对于穷人提供家庭能源支持的社会计划——是一个福利政府如何保护特权,并且让穷人自生自灭的极端例证。同时,从公共政策和地方治理上,我们可以看出政府根本没有提供基本物品的政治意愿,如能源、健康关爱或是更广泛地帮助穷人。

热浪的社会解剖分析指出了四个重要的但是很少用关于社会保护的政治方式加以讨论的问题。第一个是组织方面的错误配置。这种错误配置是由于对健康方面的持续授权以及对准军事政府组织的持续支持所导致的。这些组织(如消防组织和警察机构)的行政长官和局长很少为“温和的服务”工作。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城市居民,包括老人和弱势群体是公共物品的积极消费者的预期。在这种预期下,只有聪明的顾客才能市场中得到服务而非所有的市民都拥有社会保护的权力。

233 这种市场模型的政府管理方式创造出一种错误的服务配置方式。这种方式下,那些没有能力却极需要服务的人却得不到服务。第三个问题是城市管理者与管理者所应服务的弱势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拉大了。当政府的运作越来越像职业的公司,委员变成了 CEO,机构把更多的

服务转包给私人公司,并且警察取代地方官员和区域长官作为社区的哨兵时,政治组织有失去与市民联系的危险,并且有不了解市民需求的危险。热浪事件委员会报告所指出的被隔绝的市民需求得不到支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第四个问题是政府越来越多地运用公共关系和市场营销计划去编造他们各项计划成功的新故事。回应型政府可以使用这样的形象塑造活动告知市民,他们可以利用这些公共项目和资源,也可能被操纵,成为一种否认问题存在和严重性的机制,而这些问题与居民有关,影响到他们的政治支持。

社会解剖分析所关注的最后一个条件与新闻机构在城市象征性政治中的角色有关。这里有两个重要的趋势需要考虑,第一是新闻机构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文化和经济压力,使新闻公司能够娱乐观众并使新闻机构能够获得更多利益;第二是新的输送体系的兴起。这种输送体系利用市场规则去区分读者,以便于读者得到更少的中心地区的信息而得到更多他们自身的信息。近年来,顶尖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评论家已把注意力转移到一种如前《芝加哥论坛报》编辑詹姆斯·斯夸尔斯(James Squires)所说的公司接管美国新闻媒体的方式,或者以本·巴格迪基安(Ben Bagdikian)的话来说是媒体垄断的方式。这种方式已经损害了新闻机构的公正性。<sup>12</sup>在大公司的管理下(这种大公司对于账本底线的关心以及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对股份的关注,经常与编辑对于职业新闻价值的忠诚相冲突),主要的新闻机构(包括有声誉的报纸以及地方电台)现在都在努力平衡各种不同的需求。热浪给予编辑和记者提供了一个使新闻的极大覆盖率、严肃性和世俗平民化内容兼容的机会。但是一些具有探究性和洞察性的分析却因为一些原因而显得黯然失色,这些原因包括引起轰动的图片、戏剧性和被误导的标题,以及模糊灾难的社会因素的错误的政治讨论。根据《芝加哥论坛报》一些员工的讲述,关于热浪死难者的最有深度的评论从来没有上过版面,因为夏季的故事与现在的秋季毫不相关。又有多少其他的关于隔离的故事每天在新闻室中以相同的原因被驳回退稿

呢？当出现其他对城市穷人来说非戏剧性而是直接性的危机时，我们怎么办呢？

目标新闻的先进系统的制作和发行，使这些问题都与现代城市中心区有关。我们已经看到，地方新闻机构在热浪新闻方面是如何配合族群（这些族群在一张图片中对于看到新闻的读者来说具有代表性），并且是如何替换城市冷气中心详尽的故事的（这一故事通常在郊外地区版中有一个关于骑马的特写）。城市新闻发行也会继续为郊区的读者提供城市戏剧性的新闻，但是新闻媒体已经在发展一种更好的技术去区分它们的产品。这种区分是为了满足更小的市场需要，并满足在地理上已经被分开的隔离区域的需要。<sup>13</sup> 如果由热浪事件中的编辑决定媒体以什么样的城市故事能够吸引郊区读者的话，那么我们有很好理由去相信城市的丑闻、壮丽的场面和悲剧将对于每一位观众都有新闻价值。<sup>14</sup> 但是那些不喜欢了解这种平庸的城市问题的读者将会忽略这些信息，并且城市中生活不愉快的经历和死亡的信息也会淡出这些人的视线。

## 社会解剖分析

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像鲁道夫·魏尔啸（Rudolph Virchow）和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这样的科学家为了使解剖合法化和制度化而不断斗争。这种斗争是作为识别死亡率的解剖技术，反过来，也是为提高医疗护理的有效性。后来的生物学模型的分析 and 干预的成功不仅产生了医药科学的革命，同时也改变了我们有关生和死感觉的文化词汇。今天我们在检查身体方面有比以前更精湛的技术，将来一些领域的研究者会取得更大的进展，在生物学解释上，我们有信心会突破各种限制，了解得更多。

但是医学并不能告诉我们很多影响生和死的社会条件。医疗显微镜的过度运用模糊了或者是使我们看不到产生疾病的社会病理学原

因。近来,一群批评家,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是心理学家和科学家,争论认为固定的运用医疗和医学知识的方向,已经使现代社会不能明白所有健康事件的最终后果:死亡。他们都同意从死亡的进程中修复我们的文化裂痕,并且死亡要求深化我们生活中社会组织<sup>235</sup>的知识。但是我们对于医疗诊断的长期依赖和官方报告对于它的支持,使得构建一门社会解剖学很困难,更不要说用它来指导了。不管怎么不满意,对于生物医学模型的控制是很难打破的。

灾难的威胁和每日的危机为发展一门人文的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生命和死亡的方法提供了一个好的契机。这一工程,在阐释城市中的灾难时,不仅是一个学术目标。<sup>15</sup>当我们用到所有的解剖学时(包括生物的和社会的解剖学),对于1995年芝加哥热浪的检查与审视将是有所希望的。这种希望就是通过研究死亡,我们不仅增进理解生命的能力,更多的是增进保护生命的能力。

## 后记 永远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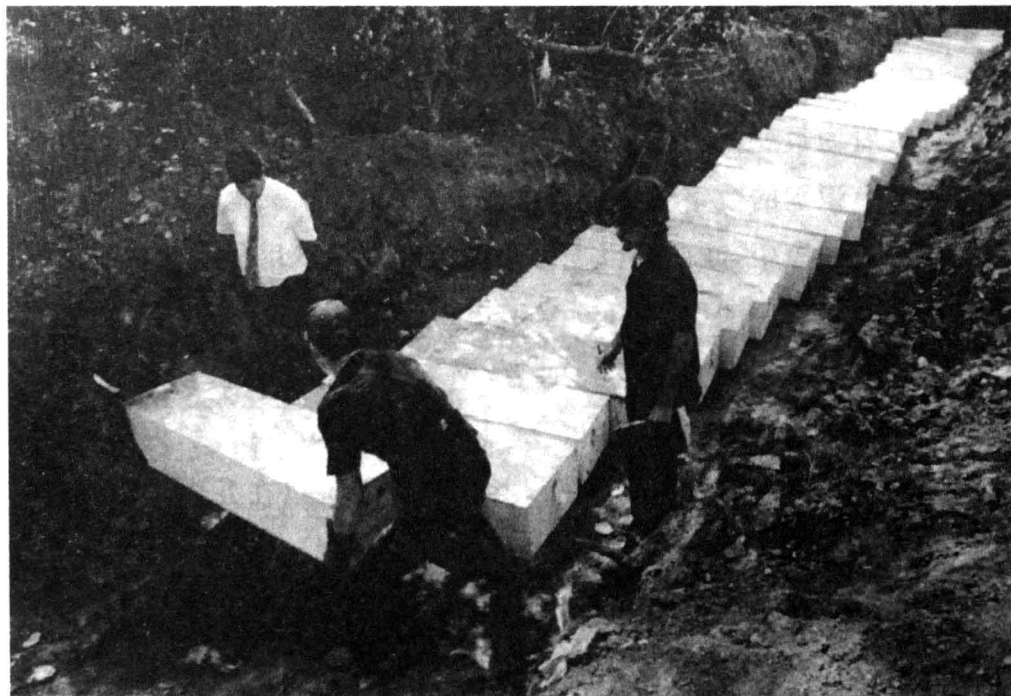
236 当夏天的空气使城市变得闷热时,尽管芝加哥居民与新闻记者偶尔会谈到 1995 年芝加哥热浪事件,但这次灾难与其他重要的灾难事件相比,包括一些造成人类很少死亡的事件相比,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关于热浪的制度史和公众记忆很重要,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了灾难怎样发展的过程,并且提出了一些概念和想法,通过这些概念和想法我们可以解释事件的意义和重要性。极端性事件过去常常被视为关于一段时期历史性知识的主要资源。在那一历史时期中,事件发生时和事件发生后都会激发行动。芝加哥大火变成了这个城市重建自身与重塑辉煌的能力,成为现代大都市的一种激励,更成了政治改革的一种动力。<sup>1</sup> 同样,20 世纪 60 年代的城市动乱成为持续的种族对立和阶层裂缝的一种文化标志,这种种族对立在当时许多美国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所发生事件的阐释有助于帮助新闻工作者和官员思考“城市危机”,产生新的认识并且会激发社会运动、文化生产和直接解决城市不公平问题的政策措施。

事件改变了事情的顺序,但是人们怎样做取决于行动者明白发生了什么的经验资源与文化规划方案。<sup>2</sup> 热浪也许是一个完整的历史性经历,但它在历史事件中的地位将永远不能被替代。因为在一本书的范围内,它的主旨在于认识到 1995 年 7 月所发生的事件里没有被研究探索到的方面,为记录灾难和回忆它的意义做出了贡献。芝加哥热浪,正如我所认为的那样,可以被视为当代城市生活状况的一个晴雨表。

237 这种城市生活状况是我们生和死的生活方式,是以前我们没有意识到的价值,现在人们关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美国城市的各种言论中,1995

年的热浪精神创伤并非人们所想象得那样受到重视。美国城市的解释者关于1995年夏季的公开言论缺少一种城市社会条件的视角,这种视角也许才可能真正揭露灾难产生的原因。在与芝加哥和其他地方的人非正式讨论时,我发现很少有人还能记得热浪事件期间人们所遭受的痛苦。安置在库克县太平间的尸体,关于热浪引发死亡的讨论,停电和联邦爱迪生公司存在的问题——这些都是主导公共想象力的图像。大部分人估计死亡总数大约在100人,官方数字从来都会让人感到意外。

如果热浪的公众死亡隐瞒了社会条件因素和产生热浪影响的过程因素,那么最大的葬礼事件则反映了它最深层次的真相(图47)。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人来参加这些芝加哥死难者的葬礼,这只不过是强化并且延续了对于死者生命的低估。



238

图47 永远在一起:太平间的工人在城外的集体公墓里安葬热浪死难者中无人认领的尸体。资料来源:路透社,摄影者:斯科特·奥尔森,存档照片。



到 1995 年 8 月,芝加哥又发生了其他的事件,记者把焦点转向其他丑闻和事件上去了。但是 41 名热浪死难者的尸体仍然在县太平安间中无人认领。距离 7 月那个死亡周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县政府官员认识到他们得把这些人安葬在无主墓地了。8 月 25 日,在霍姆伍德(Homewood)郊外的一个集体墓地,政府埋葬了剩余的尸体,还有这个月增加的其他 27 具无人认领的尸体。距离芝加哥市中心有 40 分钟车程的公墓所有者签署过一个合同,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库克县无人认领的尸体埋葬在这里。约瑟夫·里德威尔,附近的第一长老会(First Presbyterian)教堂的资深牧师,在这时自愿为贫穷的死难者主持葬礼。里德威尔告诉我,“我自己保留着在那里安葬的人的记录”,“这并不包括所有死者的名字,但是在 1996 年我做了一个统计,从 1980 年以来,在那儿至少安葬了 4000 个成年人。我独自完成了所有的仪式。那些仪式虽然简短,但是庄严。我做了和为其他人做的一样的祈祷”。

县政府为每一具尸体使用一个简单的未完成的胶合板箱子,用写在铜标签上识别的数字和可处理的文本来区分每一具尸体,然后把箱子放在一个沟壕中,政府用以上方法来保证埋葬费用的低廉和高效率。公墓总经理凯文·沃恩(Kevin Vaughan)解释说:“这是基于经济和效率。”“如果是 68 个单独的墓地的话,埋葬需要花费很长时间。”<sup>3</sup> 沃恩说,一般来说,最低的安葬费用是每具尸体至少 1000 美金,但是集体安葬的费用是每一具尸体 100 美金,并且工人们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挖开并且埋好一个大坑。

在集体安葬的那天早上,一群记者去了墓地见证这一事件。只有两个市民,霍姆伍德的历史学家伊莱恩·艾格道夫(Elaine Egdorf)和她的小孙女出现在葬礼仪式上。伊莱恩回忆起那个不堪回首的时刻,她对于葬礼的解释值得详尽引用。

我对于那一件事记忆非常深刻,那是星期五的早晨。我打开

了收音机并且听到热浪死难者的葬礼将于那天早上在霍姆伍德举行的通知。当我听到那件事,我想“我怎么不知道那件事呢?”然后我就想“多年来,霍姆伍德纪念公墓已经通过竞标取得埋葬来自库克县无人认领尸体的合同。约瑟夫·里德威尔牧师总是义务地为这些无人认领的死者做祈祷,并且这样的祈祷几乎是一个月就有一次”。我常常认为在那里参加葬礼全部的人就只有卡车司机、公墓的员工和约瑟夫·里德威尔牧师,因为没有人去关心那些死去的人。并且我认为,“作为当地的一个历史学家,我需要去那里并带上我的相机”,但我也想,“这是我见证历史的一个机会。”

在到达公墓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媒体会在那里。他们通常不会那样。我知道这些事情总是在发生。在那个公墓,只要他们得到一卡车的尸体,他们每30天或每60天就会埋葬一批。他们生活在大城市附近,并且许多人没有亲戚朋友,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

看到这么多的木箱子排成一行,确实令人有些震惊。想想这里有这么多无人认领的人。并且一会儿,公墓的人员将处理这些尸体。看到5具或10具尸体是一回事,但是看到这样一长排的尸体却又是另一回事,在我脑海里闪现出的却是20世纪40年代的新闻短片,这些短片中呈现的是大量盛放尸体的木箱子在欧洲被埋葬,那是因为战争。不过,这里并没有战争。有这么多人却永远地躺在这里,并且这里是我所生活的地方。

[墓地]是在一个荒凉的地方,路在公墓的一端,紧邻采石场。它并不在有树的地方,因为你必须要有一个大的场所,当需要进行一个大的埋葬时,公墓工作人员常常使用墓场的边缘地方。你知道,他们不可以一次埋葬一两个人,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不具有经济可行性。 240

公墓工作人员挖一个沟壕,一个长长的沟壕,并且把木箱子放进去。通常他们会租一个卡车运送尸体,车就在北边。在夏季的

时候,公墓有时会雇用额外的人员。有时他们雇用的人是十几岁的小孩儿。“你想,你见证了所有的这些事,但当你到了一定的年龄,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事实。”那长长的沟壕……

然后,我打了一个寒战,因为这儿没有任何家庭像我的家庭那样在那些人被埋葬时去怜悯他们,为他们哀悼。我为这些人感到伤心,因为他们没有家人在他们安息的时候为他们哀悼。这就像是这里没有人关心他们,尽管他们有牧师和公墓的其他人。

但是这整件事是非常漫长的,因为他们很明显在等待其他牧师的到来,我并不知道是否其中的一些人的时间改了,但是我认为牧师说了一些,然后一些迟到的人明显是从城市赶来了,是在牧师完成工作以后。

梅甘和我是两位在那里的仅有的市民,所以媒体的焦点集中在我们俩身上,因为我们俩是他们仅有的可以采访的人。[看看在公墓时记者的照片]就是在这一张图片上有15个记者。那还只是参加公墓葬礼的人的一小部分。那里有摄影记者、摄像工作人员、司机、出现在摄像机上的记者以及出版刊物的媒体。那里只有媒体,并且没有人可以接受采访。那时就像我们成了死者的哀悼者,死者的家人并不在那里。

为了让你自己感觉好受些,你必须去哀悼。因为那些人被忽略了,或者是他们没有家人。你会认为我们本来应该在他们困难的时候给他们带去一口平底锅,或者是我们本来应该给他们一些食物。我想世界本来应该是那样的感觉:我们不应该去忽视他人,我们应该关心他人。所以我们需要带给他们一束鲜花,或者是我们应该为他们建立一个墓碑。我并不是非常确定,但是我有那样的感觉,我们需要那样做,为了自己的原因,因为那样会使我们安心。我们将记得这些人,虽然我们并不认识他们。也许这里的某些人确实认识某些死者,并且他们会很伤心。

有多少人因为热浪而死去?这些仅仅是没有人认领的。热

浪,当你认真地思考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因为有许多无人认领的尸体要安葬,县和公墓的员工已经安排一些牧师去主持葬礼。在仪式正式开始之前,其中有两位约定要来的牧师却没有来,并且整个葬礼中都没有出现他们的身影。正如往常一样,里德威尔牧师主持了仪式,并且习惯于独自主持这样葬礼的他,发现媒体的出现以及不断闪烁的照相机使得他所主持的葬礼显得更具有悲剧性。“让我觉得悲哀的是,仅当有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才对这一事件感兴趣,”他说,“我在热浪之前就主持了很多这样的仪式,但是没有人参加。”

另一个宗教官员,墓地的一个陌生人,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件,这就是城市中充满了让人难以忍受的骄傲和自信。“你常常听到在世界各地有集体葬礼的事件,因为战争和灾难,”他痛心地说,“但是这里是我们的家,这里是芝加哥。”在举行仪式的时候,160英尺长10英尺宽的大墓场没有墓碑,没有标识。在大城市正处于繁荣的时刻,城市边缘的死者却没有任何一个标识去证明他来自哪里。在1996年的夏天,一个由厄尔·刘易斯领导下的市民团体帮忙树立了一块4尺高的花岗石墓碑来装饰墓场,现在这块石头是唯一可以表明安眠于地下的死者身份的标识。

我在2000年夏季最后一次去了墓地,那时已是热浪过后五年多了。那是一个安静的、多云的早晨,墓地很少有其他来访者。我和一个墓地经理一起开车前去墓地,把车停在公路旁边的一个阴凉地方。在到达空旷的墓地之前,我们爬上一个斜坡。一面小小的美国国旗——旗子的帆布因为长期暴露在外已经损坏了——静静地被安置在墓碑的基石上面。当我问到经理来访者多久会来墓地时,她回答的方式就像是她以前已经考虑这个问题有许多次了。“一些记者会时不时地来,但是也就只有那些了。我们从来没有看到热浪死难者的任何一个家属来 242 探访过,一次也没有,芝加哥的人也没有来过。”

霍姆伍德距离芝加哥并不远,但是大墓地中埋葬的死者对一个城市来说是如此微不足道,这件事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那些人无论是生或是死,在城市中都没有位置。几乎没有人会对这些极容易被遗忘的人感兴趣。但对于芝加哥的某些人来说,夏季热浪所引发的对于隔离问题的关注具有极大的震撼力,使他们难以忽视。当一个在太平间工作的年轻人把尸体带到他们最后安息的地方时,他开始思考他所帮助安葬的死者的人生悲剧。“它令人很伤心”,他说,然后说出一句很多人在看城市的灾难后都考虑过但又很少说出的话,“我希望我们都希望的:那就是我们不要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sup>4</sup>

# 注 释

## 序言

243

1. 官方的城市报告列出了七月份两组不同的中暑死亡人口总数:514 人和 521 人。在整本书中我使用了后一组数据。因为这组死亡人口数据统计得更加精确。

2.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1995, x.

3. Whitman, et al. 1997, 1517.

4. Bachelard [1934] 1984, 104.

5. Farmer 1995, 5.

6. Park [1916] 1969, 126.

## 导论

1. 约瑟夫·拉奇克的故事最初是由记者迈克尔·列夫(Michael Lev)1995 年报道的,我通过翻阅库克县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的档案把它作为一个案件来研究。据公共调查人员所说,独居和孤独终老的人收集垃圾的习惯是非常普遍的。

2. City of Chicago 1995, 2.

3. 这就是不知道美国社会问题的主题,菲利普·斯莱特(Philip Slater)在 1990 年发表的《追寻寂寞》(*The Pursuit of Loneliness*)畅销书中提出的“厕所假设”(toilet assumption)。斯莱特具有争议性的观点是,美国人生活在希望中,但这种希望却无视为世界所创造的有害的社会后果,这是他们逃避的一种方式。

4. 飓风、龙卷风、地震和洪水这类天气系统,其所到之处不但能够对人身和财产带来直接的和显著的影响,而且还为新闻媒体提供了生动、壮观的图像。电视、报纸和杂志着重报道这些灾难的特征,使它们成为地方甚至是国家关注的焦点,即使是在人员伤亡轻微时亦是如此(Gans 1979; Singer 1987; Sood, Stockdale and

Rogers 1987)。

有一长串的流行病和公共健康研究在热浪死亡率与贫穷、年老、性别和种族地位之间建立了联系,其中贫穷的老年黑人男性是最弱势的群体(Applegate, et al. 1981; Jones, et al. 1982; Martinez, et al. 1989; Oechsli and Buechley 1970; U. 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1995a)。除了最近刊登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上面关于中暑死亡的年度评论性文章外,医学和公共健康方面有代表性的学者分析了不同寻常的严重的中暑灾难,并将他们的发现刊登在专业杂志上。

5. 学者经常对其他灾难进行研究,以此来揭示不被察觉的组织(Das 1995; Vaughan 1996)、城市(Davis 1998)、社区(Erikson 1976)和政治(Molotch and Lester 1974, 1975)条件。然而对于热浪的报道倾向于掩盖社会现状,这使得问题更严重。社会科学家对美国灾难的研究一般集中于极端事件的分层影响,大都忽视了热浪,因此确实造成对热浪罹难者的忽视。的确如此,一份美国主要灾难研究的调查显示,尽管热浪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严重,对它的关注却不足。1994年埃里克森(Erikson)和1998年戴维斯(Davis)所开展的近期研究追溯了多种形式灾难的影响,但是对于酷热天气却谈得很少。1998年,玛丽·科梅里奥(Mary Comerio)对住房和灾难的研究评论了在龙卷风、飓风和地震中建筑物的脆弱性,但是她却没有提到居住条件对于热浪中罹难者的影响。

为了拓展社会研究和当代政治学的视野,重新定义自然界并着重揭示灾害环境作为一种重要的但未成为一种平等、公平的研究形式,有些学者已经构建思考现代社会分裂的新方法(Cronon 1995; Szasz and Meuser 1997)。根据大多数的相关研究,环境危险因素,例如,靠近危险的垃圾处理设施和污染工厂、不安全的水源和有碍健康的居住环境,都大致按照阶层、团体地位和社区的政治权力而分布。在他们试图使自然界非自然化时(Steinberg 2000),环境正义学者已经注意到将灾难作为社会事件处理的可能性,并且这项研究有助于建立属于环境社会学的中心问题。

然而,在社会科学中,近期大多数灾难研究都将焦点从环境方面的灾难转向技术性的灾难,并且学者对卡伊·埃里克森所谓的“新的困境”感兴趣,它将“技术性”的灾难和“自然性”的灾难做出了明确的区分(Erikson 1994; Freudenburg 1998)。这些术语重组了灾难研究领域,它们在新环境社会学和灾难社会学之间形成一条鸿沟,它肯定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环境灾难是自然现象,而忽视社会排斥和社会剥夺对某些社区脆弱性的影响。有一种明显的区分存在于环境灾难(如热浪和洪水)和大灾难(如工业或技术错误、故障带来的飞机撞击、工厂爆炸)之间。但是,将自然灾害的范畴自然化,那么,不可避免呈现的是,损害是由气候引发的,但是由社会和它们的政府组织不当造成的。阿马蒂亚·森(Sen 1981)的《贫困和饥荒:论权利和剥夺》一书表明,一系列类似于持久干旱的灾难,很久以来都被认



为是由自然力造成的,但事实上是由政治和社会系统剥夺了人们追求避免饥饿的购买力造成的。像炎热这样的外部压力导致的巨大的社会痛苦和死亡的风险,取决于社会脆弱部分所处的“风险位置”(Beck 1992);并且,正如森所认为的,这些位置及他们所代表的脆弱性水平,形成于有助于确定但是对现代社会做出区分的权利和社会保护体系。

6. Mitchell 1999, 2.

245

7. Erikson 1976, 12.

8. 参见基尔南和杰林斯基(Kiernan and Zielinski 1995)、福奈克和斯坦伯格(Fornek and Steinberg 1995)。对政治委员会、新闻报道和其共同的困惑而言,在掩盖灾难和其他主要精神创伤的分层影响方面是相同的,这一事件简化和综合了痛苦或者是由多数脆弱的人群来体验死亡。1996年,史蒂文·比尔(Steven Biel)在关于泰坦尼克号灾难的研究中,关注人们掩盖泰坦尼克号死亡率水平和极端的阶层差异的社会共识的问题。一位部长评论说:“(泰坦尼克号中)富人和穷人也一样死亡’……这一点可能在个别事件中是真实的,但不是总体情况。”(Biel 1996, 45)1995年,人类学家维纳·达斯(Veena Das)在她分析印度博帕尔事件时也回忆了类似的情况。

9. 整本书中我使用术语族裔(ethnoracial)作为身份的基础,它是基于“种族”(race)和“族群”(ethnicity)两词而来的。拒绝使用“种族”的主要原因在于,否认它具备作为一种分析术语的资格;因为尽管“种族”是现代生活的社会现实,这个术语却具有源于生物学的科学事实的历史共鸣,虽然这种观点已经很大程度上被否定。所有的分类是一种真实的建构,但这种分类在实现其理论和实践意义时忽略了他们的基础。“族裔”的概念包含更多的条条框框,它包含在“种族”的定义之内,但是学者对它更为友好,因为它更侧重指历史经验,而不是身体,而且它被认为是一种含有更少恶意的分类形式。“ethnoracial”这一概念在语法上包含了两种观点,而且它尤其能引起人们关注那些独特的、矛盾的和未经验证的分类方式,通过这种分类方式我们能够把人们和团体进行分类。这一术语无意作为一种解决分类问题的方法,而是激励人更深入地思考现代分类实践。

10. 参见惠特曼等人(Whitman, et al. 1997)有关芝加哥不同群体的最综合的死亡率评估。一份来自芝加哥卫生局1995年9月的备忘录中,城市流行病专家警告非拉丁裔美国人和白种人中暑死亡率不应该被解释等同于中暑死亡率,“非拉丁裔黑人(253人)和非拉丁裔白人(252人)的死亡人数是大致相同的,然而拉丁裔人(9人)和其他种族人口(4人)的死亡人数是很少的。在4个个案中,种族是不确定的。自从发现芝加哥非拉丁裔黑人和非拉丁裔白人有不同的年龄分布后,把年龄考虑其中是非常重要的……非拉丁裔黑人种族几乎是非拉丁裔白人种族各年龄区间的两倍”(Whitman 1995, 1)。在1979—1988年密苏里州(Missouri)热浪中非裔美国人的死亡人数几乎是白种人的五倍还多(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246

1996),并且在多次案例研究中,老年黑人已经被确定为在中暑健康危机中最脆弱的群体(Applegate, et al. 1981;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1984)。近些年,公共健康学者一直在对拉丁裔人悖论(Latino paradox)进行调查:他们发现,从健康结果的范围看,拉丁裔人的健康状况好于其他群体,他们更少面对死亡与发病的危险。参见阿布雷多-兰扎等(Abraido-Lanza, et al. 1999)。第三章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社会生态学的视角。

11. Gibson 2000, 54.

12. 芝加哥的社区概念,是50多年前由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mmitte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与当地政府机构和美国人口普查局(the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合作的情况下确立的。根据1995年芝加哥数据汇编,社区最初是基于以下几个因素提出的:(1)社区的居住、发展和历史;(2)当地对社区的认可;(3)当地的贸易;(4)当地机构的分布和成员资格;(5)像芝加哥河及其支流、铁路线、当地交通系统、公园和林荫大道这样自然的和人为的界限。社区并不是完全与芝加哥邻居关系和社区机构相一致。事实上,它们更多的是科学家和行政管理者所做出的解释,而不是为城市居民所熟知和使用的自然分类。社区对比城市的不同地区是有用的,主要因为它们的统计数据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可以进行对比和历史性研究,并且因为人口跟踪数据有时候太小而不能揭示聚集社区的趋势。现在芝加哥城有77个社区,1990年人口数在6828(近南区)和114079(奥斯汀)之间,人口平均数是36000。

13. 在社会自然学中,社会流行病学多年的传统是由涂尔干(Durkheim)创立的,并由伊芙琳·北川(Evelyn Kitagawa)应用在美国死亡率的研究上。菲利普·豪泽(Hauser 1973)已经建立了相当多证据来表明,死亡与濒死是有显著的社会性和分层的过程。然而在考虑到那些既包括由政府机构发布的官方报道,也包括由卫生方面学者做出的科学研究的文献时,重点是要说明通过那些城市最脆弱居民的尸体来表达芝加哥不公平的方式。

14. 保罗·法默(Paul Farmer)的《传染病与不平等:现代瘟疫》(1999),是一种典型的多层次社会流行病学模式,它将政治经济的不平等因素并入了它的分析中。

15. 分析将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世界之重》(1999)中创立的综合性的社会苦难研究的方法与阿马蒂亚·森(Sen 1981)发展的灾难研究模型糅合在一起。

16. 参看布尔迪厄《世界之重》一书中的介绍论文,关于如何将不同的和有分歧的观点加入到解释社会苦难的讨论,有助于在那些彼此间联系甚至没有直接联系的人们之间建立起某种关系。

247 17. 探究城市中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关系的课题,是早期的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们的中心,但是随后的城市学者倾向于关注特定邻里关系或群体。正如理查

德·森尼特(Richard Sennett)所解释的那样,“芝加哥学派的第一批成员……提出的问题是有关城市内在特征,如何使城市不同部分与其他部分联合作用,在同一城市同一地点有不同的经历”(1969,12)。

18. 参见布尔迪厄 1996 年的《国家精英》一书,尤其是卢瓦克·华康德(Loïc Wacquant)写的序,对符号权力的定义做出了详尽阐述。

19. Mauss ([1916] 1979)。

20. 观点的变化有助于创立和促进芝加哥城市社会学的传统。在他的经典文章《城市:对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调查的建议》中,罗伯特·帕克(Park [1916] 1969)引用涂尔干的传统观点论证城市本身就是一个有助于社会研究的案例。“一个大城市”,帕克声称,“倾向于……通过大量的方法揭露公众对于所有人类的性格和特点的观点,这些性格和特点通常是模糊的和被压制在一个较小的社区内的”(126)。1998年,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在他对于拓展个案法的理论解释中清晰地表达了第二个原则。“机构”,他认为,“当面临压力或者处于危机中时,以及面对不可预期的事情或者日常事务时,它们倾向于暴露自己。”(1998,14)。

21. 关于城市不平等新形式的讨论,主要有彼得·马库塞(Peter Marcuse)的《分割的城市有什么新意?》(1993);彼得·马库塞的《飞地、避难所和贫民区:后福特时代的美国城市有什么变化?》(1997);卢瓦克·华康德(Loïc Wacquant)的《边缘化的持续出现:边缘化的属性与含义》(1996);道格拉斯·马西(Douglas Massey)的《极端的时代:21世纪财富的集中与贫困》(1996);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千年终结》(1998)。

22. Nieves 2000。

23. 阿尔·亨特(Al Hunter)的《象征性社区》(1974)是芝加哥象征性社区建设最好的分析,也是对流行于整个城市社区困惑的最好分析。

24. Donoghue, et al. 1997, 11。

25. 在《真实的弱者》(1987)和《当失去工作时》(1996)中,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记录了当城市失去成百上千的制造业工作时,芝加哥的损失程度。威尔逊关注于工作的减少对芝加哥贫穷的非裔美国人的影响,但他不应该掩饰去工业化给城市带来的更广泛的影响。

26. Fegelman 1995, 3。

27. Shen, et al. 1998。

28. Schreuder and Stein 1995, 1。

29. 1970年发表在《环境研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弗兰克·奥克斯里和罗伯特·比茨利(Oechsli and Buechley 1970)使用了非正常死亡的概念评估1939年、1955年和1963年洛杉矶热浪的死亡人数。

30. 关于惠特曼和他的同事所使用的统计方法更加完整的表述,请参见惠特 248

曼等(Whitman, et al. 1997)。

31. 不论卫生部门官员如何强调炎热的危险并不是芝加哥所特有的, 记者仍反复地问为什么芝加哥比其他城市的死亡人数更多。《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和国家气象局已经发布了关于密尔沃基(Milwaukee)死亡情况的评论(国家气象局1996;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996), 并且威斯康星州的一些学者写了一份未发表的研究危机的手稿(Nashold, et al., n. d.), 但是密尔沃基灾难研究报告, 公众关注的很少。在1871年佩什蒂戈(Peshtigo)小镇发生的一场毁灭性的密尔沃基火灾也有相似的情况。尽管它被证明比同一年的芝加哥大火的伤亡更多, 却得到了更少的关注。

参见保罗·亚尔戈夫斯基(Paul Jargowsky)的《贫穷与地区》(1997)、道格拉斯·马西(Douglas Massey)和南希·登顿(Nancy Denton)的《美国的种族隔离》(1993)中芝加哥和密尔沃基的种族和阶层隔离的数据。两个城市都有相当高的贫穷聚集和种族隔离比例。在城市集中的死亡人口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理由去思考城市特定的环境条件造成了芝加哥和密尔沃基居民的脆弱性。来自伊利诺伊州公共卫生的研究人员认为, 尽管热浪影响了伊利诺伊州的南部地区, 但芝加哥每10万人死亡20人的比例是州南部地区的每10万人死亡2人比例的10倍。

32. Fegelman 1995, 3.

33. 同上书。

34. 伊利诺伊州公共卫生部(Illinois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1997。

35. 马塞尔·莫斯(Mauss [1916] 1979)在他的文章《爱斯基摩人的社会变动: 多元隔离下的社会凝聚力》(Social Variations of Eskimon: Social Cohesion in Polysegmentary Societies)中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在解释他的民族学(ethnological)研究方法时, 莫斯写道, “当问题出现时, 不仅是机构或者一个集体代表每次承担一项, 而是将所有事情都融合在一个社会体系下的共同协议中。如何描述这些能够使每一个社会融合在一起并适合于每一个个体的事实, 表述不能太过于文学、太不准确、太少界定。”

36. 参见由罗伯特·白金汉(Robert Buckingham)和他的同事完成的具有争议性的研究《与临终者在一起》(1976)。在研究中, 作者比较了养老院和医院濒死者的经历。这些并不是单独死亡的案例, 因为尽管病人相对隔离在机构环境中, 但是他们从工作人员那里得到了关怀与援助。

37. 大多数在家中孤独死亡的人因为太孤立而很难追溯他们在死亡前做了些什么。普遍令人相信的是, 那些热浪罹难者很大程度上被他们的家人抛弃, 这使得很难采访到死者的亲属。如果公开讨论热浪中的死亡情况, 询问他们的子女或者兄弟姐妹, 当他们的亲人孤独死去的时候, 他们在什么地方, 这也是对他们忽视(死者)的一种责备。

我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是使用历史工具,如档案研究和访谈,去了解在热浪一周中存活下来的芝加哥居民的经历。除此之外,我也通过田野调查去观察那些独居老人的境况,以及那些我所研究的重点地区的社会环境,例如城西的社区、城市政府机构和那些曾经报道过这些事件的城市新闻编辑室。环境在年复一年中以微妙的方式变化着,毫无疑问,这些地区的日常生活,在我对他们跟踪调查时与危机发生时略有不同。在这些居民区,我尽可能地让1995年炎夏的情境得到再现,气候对该地的社会生活有明显的影响,所以在随后的夏天,我的田野调查更多地是在西区独居这些地方进行。我煞费苦心地观察在最炎热的天气中社区的环境,因为这时的气候提供了再次访谈的环境,这时的环境与热浪盛行时非常相似。

38. 这一章的目的,是将一种民族志的视角增加到当前城市贫困研究学者所争论的“邻里效应”中。参见《邻里贫困:内容及对孩子们的影响》(Brooks-Gunn, Duncan, and Aber 1997)。就社会及空间系统的邻里关系是否对居民的生活机遇有独立的影响,该书有各种形式的讨论和争辩。

## 第一章

249

1. 参见尼夫斯(Nieves 2000, 10)。

2. 对独居生活的人的研究表明,收集各种废品堆在房间的习惯是非常普遍的。参见鲁宾斯坦(Rubinstein 1986, 158—165)关于独居生活老人的活动的讨论,尤其是对科恩(Cohen)先生的描述。

3. 目前聚焦于热浪罹难者身上的文章,没有提供独居老人的典型例子,但是这不是它的论题。相反,这些关于热浪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那些孤独和隐居老人的认识,而这些人大部分是被排除在学术研究和流行文献之外的。毫无疑问,尽管这些独居老人有着丰富的人生和社会阅历,但是他们的生活仍充满挑战。社会科学的研究记录独居老人通过何种方式使其生活有意义,在关于老年人不可能过得好的这一令人心烦意乱的未解之谜上,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例如,在阿莉·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的《意想不到的社区》(1973)记录了一群海湾地区老人活跃的社交生活,正如她所着重阐述的那样,这些老人“不是孤单也并不孤独”,相反“(他们)是社区的一部分,这些是我未能预料到会发现”。老年人通过一起工作来解决孤独问题,这就证明了孤独对于老年人是多么麻烦的事情。有一些活跃的老年人社区,霍克希尔德的研究展示了这些群体如何应运而生,以及一旦产生就对其进行描述。但是霍克希尔德的读者们太迫切地去颂扬她所描述的社区,以至于忘记了她是选择了精确地研究梅里尔社区(Merrill Court),而这里的居民是一个特例。她在文章结尾对项目的研究目的的解释比她

250 的其他解释更好。她写道：“在这本书中，我一直在试图强调的重点是关注那些孤独的人，而不是讨论孤独。梅里尔社区是一个出乎我预料的社区，是一个特例。住在普通公寓和房子里，住在破旧的市中心的酒店里，坐在公园中以及在便宜的餐馆吃饭都是老人不同程度的孤独形式。”(Hochschild, 1973, 137)霍克希尔德为其他人提供了了解梅里尔社区独居人们的社会生活的情况。

另一个类似的研究是芭芭拉·迈耶霍夫(Barbara Meyerhoof)，著名的人类学研究《我们的天数》(1978)，在这本书中，其焦点是最和谐的和社交中最活跃的的老人，他们参加了在加利福尼亚威尼斯的老人社区中心。还有汉密尔顿·吉布森(Hamilton Gibson)的《孤独的晚年生活》(2000)，在这本书中，作者以一个大学项目中活跃的老年参与者为样本，概括性地讨论了老人群体中较低层次的孤独。

4. Coles 1997, 4.

5. 参见科尔(Kearl 1996)讨论的衰老和死亡的关系。科尔认为“在老年病医学圈中，对历经衰老而死亡有一种奇怪的缄默”，不过，现在关于安乐死的争论，有助于讨论好的死亡方式(1996, 336)。舍温·努兰德(Nuland 1993)在众多学者中，讨论现代版本的死亡的艺术(ars moriendi)，视其为一种必要的集体过程。在描述一个濒临死亡的艾滋病患者时，努兰德写道：“他在医院的最后几周里，肯特(Kent)从来不是独自一人。无论他们能够或者不能在他最后的几个小时里为他提供帮助，毫无疑问的是，他的朋友的持续出现对他的安慰可能超过护理人员所能达到的程度，不管他们关怀的注意力(集中在什么地方)。”(Nuland 1993, 196)在英国，一项关于濒临死亡的研究中，克莱夫·西尔(Seale 1995)发现，在社会支持的资源很少的情况下，许多案例表明，在医院的濒死者有更强的社会融合能力。西尔也对当一个人独自死去时社区应该怎样发挥作用做出了评估。

6. 赫伯特·甘斯(Gans 1997)报告，在美国有六本热销的社会学方面的书，他们依次是：《孤独的人群》、《泰利的街角》、《追寻寂寞》、《再见吧，公众人物》、《羞辱受害者》、《心的习性》。在这些书中，只有《羞辱受害者》没有明确地说明孤单的、寂寞的或者崩溃的社区之类的问题。

7. 关于那些社会化隔离下芝加哥居民死亡率的残酷讽刺是，芝加哥作为美国城市社会学的诞生地和符号资本(symbolic)，是一个活生生的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隔离在美国城市背景下被“发掘”出来，并且成为社会科学分析的一个核心范畴。此外，芝加哥也是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son 1987)重新将社会隔离作为当代贫困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的地方。如果在美国有一个地方，在那里社会研究有清晰的背景条件并且有社会隔离的原因和结果，那么这个城市一定是芝加哥。然而在热浪的发生过程中和结束后，这座城市的大多数人，包括社会科学家和政策专家都对这里的状况表现出吃惊和难以置信的态度。我们应该问一下，为何这么多的研究是关于芝加哥的社会隔离，而对隔离情况的了解却如此匮乏呢？



部分原因是美国城市社会学家所使用的隔离的概念,它始于罗伯特·帕克 251 (Robert Park),随后由芝加哥学派的社会科学家继续研究,它没有涉及关于这个术语约定俗成的含义:“隔离”字面上的意思是个体不与其他个体联系。相反,社会学家使用隔离的概念来描述社区之间的联系,而不是社区内部的联系,隐含的意思是引用了字面上隔离的个体层面将其扩展到邻里或者群体的层次。除了一些特例外,社会学家对于字面上的社会隔离的研究很少,他们将这个问题留给了专门在传染病学、老年医学和社区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者,而他们的研究没有清楚地表明隔离发生时的社会和历史背景。然而,隔离问题的研究已经与社会网络学相结合,这为字面上的或者相关联的定义铺平了道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社会网络分析者建立了隔离的相关范畴,它是指:(1)一种个人网络的特征,例如克劳德·费希尔(Claude Fischer)和苏珊·菲利普斯(Susan Philips)将“隔离”定义为“认识相对少的可能提供交换资源的人”(1982,22);(2)在一个网络中个人的行为,例如将“隔离”定义为“在一个社交网络中缺乏与其他个体的互动和交流”(LaVeist, et al., 1997, 723);(3)这两者的结合(Krause 1993)。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son 1996)也认可了字面上的隔离的形式,即隔离的人或群体住在高犯罪地区并且限制自己与邻居的联系,或者将他们自己隔离在家中以确保安全。当意识到术语本身创造的混乱性的时候,威尔逊在近期研究中警告说:“因此,当我们在谈到社会隔离的时候,应该把那些有意识地将具有危险性邻居家庭相隔绝的群体,同主流社会如机构、家庭和个体缺乏沟通和持久交流的群体做出区分。”(1996,6)伊莱贾·安德森(Anderson 1999)、弗兰克·弗斯滕伯格(Frank Furstenberg)和他们的同事(1998)也发现隔离与隐居对于在高犯罪率的贫穷地区的居民来说,是一种生存策略。

8. 在对单独居住和独自死亡关注的时候不应该模糊这样一个事实,即城市中的隔离是一种相对不寻常的情况。正如克劳德·费希尔(Fischer [1976]1984, 1982)有力地证明了,大多数的城市居民能将自己融入到能为他们在正常时候和危机时刻提供帮助的人际关系网络中。直到现在,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沃思(Wirth)的城市主义整体理论——这个理论是说城市生活将会破坏多种形式的团结,破坏社会团体并创造一种道德沦丧的社会和疏远孤立的个体——这显然是不正确的;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城市居民在整体上比农村居民的社会融合更少。那么在这一点上,城市社会学与世俗的感知是不同的,正如我的许多被调查者所说的,“大城市产生隔离”。都市人与他们传统的种族群体是否保持联系(Drake and Cayton [1945] 1993; Gans 1962; Hannerz 1969; Kornblum 1974; Suttles 1968),或者是否在共同的兴趣和经历的基础上形成新的亚文化群体(Fischer 1975, [1976] 1984)。几十年的研究表明,尽管在拥挤的城市中感到孤单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大多数城市居民的私生活丰富多彩,能获得有意义的联系和社会网络(Fischer and Philip 1982)。然而,我在这里想表明的是,字面上的社会隔离



产生于某种状况,这种状况尽管在历史上是不同寻常的,但现在在美国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

252 9. 总人口数据来源于美国人口普查局。伍斯诺(Wuthnow 1998)报告的数据显示,在1970—1994年独居的人口总数呈上升状态,老年人管理局(the Administration on Aging)的报告是在1998年有990万名老人独居。女性独居的数量在1970—1996年翻了一番,由730万人增长到1460万人。同期,男性独居的数量几乎增长了两倍,从350万人增长到1020万人。

10. 两项关于独居老人的重要研究是,克莱夫·西尔(Clive Seale)的《独自走向生命尽头》(*Living Alone towards the End of Life*)和罗伯特·鲁宾斯坦(Robert Rubinstein)的《奇异的路径:独居的老年男人》(*Singular Paths: Old Men Living Alone* 1986)。

11. 这里的社会隔离概念不同于以下两种社会学定义:一种是指群体间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另一种是来源于传统老年病学的定义,它将隔离定义为单身或者是一个人居住。有一些社会网络研究和老年病学研究报告将社会融合和社会隔离划分为不同层次的社交交往。例如,鲁宾斯坦(Rubinstein 1986, 172—179)将社会融合和社会活动划分从“很低”到“高”的维度;而吉布森(Gibson 2000, 4—6)列举了四种不同种类的孤独:“有形的孤单”、“思想上的孤独”、“由于个人性格带来的孤独感”和“隐居”。

12. 吉布森(Gibson 2000)的研究显示大多数独居的老人并不孤独。现在有些传染病学研究阐明了社会融合对于长寿和健康的重要性,这包括一篇对加州阿拉梅达县(Alameda County)、蒂卡姆西(Tecumesh)、密歇根州(Michigan)、达勒姆县(Durham County)和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的广泛的纵向研究的文章(Blazer 1982; House, Robins and Metzner 1982; Seeman, et al. 1987)。

根据联邦统计数据显示,独居或者与外界没有联系的老人贫穷的可能性是与家人共同生活的老人的三倍(老年事务部,1999, 10)。汤普森和克劳斯(Thompson and Krause 1998, S356)发现那些独居者和与其他人一起居住者相较,不仅更害怕犯罪行为,而且“与他人同住者的安全感比那些独居者更加强烈,因为他们对犯罪行为有更少的恐惧”。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Gurley, et al. 1996)上最近的一篇研究暗示,独居老人在遇到突发事件和生病时更加脆弱。在旧金山——规模是芝加哥1/4——的研究者报告显示,在12个周的急救事件中,工作人员发现有367人独居,并且他们在公寓被发现时或者瘫痪或者有1/4的情况是已经死亡。“我们的结果表明”,他们认为,“对于独居的老人来说,在他们的家中被发现没有得到帮助或者死亡是很平常的事情”(1996, 1714, 1716)。正如芝加哥热浪中的罹难者一样,在老人、白人和非裔美国人中死亡是不成比例的,其中老年的黑人男性是最超出比例的(人群)。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他们等待被发现的风暴里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承受着“那些可

以通过更早的介入而得以减轻”的痛苦,但是因为这些罹难者的隔离而使得(痛苦)加剧(1996,1714,1716)。成功的紧急呼叫系统,或者个人健康警报,某种程度上讲是我们对独居危险认识的一种象征。

13. Gibson 2000.

14. 尽管存在这些困难,少量的研究试图列举隔离或者在人口统计学范围内描述独居的特征。例如,一份调查报告发现,有4.3%的老年非裔美国妇女独居,并且在报道中,她们在采访之前的两周内都没有与她们的家人或朋友联系过(LaVeist, et al. 1997);一项亚特兰大关于隔离的研究显示,穷人比其他人更少可能跟其他成人住在一起,更少有一种亲密的社交联系,或者与家庭以外的人交流(Tigges, Brown, and Green 1998);另一项调查也显示,邻里关系恶化的老年居民比那些邻里关系良好的老年居民更少与其他人交流(Krause 1993)。但是所有的这些数据,都有可能是低估了实际隔离的程度,因为最隔离的人是研究者所不能接触到的,因此他们被排除在调查之外。

鲁宾斯坦关于独居老人的研究也是基于一些参与老年中心的老人的样本,因此他们具有相对的融合性。然而,鲁宾斯坦将他的47名被调查者分成16组“非常低范围”和“低范围”的社交联系,因为他们能够提供的是0—2个主观上重要的联系。根据鲁宾斯坦的研究,“4个人……是参与活跃的社交圈或者群体。4个人中有三人因为生理上的残疾而制约了他们走出家门。4个人中的两个人差不多没有家人,而另外两个被(家人)疏远……这些人没有一个能够确定谁是自己亲密的朋友。”其他的12个人“只和一个社交圈或活动组有联系或一个都没有。他们很少打出或者接到电话,他们也很少写出或收到个人信件。官方的联系占据了一周中的大部分联系”(1986,172—173)。

15. 与1995年芝加哥相比,密尔沃基经历的热浪死亡率的情况是,估计27%左右的死者死亡后被发现时,他们死亡的时间已经超过一天,而大约75%的罹难者的年龄在60岁以上(Nashold n.d.)。

16. 参见西门扎等人(Semenza, et al. 1996, 86—87, 90)。

17. 芝加哥城 1995, 4。

18. 参见雅各布斯(Jacobs)在西维尔斯(Siewers 1995)中的引用。想了解关于隔离趋势的完整资料,参见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的《独自打保龄球》(2000,第一部分和99—106页)。尽管对帕特南的分析有许多批评,然而我不得不参考他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讨论他的发现,即20世纪90年代后的美国人比前几十年花更少的时间与他们的朋友、家人和邻居一起进行社交活动。我发现,帕特南有关碎片原因的观点没有多少说服力。他最重要的因果机制“世代的交替”本身就是一个条件——或者甚至说是一种历史的一个内在因素——它需要一种超越帕特南提供的社会性的解释。而且他关于具有相对社会融合性的老人的阐述中——在20世纪70—90年代之间他们参与社区生活翻了一番——强调那些更

年轻、更健康的老人的额外的活动,但是却没有谈到更老的人和更孤立的老人(2000,第14章,尤其是第256—257页)。为老人提供服务的工作者和鲁宾斯坦(Rubinstein 1986)这样的老年病学家,认为有一种两极的划分,即高度活跃和极度隔离的老人。确实如此,健康的身体、丰厚的养老金以及充足的时间使一些老年成员积极参与到社会生活中,但是疾病、贫穷和活动的限制性隔绝了许多老人。问题是是否有一种有凝聚力的、统一的代际文化来解释这种仍不清晰的变量。

254 19. 在《恐惧文化》中,巴里·格拉斯纳(Glassner 1999)对分布广泛的恐惧方式进行了类似的讨论,特别是安全,它已经影响了美国文化的生活习惯。

20. 这种趋势既是一种国家的也是一种国际的现象。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联合国发达国家的清单里,1950年有12%的人口是60岁以上,但是这一比例到1998年上升到了19%,并且预计在2025年这个比例将会达到28%。年龄在6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在发展中国家也呈上升趋势,从1950年的1亿人上升到1998年的3.55亿人,并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8.39亿(Lawson 1998)。这份报告也预测了美国在80岁以上人口的数量也会有很大的增幅,男性将会从1998年的288.1万,增加到2025年的560万余,而女性的数量在相同时期也将会从583.5万增加到875万。尽管男性寿命的增长意味着有更少的已婚女性会经历长期的独居生活,但是老人独居的绝对数量在预期中是上升的。美国人口普查报告的作者展示了美国在1995年65岁以上有17%的男性和42%的女性独自生活(Lawson 1998)。克里斯托弗·詹克斯和芭芭拉·博伊尔·托里(Christopher Jencks and Barbara Boyle Torrey 1998)的研究显示,在1960—1985年,美国人中在65—74岁的独居老人的比例从17%上升到25%,而75岁以上的增长率更加引人注目,仅仅在20年里,比例就从21%上升到39%。当然,大多数独居者都保持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尽管据估计一些独居老人绝大多数时间里无人陪伴,在社会隔离和独居之间做出分析和描述性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在家、在公寓或者是在旅店的独居,对于我们感兴趣的独居种类是一种必要的前提条件。

21. 在《独自打保龄球》中,罗伯特·帕特南(Putnam 2000,265)分析了隔离和抑郁症的关系,但是没有阐明它与老人社会不安全感的关系。

22. 参见沃尔夫等人(Wolf, et al. 1983,465,470)关于非裔美国人同自己子女同住的文献回顾,以及帕特森(Patterson 1998)、费希尔和菲利普斯(Fischer and Philips 1982)关于男性与社会网络的评论。

23. 参见沃尔夫等人(Wolf, et al. 1983,465,469)的评论和发现。印第安纳大学的研究在弗莱明-莫兰(Fleming-Moran),肯沃西-贝内特(Kenworthy-Bennett)和哈洛(Harlow)的报告中。

24. 尽管有一个类似的名字,但是老年小兄弟会是一个教会组织,与穷人小兄弟会没有关联。参见老年小兄弟会近10年出版的报告。这里的文章是引自1997

年的报告。

25. Keigher 1991, 72.

26. Martin 1995, 2.

27. 在一篇反映邻里关系恶化和社会隔离关系的文章中,尼尔·克劳斯(Neal Krause 1993, 19)运用一种方法去测量恶化,包含了对采访者和应答者的评估:(1)应答者的住处;(2)附近的房屋、建筑物、街道和公路的外界条件;(3)带来环境压力的因素,包括噪声水平、空气质量和远离犯罪的安全性。汤普森和克劳斯(Thompson and Krause 1998, S354-S356)的文献综述中展示了地区的社会生态与居民的社交联系和来自于犯罪恐惧之间的联系。

28. 正如城市居民比郊区居民和农村居民更关心犯罪一样,在研究报告中非裔美国人和生活在高犯罪率的地区其他族群比白人对犯罪更加恐惧(Joseph 1997; Miethe 1995, 19)。一种“无序”邻里关系的标志,如遗弃的建筑物、破坏文物古迹、垃圾和涂鸦,这些都令居民恐惧,而正如理查德·陶布(Richard Taub)和他同事的发现,在芝加哥,像商店、安全的公共空间和活跃的集体生活这些社区资源,对于城市居民克服恐惧和参加公共生活具有激励作用(也参见 Joseph 1997; Miethe 1995; Skogan 1990)。第二,正如萨莉·恩格尔·梅里(Sally Engel Merry)在对一个高犯罪率和多种族城市的住宅区的研究中总结的那样,一旦特定地区的居民增加对犯罪的恐惧,一种恶性循环就会出现:恐惧导致人们延长在家里的时间并降低他们同邻居社交往来的愿望;避世增加了居民与邻居的社交距离,造成害怕彼此的社区陌生人的情况;高度的恐惧导致高度的避世,以此类推。第三,根据国家犯罪受害调查(Federman, et al. 1996),生活在贫穷中的人比其他人更有可能“害怕出门”。1992年开展的调查显示,25%的家庭得到了社会保障并且20%的贫困家庭害怕出门,然而,只有9%财政收入稳定的家庭是如此。第四,调查报告中显示老人、黑人比其他群体更有可能害怕犯罪行为,与总体趋势相反的是,黑人中的男人比女人更害怕罪犯,更容易表达他们的脆弱(Joseph 1997; Skogan 1993)。这并非不合逻辑,这些反映了常识。总体上看,黑人老人,特别是黑人老年男性,比其他人群更有可能成为犯罪行为的受害者。确实,这种情况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1995年芝加哥热浪中老年非裔美国人比其他人更有可能死亡,并且表明,在城市的逻辑中,他们成为自我恐惧的受害者,而在此之前,他们首先是城市暴力和不平等体系中的受害者。

29. Thompson and Krause 1998, S356.

30. 安德森(Anderson 1999)关于作为一种保护形式的社会隔离和避世的观察,尤其是对暴力邻里关系中的孩子们的观察,源于他对费城民族志的研究。弗斯滕伯格和他的同事(Furstenberg and his colleagues 1998)关于隔离的发现是基于学校体系中的城市家庭与子女的研究调查做出的。威尔逊的关于作为一种保护策略的隔离的讨论出现《当失去工作时》(When Work Disappears)中。《我们的

美国》一书是关于芝加哥近南区成长的口述史,少年记者勒阿伦·琼斯(LeAlan Jones)和劳埃德·纽曼(Lloyd Newman)在他们避免暴力和恐惧的主题中,“在夏天他们习惯于枪杀事件的发生”,琼斯谈到。纽曼有预见性地答道,“这正是我为什么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的原因”(Jones, Newman, and Isay 1997, 31)。

31. 与其他具有可比性的国家相比,美国有充足的理由对犯罪行为表示担心:枪支可以非常容易地获得,并且枪支暴力犯罪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每年大概有 1/4 的美国家庭遭到枪支袭击,并且大约一半的人口在他们的一生中要成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Miethe 1995)。在客观上最危险的芝加哥街道做田野调查,使得对于普通城市居民——特别是那些生活在贫民窟和暴力区的居民——的描述清晰起来,他们总是疑神疑鬼的,深感受到了直接威胁,几乎不能行动,这就产生了人们对贫民窟和暴力区的居民恐惧管理和体验的整体误解。“是警告而不是恐惧,引导着我”,尤金·理查兹(Eugene Richards),一位住在北朗代尔的老年居民,在一次关于如何处理危险的讨论时进行了解释。尤金在白天会在几条街道上散步,但是他拒绝在没有驾车的情况下走四个街区以上。艾丽丝·纳尔逊(Alice Nelson),是一位住在小镇上的 70 岁左右的老妇人,在白天散步时会带着一个购物袋。“但是我不会在晚上出门,”她告诉我。

32. Secter 1995, 7.

33. Ehrenhalt 1995, 29.

34. 在《国内的外来者》(*Exotics at Home*)中,人类学家米凯拉·迪·莱昂纳多(Leonardo 1999, 125)针对那些怀旧的社会科学家做出批评。“我们遗忘的世界里对安全的贫民区的想象是这样的,夏天人们可以睡在消防通道中,在那个世界里,中产阶级可以扮演榜样和领导者角色。”她正确地告诫人们,中产阶级和贫穷的非裔美国人可以以一种亲密的关系紧紧地连在一起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幻想,然而可供我们讨论的历史基础在于,战后在贫民窟的公共空间的存在的越来越低(Wacquant 1994)。我在北朗代尔的老年访谈者和其他的非裔美国邻居坚持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周围的公共区域已经变得更加危险和具有威胁性,尤其是在晚上。

35. 格拉斯纳(Glassner 1999)报告说,65 岁以上的美国老人比小于 25 岁的美国人遭遇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少 16 倍。

36. 参见劳勒等人(Lawlor, et al. 1993, 9)对于芝加哥老人贫困的讨论。

37. Glassner 1999, 44. 在一份分析观看或者收听城市新闻影响的报告中,研究者发现,“那些收听新闻和看电视新闻的人表现出更强烈的恐惧感”,并且“当地的电视节目也有相同的效应”(Chiricos, Escholz and Gertz 1997)。

257 38. Glassner 1999, 45.

39. 参见詹姆斯·贾斯珀(James Jasper)的《不安宁的民族》(*Restless Nation* 2000, 12, 132)中对于美国个人主义文化性别特点的讨论。他认为,“美国人很少

考虑群体中的人,或者关于群体影响他人的因素”。

40. 参见戴维斯(Davis 1998)、斯科甘和哈特尼特(Skogan and Hartnett 1997)在芝加哥的关于邻里关系联防(neighborhood watches)和社区警务项目的讨论。了解在美国城市的新的堡垒式建筑,参见收集在《建筑的恐惧》一书中的文章,这本书包含了关于安装大门的社区、有围墙的城市和私人安全系统。这项研究的大部分工作是由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推动的,他有一篇关于洛杉矶的论文是《石英之城》(1990),他将批判性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城市居民和政府以何种方式重塑城市空间以防御令人恐惧的少数人上。

41. 养老院中的问题在很多其他研究中被很好地记录下来,所以我将焦点放在公共关注较少的老年人住房来源的问题上。了解一居公寓的历史,参见保罗·格罗斯的《住在闹市区》(1994);了解社会学研究记录当代芝加哥一居公寓中的社会支持网络的性质,参见查尔斯·霍克和罗伯特·斯莱顿(Charles Hoch and Robert Slayton)的《新无家可归者和老人》(*New Homeless and Old* 1989)。

42. Steinberg 1995, 10.

43. 芝加哥房屋管理局 1995, 2。

44. 组织建构和领导力发展(Building Organization and Leadership Development)1995。

45. Hoch and Slayton 1989.

46. 关于芝加哥失去单元的数据由霍克和斯莱顿(Hoch and Slayton 1989, 121)提供,国家的数据在格罗斯(Groth 1994, 283)中。参见詹克斯(Jencks 1994)关于一居公寓破损的讨论。通过引用他所认为“少于理想数量”的证据,詹克斯对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一居公寓的最高估计大打折扣,包括其著名的研究表明,在1970—1982年期间有110万间公寓流失,因为他们的数据包含了一个单元两个房间的数目。詹克斯也引用了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住房调查报告来证明一居公寓出租单元的数量从1973年的111.4万间降到了1989年的78.9万间。

47. Groth 1994, 271. 精神健康研究者估计,在国家基金资助的机构中的病人总数在1955—1995年间大约减少了50万人,一居公寓、监狱和街道承担了这部分人带来的负担。

48. 城市历史学家埃里克·门克宁(Monkkonen 1993, 345)认为,“令人悲伤的是将危难中的人团结在一起的做法,随着对老人和病人的广泛救助而慢慢减少”,但是现在国家针对老人、精神病人和吸毒成瘾的人的救助系统显然没有完全终止这种习俗。

49. Hoch and Slayton 1989, 164.

50. 关于一居公寓和开发商利益的讨论,参见萨特尔斯(Suttles 1990)。

51. 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Engels [1845] 1984)的经典解释中,这些词语被他用来描述曼彻斯特工薪阶层的住房条件。他说,“这种区别存在于英国的第二



中心城市,世界第一制造业城市”,他的评论和芝加哥有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共鸣,芝加哥是美国自己的“第二城市”,并且在历史上是制造中心。

52. 基夫尔(Keigher 1991,52-53)调查的 27 家旅店中的大多数,“有一个正式的会客厅(lobby)或者起居室,但是许多(旅店)没有展示出有社交生活的标志。很少有旅店在费心创建社交场合,并且有一些证据显示他们试图阻碍它的建立”。

53. 基夫尔(Keigher 1991)也发现一居公寓的居民倾向于不与社会服务工作人员和医疗人员联系。在她的研究中,许多居民也希望能得到支持,但是却不知道如何和从哪里获得帮助,而且居民们的医疗保健需求是“令人震惊的”(Keigher 1991,49-50)。

54. 酒精、毒品消费和心绞痛的关系是由基尔伯恩等人(Kilbourne, et al. 1982)提出的。赫伯特·西蒙发现,神经性药物的使用同恶性高温(hyperthermic)紊乱有关。

55. Rollinson 1990,194-195. 罗林森的主张因其免责声明而特别引人注目,发表免责声明是因为他采集的条件最差的旅店样本过少,有六个单人住公寓拒绝让他进入,而大多数的居民很难找到,并且很少有人愿意参与他的研究。

56. 同上书。

57. Keigher 1991,51.

58. Rollinson 1990,200.

59. Hoch and Slayton 1989,151.

60. 同上书,161.

61. Keigher 1991,49.

62. Rollinson 1990.

63. Keigher 1991,47.

64. 根据一份《芝加哥太阳时报》的清单,有 45 名热浪罹难者由库克县法医局埋葬,45 人中的 33 人,或者大概 75%是男性(*Chicago Sun-Times* 1995,14)。

65. Orloff 1993, chap. 3; Fischer 1982,253; Hoch and Slayton 1989,128.

66. 然而,正如安·奥尔罗夫(Orloff 1993)解释的那样,记录下那些通常能够获得丰厚养老金的男性是重要的,因为他们在正式的劳动市场上,有相对长期和更持续的经历。

67. 参见 R. W. 康奈尔(R. W. Connell)的《男子气概》关于“性别角色”的批判性的讨论。罗伯特·鲁宾斯坦(Rubinstein 1986,20-21)发现,在他的样本中,有 2/3 没有子女的单身老年男性“没有关系亲密的家人”,然而 29 个有子女的人中的 17 人一般与他们所有的或者其中的一个子女保持着联系。想了解男人如何被排除在各种政府福利项目之外,参见萨瑟(Susser 1993)。

68. Rubinstein 1986,1.

69. Liebow 1967,214,218-219. 两项关于探索男性暴力和压抑关系的具有说



服力的人类学研究是布尔古瓦(Bourgois 1995)和兰开斯特(Lancaster 1992)。

70. Gurley, et al. 1996, 1710.

## 第二章

259

1. Semenza, et al. 1996, 84.

2. 研究者解释道,他们“在案例的定义中,包含了那些由心脑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因为以前的研究证明,在热浪期间许多非正常过量死亡(excess of deaths)数是因为心脑血管疾病”。

3. 西门扎(Semenza)解释道:“因为有许多人太与世隔绝以至于不能将其计入到研究中。事实上,我们低估了对社会隔离重要性的研究,因为我们将那些最隔绝的人群排除在样本之外。”

4. 根据卡伦·斯莫尔(Smoyer 1998, 1813)的研究,“通过将注意力集中于人口相关的风险性因素,以及对比居民邻居关系的案例和控制因素,(这项设计)排除了任何与邻居关系特征相关的可测量到的因素,排除了超越家庭范围内的环境变量的评估。”

5. 关于有用的评论,参见拉尔夫·卡塔拉诺和凯特·皮克特(Catalano and Pickett 1999)的“关于地区和健康的分类学研究”(A Taxonomy of Research Concerned with Place and Health)。

6. 斯莫尔(Smoyer 1998, 1820)主张,总体上“在热浪期间,高死亡率和低死亡率的地区差别更加显著”。她发现在一些年份里,圣路易斯的热浪死亡率的分布情况是分散的,但是“许多人口普查变量的平均值,在高死亡率地区和低死亡率地区是非常不同的”(1820)。这些测量方法的问题在于,在死亡率较低的热浪期间,死亡人数的数字因为太小而不能在邻里关系上形成可靠的对比。斯莫尔警告说“如果出现相对少的死亡人数,在地区水平的死亡率的变量将会因为太小以至于不能形成可靠的对比”(同上)。但是其对立面也是正确的:热浪期间在地区或者邻里关系中,死亡人数微小的差异可能会产生夸大相对危险水平的指标。

斯莫尔也注意到先前在圣路易斯和纽约关于热浪死亡人数的两项研究——一项是由亨希尔(Henschel)主持,另一项则由舒曼(Schumann)主持——不仅发现了一种健康风险的空间分布,而且发现基于地区的环境和热浪死亡之间也存在重要的联系。此外,马丁内斯和他的同事(Martinez and colleagues 1998)发现在老年人中热浪死亡的地理格局。

7. 参见注解 12 对于芝加哥社区讨论的介绍。

8. 有大量的文献是关于芝加哥的非裔美国人地区的历史发展和社会条件。

关于黑人地带的经典研究是圣·克莱尔·德雷克和霍勒斯·凯顿(Drake and Cayton)的《黑人都市》([1945]1993)。

9. 尽管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犯罪率有了明显的减少,但是在城市贫穷黑人聚集区的暴力犯罪水平仍然相当高,这很难使得那些在街上的居民感到安全。一份由芝加哥公共健康部门发布的流行病项目(1996)的研究显示,在 1994 年和 1995 年,正如芝加哥警察局的报道——明显低估了真正的犯罪水平——福勒公园(Fuller Park)(福勒公园是热浪期间死亡率最高的社区)每 100 个居民就有 19 人经历暴力犯罪。热浪期间其他有高死亡率的社区也有类似的犯罪水平:伍德劳恩(Woodlawn),热浪死亡率第二高的地区,报道的是每 100 个居民有 13 起暴力犯罪;大克劳施英(Greater Grand Crossing)报道的是 11%;华盛顿公园(Washington Park)、宏伟大道(Grand Boulevard)和近南区(Near South Side),所有在这次灾难中死亡率最高的地方,其犯罪率都高于 15%,这暗示,正如伊利诺伊州公共卫生部所表明的,这些地区不稳定的日常生活与热浪期间的脆弱性是有关系的。相对地,林肯公园(Lincoln Park)——繁荣的近北区的社区——据报道是每 100 人中有 2 人经历暴力犯罪,并且是热浪期间死亡率最小的城区。

10. 然而,在使用社区数据来记录热浪效应的空间逻辑时,存在分析风险。一些大规模的和整体上种族或者阶层多样化的社区,掩盖了那些贫穷的、有犯罪行为的甚至在热浪中高死亡率的小块地区。例如,在上城街道的一个聚集区,因为它破旧的一居公寓而臭名昭著,在这里有 7 个人死于中暑,使其成为这个城市死亡率最高的地区。然而,作为一个整体的上层社会却不是死亡率最高的 15 个地区之一。

11. 正如劳伦斯·卡尔克施泰因(Laurence Kalkstein)在《柳叶刀》(*Lancet* 1995,858)中所解释的那样,那种地区有“黑色的屋顶,红色的外墙,缺乏通风……是特别不适合炎热天气(的住宅)”。

12. Shen, et al. 1995.

13. 斯莫尔(Smoyer 1998,1822)注意到缺乏和需要这类定性的研究项目。她列出了以地区为基础的关于热浪死亡率的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首先是要使用定性的研究方法解释地点和热浪死亡风险的复杂关系”。

14. 一个综合运用种族研究去评估一些芝加哥社区最好的例子是《比较社区研究》,这项研究是由芝加哥大学的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和理查德·陶布(Richard Taub)主持的。该项目始于 1993 年,雇佣大约 10 个研究生工作多年,覆盖了 4 个社区。直到 2001 年,这项研究有几篇专题论文和有关个别地区的研究著作(包括 Mary Pattillo-McCoy 的《黑色的异想世界》[1999]),但是没有基于跨地区对比的一系列更大范围的研究发现。

15. 回顾对这些案例研究使用的方法论的争论,参见查尔斯·拉金(Charles Ragin)和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Becker)版的《什么是个案?探索社会调查的

基础》(1992)。在这些比较邻里关系的研究中,我沿袭了使用芝加哥社区作为分析单位的传统。正如苏蒂尔·韦卡特施(Venkatesh 2001)和阿尔·亨特(Hunter 1974)已经讨论过的,尽管社区是社会科学家所构想出来的而不是一种对于邻里身份固有的表达,但是相对大的典型的社区的研究非常有用。将700多个热浪死难者划分在77个芝加哥社区的分类方法,要比由罗伯特·桑普森(Robert Sampson)和他的同事为哈佛公共健康研究中按照人口普查地区或者社区单位的分类更有意义(1997)。后两种计量单位太小、数量太多以至于不能产生对紧急事件可靠的死亡率统计。因此这里借用了詹妮弗·普拉特(Jennifer Platt)的习惯性做法,即使用没有确定理论地位但是毋庸置疑有实用价值的常规案例,以此作为具有学术和政治科学重要性的构造对象。然而,我的研究按照约翰·沃尔顿(Walton 1992)或者迈克尔·维韦奥卡(Wieviorka 1992)他们的形式选择分析单位之后,构建变量、类别和基于证据之上的理论分析在这个领域内并没有发现什么。

261

16. 控制这些条件使我可以避免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基于主要手段的组合因素可以解释死亡率的不同。

17. Whitman, et al. 1997, 1515-18. 惠特曼等人注意到在南朗代尔的拉丁裔人口数可能比官方统计的总数要高得多,因为这个社区是一个移民集聚中心,而他们通常是没有被人口普查人员计算在内的。

18. 但在解释小村和北朗代尔两个地区的收入数据时,要保持谨慎,因为一些当地的经济活动是在非正式的劳动市场进行的,并且工人大体上是不申报的。许多研究已经证明,美国官方的贫困线是一种不充分的贫困指标(Citro and Michael, et al. 1995)。参见拉格尔斯(Ruggles 1990)关于诸多争论的回顾,以及费德曼(Federman, et al. 1996)关于贫困后果的讨论。在美国背景下,家庭的收入高于因官方限制而相对剥夺的初级产品,如医疗保健、像样的住房、能源和食物的水平。贫困研究者们也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人口普查中,什么算作是“高贫困”地区。保罗·亚尔戈夫斯基(Jargowsky 1997, 10-11)在人口普查水平下使用了40%的贫困率作为衡量黑人贫民区、拉丁裔贫民窟和白人贫民区的标准,但是他也指出,20%的人口在贫困线以下的标准能够抓住美国人口普查的底线。

19. 最近由桑普森(Sampson 1997, 918)所从事的研究暗示,除了那些贫穷居民的比例和那些年老孤单的居民比例,社区的集体效能——其定义为“邻里之间的社会凝聚力与他们分享共同的美好事物的意愿”——能够影响当地居民在灾难中生存的能力。事实上,将社会凝聚力纳入到等式中容易产生一种疑惑,为什么小村经历相对来说如此低的死亡率,甚至很难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根据由桑普森和他的同事阐述的方法,小村比北朗代尔有更加负面的集体效能,因此在灾难中的社会帮扶系统应该更为薄弱。

20. 传统的学术思维是允许将分析者宣称运用群体的特征来解释群体间的不同

同。然而,卢瓦克·华康德(Loïc Wacquant)认为“‘种族’不能同时成为分析、待解释事物和解释要素的对象和工具。”

21. 了解类似形式的种族推理的讨论和批判,参见古尔德(Gould [1981] 1996)。

22. Angel, et al. 1996.

23. 参见安德森(Anderson 1999)、弗雷泽(Frazier 1939)、帕蒂略-麦科伊(Patillo-McCoy 1999)和斯塔克(Stack 1974)。男性的老人领袖(Old-heads)和祖母们是伊莱贾·安德森(Elijah Anderson)在其关于费城(Philadelphia)黑人社区社会联系的书中的焦点主题(1990, 1999)。安德森(Anderson 1999, 206)引用了 E. 富兰克林·弗雷泽(E. Franklin Frazier)关于黑人家庭的描述,他认为,“在这样的家庭中,最年长的妇女被看作是家庭的领袖。正是祖母将各代人聚集起来。”梅里尔·西尔弗斯坦和琳达·韦特(Merril Silverstein and Linda Waite 1993)对这些发现产生质疑,认为黑人关系网中并没有证据显示其相关的社会活动的频繁度。

24. 除了近期对于当地居民的邻里关系环境的调查外(参见 Brooks-Gunn, Duncan, and Aber 1997 以及 Sampson, Raudenbush, and Earls 1997),最近很多对城市贫困的研究已掩盖了社会环境中贫穷区域较大的变化因素。正如包括赫伯特·甘斯(Gans 1995)和迈克尔·卡茨(Katz 1993)等城市学者所表明的,大多数的社会科学研究、政策报告,以及所认定的城市下层社会的新闻报道,都不能够详细说明那些可以视为成员或者群体代表的人或者邻里关系。这些具有灵活性但不明确的术语带来的一个效应就是,那些突出的有高贫困率、高失业率和高犯罪率的黑人和拉丁裔社区同其他相同的社区类别被划分到同一个范畴,而不论这些弱邻里关系之间或内部的不同,甚至是在相同种族群体下的人口弱邻里关系也是这样。当弱的邻里关系被区分开时,正如保罗·亚尔戈夫斯基(Paul Jargowsky)的《贫穷与地区》(1997)一书所研究的,他们赋予了拉丁裔贫民窟、犹太人区或者贫民窟一些标签,这使得这些地区基于种族身份而排除在主流地区的社区之外,并且忽视了当地环境中社会的、经济的或者空间特征。亚尔戈夫斯基设计的其他同质性的分类有其进步性,然而他也简单地否定了其他社会条件的显著性。

25. McKenzie 1925, 64; Mauss [1916] 1979.

26. 在赵鼎新(Dingxin Zhao)近期的一篇文章中(1998, 153)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展示校园生态环境在正常时期培育了不同形式的人际网,结果在危机中产生了社会激进主义行为。赵认为生态决定了结构和社会网络的力量以及社区中人的空间位置和常规活动。

27. 一代代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对社会生态学和邻里关系社会生活质量和组织的关系给予关注。近 10 年来,城市学者受欧洲社会理论家的影响,如亨利·勒费布尔(Henri LeFebvre)、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和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已经重新发现了城市空间生活的重要性。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一些

美国科学家发起一系列研究来证明邻里关系是否在社会和教育结果范围内有独立的效应。这些基于邻里关系效应研究的早期定量研究表明,尽管家庭在促进孩子成长过程中是主要的推动力,但邻里关系环境确实在根据人生轨迹而变化的方式上对不同年龄群体有重要影响(Brooks-Gunn, Duncan, and Aber 1997)。

28. Taub, et al. 1984.

29. 芝加哥数据汇编(Chicago Fact Book Consortium)1995。

30. Hirsch 1983, 192.

31. 同上书, 194。

263

32. 参见沙伦·祖金(Sharon Zukin)的《城市文化》中的“这个城市的商店”(While the City Shops)一章讨论了如何使商店在社会形成过程中扮演一种组建角色。祖金也探讨了布鲁克林和芝加哥地区商务繁荣和邻里社区减少的关系。

33. Jacobs 1961, 36-37.

34. Skogan 1990, 13.

35. 参见《我们的亲属》(Stack 1974)简介中关于社区密度和两代大家庭网络的空间集中度的讨论。奥兰多·帕特森(Patterson 1998)批判了一些书,例如在《我们的亲属》中写道“我们可能称为奇迹的‘邻居’,可维持的非正式友谊的格局及社团存在这一理念可以补偿更多正式组织的瓦解或是缺失。通过单纯的、没有根据的重复实验,城市人类学家对一些美国黑人住房项目没有代表性的案例研究,形成了一种能够接受的信念,即大的网络支持和自然邻里关系环境正在等待发展与建设。”

36. 杰奎琳·沃尔夫和她的同事(Wolf and colleagues 1983, 469)报道,“老年人的住宅距离成为了老年黑人与家庭和朋友联系的最主要的决定因素,这一点之前已经被白人老年人证实过了。”

37. 正如尼尔·克劳斯(Krause 1993)报道的,老年病学家已经表明“更高整体邻里质量与提高家庭成员间的联系是有关的。”在他自己的研究中,克劳斯(Krause 1993, 9-10)显示,“恶化的邻里关系……倾向于增强他人的不信任感,那些不信任他人的老人更加倾向于与社会隔离[从字面的意义上来说]。”(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发展时期,沃尔格林药房和多米尼克的杂货店在北朗代尔区的罗斯福路上开张了。)

38. 在理查德·陶布和他的同事(Taub and colleagues 1984, 60)的《邻里关系的变化》一书中,显示了商业吸引力在将居民从他们的家中拉出来,并参与到有社会联系的社交地区的重要性。陶布的团队发现,芝加哥非裔美国人更喜欢到他们邻里之外的地方购物,部分原因是他们相信在当地他们不能得到更高质量的商品。

39. 我的被调查者对于在区域内找到的营养食物和基本商品的困难做出抱怨,暗示了是社会生态,而不是简单的文化口味和偏好,导致了北朗代尔和其他贫

穷的黑人社区的肥胖和糖尿病。那些通常不能开车或者不能承担车费外出购物的老人,在获取健康食物方面最困难。我见到的许多老人,通常会储备罐装的或者袋装的食品,这样他们总是有东西吃,但是在他们家中不会有他们想要的新鲜食品。

264 在这个地区中的小商店充斥着没有营养价值的高糖食物,并且很少有关注糖尿病、肥胖和心脏疾病的公共健康工作者所推荐的食物存货。在当地商店所有的商品要比在贫民窟外的大商店的商品贵得多。“你不得需要一辆车到周围去消费”,在我到一个社区公园访问一位老年妇女时,她这样说,“或者你有一些来自于城市的特别消费卡并乘坐公共汽车。在这个地区的商店是很贵的。如果你在这里购物,你是在浪费你的钱。”“他们卖酒和这样那样的东西,”一位60岁左右的老人补充道,“但是价格太高了,除了买张报纸之外,我还没进过那些小商店呢。”

40. 劳里·凯耶·亚伯拉罕(Abraham 1993, 139-140)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讨论了那些试图在缺乏营养食物来源的动乱地区,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老人的种种困难。“听从健康建议对于贫穷者来说比那些有更多选择的中产阶级更加困难……都市里的穷苦群体也许会拒绝养成最简单的健康习惯。例如,在朗代尔教会对汤米的第二次身体检查中,琼斯(Jones)医生告诉他,他需要经常散步,否则将失去行走能力。‘我不想没收入,’汤米回答道。”

41. 芝加哥市,1996。

42. 夏天的犯罪率倾向于上升,因为炎热的天气迫使人们花比其他季节更多的时间在室外。但是当天气炎热到极限时,事实上犯罪率会下降,这是因为潜在的罪犯无精打采而不会参与犯罪。

43. 参见其他人的研究,布尔古瓦(Bourgois 1995)和桑切斯-扬科威茨(Sanchez-Jankowski 1991)。

44. 这就是为什么当地主要的社会运动,例如“回归街道”的游行示威、反吸毒静坐(居民坐在贩毒活跃的市场的街道上)、社区花园工程和用木板封闭在空地上的废弃的建筑物和栅栏的努力,都聚焦于为居民收回自然的和社会的空间。

45. 社区附近的居民据说也有类似的担忧。例如,在1994年5月所做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发现,在西部地区公共住房工程的居民,40%住在一居公寓的居民以及11%住在其他公寓的居民说在过去的一年中有子弹打到他们的公寓里。《隐匿的战争》这本书的作者说,“我们调查的大多数居民(63%)说如果他们晚上一个人出门会感到不安全,而一些居民(33%)甚至在他们自己家中也感到不安全”(Popkin, et al. 2000, 100-102)。

46. Anderson 1999, 118.

47. 在关于一个贩毒活跃市场地区的研究中,伊莱贾·安德森(Anderson 1999)发现,在高犯罪率地区的家长强制他们的孩子待在家里,这样他们就不会卷入或者遭受当地街道生活中的危险因素。在这种环境内的孩子变得与他们的同



龄人和当地的社区格格不入。避免到街道上,使孩子们变得心理脆弱并且有封闭和隔离的危险。

48. 根据克劳斯(Krause 1993,16)所说,“一个社区也许包含容易限制和他人交流的外部障碍。例如,公寓里深深的走廊、毁坏的台阶和弯曲的人行通道都可能会阻碍身体残疾的老人到其他人家里做客。”

49. 在汉普顿(Hampton),M.P.鲍姆格特纳(M.P. Baumgartner)做种族调查的富裕的白人郊区,居民们对于他们邻居的实际认识与社交联系大相径庭。鲍姆格特纳发现,“缺乏参与中产阶级关系的社交知识是汉普顿典型的社区联系。郊区的居民通过避免同他人联系保持社交距离,在这里他们有的只是可能的或者微弱的社交联系。” 265

50. 在北朗代尔社区,大多数但不是全部是严格意义上的教堂。参见北朗代尔家庭网络(1998)。

51. 关于黑人教堂历史的重要性,参见弗雷泽(Frazier 1961)和林肯(Lincoln 1990)。关于芝加哥的黑人教堂,参见德雷克和凯顿(Drake and Cayton [1945] 1993),帕蒂略-麦科伊(Pattillo-McCoy 1998)和斯皮尔(Spear 1967)。除了对“黑人教堂”的修辞用法,仍没有明显独立和统一的黑人宗教机构。正如奥马尔·麦克罗伯茨(McRoberts 2001,8-11)写道,“从来不存在一个同类的黑人社区或是共同的黑人教堂来反抗它。”我在北朗代尔地区时,观察到这里的教堂扮演着多种角色,包括:(1)在平时和特殊的场合及举行仪式时为人们融合提供一个地点;(2)为社区各种形式的政府组织活动做出贡献;(3)协调居民和政府机构的关系,如警察局和卫生部,它们两者都会召开会议或者组织在教堂外的项目;(4)通过将居民与计划者、政策制定者和发展者聚集在一起,协调经济发展项目;(5)组织社区服务工程,如反毒品游行示威以及非宗教的社区组织;(6)提供关键性服务,如膳食、去购物的自行车、医疗服务和去家里拜访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以及为孩子们提供日常照顾和夏令营活动;(7)帮助建设和装修住宅;(8)将当地居民与雇主联系起来;(9)主办街区俱乐部和其他的邻里会议;(10)提供替代当地公立教育的私人教育;(11)灾后劝告或者安慰居民以及在节日同居民一起庆祝。于是,很显然,北朗代尔当地的教堂过去是,现在也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可利用的资源,它们的贡献远远超出了宗教领域。

52. Meares 1998.

53. 芝加哥市 1995,4。

54. 奥马尔·麦克罗伯茨在他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的观察,他的研究对象是以福克纳斯教堂为基础的支持服务,福克纳斯是波士顿的一个非裔美国人地区。综合了解其研究,参见麦克罗伯茨(McRoberts 2001)。

55. 参见艾伯特·亨特(Albert Hunter)的《象征性社区》(1974,187)关于街区俱乐部的研究。亨特发现,这些俱乐部“在芝加哥黑人社区呈现更流行的趋



势”。

56.《从放弃到希望》一书是针对邻里关系复兴有影响的研究(Leavitt and Saegert 1990)。

57.除了这些重要性外,研究城市贫困的学者对一些大的社区之内的邻居和街道的变化开始关注是很少的,但是注意到一些拥有强烈社会纽带、组织得非常好的社区,如北朗代尔,这一点是重要的。在芝加哥,一些构建的最完善的社区就与一些最危险的街道毗邻。

266 58.参见桑普森等人(Sampson, et al. 1997)关于社区稳定性的重要讨论。但是在近期的一些文章中,凯瑟琳·罗斯和她的同事(Ross and colleagues 2000, 581)认为,“在一些富裕的社区,稳定与低水平贫困密切相关;在贫穷的情况下与之相反……在贫困状况下,稳定不能降低已经感觉到的无序,在更富裕的地区亦是如此。”

59. Spergel and Grossman 1997.

60. City of Chicago 1996.

61.在埃米尔·涂尔干和马塞尔·莫斯(Émile Durkheim and Marcel Mauss [1903] 1963)的《原始分类》中,认为分类体系代表了社会构建,尽管他们并不像后期的一些社会学家一样,对政治构建的不同象征意义感兴趣,如艾伯特·亨特(Hunter 1974)一样,他运用他们的理论去分析符号社区。

62. Hunter 1974, 74.

63. 芝加哥数据汇编(Chicago Fact Book Consortium)1995, 110; Pugh 1997.

64. 芝加哥数据汇编(Chicago Fact Book Consortium)1995, 110.

65. Massey and Bernert 主编 1949.

66. Pugh 1997.

67. Massey and Denton 1993, 137.

68.在“美国贫民窟研究的三个有害性假设”中,卢瓦克·华康德(Wacquant 1997b, 343)认为,一个贫民窟是“人类性格的闭合及控制的具有社团组织性质的一种机构形式。在理想类型的术语中,贫民窟可能被描述为有界限的、种族的或者文化上统一的社会空间的群体,其基础是:(1)强制的驱逐;(2)‘消极类型的’居民;(3)在这些地区的人口残留着‘保留地’;(4)在一系列平行机构下发展;(5)在不完整和次级水平下复制主要机构;(6)保持那些对在依赖结构中依赖性的人”。根据华康德所说,在美国,只有非裔美国人所居住的城市服从于五项中之一的不相配的水平,“种族统治的基本形式:偏见、歧视、隔离、强迫集中居住和暴力。”

69.根据美国官方 2000 年的数据,在芝加哥地区官方统计的拉丁裔人口可能会在 1990—2000 年间增长超过 20 万人,而白人的数量会减少 15 万人,并且非裔美国人会减少 2 万人。在有 60 个县的大都市地区,拉丁裔人也占据了新增居民

的 69%。

70. McMurray 1995, 33.

71. Suttles 1968, 73.

72. 小村的社会生态圈社会生成角色的运作形式与赵鼎新分析的北京校园生态类似(1998)。

73. 丹尼尔·多翰(Daniel Dohan 1997)记录了一些这样的行为,这些是拉丁裔家庭,特别是移民,因劳动力市场上要求过长的工作时间和微薄的收入而导致的。

74. Jacobs 1961, 34—35.

75. 正如在 1990 年,第 11 警区(Eleventh Police District)有 98554 名居民,第 10 警区(Tenth Police District)有 131852 名居民。

76. 居民为当地年轻人所能拥有的贫乏的资源供给而担心。这个区域内的唯一的大公园在小村的西南角,而它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步行去太远了,而与那些坏孩子组成的帮派交往又太危险。当地的学校非常拥挤,尽管有一些设施已经开设或者在我离开那里之前准备对外开放。

77. 根据最近的一篇新闻文章,芝加哥大主教(the Archdiocese of Chicago)声称,大概有 80 万拉丁裔教区居民,占所有人数的 1/3。

78. Angel, et al. 1996.

79. 在这个过程中,种族研究能够帮助识别相关问题的各种信息。如果没有对当地环境近距离的考察,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调查人员可能不能确定有意义的环境。

80. 两个有高犯罪率和低人口减少率的地区,里弗代尔(Riverdale)和奥本格雷沙姆(Auburn Gresham),属于热浪死亡率最低的地区之一。将来的研究能够评估人口的稳定性是否会缓和群体生活中高犯罪率的社会影响。

81. Shen, et al. 1995; Smoyer 1998.

82. 参见保罗·亚尔戈夫斯基(Paul Jargowsky)的《贫穷与地区》(1997),这本书描述了 20 世纪后几十年里芝加哥贫困地区数量上升的情况。

### 第三章

1. 警察局调查了异常的死亡,提供现场环境的官方解释。死亡报告包括尸体、死亡地点、每一个标志性的犯罪迹象和他们的亲属及邻居在什么地方等有关信息,它成为死者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局的官员也有负责将尸体运送到太平间,并协调与法医鉴定人的工作。

2. 应急网上新闻服务(Emergency Net News Service)1995。

3. 参见根据消防局的资料和 TriData 公司指导的委员会报告(1998 年和 1999 年)。受该报告的推动,新消防局行政长官詹姆斯·T. 乔伊斯(James T. Joyce)在 1999 年将 12 辆新的急救车增添到城市车队中。

4. 消防员和护理人员紧张的关系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那时,理查德·J. 戴利(Richard J. Daley)提升了急救医疗服务,即消防员和文职人员的雇佣都得通过《综合就业和培训法案》(Comprehensive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Act)。直到 1980 年消防队员罢工前,护理人员是被排斥在消防队之外的,当时工会正努力从内部扩展其等级。但是与消防员相比,他们得到的是更短时间的休假和更少的薪水,而部门内部的分隔只是传说。1995 年,城市在处理与护理人员争端的仲裁中败诉,护理人员赢回了数百万的加班欠薪。(但是)消防人员仍然是部门中的主要成员,特别是从管理层面上来说。

5. Dematte, et al. 1998 and Semenza, et al. 1999.

6. Raica 1995.

7. Spielman and Mitchell 1995b, 9.

8. Mitchell and Jimenez 1995, 12.

268 9. 同上书。

10. Dematte, et al. 1998.

11. Semenza, et al. 1996, 87。芝加哥并没有使用新的高温天气健康监测系统,该系统是基于总体的天气变化,而不是简单的热浪检索。据劳伦斯·卡尔克施泰因和他的同事(Laurence Kalkstein and colleagues 1996, 1519)所说,关注更综合情况的热浪警戒系统能够提高“公众对于热浪的超常热条件的关注意识,(并且)可能对在 1995 年夏天降低费城的中暑死亡率起到重要作用。”

12.《芝加哥太阳时报》专栏作家迈克尔·斯尼德(Sneed 1995, 4)报道,戴利周末时间在密歇根州的家中度过,并且一些我采访的城市其他官员证实了这份报告。

13. Spielman and Mitchell 1995a, 1.

14. 在指控这个城市“公共政策犯下谋杀”罪行的时候,斯凯茨加入了批评家的行列,他们也同样指控政府造成了危机中公民的脆弱性。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大屠杀》中,迈克·戴维斯(Davis 2001)记载了持不同政见的官员和记者的观点,他们认为国家应该为在饥荒中数以万计的印度人死亡负责。正如罗伯特·奈特(Robert Knight),在《印度经济学家和政治家》(*Indian Economist and Statesman*)中写道:“对于那些无视我们在这个国家中的所作所为之真正本质的人所犯下的无数谋杀罪行,我们和我们的同代人必须直言不讳,否则,便是这些罪行的参与者”(引自于 Davis 2001, 53—54)。

15. 国家气象局 1996。

16. Raica 1995.

17. Raica 1995, 2.

18. 为新的政府效率和企业主义做出阐述的是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 (Osborne and Gaebler 1992) 的《改革政府》。这本书受到了美国执政的民主党和比尔·克林顿 (Bill Clinton) 的推崇, 克林顿将其作为政治改革的蓝图。关于质量管理的效率问题, 参见贝纳特 (Beinart 1997), 艾格 (Eig 1999) 和吉拉斯特里斯 (Glastris 1992); 关于外包, 参见塞登斯塔特 (Seidenstat 1996); 关于将公民视作顾客, 参见奥斯本和盖布勒 (Osborne and Gaebler 1992); 关于奖励有渠道获取信息的公民, 参见吉尔伯特 (Gilbert 1995); 关于惩罚那些技能不强和资源有限的人, 参见哈尔彭 (Halpern 1999); 关于媒体监督和公共管理的观点, 参见库克 (Cook 1998); 关于政府机构的专业化的角色, 参见卡尼斯 (Kaniss 1991)。

19. 关于政府对于灾难负有责任的描述, 参见埃里克森 (Erikson 1976) 和拉森 (Larson 1999)。参见埃斯平-安德森 (Esping-Anderson) 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1990, 23), 简要地讨论了福利国家是一个分层性的机构。“福利国家”, 他解释道, “不仅是一个干预机构, 而且也是一个调节机构, 平衡不公平的结构。这是它的权力, 其本身是一个分层机构。它是维系社会关系中最有效的权力。”关于政府在对城市应对灾难的脆弱性有责任的讨论, 参见收集在《灾难的考验: 转型的特大城市和灾难》中的文章。戴维 (David) 在他近期的两本书中说明了这一点 (Mitchell, et al. 1999)。他记录了在 19 世纪的印度、中国政府在极端天气事件中脆弱性的角色以及《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大屠杀》的巴西 (2001), 及《生态学的恐惧》中同时期的洛杉矶。 269

20. 参见《美国法老》中, 理查德·J. 戴利关于城市美化项目热情的讨论 (Cohen and Taylor 2000, 166-167)。

21. 芝加哥公立学校管理系统失败的情况, 发表在《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 (1992)。

22. 参见亚历山大 (Alexander 1998) 关于政策研究行动组织的报道; 亚尔戈夫斯基 (Jargowsky 1997, 78) 关于芝加哥集中贫困的数据; 格林威治 (Greenwich), 利维 (Leavy) 和琼斯 (Jones) 关于芝加哥经济发展计划的叙述。大量监禁城市贫困居民, 特别是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人, 是将贫困人口从公众视线中消除从而调节不平等的最有效的办法。

23. 国家气象局 1996, 芝加哥在 1995 年夏天前已经经历过危险的酷暑。1983 年、1986 年和 1988 年的高温与 208 名、167 名和 294 名芝加哥居民的过量死亡有联系 (Whitman, et al. 1997, 1517); 地方媒体已经对此做了相当多的报道。“1988 年是 1995 年灾难的一次预演”, 当地的公共卫生部门领导昆廷·扬 (Quentin Young) 这样告诉我, “但是这个城市还未准备好接受这样的事情。”

24. 尽管有一些报道描述了正式的结构和在纯粹的组织条件下革新政府的精神, 但是事实上, 很明显, 它是一种政治行为。

25. 参见戈茨(Goetz)对城市消防部门深刻而富有见解的组织研究。

26. 在《正常事故》(*Normal Accidents*)中,社会学家查尔斯·佩罗(Perrow 1984,4,9)记录了组织中强耦合的风险,强耦合是指运用先进技术导致危险的状态,因为复杂的因果关系链很难预测到任何特殊情况的影响。政治组织经常不得不对危机做出反应,经常遇到相反的问题,因为弱耦合减弱了他们的反应速度。卡尔·韦克(Karl Weick)已经对来源于弱耦合的组织问题做出了最综合的评估。关于近期研究弱耦合的文献,参见奥顿和韦克(Orton and Weick 1990)。

27. 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结构性的变动改变了城市的服务水平。当中断了联邦社会支持和公共帮助工程,并且城市政治权力的下降使得像芝加哥这样资源匮乏的市中心没有能力减少集中增长的贫困(Jargowsky 1997; Wacquant 1996; Weir 1998);城市政府工作人员的职业化和来自私人部门弹性管理政策的重要性(Eig 1999; Hambleton 1990; Seidenstat 1996);国家项目的外包和私有化(Seidenstat),提升政府竞争力和依赖私人资金来支持公共帮扶项目(Alexander 1998);将公民转变成消费公共物品(Osborne and Gaebler 1992)的顾客,这些都强行给政府行政官员、雇员和他们所服务的人民施加压力。

270 28. 埃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on 1999,第八章)认为,“老福利国家”与今天的劳动市场和破碎的家庭导致的“新的社会风险”是不同步的。当代的劳动市场要求灵活性和通过移民和打零工的方式,强制工人为了工作而重新安排他们的生活;数百万的工人,特别是在美国,成千上万的劳动者无法谋到生计,而且在许多欧洲国家失业率相当高。他认为,家庭是在市场瘫痪时一种长效的社会支持资源,但是当代婚姻是不稳定的,而且这种资源的保护性是不可靠的。

29. Spielman and Mitchell 1995a,6.

30. Kass 1995c. 在《天灾》(*Acts of God* 2000)一书中,历史学家特德·斯坦伯格(Ted Steinberg)说明在大多数穷人和脆弱人群遭遇灾难之后,精英记者和政治官员一直在主张政府不应该对无法控制的自然力承担责任。

31. Richards 1995,29.

32. Perrow 1984.

33. 都市老人在行动(*Metro Seniors in Action*)1995,4.

34. 同上书,1.

35. 参见门克宁(Monkkonen 1993),政治科学家,迈克尔·利普斯基(Michael Lipsky)也将政策官员列入主要的“基层官员”之列,他们在与公民的交流中重构和实施公共政策。

36. Flock 1995.

37. Skogan and Hartnett 1997; Skogan, et al. 1999. 关于警察是社区的守护者的说法如何被用于社区警务运动的讨论,参见格兰克的著作(Grank 1994)。《改革政府》的作者引用了前任休斯敦警察局长和美国缉毒官员李·布朗(Lee

Brown)对社区警务活动的定义：“我们对巡警重新定义——我们希望他是一个社区的管理者，活动的发起者，问题的解决者”(Osborne and Gaebler 1992, 49)。尽管在城市社区警务项目中有不同的方案，根据政策科学家韦斯利·斯科甘和苏珊·哈特尼特(Wesley Skogan and Hartnett 1997, 5)概括的基本社区警务的特点包括：(1)改革决策制定过程，给予在这一领域的官员决策权和组织分权，即允许警察与公民增进交流；(2)问题导向型的决策战略；(3)对公共要求给予回应；(4)承诺帮助当地社区发展他们自己解决犯罪问题的策略。

38. Skogan and Hartnett 1997, 100, 231.

39. 斯科甘和哈特尼特(Skogan and Hartnett 1997, 81—84)在从事其研究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72%的芝加哥官员报告说他们认为“CAPS 会导致‘由社会群体提出的不合理的政策要求’”，而且也有相似比例的人感到这个项目施加了“更大的压力来解决所有的社区问题”，包括那些，一位官员说的“失去控制”(的问题)。

40. Skogan, et al. 1999, 120.

41. 《芝加哥周末报》1995, 1。

42. Stark 1995.

271

43.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企业型政府中，促进政府支持的最佳条件是当地政府能够对州、联邦或者私人资源进行驾驭。更准确地说，这项条件在老年事务部一组手握丰富资源的政府雇员中得到确认，在 1992 年他们收到了来自当地私人基金会的资金，以帮助老年事务部发展救济资格清单的项目。从 1993 年开始，老年事务部依赖一种短小的表格。通过这种表格，芝加哥老人能够申报他们的收入和资产因而检查他们从一长串职务中获得的收益。老年事务部在整个城市中将表格分发给老人，当他们交回填好的表格时，老年事务部将会通过运行一个简单的计算机程序来确定老人是否有权利获得他们未曾得到的任何利益。如果确实如此，老年事务部就会与他们联系并帮助他们登记。

该项目主要是由私人基金会赞助，并且计划拓展在城市预算之外的改革资金(福利计划列举在一览表中，其中 28 项是由国家、政府、联邦和私人来源赞助的，有 14 项是由芝加哥市赞助的)。在启动 BEC 后不久，城市雇佣一个广告代理商发起一个营销活动以促进该项目的运作。除了在整个芝加哥城的公共汽车和布告栏上张贴广告外，城市还通过分发小册子的形式解释戴利市长的问题，“老年人是否都得到了与其权利相匹配的收益？”这激发了老年事务部创建 BEC。在 1993—1997 年，项目处理了 5.8 万个申请书并帮助老人申请了 5.7 万项权益——从城市一度试图将人们从公共帮扶计划中推开看，这些数字令人印象深刻。

在最初的由私人赞助几年后，款项终止了，城市决定将 BEC 整合到公司预算中，虽然这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划拨款项，仅仅保留了基本雇员。在热浪之后，老年事务部让 BEC 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寻找那些独居老人集中的社区里隔离

的老人,使他们加入到城市服务提供系统。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在芝加哥大概12条街的BEC的工作人员做了不少工作付出了努力,确认那些年老且独居的居民。我追踪了几周的街道办事人员,他们都是兼职者,他们每个月在街道工作的时间少于40小时。确认孤单老人是一项困难且耗时的的工作,但是老年事务部的行政工作人员通过BEC实施的一些正式项目完成了这项任务。芝加哥人从热浪中认识到,独居在家的老人需要特殊形式的社会扶助,这既包括常规帮助,也包括紧急援助。只要由外部资金支持,BEC的计划就是一种促进政策回应的有效的媒介。问题是当私人赞助之溪流干涸的时候,BEC或类似的社会扶持项目是否会仍然存在。

44. Alexander 1998.

45. Osborne and Gaebler 1992,19.

46. 参见卢瓦克·华康德(Wacquant 1997b)讨论如何使政府机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在持续的推进改革和引进会影响贫民窟居民生活项目的同时,避免美国贫民窟的再次出现。

47. 在理查德·M.戴利2000年的市长竞选中,议员博比·拉什(Bobby Rush)批评戴利市长失职而令芝加哥选民大吃一惊。一位市长助理仓促地回应了拉什的指控,议员在大选中失利。

48. 关于讨论政府应该使公民能够做到而不是直接提供(帮助),参见尼尔·吉尔伯特(Neil Gilbert)的《福利正义:恢复社会公平》(1995,148),和奥斯本和盖布勒的《改革政府》。

49. 例如,参见查尔斯·佩罗(Charles Perrow)和莫罗·吉伦(Mauro Guillen)的《艾滋病灾难》(1990)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分析是,通过支持网络,组织是如何管理费城处于社会边缘的贫困的少数人,以及静脉毒品使用者的。

50. Halpern 1999,14.

51. 来自州政府和倡导组织的内在压力,推动了社会工作者和组织者奖励那些对此有特别关注的大多数企业客户。尽管有许多问题存在,但是当政府机构必须展示其能成功地衡量管理来自于外部的资金的时候,政府机构希望能产生出有形的成果,我所观察到的社会工作者致力于利普斯基所说的“提取精华”的做法,即热衷并集中于针对那些“依照官僚制的成功标准可能成功的人”的工作(Lipsky 1980,107)。

52. Pearson 1995. 根据特德·斯坦伯格(Steinberg 2000,193-194)的一项公共健康研究报告,在20世纪90年代供热费用太贵了,以至于“贫穷的家长通过削减他们子女的食物来支付供热费用”。

53. Semenza, et al. 1996,87. 一些环境学家已经批判了为穷人提供空调的项目,因为这项政策提供的是短期的帮助,但是却提高了污染的风险和加剧了气候危机。



54. 参见莱维坦(Levitan)的《援助穷人的计划》(*Programs in Aid of the Poor*)关于对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计划的观点。

55. Steinberg 2000, 195. 参见皮尔逊(Pearson 1995)关于降低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计划的报告。

56. Hartstein 1995.

57. 这项政策已经被证明对于芝加哥税务局是有效的,它帮助戴利市长赢得了绝大多数的公众支持和政治赞同。他将停车费用强制项目外包给电子数据系统,一个致力于针对违法行为的私立公司,并且它为城市带来了数百万的财政收入。这项停车项目成功的关键在于机构使用了丹弗锁扣装置(Denver boot),这使得居民不付费就得放弃他们的车。参见《经济学家》(1995)。

58. Wallace 1993, 233.

273

## 第四章

1. 参见克莱珀(Kleppner 1985)关于比兰迪克身陷暴风雪危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比兰迪克对于那场危机的不当处理可能是他竞选失败的原因,而流行的说法则是暴风雪加速了他的失败。

2. Squires, et al. 1987, 85—86.

3. 例如,在1998年一次社区治安的会议上,芝加哥提出了一个主要的议程,内容是如何使警察局运用公共关系和市场计划来提升警方的警觉。

4. Cook 1998, 122. 关于政府统治的符号政策阐述得最好的是卡尼斯(Kaniss 1991)、舒德森(Schudson 1978)和萨特尔斯(Suttles 1990)。

5. Cater 1959.

6. Linsky, O'Donnell, and Moore 1986, 203.

7. Habermas 1989, 193—195.

8. 参见李(Lee 1999)关于企业之作用于政府官员和官僚工作如何影响了公共事务的讨论。

9. Neal 1995, 25.

10. Kass 1995a, 1.

11. Spielman and Mitchell 1995a, 7.

12. Jimenez and Rodriguez 1995, 6; Kass 1995a, 1; Spielman and Mitchell 1995b, 1.

13. Jimenez and Rodriguez 1995.

14. Spielman and Mitchell 1995a, 6.

15. 在他经典的文章《区域和区域行为》中,欧文·戈夫曼(Goffman 1959, 第

三章)认为,后台区域是非正式的和实施不合适行为的空间,然而前台或者公共区域要求更加小心的自我管理和控制。在热浪期间被指控的记者招待会,是一种所谓的前台场合,莱恩关于城市对危机的处理不当的直率批评,除了在真正的后台,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被允许。

16. Spielman and Mitchell 1995a, 7.

17. Kass 1995a, 1.

18. 我所采访的一位市议员解释说,尽管她对城市突发事件回应的薄弱感到愤慨,但是她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任何评判性的公共声明,因为她不想将市长办公室的注意力从健康工作上分散开。

19. Cotliar 1995, 8; Kaplan and Stein 1995, 10.

20. Cotliar 1995, 8; Kaplan and Stein 1995, 1, 10.

21. 7月28日,星期五,在《芝加哥论坛报》第三页的都市版块刊登了一篇标题为《多诺霍认同热浪死亡人数》的文章。

22. Kass and Kaplan 1995, 1.

23. 同上书。

24. 都市老人在行动(Metro Seniors in Action 1995)。在热浪之后,很多环保者争论说政府有意放纵生产厂家排泄有害物质,直接导致了环境的破坏。大多数的环境科学家认为,全球升温提高了热浪的频率以及其他气候事件的发生,并且有一些专家强调,在热空气中一氧化碳的增加使得夏天变得更加危险。

25. Stone 1997, 181-183.

26. Kass 1995d, 3.

27. 参见阿伦特(Arendt 1963, 84-86)的经典讨论,政府和社会如何利用委婉的语言作为一种掩饰他们所犯下的却又不愿面对暴行的一种方法。在《国家的拒绝》(*States of Denial*)中,斯坦利·科恩(Cohen 2001, 第四章)评论了涉及否认的语言游戏。

28. 例如在“在风险中实现”(Reaching Those at Risk)一章中,委员会警告,老人在文化和语言上被隔离,在这些老年人居住多年的地方,他们的邻居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朋友和家人已经离开这个城市,这导致了48%的城市老人独自居住,而且“没有人为他们提供帮助”。

29. 同上书, 3, 12.

30. 同上书, 3.

31. 同上书, 4.

32. 同上书, 4. 委员会解释说,市区活动室很少有人去,很多老年人不愿意为陌生人开门,是老人不想从政府那里得到帮助的证据。

33. 同上书, 3-4.

34. 皮埃尔·布尔迪厄(Bourdieu 1991, 1996)已经表明,政府有一种独特的能

力,不仅能够对主要事件和社会过程提供官方解释,而且规定了组织辩论中的术语和种类。布尔迪厄称这种政策性工作为“合法的符号暴力”,它构建了我们能够看见和不能够看见的社会世界的方式。

35. Cohen 1996, 2001.

36. Cohen 1996; 2001, 7, 8, 80, 109, 113, 134.

37. 在灾难中,极端事件引起或导致他们自身死亡的官方观点太过于普通,以至于在芝加哥的丹尼尔·阿尔瓦雷斯否认这种指控,这可以从他的字里行间感受到。医学人类学家维纳·达斯(Das 1995)说明了印度医学家和政府官僚将博帕尔化学灾难导致的死亡,归咎于当地居民的个体行为。在官方的语言和关于这个事件的报道中,达斯认为“异氰酸甲酯的特性并不是问题的重点,重点是当居民面对不能解释的现象时试图逃跑的行为”(1995, 151)。阿马蒂亚·森和迈克·戴维斯(Sen 1981 and Mike Davis 2001)也记载了在印度和中国官员分别指责在灾荒中的罹难者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原因而饿死的。

38. 两位在 20 世纪早期和中期已经离任的城市官员说,圣路易斯的国家卫生专家所认为的作为模范介入项目的供热计划,事实上是从芝加哥最早提出的。

当然,我们不能知道我们所面临的所有危险,但是通过政府确定它们将会提供什么形式的保护过程是非常政治化的。玛丽·道格拉斯和阿伦·维尔达夫斯基(Mary Douglas and Wildavsky 1983, 7)认为现代社会信任政府和政策制定者,政府和政策制定者有责任保护他们的安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国家公共卫生机构不仅对热浪的人员成本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记录,而且还显示了谁是中暑危机的最脆弱的群体,从而制定出预防措施。

面对一系列广泛的潜在的健康危险,城市管理者觉得未来高温灾难的风险并不严重,而且脆弱居民的条件并不令人害怕到值得做一个详细的计划。我的一些访谈对象告诉我,当消防局使操作合理化和“减肥”以获得组织效率的时候,突发事件的回应系统已经被搁置了。在道格拉斯和维尔达夫斯基(Douglas and Wildavsky 1983, 4)的框架体系中,消防局不能无视热浪灾难中的危险,应该接受这个风险并集思广益地了解如何处理这种风险。这好似一项显著的政策决定,尽管人类高估了它在芝加哥实施的结果。

39. Lee 1999, 455.

40. 根据政策科学家默里·埃德尔曼(Edelman 1988, 102)的说法,“在聚光灯下卷入重大事件的个人,将注意力从能解释这些事件和其他现象的更大的结构上转移开来。”

41. 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的《决定什么是新闻》(1979)仍然是对组织和社会条件最好的表述,他认为是由记者决定什么是最有价值的新闻。

## 第五章

1. 在《电视:技术和文化形式》(*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e Form*)中,雷蒙德·威廉斯(Williams [1974]1992,98-99)分析了一些电视新闻广播的顺序,谈到,“(新闻)包含了一些重要的事件,(但是)它们之间的联系并没有进行特别的安排。”威廉斯认为,不系统地将各种早期的影像组合在一起,以及混乱的故事,使得文化工作抹杀了电视上报道的问题和事件的关系。

2. 盖伊·塔奇曼(Tuchman 1973)研究了记者通过何种方法将未预期到的事情转变成熟悉的叙述框架和事件种类,从而将“突发事件常规化”。

3. Gans 1979,52-55.

4. Molotch and Lester 1974,109.

5. 同上书,109-110。

6. Fallows 1996,7.

7. Rosen 1999,281.

8. Boorstin 1961,8.

9. 迈克尔·舒德森(Schudson 1978,6)认为,媒体“(倾向于)使新闻价值屈从于商业价值,并且一些有坚定信念的批评家担心,会出现美国哥伦比亚公司新闻作者丹·拉瑟(Dan Rather)所说的‘新闻的娱乐化’”。

10. 了解聚焦最好的实践和对《芝加哥论坛报》的一名记者特写的调查性新闻研究,参见埃特玛和格拉瑟(Ettema and Glasser 1998,37-39,171-172)。

11. 菲利普·施莱辛格(Philip Schlesinger),引自于甘斯(Gans 1979,81)。

276 12. 根据赫伯特·甘斯(Gans 1979),利昂·西加尔(Sigal 1986),一些研究媒体、政府官员、精英和其他掌握信息来源的主流社会学家,经常通过媒体将其观点投射给公众,并定义出主要问题的时间。

13. 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一旦一个事件被选择在新闻媒体中报道,便能够影响它的结果和传播。然而,社会学家一旦提出他们的建议后,对于决定如何处理事件的过程关注很少。一些关于媒体代表针对新闻叙述经常不能区分新闻的不同部分的研究表明,这是基于他们在新闻媒体中的位置决定的,因此,他们会忽视所报道的新闻的背景和等级顺序。

14. 一篇在1975年刊登的关于新闻和事件的有影响力的文章中,哈维·莫罗奇和玛丽琳·莱斯特(Molotch and Lester 1975)发现,在加州圣巴巴拉的石油泄漏事件之后,当地媒体的新闻报道比国家新闻的叙述更加综合且具有实质性。他们认为,地点上的临近对于新闻报道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15. 内容分析分别由两位研究者独立做出,其中一位是西北大学的社会学研

究生埃伦·贝里(Ellen Berrey),另一位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斯科特·里昂·华盛顿(Scott Leon Washington),他们分享研究成果。两位研究者为每一个刊登在《芝加哥论坛报》和《芝加哥太阳时报》中的文本(包括新的文章、特辑、社论和信件)、新闻标题和图表设定了两个主导框架。有143个文本和100个图表来自于《芝加哥论坛报》,有159个主题和47个图表来自于《芝加哥太阳时报》,包括其中的分析。

16. 都市部是报纸的都市部分及第一部分(芝加哥故事)的编辑部。

17. 像其他的社会团体和组织一样,这是个生活节奏模式化的新闻机构,它们的运行因季节、日期和时间的不同而不同,并且伴随着最紧张的采访和相对轻松的工作。

18. 在1999年关闭的芝加哥城市新闻局,为这个城市提供了108年的当地新闻的电信服务,培训了一代代的新闻记者。

19. AP是美联社的缩写,是最老和最大的媒体之一。

20. Le and Kates 1995, 1.

21. 关于24小时地方新闻的更完整的记述,参看利伯曼(Lieberman 1998)。

22. 20世纪70年代,研究新闻机构的社会学家发现,记者建立了一整套常规的类型(conventional categories),习惯于通过这种路径开展工作和主张控制新闻制作过程。典型化的故事适合按照预定的类型(predetermined)组织新闻内容,故事的特性极大地决定着信息来源、制定过程和被公众关注的程度。因此,框架帮助确定问题、诊断因果、做出道德判断、建议救济,从而不仅决定人们是否注意有关事项,而且决定他们还要如何评价它。参见加姆森(Gamson 1992),戈夫曼(Goffman 1974),恩特曼(Entman 1993)。

23. Castells 1996, 333. 詹姆斯·法洛斯(Fallows 1996),迈克尔·舒德森(Schudson 1995)和皮埃尔·布尔迪厄(Bourdieu 1998)对提高记者文化融合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没有人”布尔迪厄声称,“像记者那样会阅读所有的文章,记者倾向于认为每个人会读所有的报纸。……要想知道说什么,你不得不去了解其他人已经说了什么”(1998, 24)。另一方面,一些记者认为在一个专业领域内面临的工作挑战,使他们不得不做出最有原创性的报道和个人的贡献。这在杂志中比在每日出版物和广播报道更加有可能,因为他们需要更快的报道。

24. Bourdieu 1998, 23-25.

25. 关于最近的内部批评,参见詹姆斯·斯夸尔斯(James Squires)的《阅读关于它的一切》(*Read All About It* 1993);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的《打破新闻》(*Breaking the News* 1996);和迈克尔·詹韦(Michael Janeway)的《否认共和》(*Republic of Denial* 1999)。

26. 迈克尔·舒德森(Schudson 1978, 11)认为,“新闻是新闻从业人员的信息源的成果,确实,大多数分析家同意信息源是第一位的。”

27. Kaniss 1995b, 3.

28. 参见盖伊·塔奇曼的经典文章“作为策略性仪式的客观性:对新闻记者客观性观念的考察”(1972),讨论关于记者在对待常规的官方的信息源的怀疑度要比其他信息源的怀疑度要低。

29. 其他研究显示,在灾难中,政府官员对信息源扮演着特殊影响力的角色,当掌握权力的公共性机构通过特殊的渠道获得关于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的时候(Sood, Stockdale, Rogers 1987; Vanghan 1996)。

30. Royko 1995; Schreuder and Gorner 1995.

31. Kass 1995b, 3.

32. Schreuder and Gorner 1995, 6.

33. Semenza 1995.

34. 《芝加哥论坛报》的报道是卡拉汉(Callahan 1995)。《芝加哥太阳时报》的报道是罗德里格斯(Rodriguez)和布朗(Brown)。

35. 皮埃尔·布尔迪厄(Bourdieu 1998)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新闻界的公约,它有隐瞒其真正观点和所展示事件的效力,当直接报道的渠道被关闭时,也会有人要求开放。关于新闻界的“客观性的神话”的构建和指责的完整叙述,参见甘斯(Gans 1979),舒德森(Schudson 1978)和塔奇曼(Tuchman 1972)。

36. Spielman and Mitchell 1995b, 1, 9.

37. Kass 1995a, 4.

38. Bryant 1995; McSherry 1995b.

39. 参见甘斯(Gans 1979:131-138)关于减轻记者和一般记者的影响的完整讨论。

40. Stein 1995a, 1995b.

41. Kiernan and Zielinski 1995, 1.

42. 同上书。

43. 同上书, 6。

44. 这种习惯的部分原因是在《芝加哥论坛报》中,文字编辑和记者之间存在专业差距,一位文字编辑证实,这样的鸿沟是“有一种奇怪的仇恨在我们之间”。  
278 “我们类似于陌生人”,他解释道,因为他们不同的办公桌上工作并且有不同的职责,而且文字编辑认为,如果文章太长则会为了版面而修剪、改动记者的文章。如今,《芝加哥论坛报》编辑试图减少这种隔阂,并且通过制定一种实验性的措施,即要求记者将标题建议同他们的文章一起提交,解除记者对于准确理解标题的顾虑。尽管他们总是对标题感到失望,但是大多数记者都拒绝参加这个项目。他们更多关心的是这会承担多余的工作量,而不是关于他们文章中标题的质量。所以,他们在其发挥作用之前就终止了这项实验。

然而,一些记者仍保持着对加工他们文章的敏感度,并且试图培养与文字编

辑的关系,以提高他们对其过程的控制。史克鲁德对于减少她的文章同文字编辑者的不友好的可能性的方法是,以个人的方式了解他们,并且为他们好的工作表现给予奖励。“我试图同文字编辑建立一种定期的联系,因为我感到很多时候他们看东西的速度很快,”她说,“有时他们会捕捉到一些事实性的错误和我视为生命支柱的东西。因为他们承担着非常艰苦的工作。”然而,史克鲁德和其他大多数记者一样,回忆了许多文字编辑破坏他们的文章的例子,或者删除了主要内容或者删减文章末尾导致结尾的不完整。在这些例子中,史克鲁德指出“你只是想从桌下偷偷爬走……因为你的名字在文章中,并且……这是你的公共呼吁,你必须接受他们及其来源。”对于一些记者,他们对于文字编辑改动他们文章的恐惧如此强烈,以致直到文章发表他们都拒绝阅读自己的文章。“不管怎样都太晚了”,有人解释道,并且其他人承认“我不能做任何处理。”

45. 在《构建政治奇观》(*Constructing the Political Spectacle*)中,默里·埃德尔曼(Edelman 1988, 120)认为,公开展示公共事件的新闻报道“有助于缓和历史、社会结构、经济不平等和描述为幸福和个人隐私的主题文章……通过扩展新闻,突出强调它的观众,似乎有一种不言自明的意义。含义和自身的发展是证明不公平的正当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典型表达和生动强调”,埃德尔曼的观点包含了居伊·德波(Guy Debord)的文章《景观社会》([1967]1983)。德波认为,景观是卓越超群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强迫并且全面地证明了意识形态体系的本质:贫穷、奴役和对真实生活的否定。景观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和疏远的表达。”([1967] 1983, 215)

46. 在《决定什么是新闻》中,赫伯特·甘斯(Gans 1979, 82 和第三章)确定了在选择有价值的新闻时主要应考虑七个因素:“信息源、实质性、作品、价值考量、商业、听众和政治考量。”

47. 《芝加哥论坛报》创作地区性的新闻已经几十年了,但是直到最近,先进的出版技术才允许公司自由地交换头版新闻和图表。在1995年,报纸频繁地使用这项技术,但是经理和编辑随后决定,读者喜欢更协调统一的头版头条和交换的新闻少些平庸。在《制作当地新闻》中,菲莉丝·卡尼斯(Phyllis Kaniss 1991)讨论关于《芝加哥论坛报》早期的划区实验中,她也发现中心城市为都市读者提供了更多有影响力的新闻。

这些改变现在已经成为《芝加哥论坛报》新闻创作的日常工作。他们通过吸引那些对当地问题感兴趣的读者来提高市场占有率,也影响了大都市社会和象征性的分割。根据居民所在地将读者划分新闻社区。城市报纸,失去了通过至少是一种代表城市生活的文本来整合城市社区的能力,这一功能的提出归因于贝内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涂尔干影响下的一些传媒社会学家(比如Chaney [1986])。相反,报纸有助于按照市场原则构建的边界形成一种标志性的都市社区。



这一领域的一位技术领导认为,《芝加哥论坛报》在制作和发行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它能够为特定的市场来组织报纸。其他主要的报纸,如《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制作了许多地区版日报,但是只有《洛杉矶时报》,更多的报道覆盖了山林农田和城市厂房。《奥兰多哨报》,像《芝加哥论坛报》一样,它的营销策略是在同一个大都市地区实行不同的分区。面对其他新闻媒体的日益激烈的竞争,例如有线电视和网络,越来越多的报纸采用了《芝加哥论坛报》的模式,并且开始制作基于细分市场利益的区域版本。

48. Tennison 1995.

## 结论

1.《芝加哥论坛报》1995,8。

2. Palecki, Changnon and Kunkel 2001,8.

3. 同上书,15。

4. 同上书,19—21。

5. 同上书,13—14。

6. 同上书,8。

7. 劳伦斯·卡尔克施泰因和他的同事(Kalkstein and colleagues 1996)已经完成了一系列最完整的研究,表明精确的高端报警系统和强公共健康策略能够降低热浪造成的影响。

8. Manier 1999,6.

9. 参见报告草案,《2001年气候变化:影响、适应性和脆弱性》,来自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10. 有一篇关于增进公共健康的文献,是关于极端不平等的负面健康结果的。在众多重要研究中,参见卡普兰等人(Kaplan, et al. 1996)和肯尼迪、河内一郎和普洛思罗-斯蒂思(Kennedy, Kawachi, and Prothrow-Stith 1996)。

11. Massey 1999,6.

12. Squires 1993; Bagdikian 1997.

280 13. 参见约瑟夫·图罗(Joseph Turow)的《分裂美国:广告商和新媒体世界》中关于广告产业如何对新闻产品和分割媒体观众的最综合的表述。

14. 我所采访的记者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正如菲莉丝·卡尼斯在《制作当地新闻》中提到的一样。

15. 皮埃尔·布尔迪厄(Bourdieu 1999,629)生动地解释了实施这种生物社会学调查的科学原因和政治原因。“开始意识到那些使生活痛苦甚至无法忍受的机制并不能使这些机制无效,将矛盾曝光也不能解决问题。”但是,就像我们会对社

社会学知识的社会效力产生怀疑一样,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它在以下方面产生的效果:它使那些人发现他们的痛苦应归结为社会原因,并因此减除自己的罪孽感;它使公众了解了各种形式的不幸,包括最私人化的、最隐秘的不幸之社会根源,而这一根源以前是被集体性隐藏起来的。与表面上看上去的相反,这种观察并不会导致绝望;相反,在这一知识的武装下,社会世界此前之作为它可能之作用,就为公众所知了。

## 后记

1. 参见罗斯·米勒(Ross Miller)关于神话和历史的出色讨论。《美国的天启:大火和芝加哥的神话》(1990);和卡伦·萨威斯拉克(Karen Sawislak)《阴燃的城市:芝加哥人和大火灾,1871—1874》(Sawislak 1995)。

2. 参见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事件再次重现”(Sahlins 2000, 293—351),关于事件史争论的充分阐述,并且试图对结构和事件进行综合。

3. 引自麦克谢里的论述(McSherry 1995)。

4. 引自希门尼斯的论述(Jimenez 1995, 8)。

## 参 考 书 目

- Abraham, Laurie Kaye(劳里·凯耶·亚伯拉罕). 1993. *Mama might be better off dead*(《妈妈可能会死得更好》).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braido-Lanza, Ana(安娜·阿布雷多-兰扎), Bruce Dohrenwend(布鲁斯·多伦温德), Daisy Ng-Mak(黛西·恩格-马克) and J. Blake Turner(J. 布莱克·特纳). 1999. The Latino mortality paradox: A Test of the 'salmon bias' and healthy migrant hypotheses(“拉丁裔死亡率悖论:对‘鲑鱼的偏见’和健康移民假设的检验”).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美国公共卫生杂志》)89:1543-1548.
- Administration on Aging(老年人管理局). 1999. Profile of older Americans: 1999(“美国老年人概况:1999”).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Administration on Aging.
- Alexander, Stephen(斯蒂芬·亚历山大). 1983. Public resource allocation in Chicago: Impact of the city's budget process on low and moderate-income communities(“公共资源在芝加哥的配置:城市预算过程对中、低收入社区的影响”). Chicago: Policy Research Action Group.
- Anderson, Benedict(贝内迪克特·安德森).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想象的社区》). New York: Verso.
- Anderson, Elijah(伊莱贾·安德森). 1990. *Streetwise: Race, class, and change in an urban community*(《街头:种族、阶级和一个城市社区的改变》).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9. *Code of the street: Decency, violence, and the moral life of the inner-city*(《街头规则:正派、暴力和市中心的道德生活》). New York: W. W. Norton.
- Angel, Jacquelin(杰奎琳·安杰尔), R. Angel(R. 安杰尔), J. McClellan(J. 麦克莱伦) and K. Markides(K. 马齐德斯). 1996. Nativity, declining health, and preferences in living arrangements among elderly Mexican Americans: Implications for long-term care(“出生、健康的衰退和墨西哥裔美国老人的居住偏好:长期照料的启示”). *The Gerontologist*(《老年病学家》)36:464-473.
- Applegate, William(威廉·阿普尔盖特), John Runyan(约翰·鲁尼恩), Linda Brasfield(琳达·布拉斯菲尔德), Mary Lynn Williams(玛丽·林恩·威廉斯),

- Charles Konigsberg(查尔斯·康尼格斯博格) and Cheryl Fouche(谢里尔·福凯). 1981. Analysis of the 1980 heat wave in Memphis (“1980年孟菲斯热浪解析”). *American Geriatrics Society*(《美国老年病学会杂志》)29:337-342.
- Arendt, Hannah(汉娜·阿伦特). 1963. *Eichma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 New York: Viking Press.
- Bachelard, Gaston(加斯东·巴什拉). [1934]1984. *The New Scientific Spirit*(《新科学精神》). Boston: Beacon Press. 最初出版的题目是 *Le Nouvel Esprit Scientifique*(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34).
- Bagdikian, Ben(本·巴格迪基安). 1997. *The media monopoly*(《媒体垄断》). Boston: Beacon Press.
- Baumgartner, M. P. (M. P. 鲍姆格特纳). 1988. *The moral order of a suburb*(《郊区的道德秩序》).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ck, Ulrich(乌尔里希·贝克).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风险社会:迈向一个新的现代性》). London: Sage.
- Beinart, Peter(彼得·贝纳特). 1997. The pride of the cities(“城市的骄傲”). *The New Republic*(《新共和》), 30 June, 16-24.
- Biel, Steven(史蒂文·比尔). 1996. *Down with the old canoe: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Titanic disaster*(《放下旧艇:泰坦尼克号灾难的文化史》). New York: W. W. Norton.
- Blazer, Dan(丹·布莱泽). 1982. Social support and mortality in an elderly community population (“社会支持和社区老年人口的死亡率”).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美国流行病学杂志》)115:684-694. 282
- Boorstin, Daniel(丹尼尔·布尔斯特廷). 1961. *The image: a guide to pseudo-events in America*(《形象:美国造假事件指南》).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Books.
- Bourdieu, Pierre(皮埃尔·布尔迪厄).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语言和符号权力》).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6. *The state nobility*(《国家精英》).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8. *On television*(《论电视》). New York: The New Press.
- Bourdieu, Pierre, et al. (皮埃尔·布尔迪厄等人). 1999.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世界之重:当代社会的社会疾苦》).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urgois, Philippe(菲利普·布尔古瓦). 1995. *In search of respect: Selling crack in El Barrio*(《生命的尊严:透析哈莱姆东区的快克买卖》).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ooks-Gunn, Jeanne (珍妮·布鲁克斯-冈恩), Greg Duncan (格雷格·邓肯) and J. Lawrence Aber (J. 劳伦斯·阿贝). 1997. *Neighborhood poverty: Context and consequences for children* (“贫穷的邻居: 背景和对儿童所造成的后果”).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Bryant, Rick (里克·布赖恩特). 1995. Experts: Daley won't feel the heat for long (“专家: 戴利感到炎热不会持续太久”). *The Daily (Chicago) Southtown* (《南镇日报》(芝加哥)), 23 July.
- Buckingham, Robert (罗伯特·白金汉), S. A. Lack (S. A. 拉克), B. M. Mount (B. M. 芒特), L. D. Maclean (L. D. 麦克莱恩) and J. T. Collins (J. T. 柯林斯). 1978. Living with the dying: Use of the technique of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与临终者在一起: 参与观察法的应用”).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加拿大医学会杂志》) 115: 1211 - 1215.
- Building Organization and Leadership Development (BOLD) (组织建构和领导力发展). 1995. BOLD group endorses CHAPS police unit (“组织建构和领导力发展, 赞同票据交换自动付款系统的警察单位”). Press release. Chicago: BOLD.
- Burawoy, Michael (迈克尔·布洛维). 1998. The extended case method (“拓展个案法”). *Sociological Theory* (《社会学理论》) 16: 4 - 33.
- Callahan, Patricia (帕特里夏·卡拉汉). 1995. Residents leave cooling centers in cold (“从冷气中心出来的居民感冒了”). *Chicago Tribune* (《芝加哥论坛报》) 17 July, sec. 2, pp. 1, 4.
- Castells, Manuel (曼纽尔·卡斯特).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网络社会的崛起》).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1998. *End of millennium* (《千年终结》).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Catalano, Ralph (拉尔夫·卡塔拉诺) and Kate Pickett (凯特·皮克特). 1999. A taxonomy of research concerned with place and health (“关于地区和健康的分类学研究”). Gary Albrecht (加里·阿尔布雷克特), Ray Fitzpatrick (雷·菲茨帕特里克) and Susan Scrimshaw (苏珊·斯克林肖), eds. *Handbook of social studies in health and medicine* (《保健和医疗社会研究手册》). London: Sage.
- Cater, Douglass (道格拉斯·凯特). 1959. *The fourth branch of government* (《政府的第四个部门》).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Chaney, David (戴维·钱尼). 1986. The symbolic mirror of ourselves: Civic ritual in mass society (“象征自己的镜子: 大众社会的公民仪式”). Richard Collins (理查德·柯林斯) ed.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A critical reader* (《媒体、文化和社会: 一位批判性的读者》). Beverly Hills: Sage.
- Chicago Fact Book Consortium (芝加哥数据汇编). 1995. *Local community fact book: Chicago metropolitan area* (“当地社区概况: 芝加哥大都市区”). Chicago:

- Academy Chicago Publishers.
- Chicago Housing Authority(芝加哥房屋管理局). 1995. Elderly receive needed security through Chicago Housing Authority protection of seniors program(“老人通过芝加哥房屋管理局老人防护计划获得其所需的保障”). Press release. Chicago: Chicago Housing Authority.
- Chicago Sun-Times*(《芝加哥太阳时报》). 1995. List of those who died alone(“孤独死亡者的清单”). 25 August, p. 14.
- Chicago Tribune*(《芝加哥论坛报》). 1992. *The worst schools in America*(《美国最糟糕的学校》). Chicago: Contemporary Press.
- Chicago Weekend*(《芝加哥周末报》). 1995. Daley, city guilty of negligence, says Rush(“拉什议员批评戴利市长失职”). 23 July, p. 1.
- Chiricos, Ted(特德·基里克斯), Sarah Escholz(萨拉·埃施霍尔茨) and Marc Gertz(马克·格茨). 1997. Crime, news, and fear of crime: Toward an identification of audience effects(“犯罪、新闻和对犯罪的恐惧:对观众效应的证明”). *Social Problems*(《社会问题》)44:342-357. 283
- Citro, Constance(康斯坦丝·奇特罗) and Robert Michael(罗伯特·迈克尔). 1995. *Measuring poverty: A new approach*(《贫穷的测量:一种新的取向》).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 City of Chicago(芝加哥市). 1995. Final report: Mayor's commission on extreme weather conditions(“最终报告:市长委员会论极端天气状况”). November.
- City of Chicago,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芝加哥市,公共卫生局). 1996. An epidemiological overview of violent crimes in Chicago(“芝加哥暴力犯罪的流行病学概况”), 1995.
- Cohen, Adam(亚当·科恩) and Elizabeth Taylor(伊丽莎白·泰勒). 2000. *American pharaoh: Mayor Richard J. Daley: his battle for Chicago and the nation*(《美国法老:理查德·J.戴利为芝加哥和国家而战》).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 Cohen, Stanley(斯坦利·科恩). 1996. Government responses to human rights: Claims, denials, and counterclaims(“政府对人权报告的回应:要求、否认和反诉”). *Human Rights Quarterly*(《人权季刊》)18:517-543.
- 2001. *States of denial: knowing about atrocities and suffering*(《国家的拒绝:知晓暴行和苦难》).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Coles, Robert(罗伯特·科尔斯). 1997. *Old and on their own*(《老龄化和自立》). New York: Double Take Books.
- Comerio, Mary(玛丽·科梅里奥). 1998. *Disaster hits home: New policy for urban housing recovery*(《灾难殃及家庭:城市住房补偿的新政策》). Berkeley and Los

-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nnell, R. W. (R. W. 康奈尔). 1995. *Masculinities* (《男子气概》).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ok, Timothy (蒂莫西·库克). 1998. *Governing with the news: The news media as a political institution* (《用新闻来治理: 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新闻媒体》).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otliar, Sharon (沙伦·科特利尔). 1995. Count isn't overblown, medical examiner insists (《法医鉴定人坚持认为, 统计数据没有过分渲染》). *Chicago Sun-Times* (《芝加哥太阳时报》), 19 July, p. 8.
- Crank, John (约翰·克兰克). 1994. Watchman and community: Myth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policing (《守夜人和社区: 神话和政策的制度化》). *Law and Society Review* (《法律与社会评论》) 28: 325 - 351.
- Cronon, William (威廉·克罗农). 1995. Introduction: In search of nature (《导言: 寻找自然》). In William Cronon (威廉·克罗农) ed. *Uncommon ground: Toward reinventing nature* (《不寻常: 走向重塑自然之路》). New York: W. W. Norton.
- Das, Veena (维纳·达斯). 1995. *Critical events: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on contemporary India* (《重要事件: 人类学视角下的当代印度》).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avis, Mike (迈克·戴维斯). 1990. *City of quartz: Excavating the future in Los Angeles* (《石英之城: 挖掘洛杉矶的未来》). London: Verso.
- 1998. *Ecology of fear: Los Angeles and the imagination of disaster* (《生态恐惧: 洛杉矶和想象的灾难》).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 2001.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El Nino famin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大屠杀: 厄尔尼诺饥荒与第三世界的形成》). London: Verso.
- Dematte, Jane (简·德马特), Karen O'Mara (卡伦·奥马拉), Jennifer Buescher (珍妮弗·比舍尔), Cynthia Whitney (辛西娅·惠特尼), Sean Forsythe (肖恩·福赛斯), Turi McNamee (图里·麦克纳米), Raghavendra B. Adiga (加拉万德拉·B. 阿迪加) and I. Maurice Ndukwu (I. 莫里斯·恩杜克伍). 1998. Near-fatal heat stroke during the 1995 heat wave in Chicago (《1995年热浪时期芝加哥致命的中暑》).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内科年鉴》) 129: 173 - 181.
- di Leonardo, Micaela (米凯拉·迪·莱昂纳多). 1999. *Exotics at home: Anthropologist, others, American modernity* (《国内的外来者: 人类学家、他者和美国的现代性》).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ohan, Daniel (丹尼尔·多翰). 1997. Culture, poverty, and economic order in two



- inner-city areas(“两个市中心地区的文化、贫穷和经济秩序”).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Donoghue, Edmund(埃德蒙·多诺霍), Michael Graham(迈克尔·格雷厄姆), Jeffrey Jentzen(杰弗里·延岑), Barry Lifchultz(巴里·利夫舒尔茨), James Luke(詹姆斯·卢克) and Haresh Michandani(哈瑞什·米尚达尼). 1997. Criteria for the diagnosis of heat-related deaths: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edical Examiners(“诊断中暑死亡人数的标准:国家法医鉴定人协会”).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Forensic Medicine and Pathology*(《美国法医学与病理学杂志》)18: 11-14.
- Douglas, Mary(玛丽·道格拉斯) and Aaron Wildavsky(阿伦·维尔达夫斯基). 1983. *Risk and culture: An essay on the selection of techn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ngers*(《风险与文化:论技术选择与环境危害》).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84
- Drake, St. Clair(圣·克莱尔·德雷克) and Horace Cayton(霍勒斯·凯顿). [1945]1993. *Black metropolis: A study of Negro life in the northern city*(《黑人都市:城市北部黑人生活研究》).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Repri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ubord, Guy(居伊·德波). [1967]1983.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景观社会》). Detroit: Black and Red. 最初出版的题目是 *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Paris: Editions Burchet-Chastel, 1967)。
- Durkheim, Emile(埃米尔·涂尔干). 1951.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自杀论》). John A. Spaulding(约翰·A.斯波尔丁) and George Simpson(乔治·辛普森) trans.; 乔治·辛普森编写导论. New York: Free Press.
- Durkheim, Emile(埃米尔·涂尔干) and Marcel Mauss(马塞尔·莫斯). [1903] 1963. *Primitive classification*(《原始分类》).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最初出版的题目是 *De quelques formes primitives de classification*(*Année sociologique*《社会学年鉴》, 1901-1902)。
- Economist*(《经济学家》). 1995. Da manager: City government(“大管理者:城市政府”). 4 March, pp. A25-26.
- Edelman, Murray(默里·埃德尔曼). 1988. *Constructing the political spectacle*(《构建政治奇观》).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hrenhalt, Alan(艾伦·埃伦霍尔特). 1995. *The lost city: the forgotten virtues of community in America*(《失落之城:在美国被遗忘的共同体美德》). New York: Basic Books.
- Eig, Jonathan(乔纳森·艾格). 1999. Da rules(“大规则”). *Chicago Magazine*(《芝加哥杂志》), November, pp. 114-125.

- Ellin, Nan(纳恩·埃琳) ed. 1997. *Architecture of Fear* (《建筑恐惧》), Princeton, N.J.: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 Emergency Net News Service(应急网络新闻服务). 1995. Caution urged during heat wave(“小心应对热浪”). [www.emergency.com/heatwave.htm](http://www.emergency.com/heatwave.htm). Accessed 13 December 2000.
- Engels, Frederick(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45]1984.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Chicago: Academy Chicago Publishers. 最初出版题目是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Leipzig: O. Wigand, 1845)。
- Entman, Robert(罗伯特·恩特曼). 1993.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fractured paradigm(“架构:朝着阐明断裂的范式”).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传播学刊》)43:51-58.
- Erikson, Kai(卡伊·埃里克森). 1976. *Everything in its path: Destruction of community in the Buffalo Creek flood* (《吞没一切:布法罗河洪水对社区的毁坏》).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1994. *A new species of trouble: The human experience of modern disasters* (《一种新困境:人类经历的现代性灾难》). New York: W. W. Norton.
- Esping-Anderson, Gosta(哥斯塔·埃斯平-安德森).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9.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 (《后工业经济的社会基础》).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ttema, James(詹姆斯·埃特玛) and Theodore Glasser(西奥多·格拉瑟). 1998. *Custodians of conscience* (《良知的看守人》),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Fallows, James(詹姆斯·法洛斯). 1996. *Breaking the news: How the media undermine American democracy* (《打破新闻:媒体如何破坏美国的民主》). New York: Vintage.
- Farmer, Paul(保罗·法默). 1999. *Infections and inequalities: The modern plagues* (《传染病与不平等:现代瘟疫》).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ederman, Maya(马亚·费德曼), Thesia Garner(赛西亚·加纳), Kathleen Short(凯瑟琳·肖特), W. Boman Cutter IV(W. 博曼·卡特四世), John Kiely(约翰·基利), David Levine(戴维·莱文), Duane McGough(杜安·麦高夫) and Marilyn McMillen(玛里琳·麦克米伦). 1996.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poor in America? (“贫穷在美国意味着什么?”) *Monthly Labor Review* (《劳工评论月

- 刊》), 17 May, pp. 3 - 17.
- Fegelman, Andrew (安德鲁·费戈尔曼). 1995. Medical examiner takes the heat (“法医鉴定人认为天气炎热是死因”), *Chicago Tribune* (《芝加哥论坛报》), 25 July, sec. 2, p. 3.
- Fischer, Claude S. (克劳德·S.费希尔). 1975. Toward a subcultural theory of urbanism (“迈向城市化的一种亚文化理论”).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美国社会学杂志》) 80: 1319 - 1341.
- [1976] 1984. *The urban experience* (《城市经验》).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Reprint,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1982. *To dwell among friends: Personal networks in town and city* (《与朋友相伴: 城镇和城市的个人网络》).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ischer, Claude (克劳德·费希尔) and Susan Philips (苏珊·菲利普斯). 1982. Who is alon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people with small networks (“谁是独自一人? 小型网络中人们的社会特征”). In *Loneliness: A sourcebook on current theory, research, and therapy* (《孤独感: 一份现行理论、研究和治疗的原始资料》). In Leticia Anne Peplau (利蒂西娅·安妮·佩普劳) and Daniel Perlman (丹尼尔·珀尔曼), eds. New York: Wiley.
- Fleming-Moran, M. (M. 弗莱明-莫兰), T. Kenworthy-Bennett (T. 肯沃西-贝内特) and K. Harlow (K. 哈洛). 1991. Illinois state needs assessment survey of elders aged 55 and over (“伊利诺伊州需要对55岁及以上老年人做评价调查”). Bloomington: Heartland Center on Aging, Disability, and Long Term Car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 Indiana University; and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Senior Living, South Bend.
- Flock, Jeff (杰夫·弗洛克). 1995. Chicago morgue struggle to keep up with heat deaths (“芝加哥太平间与中暑死亡数赛跑”), 16 July, Cable Network News (CNN).
- Fornek, Scott (斯科特·福奈克) and Neil Steinberg (尼尔·斯坦伯格). 1995. Death was the only equalizer for varied victims (“死亡是对不同罹难者的唯一补偿”). *Chicago Sun-Times* (《芝加哥太阳时报》), 17 July, p. 10.
- Frazier, E. Franklin (E. 富兰克林·弗雷泽). 1939. *The Negro family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的黑人家庭》).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61. *The Negro church in America* (《美国黑人教会》). Liverpool, England: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 Freudenburg, W. R. (W. R. 弗洛伊登伯格). 1988. Perceived risk, real risk: social science and the art of probabilistics risk assessment (“知觉到的风险、真实的风险: 社会科学和风险概率评估的艺术”). *Science* (《科学》) 242: 44 - 49.

- Furstenberg, Frank(弗兰克·弗斯滕伯格), Thomas Cook(托马斯·库克), Jacqueline Eccles(杰奎琳·埃克尔斯) and Arnold Sameroff(阿诺德·萨莫洛夫). 1998. *Managing to make it: Urban families and adolescent success*(《排除万难:城市家庭和青少年的成功》).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amson, William(威廉·加姆森). 1992. *Talking politics*(《谈政治》).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ns, Herbert(赫伯特·甘斯). 1962. *The urban villagers: Group and class in life of Italian-Americans*(《城市居民:意大利裔美国人生活的群体和阶层》). Glencoe, Ill.: Free Press.
- 1979. *Deciding what's news*(《决定什么是新闻》). New York: Pantheon.
- 1995. *The war against the poor: The underclass and antipoverty policy*(《对贫穷的战争:下层社会和反贫穷政策》).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97. Best-sellers by sociologists: An exploratory study(“社会学家的畅销书:一项探索性研究”). *Contemporary Sociology*(《当代社会学》)26: 131-135.
- Gibson, Hamilton(汉密尔顿·吉布森). 2000. *Loneliness in later life*(《孤独的晚年生活》). London: Macmillan Press.
- Gilbert, Neil(尼尔·吉尔伯特). 1995. *Welfare justice: Restoring social equity*(《福利正义:恢复社会公平》).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Glassner, Barry(巴里·格拉斯纳). 1999. *The culture of fear: Why Americans are afraid of the wrong things: crime, drugs, minorities, teen moms, killer kids, mutant microbes, plane crashes, road rage, and so much more*(《恐惧文化——为什么美国人害怕错误的东西:犯罪、毒品、少数民族、少女妈妈、小孩杀手、变种微生物、飞机失事、公路暴怒症等等》). New York: Basic Books.
- Glastris, Paul(保罗·吉拉斯特里斯). 1992. Reinventing da mayor(“再造大市长”).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23 March, pp. 40-42.
- Goetz, Barry(巴里·戈茨). 1959. State theory and fire control: selection mechanisms in local government(“国家理论和火灾控制:地方政府的选择机制”). *Critical Sociology*(《批判社会学》)23: 32-62.
- Goffman, Erving(欧文·戈夫曼).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New York: Anchor Books.
- 286 ——1974. *Frame analysis*(《框架分析》).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 Gould, Stephen Jay(斯蒂芬·杰伊·古尔德). [1981]1996. *The mismeasure of man*(《人的误测》). New York: W. W. Norton. Reprint, New York: W. W. Norton.
- Greenwich, Howard(霍华德·格林威治), Jacqueline Leavy(杰奎琳·利维)和 John Jones(约翰·琼斯). 1996. *Moving beyond the basics: Building Chicago for the next century*(“超越基础:构建跨世纪的芝加哥”). Chicago: Neighborhood

- Capital Budget Group.
- Groth, Paul(保罗·格罗斯). 1994. *Living Downtown* (《住在闹市区》).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urley, Jan(简·格利), Nancy Lum(南希·卢姆), Merle Sande(默尔·桑德), Bernard Lo(伯纳德·罗) and Mitchell Katz(米切尔·卡茨). 1996. Persons found in their homes helpless or dead(“被发现在家中无助或死去的人”).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334: 1710 - 1716.
- Habermas, Jürgen(尤尔根·哈贝马斯). 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Halpern, Robert(罗伯特·哈尔彭). 1999. *Fragile families, fragile solutions: A history of supportive services for families in poverty* (《脆弱的家庭、脆弱的解决方案: 一种支援服务贫困家庭的历史》).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ambleton, Robin(罗宾·汉布尔顿). 1990. Future directions for urban government in Britain and America(“英国和美国城市政府未来的方向”).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城市事务杂志》) 12: 75 - 94.
- Hannerz, Ulf(乌尔夫·汉内斯). 1969. *Soulside: Inquiries into ghetto culture and community* (《黑人那一边: 探索贫民聚集区的文化和社区》).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artstein, Larry(拉里·哈特斯坦). 1995. Hydrant-closing crews pelted with bullets(“关闭消防栓的人员遭到枪弹袭击”), *Chicago Tribune* (《芝加哥论坛报》), 17 July, sec. 2, p. 4.
- Hirsch, Arnold(阿诺德·赫希). 1983. *Making the second ghetto: Race and housing in Chicago, 1940 - 1960* (《正成为第二个贫民区: 1940 - 1960年芝加哥种族与住房》).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ch, Charles(查尔斯·霍克) and Robert Slayton(罗伯特·斯莱顿). 1989. *New homeless and old: Community and the skid row hotel* (《新无家可归者和老人: 社区与贫民区旅店》).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Hochschild, Arlie Russell(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 1973. *The unexpected community: Portrait of an old age subculture* (《意想不到的社区: 一个老年亚文化的肖像》).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ouse, James(詹姆斯·豪斯), Cynthia Robbins(辛西娅·罗宾斯) and Helen Metzner(海伦·梅茨纳). 1982. The associ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activities with mortality: Prospective evidence from the Tecumesh Community Health Study(“社会关系、活动和死亡率之间的关联: 来自蒂卡姆西社区卫生研究的前瞻性证据”).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美国流行病学杂志》) 116: 123 - 140.

- Hunter, Albert(艾伯特·亨特). 1974. *Symbolic communities: The persistence and change of Chicago's local communities*(《象征性社区:芝加哥地方社区的持续存在与变化》).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Illinois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伊利诺伊州公共卫生部). 1997. *Vital Statistics Basic Research Series 1/3*(“人口统计数据基础研究系列 1/3”). Springfield.
-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2001.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Climate change 2001: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决策者提要——2001年气候变化:影响、适应性和脆弱性”). Geneva.
- Irvine, Martha(玛莎·欧文). 2001. Hispanic influx shaping Chicago(“拉丁裔人的涌入对芝加哥的影响”). *Chicago Sun-Times*(《芝加哥太阳时报》), 11 March, p. 1.
- Jacobs, Jane(简·雅各布斯). 1961.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New York: Vintage.
- Janeway, Michael(迈克尔·詹韦). 1999. *Republic of denial: Press, politics, and public life*(《否认共和:新闻出版、政治和公共生活》).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Jargowsky, Paul(保罗·亚尔戈夫斯基). 1997. *Poverty and place: Ghettos, barrios, and the American city*(《贫穷与地区:贫民区和美国城市》).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Jasper, James(詹姆斯·贾斯珀). 2000. *Restless nation: Starting over in America*(《不安宁的民族:在美国重新开始》).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Jencks, Christopher(克里斯托弗·詹克斯). 1994. *The homeless*(《无家可归者》). 28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Jencks, Christopher(克里斯托弗·詹克斯) and Barbara Boyle Torrey(芭芭拉·博伊尔·托里). 1988. *Beyond income and poverty: Trends in social welfare among children and the elderly since 1960*(《超越收入与贫困:自1960年以来儿童与老人的社会福利趋势》). In John Palmer(约翰·帕尔默), Timothy Smeeding(蒂莫西·斯米丁) and Barbara Boyle Torrey(芭芭拉·博伊尔·托里) eds. *The vulnerable*(《弱势群体》). Washington, D. C.: The Urban Institute Press.
- Jimenez, Gilbert(吉尔伯特·希门尼斯). 1995. Strangers bid heat victims sad farewell(“陌生人向热浪罹难者悲伤告别”). *Chicago Sun-Times*(《芝加哥太阳时报》), 26 August, pp. 1-8.
- Jimenez, Gilbert(吉尔伯特·希门尼斯) and Alex Rodriguez(亚历克斯·罗德里

- 格斯). 1995. Death toll climbs to 179 (“死亡总数攀升至 179 人”). *Chicago Sun-Times*(《芝加哥太阳时报》), 18 July, p. 6.
- Jones, LeAlan(勒阿伦·琼斯), Lloyd Newman(劳埃德·纽曼) and David Isay(戴维·伊赛). 1997. *Our America: Life and death on the South Side of Chicago*(《我们的美国:芝加哥南区的生与死》).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 Jones, T. Stephen(T. 斯蒂芬·琼斯), Arthur Liang(亚瑟·梁), Edwin Kilbourne(埃德温·基尔伯恩), Marie Griffin(玛丽·格里芬), Peter Patriarca(彼得·帕特里阿尔卡), Steven G. File Wassilak(斯蒂文·G. 法勒·瓦希拉克), Robert Mullan(罗伯特·马伦), Robert Herrick(罗伯特·赫里克), H. Denny Donnell Jr.(H. 丹尼·唐奈), Keewhan Choi(崔基焕) and Stephen Thacker(斯蒂芬·撒克). 1982.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associated with the July 1980 heat wave in St. Louis and Kansas City, Mo.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和堪萨斯城与 1980 年热浪相关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美国医学会杂志》)247:3327-3331.
- Joseph, Janice(贾尼丝·约瑟夫). 1997. Fear of crime among black elderly(“老年黑人对犯罪的恐惧”).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黑人研究杂志》)27:698-717.
- Kalkstein, Laurence(劳伦斯·卡尔克施泰因). 1995. Lessons from a very hot summer(“炎热夏天的教训”). *Lancet*(《柳叶刀》)346:857-859.
- Kalkstein, Laurence(劳伦斯·卡尔克施泰因), Paul Jamason(保罗·詹姆逊), J. Scott Greene(J. 斯科特·格林), Jerry Libby(杰里·利比), Lawrence Robinson(劳伦斯·罗宾逊). 1996. The Philadelphia hot weather-health watch/warning system: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summer 1995(“费城的炎热天气——卫生监督或报警系统:1995 年夏天的发展与运用”).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美国气象学会通报》)77:1519-1528.
- Kaniss, Phyllis(菲莉丝·卡尼斯). 1991. *Making local news*(《制作当地新闻》).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aplan, George(乔治·卡普兰), Elsie Pamuk(埃尔茜·帕穆克), John Lynch(约翰·林奇), Richard Cohen(理查德·科恩) and Jennifer Balfour(珍妮弗·鲍尔弗). 1996. Inequality in income and mort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alysis of mortality and potential pathways(“收入的不平等与美国的死亡率:死亡人数与潜在路径的分析”). *British Medical Journal*(《英国医学杂志》)321:999-1003.
- Kaplan, Joel(乔尔·卡普兰) and Sharman Stein(沙曼·斯坦). 1995. City deaths in heat wave triple normal(“热浪期间的死亡人数是平时的三倍”). *Chicago Tribune*(《芝加哥论坛报》), 20 July, sec. 1, pp. 1, 10.



- Kasper, Judith(朱迪思·卡斯珀). 1988. Aging alone: Profiles and projections(“独自变老:概况及预测”). New York: The Commonwealth Fund(联邦基金会).
- Kass, John(约翰·卡斯). 1995a. Daley, aides try to deflect heat criticism(“戴利,助手试图扭转热浪批评”). *Chicago Tribune*(《芝加哥论坛报》), 18 July, sec. 2, p. 1.
- 1995b, Donoghue is backed on heat-wave toll “热浪死亡数据支持多诺霍的观点”, *Chicago Tribune*(《芝加哥论坛报》), 28 July, Chicago, sec. 2. p. 3.
- 1995c, In the heat, government shouldn't take beating(“高温下:政府不应该被打败”), *Chicago Tribune*(《芝加哥论坛报》), 23 July, sec. 4, p. 1.
- 1995d, Rambunctious aldermen sideline dog law, heat-wave probe(“议员们纷纷表态要求对热浪进行调查”), *Chicago Tribune*(《芝加哥论坛报》), 2 August, sec. 2, p. 3.
- Kass, John(约翰·卡斯) and Joel Kaplan(乔尔·卡普兰). 1995. Heat plan is launched(“热浪应急计划启动”). *Chicago Tribune*(《芝加哥论坛报》), 21 July, sec. 2, pp. 1, 6.
- Katz, Michael(迈克尔·卡茨). 1993. *The “underclass” debate*(《“下层社会”之辩》).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earl, Michael(迈克尔·科尔). 1996. Dying well: The unspoken dimension of aging well(“平安谢世:老年生活中未被触及的维度”). *Th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美国行为学家》)39:336—360.
- Keigher, Sharon(沙伦·基夫尔). 1991. *Housing risks and homelessness among the urban elderly*(《房屋风险和无可归家的城市老人》). New York: Haworth Press.
- Kennedy, Bruce(布鲁斯·肯尼迪), Ichiro Kawachi(河内一郎) and Deborah Prothrow-Stith(德博拉·普洛思罗-斯蒂思). 1996.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ortality: Cross-Sectional ecological study of the Robin Hood Index in the United States(“收入分配与死亡率:美国罗宾汉指数横截面生态研究”). *British Medical Journal*(《英国医学杂志》)312:1004—1007.
- Kiernan, Louise(路易丝·基尔南) and Graeme Zielinski(格雷姆·杰林斯基). 1995. Casualties of heat just like most of us: Many rejected any kind of help(“高温事件的死难者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拒绝任何帮助”). *Chicago Tribune*(《芝加哥论坛报》), 18 July, sec. 1, pp. 1, 6.
- Kilbourne, E. (E. 基尔伯恩), K. Choi(K. 崔) and S. Thacker (S. 撒克). 1982. Risk factors for heat-stroke(“中暑的风险因素”).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美国医学会杂志》)247:3332—3336.
- Kitagawa, Evelyn(伊芙琳·北川) and Philip Hauser(菲利普·豪泽). 1973. *Differential mort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tudy in socioeconomic epidemiology*

- 《美国死亡率差异:社会经济流行病学研究》,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leppner, Paul(保罗·克莱珀). 1985. *Chicago divided: the making of a black mayor*(《芝加哥的区域划分:做一个黑人市长》).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 Klinenberg, Eric(埃里克·克里纳伯格). 2000. Information et production numérique(“数字化信息的生产”).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社会科学研究学报》)134:66—75.
- Kornblum, William(威廉·科恩布卢姆). 1974. *Blue collar community*(《蓝领社区》).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rause, Neal(尼尔·克劳斯). 1993. Neighborhood deterioration and social isolation in later life(“晚年生活的邻里关系恶化和社会孤立”).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国际老龄化与人类发展杂志》)36:9—38.
- Lancaster, Roger(罗杰·兰开斯特). 1992. *Life is hard: Machismo, danger, and the intimacy of power in Nicaragua*(《生活艰难:大男子主义、危险和尼加拉瓜权力的密切关系》).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arson, Eric(埃里克·拉森). 1999. *Isaac's storm: a man, a time, and the deadliest hurricane in history*(《艾萨克的暴风雨:一个人、一个时代和历史最致命的飓风》). New York: Crown.
- LaVeist, Thomas(托马斯·拉维斯特), Robert Sellers(罗伯特·塞勒斯), Karin Elliot Brown(卡林·埃利奥特·布朗) and Kim Nickerson(金·尼克森). 1997. Extreme social isolation, use of community-based support services, and mortality among African American elderly women(“极端的社会孤立,以社区为基础的支持服务和非裔美国老年妇女的死亡率”).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美国社区心理学杂志》)25:721—732.
- Lawlor, Edward(爱德华·劳勒), Gunnar Almgren(冈纳·阿尔姆格伦) and Mary Gomberg(玛丽·冈伯格). 1993. *Aging in Chicago: Demography*(“芝加哥老龄化:人口统计学”). Chicago: Chicago Community Trust.
- Le, Phuong(方·勒) and Joan Giangrass Kates(琼·詹格拉斯·凯茨). 1995. If you can stand the heat, you must be out-of-towner(“如果你能忍受热浪,你一定不是本地人”). *Chicago Tribune*(《芝加哥论坛报》), 13 July, sec. 2, pp. 1, 6.
- Leavitt, Jacqueline(杰奎琳·莱维特) and Susan Saegert(苏珊·泽格特). 1990. *From abandonment to hope: Community-households in Harlem*(《从放弃到希望:黑人住宅区的社区住户》).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ee, Mordecai(莫迪凯·李). 1999. *Reporters and bureaucrats: Public relations*

- counter-strategies by public administrators in an era of media disinterest in government(“记者与官僚:媒体对政府不感兴趣时公共行政者的公共关系应对战略”). *Public Relations Reviews*(《公共关系评论》)25:451—563.
- Lev, Michael(迈克尔·列夫). 1995. Alone in life, unclaimed in death(“独自生活,无人认领的死者”). *Chicago Tribune*(《芝加哥论坛报》), 30 July, sec. 1, pp. 1, 12.
- Levitan, Sar A.(萨尔·A.莱维坦). *Programs in aid of the poor*(《援助穷人的计划》).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ieberman, David(戴维·利伯曼). 1998. The rise and rise of 24-hour local news(“当地新闻 24 小时不间断翻新”).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 no. 37(November/December):54—57.
- Liebow, Elliot(埃利奥特·列葆). 1967. *Tally's corner: A study of Negro street-corner men*(《泰利的街角:一项街角黑人的研究》). Boston: Back Bay Books.
- Lincoln, C. Eric(C.埃里克·林肯) and Lawrence Mamiya(劳伦斯·马米亚). 1990. *The black church in the African-American experience*(《非裔美国人经验中的黑人教会》).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Linsky, Martin(马丁·林斯基), Wendy O'Donnell(温迪·奥唐奈) and Jonathan Moore(乔纳森·穆尔). 1986. *Impact: How the press affects federal policymaking*(《影响:新闻界如何影响联邦政策的制定》). New York: W. W. Norton.
- 289 Lipsky, Michael(迈克尔·利普斯基). 1980.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Dilemmas of the individual in public services*(《低级官僚:公共服务中的个体困境》).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Little Brothers Friends of the Elderly(老年小兄弟会). 1997. Annual report: Little Brothers is about relationships(“年度报告:小兄弟的人际关系”). Chicago: Little Brothers Friends of the Elderly(老年小兄弟会).
- Lowry, William(威廉·劳里). 1967. The climate of cities(“城市的气候”). *Scientific American*(《环球科学》)217:15—23.
- Manier, Jeremy(杰里米·马尼尔). 1999. Lessons of '95 helped keep heat toll down(“1995年的教训使中暑死亡人数下降”). *Chicago Tribune*(《芝加哥论坛报》), 3 August, sec. 1, p. 6.
- Marcuse, Peter(彼得·马库塞). 1993. What's so new about divided cities?(“分割的城市有什么新意?”).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国际城市与地区研究杂志》)17:355—365.
- 1997. The enclave, the citadel, and the ghetto: What has changed in the post-Fordist U. S. city(“飞地、避难所和贫民区:后福特时代的美国城市有什么变化”). *Urban Affairs Review*(《城市事务评论》)33:228—264.

- Martin, Andrew(安德鲁·马丁). 1995. City murders on rise along with thermometer(“城市谋杀随着温度计上升而增多”). *Chicago Tribune*(《芝加哥论坛报》), 14 July, sec. 2, p. 3.
- Martinez, Beverly(贝弗利·马丁内斯), Joseph Annett(约瑟夫·安尼斯特), Edwin Kilbourne(埃德温·基尔伯恩), Marilyn Kirk(玛丽琳·柯克), Kung-Jong Lui(吕刚中) and Suzanne Smith(苏珊娜·史密斯). 1989.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heat-related deaths among elderly persons(“中暑死亡老人的地理分布”).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美国医学会杂志》)262:2246—2250.
- Massey, Douglas(道格拉斯·马西). 1996. The age of extremes: Concentrated affluence and pover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极端的时代:21世纪财富的集中与贫困”). *Demography*(《人口统计学》)33:395—412.
- Massey, Douglas(道格拉斯·马西) and Nancy Denton(南希·登顿). 1993. *American apartheid: Segreg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underclass*(《美国种族隔离: 隔离和下层社会的形成》).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auss, Marcel(马塞尔·莫斯). [1916]1979, Seasonal variations of the Eskimo: A study in social morphology(in collaboration with Henri Beuchet)(“季节变动下的爱斯基摩人: 一项社会形态的研究(与亨利·伯查特)”. London and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最初出版的题目是 *Essai, sur les variations saisonnières des sociétés Eskimos: étude de morphologie sociale*(Paris, 1916)。
- McKenzie, R. D. (R. D. 麦肯齐). 1925.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the human community(“人类社区研究的生态学取向”). In Robert Park(罗伯特·帕克) and Ernest Burgess(欧内斯特·伯吉斯) eds. *The city: Suggestions for investigation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城市: 对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调查的建议》).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cMurray, Scott(斯科特·麦克默里). 1995. Little Village hits big(“小村闹出大问题”). *Chicago*, October 1995, pp. 33—35.
- McRoberts, Omar(奥马尔·麦克罗伯茨). 2001. Black churches, community and development(“黑人教堂、社区和发展”), *Shelterforce*, January/February, pp. 8—11.
- McSherry, Meg(梅格·麦克谢里). 1995a. Burying the forgotten(“埋葬被遗忘的人们”). *The Daily (Chicago) Southtown*(《芝加哥》《南镇日报》), 26 August, pp. A1—A5.
- 1995b, Staying ahead of heat(“气温逐渐升高”). *The Daily (Chicago) Southtown*(《芝加哥》《南镇日报》), 23 July, pp. A1—A8.
- Meares, Tracey(特雷西·米尔斯). 1998. Peace and crime(“和平与犯罪”). *Chica-*

- go *Kent Law Review*(《芝加哥肯特法律评论》)73:669—705.
- Merry, Sally Engle(萨莉·恩格尔·梅里). 1981. *Urban danger: Life in a neighborhood of strangers*(《城市的危险:在陌生的邻里关系中生活》).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Metro Seniors in Action(都市老人在行动). 1995. Heat wave ravages seniors(“热浪袭向老人,戴利推卸责任”). *Metro Senior*(《都市老人》), pp. 1, 3.
- Meyerhoff, Barbara(芭芭拉·迈耶霍夫). 1978. *Number our days*(《我们的天数》). New York: Touchstone Books.
- Miethe, Terance(特伦斯·米特). 1995. Fear and withdrawal(“恐惧与回避”).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年报》)539: 14—19.
- Miller, Ross(罗斯·米勒). 1990. *American apocalypse: The Great Fire and the myth of Chicago*(《美国的天启:大火和芝加哥的神话》).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90 Mitchell, James(詹姆斯·米切尔等人). 1999. *Crucibles of hazard: Mega-cities and disasters in transition*(《灾难的考验:转型的特大城市和灾难》). 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 Mitchell, Mary(玛丽·米切尔) and Gilbert Jimenez(吉尔伯特·希门尼斯). 1995. CDC endorses county coroner's heat findings(“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赞同县法医的热浪调查结果”). *Chicago Sun-Times*(《芝加哥太阳时报》), 28 July, p. 12.
- Molotch, Harvey(哈维·莫罗奇) and Marilyn Lester(玛丽琳·莱斯特). 1974. News as purposive behavior: On the strategic use of routine events, accidents, and scandals(“作为有目的行为的新闻:常规事件、事故和丑闻时的策略运用”).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美国社会学评论》)39:101—112.
- 1975. Accidental news: The great oil spill as local occurrence and national event(意外消息:作为发生在本地的国家大事的重大漏油事件).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美国社会学评论》)81:235—260.
- Monkkonen, Eric(埃里克·门克宁). 1993. Nineteenth century institutions(“十九世纪的机构”). In Michael Katz(迈克尔·卡茨) ed. *The “underclass” debate*(《“下层社会”之辩》).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Nashold, Raymond(雷蒙德·纳什赫德), Jeffrey Jentzen(杰弗里·延岑), Patrick Remington(帕特里克·雷明顿) and Peggy Peterson(佩姬·彼得森). N. d. Excessive heat deaths(“过多的中暑死亡人数”), Wisconsin, June 20-August 19, 1995. Unpublished manuscript(未出版的手稿).
-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国家气象局). 1996. Natural disaster survey report: July

- 1995 heat wave(“自然灾害调查报告:1995年7月热浪”). Silver Spring, Md.: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美国商务部),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e Administration(全国海洋和大气管理署)和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国家气象局).
- Neal, Steve(史蒂夫·尼尔). 1995. Daley's leadership wilted in heat crisis(“戴利的领导力在热浪危机中受到削弱”). *Chicago Sun-Times*(《芝加哥太阳时报》), 25 July, p. 25.
- Nieves, Evelyn(伊夫琳·尼夫斯). 2000. In San Francisco, more live alone, and die alone, too(“在旧金山,独居者和孤独终老者日益增多”).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 25 July, p. 10A.
- North Lawndale Family Network(北朗代尔家庭网络). 1998. Community assets: A North Lawndale directory of services 1998-99(“社区资产:一份1998-1999年北朗代尔服务指南”). Chicago: North Lawndale Family Network.
- Nuland, Sherwin(舍温·努兰德). 1993. *How we die: Reflections on life's final chapter*(《我们如何死去:思考生命的最后一章》). New York: Vintage.
- Oechli, Frank(弗兰克·奥克斯里) and Robert Buechley(罗伯特·比茨利). 1970. Excess mortality associated with three Los Angeles September heat spells(“过量死亡与洛杉矶九月份的三段炎热时期的关系”). *Environmental Research*(《环境研究》)3:277-284.
- Orloff, Ann Shola(安·舒拉·奥尔罗夫). 1993. *The politics of pens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Brita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80-1940*(《养老金政治: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对比分析 1880-194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Orton, J. Douglas(J.道格拉斯·奥顿) and Karl Weick(卡尔·韦克). 1990. Loosely coupled systems: A reconceptualization(“松散耦合系统:重新定义”).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管理学会评论》)12:203-223.
- Osborne, David(戴维·奥斯本) and Ted Gaebler(特德·盖布勒). 1992. *Reinventing government: How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is transforming the public sector*(《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政府部门》). New York: Plume.
- Palecki, Michael(迈克尔·帕勒奇), Stanley Changnon(斯坦利·昌农) and Kenneth Kunkel(肯尼思·孔克尔). 2001. The nature and impact of the July 1999 heat wave in the Midwestern U. S.: Learning from the lessons of 1995(“1999年7月美国中西部地区热浪的性质与影响:从1995年中吸取教训”).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美国气象学会通报》)82, no. 7: 1353-1367.
- Park, Robert(罗伯特·帕克). [1916]1969. *The city: Suggestions for the investiga-*

- tion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城市:对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为调查的建议”). In Richard Sennett(理查德·森尼特) ed. *Classic essays on the culture of cities*(《城市文化的经典论文》). Englewood Cliffs, N. J. : Prentice-Hall. 最初发表在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美国社会学杂志》) 20:577-612。
- Patterson, Orlando(奥兰多·帕特森). 1998. *Rituals of blood*(《血的仪式》). Boston: Beacon.
- Pattillo-McCoy, Mary(玛丽·帕蒂略-麦科伊). 1998. Church culture as a strategy of action in the black community(“黑人社区中作为行动策略的教会文化”).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美国社会学评论》) 63:767-784.
- 1999. *Black picket fences: Privilege and peril among the black middle class*(《黑色的异想世界:黑人中产阶级的特权与危险》).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91 Pearson, Rich(里奇·皮尔逊). 1995. Funding to help poor pay heating bills evaporating(“帮助穷人支付供热费用的基金”). *Chicago Tribune*(《芝加哥论坛报》), 20 July, sec. 2, p. 6.
- Perrow, Charles(查尔斯·佩罗). 1984. *Normal accidents*(《正常事故》). New York: Basic Books.
- Perrow, Charles(查尔斯·佩罗) and Mauro Guillen(莫罗·吉伦). 1990. *The AIDS disaster: The failure of organizations in New York and the nation*(《艾滋病灾难:在纽约和国家中失灵的组织》).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Platt, Jennifer(詹妮弗·普拉特). 1992. Cases of cases... of cases(“案例中的案例……案例”). In Charles Ragin(查尔斯·拉金) and Howard Becker(霍华德·贝克尔) eds. *What is a case? Expl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quiry*(《什么是个案? 探索社会调查的基础》). Cambridge, Mas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opkin, Susan(苏珊·波普金) and Victoria Gwiasda(维多利亚·格威亚兹达), Lynn Olson(林恩·奥尔森), Dennis Rosenbaum(丹尼斯·罗森鲍姆) and Larry Buron(拉里·比龙). 2000. *The hidden war: Crime and the tragedy of public housing in Chicago*(《隐匿的战争:犯罪和芝加哥公共住房悲剧》). New Brunswick, N. J. :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Pugh, Ralph(拉尔夫·皮尤). 1997. Pilsen /Little Village(“比尔森/小村”). *Chicago History*(《芝加哥历史》) 26, no. 1(spring): 40-61.
- Putnam, Robert(罗伯特·帕特南).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崩溃与重建》). New



-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Ragin, Charles(查尔斯·拉金) and Howard Becker(霍华德·贝克尔) eds. 1992. *What is a case? Expl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quiry*(《什么是个案? 探索社会调查的基础》). Cambridge, Ma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aica, Robert(罗伯特·瑞卡). 1995. *Report of the heat related deaths in Cook County*(《库克县中暑死亡人数报告》). Illinois State Senate(伊利诺伊州参议院), Springfield.
- Richards, Cindy(辛迪·理查兹). 1995. Less government? Not if it costs me(“让政府少管一点么? 如果这对我有害的话, 不!”). *Chicago Sun-Times*(《芝加哥太阳时报》), 21 July, pp. 1, 8.
- Riesman, David(戴维·热斯曼), Nathan Glazer(内森·格雷泽) and Reuel Denney(鲁埃尔·丹尼). 1950. *The lonely crowd: A study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character*(《孤独的人群: 变动中的美国人性格》),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odriguez, Alex(亚历克斯·罗德里格斯) and Mark Brown(马克·布朗). 1995. 116 die; few using city cooling centers(“116人死亡: 很少有人使用城市冷气中心”). *Chicago Sun-Times*(《芝加哥太阳时报》), 17 July, pp. 1, 8.
- Rollinson, Paul(保罗·罗林森). 1990. The story of Edward: The everyday geography of elderly single room occupancy(SRO) hotel tenants(“爱德华的故事: 一居公寓中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地理学”).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当代民族志杂志》)19: 188—206.
- Rosen, Jay(杰伊·罗森). 1999. *What are journalists for?* (《记者做什么?》)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oss, Catherine(凯瑟琳·罗斯), John Reynolds(约翰·雷诺兹) and Karlyn Geis(卡琳·吉斯). 2000. The contingent meaning of neighborhood stability for resident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社区稳定对于居民心理健康的重要意义”).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美国社会学评论》)65: 581—597.
- Royko, Mike(迈克·罗伊科). 1995. Killer heat wave or media event? (“凶手是热浪还是媒体报道?”) *Chicago Tribune*(《芝加哥论坛报》), 18 July, sec. 1, p. 3.
- Rubinstein, Robert(罗伯特·鲁宾斯坦). 1986. *Singular paths: Old men living alone*(《奇异的路径: 独居的老年男人》).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Ruggles, Patricia(帕特里夏·拉格尔斯). 1990. *Drawing the line: Alternative poverty measur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policy*(《划清界限: 替代贫困措施和公共政策的含义》). Washington, D. C.: Urban Zone Books.
- Sahlins, Marshall(马歇尔·萨林斯). 2000. *Culture in practice*(《文化实践》). New York: Zone Books.

- Sampson, Robert(罗伯特·桑普森), Stephen Raudenbush(斯蒂芬·劳登布什) and Felton Earls(费尔顿·厄尔斯). 1997. Neighborhood and violent crime: A multivariate study of collective efficacy(“邻里关系和暴力犯罪:一个多层次的集体效能”). *Science*(《科学》)277:918—924.
- Sanchez-Jankowski, Martin(马丁·桑切斯-扬科威茨). 1991. *Islands in the streets: Gangs and American society*(《街道中的孤岛:黑帮与美国社会》).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awislak, Karen(卡伦·萨威斯拉克). 1995. *Smoldering city: Chicagoans and the Great Fire 1871—1874*(《阴燃的城市:芝加哥人和大火灾 1871—187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92 Schreuder, Cindy(辛迪·史克鲁德) and Peter Gerner(彼得·格纳). 1995. Coroners don't always agree on when heat kills(“当热浪充当杀手时,法医鉴定人并非总是认同热浪造成死亡”). *Chicago Tribune*(《芝加哥论坛报》), 18 July, sec. 1, pp. 1, 6.
- Schreuder, Cindy(辛迪·史克鲁德) and Sharman Stein(沙曼·斯坦). 1995. Cities learn lessons from killer heat(“城市从炎热中学到的教训”). *Chicago Tribune*(《芝加哥论坛报》), 20 July, sec. 2, p. 1.
- Schudson, Michael(迈克尔·舒德森). 1978. *Discovering the news*(《发现新闻》). New York: Basic.
- 1995. *The power of news*(《新闻的力量》).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eale, Clive(克莱夫·西尔). 1995. Dying alone(“孤独终老”).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健康与疾病社会学》)17:376—392.
- 1996. *Living alone towards the end of life*(“独自走向生命尽头”). *Aging and Society*(《老龄化与社会》)16:75—91.
- Secter, Bob(鲍勃·塞克特). 1995. People forget how to beat the heat(“人们忘记如何对抗炎热”). *Chicago Sun-Times*(《芝加哥太阳时报》), 18 July, p. 7.
- Seeman, Teresa(特蕾莎·西曼), George Kaplan(乔治·卡普兰), Lisa Knudson(莉萨·克努森), Richard Cohen(理查德·科恩) and Jack Guralnik(杰克·古拉尔尼克). 1987. Social network ties and mortality among the elderly in the Alameda County study(“社会网络关系与阿拉梅达县老年人死亡率研究”).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美国流行病学杂志》)126:714—723.
- Seidenstat, Paul(保罗·塞登斯塔特). 1996. Privatization: Trends, interplay of forces, and lessons learned(“民营化:趋势、相互作用力和教训”). *Policy Studies Journal*(《政策研究杂志》)24:464—477.
- Semenza, Jan(简·西门扎). 1995. Letter to Chicago Department of Public

- Health, 20 July (“7月20日致芝加哥公共卫生局的一封信”). Atlanta.
- Semenza, Jan(简·西门扎), Joel McCullough(乔尔·麦卡洛), W. Dana Flanders (W. 达纳·弗兰德斯), Michael McGeehin(迈克尔·麦吉因) and John Lumpkin(约翰·伦普金). 1999. Excess hospital admissions during the July 1995 heat wave in Chicago(“1995年7月芝加哥热浪期间超额的住院治疗”).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美国预防医学期刊》)16:269—277.
- Semenza, Jan(简·西门扎), Carol Robin(卡罗尔·罗宾), Kenneth Falter(肯尼思·福尔特), Joel Selanikio(乔尔·塞拉尼奇欧), W. Dana Flanders (W. 达纳·弗兰德斯), Holly Howe(霍利·豪) and John William(约翰·威廉). 1996. Heat-related deaths during the July 1995 heat wave in Chicago(“1995年7月芝加哥热浪期间的中暑死亡”).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新英格兰医学杂志》)335:84—90.
- Sen, Amartya(阿马蒂亚·森). 1981.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ennett, Richard(理查德·森尼特). 1969. An introduction. In Richard Sennett (理查德·森尼特) ed. *Classic essays on the culture of cities*(《城市文化的经典论文》).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Shen, Tiefu(沈铁福), Holly Howe(霍利·豪), Celan Alo(策兰·阿洛) and Ronald Moolenaar(罗纳德·穆兰纳尔). 1998. Toward a broader definition of heat-related death: Comparison of mortality estimates from medical examiners' classification with those total death differentials during the July 1995 Chicago heat wave(“走向中暑死亡更广泛的定义:法医鉴定人对1995年7月芝加哥热浪死亡总量分类的死亡评价对比”).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Forensic Medicine and Pathology*(《美国法医学与病理学杂志》)19:113—118.
- Shen, Tiefu(沈铁福), Holly Howe(霍利·豪), Ruth Ann Tobias(鲁斯·安·托拜厄斯) and Chandrima Roy(钱德里玛·罗伊). 1995. Executive summary: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correlated with heat-related mortality(“现实概要:社区特征与中暑死亡的关系”). Chicago, Illinois, July 1995. Illinois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伊利诺伊州公共卫生部), Springfield.
- Siewers, Alf(阿尔夫·西维尔斯). 1995. Isolated times may have fed heat wave toll(“隔离次数可能助长热浪死亡人数”). *Chicago Sun-Times*(《芝加哥太阳时报》), 23 July, p. 11.
- Sigal, Leon(利昂·西加尔). 1986. Sources make the news(《新闻来源决定新闻内容》). In Robert Karl Manoff(罗伯特·卡尔·马诺夫) and Michael Schudson(迈克尔·舒德森) ed. *Reading the news*(《读新闻》). New York: Pantheon.

- Silverstein, Merrill(梅里尔·西尔弗斯坦) and Linda Waite(琳达·韦特). 1993. Are blacks more likely than whites to receive and provide social support in middle and old age? Yes, no, and maybe so(“中老年黑人是否比白人更容易获得或者提供社会援助? 是或否或可能如何”). *Journal of Gerontology*(《老年学杂志》)48:S212—222.
- Simon, Herbert(赫伯特·西蒙). 1994. Hyperthermia and heatstroke(“热疗与中暑”). *Hospital Practitioner*(《医院从业者》)8:65—80.
- Singer, Eleanor(埃莉诺·辛格). 1987. Reporting hazards: Their benefits and costs(“灾难报告: 它们的收益与成本”).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传播学刊》)37:10—26.
- 293 Skogan, Wesley(韦斯利·斯科甘). 1990. *Disorder and decline: Crime and the spiral of decay in American neighborhoods*(《混乱与衰退: 犯罪与美国社区的恶性循环》).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3. The various meanings of fear(“恐惧的多种含义”). In Wolfgang Bilsky(沃尔夫冈·比尔斯基), Christian Pfeiffer(克里斯琴·法伊弗) and Peter Wetzel(彼得·韦策尔) eds. In *Fear of crime and criminal victimization*(《对犯罪的恐惧和犯罪受害者》). Stuttgart: Ferdinand Enke Verlag.
- Skogan, Wesley(韦斯利·斯科甘) and Susan Hartnett(苏珊·哈特尼特). 1997. *Community policing, Chicago style*(《社区警务, 芝加哥特色》).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kogan, Wesley(韦斯利·斯科甘), Susan Hartnett(苏珊·哈特尼特), Jill DuBois(吉尔·杜波伊斯), Jennifer Comey(詹妮弗·科米), Marianne Kaiser(玛丽安娜·凯泽) and Justine Lovig(贾斯廷·洛文). 1999. *On the beat: Police and community problem solving*(《在街上巡逻: 警察与社会问题的解决》). Boulder, Colo.: Westview.
- Slater, Philip(菲利普·斯莱特). 1990. *The pursuit of loneliness*(《追寻寂寞》). Boston: Beacon Press.
- Smoyer, Karen(卡伦·斯莫尔). 1998. Putting risk in its place: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for investigating extreme event health risk(“定位风险: 极端事件中健康风险方法的考量”). *Social Science Medicine*(《社会科学及医学》)47:1809—1824.
- Sneed, Michael(迈克尔·斯尼德). 1995. Michael Sneed's column(迈克尔·斯尼德专栏). *Chicago Sun-Times*(《芝加哥太阳时报》), 20 July, p. 4.
- Sood, Rahul(拉胡尔·苏德), Geoffrey Stockdale(杰弗里·斯托克代尔) and Everett M. Rogers(埃弗里特·M. 罗杰斯). 1987. How the news media operate in natural disasters(“自然灾害发生时新闻媒体如何运作”). *Journal of Commu-*

- nication(《传播学刊》)37:27—41.
- Spear, Allan(艾伦·斯皮尔). 1967. *Black Chicago: The making of a Negro ghetto 1890—1920* (《1890—1920 黑色芝加哥: 黑人贫民区的形成》).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pergel, Irving(欧文·施派格尔) and Susan Grossman(苏珊·格罗斯曼). 1997. The Little Village project: A community approach to the gang problem(“小村方案: 解决帮派问题的一种社区途径”). *Social Work*(《社会工作》)42:456—470.
- Spielman, Fran(弗兰·斯皮尔曼) and Mary Mitchell(玛丽·米切尔). 1995a. City ignored emergency plan(“城市忽视应急计划”). *Chicago Sun-Times*(《芝加哥太阳时报》), 18 July, p. 1.
- 1995b. The shocking toll: 376(“令人震惊的人数: 376人”). *Chicago Sun-Times*(《芝加哥太阳时报》), 19 July, pp. 1, 9.
- Squires, Gregory(格雷戈里·斯夸尔斯), Larry Bennett(拉里·贝内特), Kathleen McCourt(凯瑟琳·麦考特) and Philip Nyden(菲利普·尼登). 1987. *Chicago: Race, class, and the response to urban decline*(《芝加哥: 种族、阶级和城市衰弱的回应》).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Squires, James(詹姆斯·斯夸尔斯). 1993. *Read all about it!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American's newspapers*(《阅读关于它的一切! 公司接管美国报纸》). New York: Times Books.
- Stack, Carol(卡罗尔·斯塔克). 1974. *All our kin: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a black community*(《我们的亲属: 黑人社区生存的策略》).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
- Starks, Robert(罗伯特·斯塔克斯). 1995. The black community demands the firing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Fire and other department heads in the wake of heat disaster(“炎热灾难之后, 黑人社区要求解雇消防局和其他部门的负责人”). *Chicago Standard News*(《芝加哥旗帜新闻报》), 20 July.
- Stein, Sharman(沙曼·斯坦). 1995. Exceptionally high humidity proved to be the real culprit(“被证实最后的罪犯是高湿度”). *Chicago Tribune*(《芝加哥论坛报》), 18 July, sec. 2, pp. 1, 4.
- Steinberg, Neal(尼尔·斯坦伯格). 1995. Seniors suffer and endure in sweltering CHA high-rise(“老人在高层建筑中遭受痛苦和忍耐闷热”). *Chicago Sun-Times*(《芝加哥太阳时报》), 17 July, p. 10.
- Steinberg, Ted(特德·斯坦伯格). 2000. *Acts of God: The unnatural history of natural disaster in America*(《天灾: 美国自然灾害的非自然历史》).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one, Deborah(德博拉·斯通). 1997. *Policy paradox: The art of political deci-*

- sion making*(《政策悖论:政策决策的艺术》). New York: W. W. Norton.
- Susser, Ida(艾达·萨瑟). 1993. Creating family forms: The exclusion of men and teenage boys from families in the New York City shelter system(“创建家庭形式:将男性和十几岁男孩排除在纽约城市庇护系统之外”).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人类学批判》)13:267—285.
- Suttles, Gerald(杰拉尔德·萨特尔斯). 1968. *The social order of the slum: Ethnicity and territory in the inner city*(《贫民窟的社会秩序:城市中的种族和区划》).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0. *The man-made city: The land use confidence game in Chicago*(《人造城市:芝加哥土地利用信任博弈》).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94 Szasz, Andrew(安德鲁·萨斯) and Michael Meuser(迈克尔·穆泽). 1997. Environmental inequalities: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oposals for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and theory(“环境不平等:新研究方向的文献综述与建议”). *Current Sociology*(《当代社会学》)45:99—120.
- Taub, Richard(理查德·陶布), D. Garth Taylor(D. 加思·泰勒) and Jan Durham(简·德拉姆). 1984. *Paths of neighborhood change: Race and crime in urban America*(《邻里关系的变化:美国城市的种族与犯罪》).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ennison, Patricia(帕特里夏·特尼森). 1995. Finding the mane attraction(“发现马鬃的吸引力”). *Chicago Tribune*(《芝加哥论坛报》), 20 July, Metro-McHenry, p. 1.
- Thompson, Estina(埃斯蒂纳·汤普森) and Neal Krause(尼尔·克劳斯). 1998. Living alone and neighborhood characteristics as predictors of social support in later life(“独居和对晚年生活邻里特征的社会支持预测”). *Journal of Gerontology*(《老年学杂志》)53B:S354—364.
- Tigges, Leann(利恩·蒂格斯), Irene Brown(伊伦·布朗) and Gary Green(加里·格林). 1998. Social isolation of the urban poor: Race, class, and neighborhood effects(“城市穷人的社会孤立:种族、阶级和邻里关系的影响”). *Sociological Quarterly*(《社会学季刊》)39:53—77.
- TriData Corporation(垂戴塔公司). 1999.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Chicago Fire Department*(《芝加哥消防局综合评论》). Arlington, Va. June.
- Tuchman, Gaye(盖伊·塔奇曼). 1972. Objectivity as strategic ritual: An examination of newsmen's notions of objectivity(“作为策略性仪式的客观性:对新闻记者客观性观念的考察”).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美国社会学杂志》)77:660—679.
- 1973. Making news by doing work: Routinizing the unexpected(“通过工作处

- 理新闻:将突发事件常规化”。*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美国社会学杂志》)79:113—131.
- Turow, Joseph(约瑟夫·图罗). 1997. *Breaking up America: Advertisers and the new media world*(《分裂美国:广告商和新媒体世界》).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U. 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1984. Epidemiologic notes and reports illness and death due to environmental heat-Georgia and St. Louis, Missouri, 1983(“1983年因为炎热环境导致的疾病和死亡的流行病学通告和报道——佐治亚州、圣路易斯、密苏里州”).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33, no. 23:325—326.
- 1995a. Heat-related illness and deaths—United States, 1994—1995(“1994—1995年中暑疾病与死亡——美国”).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44, 465—468.
- 1995b. Heat-related mortality—Chicago, July 1995(“1995年7月中暑死亡率——芝加哥”).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44:577—579.
- 1996. Heat-related mortality—Milwaukee, Wisconsin, July 1995(“1995年7月中暑死亡率——密尔沃基、威斯康星州”).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45:505—507.
-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美国商务部), Bureau of the Census(人口普查局). 1995.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统计摘要》). Washington, D. C.
- Vaughan, Diane(黛安娜·沃恩). 1996. *The Challenger launch decision: Risky technology, culture, and deviance at NASA*(《挑战号发射决定:危险的技术、文化和美国宇航局的越轨》).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Velkoff, Victoria(维多利亚·韦尔科夫) and Valerie Lawson(瓦莱丽娅·劳森). 1998. International brief: Gender and aging: caregiving(“国际简讯:性别和老龄化:照顾者”). Washington, D. C.: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 Venkatesh, Sudhir(苏蒂尔·韦卡特施). 2001. Chicago's pragmatic planners: American sociology and the myth of community(“芝加哥的实用主义规划:美国社会学和社区神话”). *Social Science History*(《社会科学史》)25, no. 2: 276—317.
- Wacquant, Loïc(卢瓦克·华康德). 1994. The new urban color line: The state and fate of the ghetto in PostFordist America(“新城市色彩线:国家和美国后福特主义时代贫民区命运”). In Craig Calhoun(克雷格·卡尔霍恩) ed. *Social theo-*



- 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社会理论和政治认同》).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1996. The rise of advanced marginality: Notes on its nature and implications (“边缘化的持续出现: 边缘化的属性与含义”). *Acta Sociologica* (《社会学学报》) 39: 121—139.
- 1997a. For an analytic of racial domination (“种族统治的解析”).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政治权力与社会理论》) 2: 221—234.
- 1997b. Three pernicious premises in the study of the U. S. ghetto (“美国贫民窟研究的三个有害性假设”).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国际城市与地区研究杂志》) 21: 341—353.
- 295 Wallace, Roderick (罗德里克·华莱士). 1993. Recurrent collapse of the fire system in New York City: The failure of paramilitary systems as a phase change (“纽约消防系统经常性瘫痪: 准军事系统的失败作为一个阶段性变化”).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环境与规划》) A 25: 233—244.
- Walton, John (约翰·沃尔顿). 1992. Making the theoretical case (“制作理论性案例”). In Charles Ragin (查尔斯·拉金) and Howard Becker (霍华德·贝克尔) eds. *What is a case? Expl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quiry* (《什么是个案? 探索社会调查的基础》).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eir, Margaret (玛格丽特·韦尔). 1998. Big cities confront the new federalism (“大城市遭遇新联邦主义”). In Alfred Kahn (艾尔弗雷德·卡恩) and Sheila Kammerman (希拉·卡梅尔曼) eds. *Big cities in the welfare transition* (《福利转型中的大城市》).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School of Social Work.
- Whitman, Steve (史蒂夫·惠特曼). 1995. Comments on the report of the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Analysis Committee (“对发病率和死亡率分析委员会报告的评论”). 6 September, Chicago Department of Health (芝加哥卫生局), Chicago.
- Whitman, Steve (史蒂夫·惠特曼), Gleen Good (格林·古德), Edmund Donoghue (埃德蒙·多诺霍), Nanette Benbow (南妮特·本博), Wenyuan Shou (寿文远) and Shanxuan Mou (牟山轩). 1997. Mortality in Chicago attributed to the July 1995 heat wave (“1995年7月芝加哥热浪死亡率的原因”).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美国公共卫生杂志》) 87: 1515—1518.
- Wieviorka, Michel (米歇尔·维韦奥卡). 1992. Case studies: History or sociology (“案例研究: 历史学或者社会学”). In Charles Ragin (查尔斯·拉金) and Howard Becker (霍华德·贝克尔) eds. *What is a case? Expl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quiry* (《什么是个案? 探索社会调查的基础》).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 Raymond (雷蒙德·威廉斯). [1974] 1992.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 Cultural Form* (《电视:技术和文化形式》). London: Fontana. Reprint, Middletown, 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 Wilson, William Julius (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真实的弱者:市中心、下层社会和公共政策》).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6. *When work disappears: The world of the new urban poor* (《当失去工作时:新城市穷人的世界》). New York: Alfred Knopf.
- Wirth, Louis (路易斯·沃思) and Eleanor Bernert (埃莉诺·贝尼特). 1949. *Local community fact book of Chicago* (《芝加哥当地社区概况》).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olf, Jacquelyn (杰奎琳·沃尔夫), Naomi Breslau (娜奥米·布雷斯劳), Amasa Ford (阿马萨·福特), Henry Ziegler (亨利·齐格勒) and Anna Ward (安娜·沃德). 1983. Distance and contacts: Interactions of black urban elderly adults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距离和联系:城市老年黑人同家人和朋友的相互交流”). *Journal of Gerontology* (《老年学杂志》) 38: 465—471.
- Wuthnow, Robert (罗伯特·伍斯诺). 1998. *Loose connections: Joining together in America's fragmented communities* (《松散的联系:加入到美国分立的社区》).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Zhao, Dingxin (赵鼎新). 1998. Ecologies of social movements: Student mobilization during the 19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Beijing (“社会运动的生态”).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美国社会学杂志》) 103: 1493—1529.
- Zukin, Sharon (沙伦·祖金). 1995. *The culture of cities* (《城市文化》). Oxford and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 索引

(索引所标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 abandoned housing stock 败落不堪的住房 127
- abandonment 遗弃 77; ~高水平的地区 125-126, 231; ~浮夸之词, 赋权和消费者至上的言论 157
- ABC television newscasts ABC 电视广播 185-186, 188
- abuse 虐待 77
- accidental news events 突发新闻事件 189
- accountability 责任 140, 142; 个人及社区履行的 ~ 176; 政治原因的 ~ 143-147, 154; 参见 blaming; responsibility
- acculturation 适应 ~了炎热的天气 88-89
- advertisements, high-profile 广受关注的广告 166-167
- advertising 广告 158
- African-American churches 非裔美国人教堂 105, 265注51
- African-American community areas 非裔美国人社区 56, 81-82, 115, 156
- African-American elderly 非裔老年人 154; ~的应急卫生服务 154; ~的孤独 49
- African-American men 黑人男性 76
- African-American migration 非裔移民 92-93
- African Americans 非裔美国人 174; ~犯罪 255; ~死亡率 127
- age 年龄 不同~的中暑死亡 18-19
- aged persons living alone 独居老人 ~比例高的社区 81-82; 参见 seniors
- Aging 衰老 ~和平安谢世 250注5
- Aging, Department on 老年事务部 145, 154, 155, 227
- Aging Alone: Profiles and Projections* “独自变老: 概况及预测”(联邦基金会) 49
- aging population of urban residents living alone 城市居民中独居老龄人口 230
- air-conditioning 空调 60, 80, 159-160, 166, 168
- alcohol use 酗酒 69-70
- alienation 疏离 76-77
- All Things Considered* “关注天下”节目 187-188
- Alvarez, Daniel 丹尼尔·阿尔瓦雷斯 171-172, 186, 206
- ambulances 救护车 206; ~的回应时间 5-6; 缺乏 ~ 5, 130-134, 225
- apartments, one-room 一居公寓 65

- Archdiocese of Chicago 芝加哥的大主教 122—123
- bedridden individuals 卧床不起的人 80
- Benefits Eligibility Checklist(BEC) 救济资格清单项目 271
- Bilandic, Michael 迈克尔·比兰迪克 28, 165—166
- Bild, Sidney 西德尼·比尔德 145—146
- blaming 责备 31; ~家庭 175—176; ~受害者 32, 172, 181, 211—213, 222
- blizzard of 1979 1979年的那场暴风雪 28, 165
- block clubs 街区俱乐部 105, 107—109
- “bombed out” areas “遭到轰炸”的地区 96—98
- Bourdieu, Pierre 皮埃尔·布尔迪厄 280
- Bronzeville 布朗泽维尔 56—57
- budget cuts 预算缩减 141, 154—156, 159—161, 229, 232; 参见 government
- bureaucracies 官僚化 156
- Burns, Diann 戴安·伯恩斯 187
- buses 巴士 138
- Byrne, Jane 简·伯恩 28, 165
- Cable News Network(CNN)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187
- Cabrini-Green 卡布里妮-格林 60
- Carlozo, Lou 卢·卡洛佐 195—198, 208, 224
- case managers for elderly 老年人个案调查的主管 156—157
- catastrophes 灾难; 参见 disaster
- 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会 122; 社区教堂间的联系和~ 123
-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79—80, 86, 173, 203
- Central Heat Command Center 热浪指挥中心 227
- Chambers, Arthur 亚瑟·钱伯斯 60—61
- Chicago 芝加哥 ~死亡之城 8—11; ~的社会流行病学 20—23; 参见具体主题
- Chicago Housing Authority(CHA) 芝加哥房屋管理局 60—64, 218; ~的政策有改变 64
- Chicago Sun-Times 《芝加哥太阳时报》 188; 对~热浪报道的内容分析 193—194
- Chicago Transit Authority 芝加哥运输局 165
- Chicago Tribune 《芝加哥论坛报》 188, 210, 213, 217, 278—279; ~和指派故事 207—210; 对~热浪报道的内容分析 193—194; ~和发现灾难 194—201; ~文字编辑和记者之间的距离 277—278; ~读者的碎片化及目标新闻 219—221; ~和事件、图像和新闻地点 217—218
- Chicago's Alternative Policing Strategy(CAPS) 芝加哥替代警务战略 147, 150—151, 153
- Chief Medical Examiner 首席法医鉴定人; 参见 Donoghue
- childless seniors 膝下无儿无女的老人 49

- children 孩子 消防员救助 ~3; ~是热浪受害者 6; 虚脱的~接受紧急救援 4
- church networks 教会关系网 121
- churches 教会 105-106; 非裔美国人 ~105, 265注51; ~的集中 121-124; ~事务和项目 123
- City Hall 市政厅 173, 176, 207; ~与健康危机 154; ~的回应, 热浪危机 154
- City News Bureau wire reports 城市新闻局发来的传真报道 195
- civic organizations 市民组织 146
- Coles, Robert 罗伯特·科尔斯 39-40
- commercial sector, active 活跃的商业部门 ~的影响 118
- Commonwealth Edison 联邦爱迪生公司 4, 185, 227; ~西北总部 3; ~成为谴责对象 31-32, 169, 172, 175-177
- communication problems and failures 沟通问题及失败 32, 133-137, 141-142, 146, 154
- communities, cohesive 凝聚的社区 104-105
- community areas 社区 246注12, 260注14-15; 非裔美国人~ 56, 81-82, 115, 156; 热浪死亡率最高的~ 81-82; 独自居住的老人比例最高的~ 81-82; 贫困线之下人口最高比例的~ 82, 84; 犯罪率最高的~ 55, 82-83; 热浪死亡率最低的~ 126
- community organizing models 社区组织模式 107
- Community Oriented Policing Services 社区导向的警察服务 150
- Community policing 社区警务 ~和小范围巡查 152-153; 犯罪者经常隐藏的社区的~ 152; ~的新系统 149-150; 问题导向的~ 152-153
- community policing programs 社区警务项目 150, 270注37
- consumerism 消费者至上 ~的浮夸之词 157
- Cook, Barbara 芭芭拉·库克 203
- Cook County Medical Examiner 库克县法医鉴定人 8, 29, 138; 参见 Donoghue
- Cook County Medical Examiners Office 库克县法医局 8, 9, 136, 145, 149, 184, 195, 202, 218
- Cook County Morgue 库克县太平间 8, 25, 147-149, 172, 214-216, 237-238
- cooling centers 冷气中心 159, 205, 206, 225-227
- Cooper, Viola 薇奥拉·库珀 54
- corpses 尸体; 参见 dead bodies
- crime 犯罪 62-63; 对非裔美国人的~ 255注28; 对~的处理策略 63, 102-103; 参见 fear; violence
- crime statistics 犯罪统计数据 99, 100, 259-260注9
- criminal justice facilities 看守所 ~和旅店公寓之间流动人数的激增 67
- cultural capital 文化资本 158
- cultural condition 文化条件 48
- "Daley, Aides Try to Deflect Criticism" "戴利, 助手试图扭转热浪批评" 206
- Daley, Richard M. 理查德·M. 戴利 15, 167, 175-178, 181, 182; 责任和

- ~ 154, 167-168; ~ 发起运动 168, 272; ~ 和埃德蒙·多诺霍 26-27, 172-174, 182, 184, 200, 203; ~ 的政策, 140-141; ~ 和媒体 27, 133, 135, 171-174, 205-206; ~ 保证, 使城市免受危机侵害 167-168; ~ 与热浪导致的政治后果 27-28, 166; ~ 的政治损失控制模式 169; ~ 强硬支持, 公共政治 144-145; 参见 Mayor's Office
- Daley administration 戴利当局 168; ~ 的公共关系 166; ~ 的回应, 热浪灾难 26-27, 168-169, 171-179
- dead bodies 尸体 无人认领的 ~ 要安葬 237-241; 储藏 ~ 8-9; 运输 ~ 8-9, 25, 215, 218
- death, "good" "好的死法" 41-42, 250
- death rates 死亡率 ~ 与过量死亡 29
- death toll 死亡总数 6-10, 15, 28, 30, 79, 202-205, 212; 第二次侵袭的热浪的 ~ 226, 228; 参见 Donoghue
- death, heat-related 中暑死亡 1995 年之前 ~ 71; 确立 ~ 标准 26, 28, 30, 202-203; 警察急促之中填写的 ~ 报告 40-42; 阻止 ~ 159-160
- dehydration 虚脱 4
- demographic shift 人口变迁 48
- denial 否认 27, 135, 141-143, 180, 274 注27; ~ 死亡归因 26-27, 136, 172; ~ 的种类 180, 181; 参见 public relations
- Denton, Nancy 南希·登顿 115
- depression 沮丧 49, 76
- disaster news stories 灾难新闻 189
- disaster(s) 灾难 244注5; ~ 公式 230-234; 热浪悲剧与以前的 ~ 10; 状态 ~ 139-144; "技术性"与"自然性"的 ~ 244注5; 参见 extreme events
- distrust 不信任 76-77
- Donoghue 埃德蒙·多诺霍 15, 24-30, 202, 228; 批评 ~ 26-28, 172-174, 200-201; ~ 以前对炎热灾害的知识 26-27; 参见 Medical Examiner
- Douglas, Paul 保罗·道格拉斯 199, 216-217, 229
- drug abuse 成瘾 61-62
- drug trade and drug dealing 毒品交易 63, 98, 100-104, 127
- drug use 吸毒 67-70
- drugs 药物 99, 101; ~ 处方 70
- Drury, John 约翰·德鲁里 185-187
- dying process 死亡过程 248; 理想的 ~ 41-42, 250注5
- educating public about heat risks 教育公众关于炎热的风险 225, 226
- Egdorf, Elaine 伊莱恩·艾格道夫 238-239
- Ehrenhalt, Alan 艾伦·埃伦霍尔特 56-57
- elderly 老年人
- electrical failures 停电 169
- electricity, cost of 电费 160
- emergencies 应急事件 福利国家与 ~ 163-164, 268, 270
- emergency care facilities 应急设施 131
- emergency care system 应急医疗系统 134
-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 应急系统 130
- emergency plans, heat 高温应急计划

- 227, 228; 没有遵循~ 32, 136, 174; 新的~ 174, 205
- emergency response 紧急应对 没有一个地方对热浪采取~135
- Emergency Response and Research Institute 城市应急系统和研究所 129-132, 136
- emergency response programs 城市应急回应项目 133, 225-226
- emergency response system 城市应急回应系统 134-226
- emergency rooms 急救室 6, 226
- emergency services 应急服务 154; 需要~ 130
- emergency warnings, heat 热浪警报 226
- empowerment era 赋权时代 231; ~购买服务 157-159
- energy crisis, everyday 日常能源危机 159-163
- energy subsidies 能源补贴 159-161
- environmental dangers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环境危险因素与环境正义 244注5, 273-274注24
- ethnicity/race 族裔, 种族 245; 热浪导致的~死亡人数 18-19
- ethnoracial composition of residents 居民的族群构成 ~和适应高温 88-89; ~和死亡率 88-89, 126, 127, 245, 246注10; 许多社区的~ 87-90, 126
- ethnoracial groups 族群团体 245; 特殊~的目标新闻读者 220, 234
- Evers, Mandy 曼迪·埃弗斯 156
- extreme events 极端性事件 236; ~的象征性意义 236; ~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挑战 163, 244; 典型事件和~ 23-24, 26-32
- Extreme Weather Operations Plan 极端异常天气应对方案 227
- extremes, everyday urban 日常城市极端 230-234
- families 家人 年长家族成员融入~ 119; ~忽视老年人 175-176
- family ties multigenerational and extended 代际多样化及扩大化的家庭纽带 49-50, 88-89, 118-119
- fear 恐惧 230-231; ~文化 48, 56-60, 255注28; 危险与警告及~ 51, 55, 101-104, 119, 255注28, 256注31; 参见 violence
- federally subsidized housing 联邦政府资助的住宅; 参见 Lakefront
- "Final Report: Mayor's Commission on Extreme Weather Conditions" "最终报告: 市长委员会论极端天气状况" 16-17, 47, 58, 177-179, 182
- Fire Department 消防部门 131, 132, 134-135, 138; ~内部 130-131, 133-134; ~的领导 134; ~的问题与批评 132-138
- firefighters 消防员 ~帮助儿童 3; ~和医护人员紧张的关系 131, 267
- fire hydrants 消防栓 违法打开~ 3, 5, 61, 161, 186, 187
- Flannery Senior Housing building 弗兰纳里老人公寓 60-61
- Freeman, Mrs. 弗里曼夫人 102
- friendships 友谊 ~的性别差异 74-76
- funding 资金



- gangs 帮派 98-99, 103, 121
- Garcia, John 约翰·加西亚 185-186
- Gebner, George 乔治·格巴纳 59
- Geer, Stacy 斯泰西·吉尔 158
- gender differences 性别差异 在死亡率上的~ 19-20, 77; 在孤独感上的~ 74-78
- gender roles 性别角色 74-76, 258注67
- gendered character of dying alone 孤独死去的性别特性 74-75
- gendered condition 性别状况 48
- geography of heat wave vulnerability 热浪脆弱性的地理学特征 81-85, 259注6
- ghettos and ghettoization 贫民区与强迫集中居住 127, 266注68
- Glassner, Barry 巴里·格拉斯纳 59
- government, Chicago city 芝加哥政府 ~明显的特征 142-143; ~的防御措施 144; ~的企业行为 139, 268注18; ~财政紧张 134; ~关于公民的预期 142-143, 232; ~没有意识到侵蚀健康的威胁 141-142; ~机构全职人员 150; ~处理城市问题的基本特性 139; ~分散治理的组织复杂性 145; 反对与赞成~ 139-140, 268注19; ~对贫困和隔离的回避 141; ~的服务缺陷 130, 137-138; ~摆脱危机 180-184; ~的结构条件问题 139-142; 参见各具体主题
- government agencies 政府部门 ~与老龄化社会 143
- "government by publicity" 公众政府 167
- government(s) 政府 ~的市场模式 157-158, 162, 232-233; ~对弱势群体责任 143-144
- Graham, Dorothy 多萝西·格雷厄姆 107-108
- grandparents 祖父母 119
- grants 补助金 155
- Greblow, Bob 鲍勃·格雷布罗 67, 76-77
- Green, Father 格林神父 118, 119, 123
- Groth, Paul 保罗·格罗斯 66
- Habermas, Jürgen 尤尔根·哈贝马斯 167
- Halpern, Robert 罗伯特·哈尔彭 158
- Hansen, Bernard 伯纳德·汉森 176-177
- health and medical services 医疗服务 117; ~对准军事化组织的授权 142, 232
- health care 医疗保障 69
- health-care facilities 医疗服务基础设施 130, 135
- health crises 健康危机 69
- Health Department 卫生局 30, 136, 138, 226
- hearings, investigative 听证会 137
- Heat Command Center 热浪指挥中心 225
- heat emergency warnings 热浪警报 226
- heat wave disaster of 1995 1995年的热浪灾难 ~的余波 237; ~的起因 10-11, 16; ~的历史性展望 236-237; ~的后面的改进和预防措施 163; 在第二次热浪期间 225-228;

- ~的社会剖析 10-11, 15-21, 232, 234-235; ~的幸存者 12-13; ~的象征意义 236-237
- heat wave victims 热浪死难者~的记录 26-27; 参见具体主题
- heat waves 热浪 ~期间的灾难 17, 28-29; 未来 229; ~是自然灾害 175; 以前的~ 26-27, 71; 中暑 9, 135; ~的致命因素 70
- Hoch, Charles 查尔斯·霍克 67
- Hochschild, Arlie 阿莉·霍克希尔德 249-250
- home 家庭 在~中无助或死亡的 77; 保护~ 59, 63, 101-102, 119-120, 255-256注30, 264注47; 在~中社会和空间压力的存在 59, 63, 98, 119-120, 264注48
- Homewood Memorial Cemetery 霍姆伍德纪念公墓 238-241
- hospitalization 住院治疗 5
- hospitals 医院 131, 138; ~实施关闭状态 6, 131
- hotel environments 旅店环境 ~的恶化 66-68; ~的问题 70-71
- hotel owners 旅店所有者 66
- hotel residences/buildings 旅店住房/住宅 65-67; ~的死亡率 64, 65; ~状况不佳 68-71; ~出售 66
- hotline 热线 225
- housing, public/government-subsidized 公共的/政府补助的住房 73, 229; 参见 CHA
- housing advocates 旅店住户支持者 66
- housing projects 住房工程 156, 157
- humidity 湿度 211
- Illinois state senate 伊利诺伊州参议院 137
- illness 疾病 67, 80, 163; 中暑~ 5, 9, 226
- independence 独立 ~的神话和理想化 59
- institutions 制度 不相信~ 76, 77
- intimacy 亲密关系 ~与性别 74-76
- investigative hearings 听证会 137
- isolated seniors 孤独的老人 取得~信任 156; ~的需要 156
- isolation 孤独 24, 251-252注7-8, 253注14; ~的定义和概念 44, 250-251注7, 252注11; ~的性别 74-78; 研究~的方法论 22; ~的社会生产 47-48; ~的趋势 253-254注18; ~的类型 22
- Jacobs, Jane 简·雅各布斯 47-48
- James, Father 詹姆斯神父 123
- Jankowitz, Pauline 保利娜·扬科威茨 50-54
- Jewish community 犹太社区 92
- Jones, Sarah 萨拉·琼斯 96-98
- journalistic mediation 新闻媒体 184, 191
- journalistic organizations 媒体组织 ~的新闻塑造 192; ~的转化 233
- journalists 记者 ~的争论经历 199-201; ~致力于刻画灾难报道的符号性 191; ~异议的观点 205-207; ~快速思考 210-212; ~的责任和角色 190-191; ~的亚文化 197, 276-277注23; ~的训练 197
- Keigher, Sharon 沙伦·基夫尔 54

- Kern, Gerould 杰罗尔德·克恩 210, 222, 224
- Kiernan, Louise 路易丝·基尔南 209, 211-213, 224
- Kinzie Street Bridge 金齐街道桥 2
- Kruk, Frank 弗兰克·克鲁克 120
- Laczko, Joseph 约瑟夫·拉奇克 14-15
- Lakefront 雷克弗兰特 71-73
- Latino churches 拉丁裔教会 ~的集中化 122-124
- Latino families 拉丁裔家庭 119
- “Latino health paradox” 拉丁裔人的健康悖论 19
- Latino seniors 拉丁裔老人 ~的隔离 124; ~的社会支持网 124
- Latinos 拉丁裔人 220; ~适应高温 88, 89; ~向小村迁移 110; ~向北朗代尔迁移 110
- Leavy, Jacqueline 杰奎琳·利维 166
- Ledwell, Joseph 约瑟夫·里德威尔 238-240
- Lester, Marilyn 玛丽琳·莱斯特 189-190
- Liebow, Elliot 埃利奥特·列葆 76
- Lipinski, Ann Marie 安·马里·利平斯基 222
- Little Brothers Friends of the Elderly 老年小兄弟会 51-52
- Little Village (South Lawndale) 小村 (南朗代尔) ~人山人海的街道 116-121; ~集中化的教会 121-124; ~的特点 87; ~发展成为居住的密集地 115-116; ~是发展中的小村 109-116; ~的历史 112-113, 115-116; ~人口 115; ~得到免受孤独危险的保护 110; ~是自我容纳社区 117-118; ~的社会环境 90; ~的暴力犯罪率 109, 120; 参见具体主题
- living alone 独自生活 24, 252-253 注 12, 254 注 20; ~和存在 43-46; 研究 ~的书籍 39-40, 43; ~的定义 43-44
- Low Income Home Energy Assistance Program (LIHEAP) 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项目 159-161
- Lowry, William 威廉·劳里 289
- Lyne, Sheila 希拉·莱恩 135-136, 138, 169, 171
- Maratto, Joseph 约瑟夫·马拉托 146
- market-model managerial strategy 市场模型管理战略 159
- marketing 市场交易 158, 214, 233
- marketing programs 市场营销计划 政府越来越多运用 ~ 233
- Mary, Sister 玛丽修女 102-103
- Massey, Douglas 道格拉斯·马西 115, 231
- mayoral campaign of 1979 1979 年市长竞选 165-166
- Mayor's Commission on Extreme Weather Conditions 市长委员会论极端天气状况 16-17, 47, 58, 177-179, 182
- Mayor's Office 市长办公室 31, 140, 141, 177-179, 184; 参见 Daley
- media 媒体 ~竞争 199; 印刷 ~ 192-193
- media coverage of heat wave 媒体报

- 道热浪 ~与城市公共关系活动 184
- media management skills 媒体管理技术 183
- media scrutiny 媒体审查 139
- Medical Examiner 法医鉴定人 8, 29, 138
- Medical Examiners Office 法医局 8, 9, 136, 145, 149, 184, 195, 202, 218
- medical response system 医疗卫生回应系统 ~的问题 137-138
- medical treatment of heat-related illness 与中暑有关的病的急救 135
- men, African-American 黑人男性 76
- men, elderly 老年男性 ~的依赖, 儿童 75; ~相对老年女性 74-75, 230; ~独自生活 253注14, 258注67
- mentally ill people 精神病人 49, 66, 67, 69-70
- Merrill Court 梅里尔社区 249-250
- Metro Seniors in Action 都市老人在行动 145-147, 206
- Mexican-American seniors 墨西哥裔老人 89
- Mexican-Americans 墨西哥裔美国人 115
- Michael, Father 迈克尔牧师 103
- Midwestern Regional Climate Center 中西部地区气象中心 227, 228
- migration 移民 50, 92-93, 95, 110
- Molotch, Harvey 哈维·莫罗奇 189-190
- Morales, Father 莫拉莱斯神父 118, 122, 123
- morgue 太平间 8, 25, 147-149, 172, 214-216, 237-238
- mortality, annual 年平均死亡率 17
- mutual aid boxed alarm system 联合援助预警系统 132, 133
- National Public Radio 全美公共广播 187-188
-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NWS) 美国国家气象局 136-137
- natur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the world 自然的解释世界的基本框架 175
- neighbors 邻居 ~作为照料者 144; ~对年长者的忽视 175
- “network society” 网络社会 232
- news 新闻 对~的内容分析 190-194; ~与灾难 189-190; 娱乐~ 191; ~的官方来源和记者报道惯例 201-205; 目标~, 读者碎片化 218-221, 233-234; 参见 media
- “News As Purposive Behavior” 作为有目的的行为的新闻 189-190
- news conferences 新闻发布会 27, 169, 171, 174, 175
- news delivery systems 新闻传送体系 233
- news editors 新闻编辑 192, 199-200, 207-208, 277
- news headlines and visual images 新闻头条和可见的图像 213-217
- news organizations/institutions 新闻组织/机构 199, 215; ~在城市象征性政治中的角色 233
- news placement 新闻地点 事件、图像和~ 217-218
- news reports 新闻报道 133, 136, 200
- newspapers 报纸 192-193; 公司接管 ~ 233

- newsrooms 新闻采编室 184
- newsworthiness of disaster 灾难事件的新闻价值 221-224
- North Avenue Beach 北大街沙滩 2
- North Lawndale 北朗代尔 ~是被遗弃的社区 91-99;~的特点 87,97-98;~经济崩溃 93-98;~与小村的生态基础不同 110;~迁移进入和迁移出去 95;~人口 93;~的社会纽带 104-105;~的耻辱 110;~的暴力 98-103
- nursing homes 医护室 226
- Ogden Avenue 奥格登大道 97
- Old and On Their Own* 《老龄化和自立》 39-40
- Orozco, Raymond 雷蒙德·奥罗斯科 171
- Ortiz, Margaret 玛格丽特·奥蒂茨 6
- outreach workers 扩大服务人员 225-226
- overcrowding 拥挤 91
- Papajohn, George 乔治·帕帕约翰 194-197,208
- paramedics 护理人员 129-132;缺少~ 130-131;~和消防员的紧张关系 131,267
- phone bank 电话机构 225
- photographs 照片 219-220
- police 警察 99,147,218;~与社区警官职责 151-152;~与保护老人 153;社会保护与社区服务 146-147,149-153;~和老人的纽带 151
- Police Department 警察局 ~与热浪死亡率 149;~与新的服务需求 153;~改革 140;老人与~社区警官的关系 146,147
- police officer training, problems with 警官培训的问题 151-152
- policy recommendations 政治文件 137-138
- political action, strategic symbolic 策略性的符号化的政治行动 167
- political will 政治决心 关于基本资源的提供的~ 142;关于服务传递的~ 153-157
- poor elderly 贫穷的老人 ~拖欠债务的后果 159;~受到低水平的服务 155;参见 poverty
- poor neighborhoods 贫穷的邻居 157,262
- population density, high 高人口密度 ~的影响 118;~与拥挤 91
- Porter, Greg 格雷格·波特 72-73
- poverty 贫困 58, 141, 231, 232, 261注18;政府回避~ 141,229,232;~的社会环境差异 90-91;参见 poor elderly
- poverty level 贫困水平 ~与区域 82,84
- power failures/outages 停电/中断 3,47,161,169,170,177
- power generators 发电机 4,227
- press release 记者招待会 130
- preventing deaths in future heat waves 在未来的热浪中预防死亡 79,163,225-226,229
- preventive health and safety work 预防性卫生与安全工作 147
- private sector 私人部门 公众服务交给~ 155-156,271注43

- public administrators 公共事务管理者 74; ~的社会距离, 与应该服务的弱势群体 233; 参见 government
- public relations 公共关系 ~与好的政府 167; ~的治理 143, 183, 233
- public relations campaign 公共关系竞争 在热浪灾难期间 ~183-184; ~提升芝加哥市 166
- publicity 公共性 ~治理 167; 有意做出的 ~ 167
- race 种族 245
- racism 种族主义 115-116
- Raica, Robert 罗伯特·瑞卡 137
- Ranger, Lorraine 洛兰·兰杰 69-70
- Recktenwald, Bill 比尔·拉克唐瓦尔德 221-224
- reforms 改革 140
- rejection 反对 76
- relationships 关系 ~的性别差异 74-76
-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宗教组织 106, 122; 参见 churches
- research methodology 研究方法论 22, 45, 79-81, 260-261注13-16; ~配对 86-90
- residential stability 居住的稳定性 ~与流失 108
- resources 资源 提供基本的 ~142
- responsibility 责任 154; 拒绝 ~ 31, 180, 181; ~的分担 31, 175-176; 个人、家庭和社区的 ~ 144-146, 175-176, 205
- Richards, Cindy 辛迪·理查兹 144
- Richards, Eugene 尤金·理查兹 57-58
- risk 威胁 ~与保护的来源 125; 覆盖处于 ~中的人群 79
- risk factors 风险因素 80, 128, 143; 中暑的 ~ 70
- risks, heat 中暑风险 ~的教育 225, 226
- Rollinson, Paul 保罗·罗林森 76, 253
- Rush, Bobby 博比·拉什 154
- Salvation Army 救世军 72
- Scates, Robert 罗伯特·斯凯茨 131-136
- Schreuder, Cindy 辛迪·史克鲁德 198-199, 201, 217
- Sears, Roebuck, and Co. 西尔斯洛巴克公司 92-94
- "secret city of people who live and die alone" "人们自生自灭的神秘城市" 37
- Secter, Bob 鲍勃·塞克特 56
- Section 8 housing 第八区住房 72
- segregation 隔离 82, 115-116, 127, 248注31
- self-sufficiency, idealization of 自主的理想化 59
- Semenza, Jan 简·西门扎 79-80, 203-204
- Sen, Amartya 阿马蒂亚·森 244-245 注5
- Senior Citizen Police Unit 老人公民小组 146, 153
- Senior Citizens Services Division 老年城市居民服务部门 151
- seniors 老年人 254; ~作为公共服务的消费者 142-143, 232; ~作为热浪的遇难者 18, 19; ~参加组织和社区

- 159; ~ 得到保护免受隔离的危险  
110; 极具代表性 156, 158-159, 211-213, 222; ~ 与没有得到满足的责任与期望 59-60
- service programs 服务计划 竞争的~  
155; ~ 缺乏有效的系统加以协调和监督 142
- service providers 服务提供者 72
- service systems, entrepreneurial 企业性的服务体系 ~ 与孤寡老人 158-159
- service workers, city 城市服务工作者  
~ 的挑战 155; ~ 与孤寡老人 157; ~ 的操作实践 156
- silencing 使其沉默 180, 181, 183
- single room occupancy dwelling (SRO) 一居公寓住户 ~ 的弱点 65; ~ 的警戒信号 70-74; ~ 的环境 68; ~ 的危机 38, 64-70, 257注46; ~ 的中暑死亡 64-65, 71
- Skogan, Wesley 韦斯利·斯科甘 95
- Slayton, Robert 罗伯特·斯莱顿 67
- sleeping outdoors 睡在屋外 56, 57
- Smith, Don 唐·史密斯 154
- Smoyer, Karen 卡伦·斯莫尔 259
- social autopsy of heat wave disaster 热浪灾难的社会剖析 10-11, 15-21, 232, 234-235
- social capital 社会资本 158, 230
- social cohesion and support 社会凝聚与支持 72-73, 104; 邻里的~ 107, 261注19; 参见 block clubs, churches
- social conditions 社会状况 灾难揭示的~ 244
- social contacts 社会交往 80
- social ecological features 社会生态特征 ~ 与高温死亡率 125, 127
- social ecology 社会生态 231; 社区的~  
90-91
- social environment 社会环境 72
- social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s risk factors 社会环境条件作为风险因素 80
- social epidemiology 社会流行病学 芝加哥的~ 20-23
- social fault lines 社会系列失误 ~ 在生物学上的反应 11
- social framework 社会基本框架 解释世界的~ 175
- social morphological conditions 社会形态状况 90
- social morphology 社会形态学 ~ 与中暑死亡率 125
- social networks 社会关系网 124, 159, 263 注35; ~ 的分解或者松动 108
- social protection 社会保护 政治方式的~ 232-233
- social protection system 社会保护系统 184; 极端事件对~ 的挑战 163, 244 注5
- social separation 社会隔离 231, 232
- social workers 社会工作者 为老年人的~ 156-157
- spatial concentration 空间集中化 增长的~ 231
- spatial distribution 空间分布 死亡率的~ 81-85, 259 注6
- spatial transformation 空间转换 48
- Starks, Robert 罗伯特·斯塔克斯 154
- Staten, Clark 克拉克·史丹顿 129-130, 134
- Steele, John 约翰·斯蒂尔 154



- Steinberg, Ted 特德·斯坦伯格 161
- Stewart, Ernie 厄尼·斯图尔特 102
- stigma 耻辱 27, 59-60, 76, 110, 156
- street life 街道生活 ~是人际关系网的一个重要纽带 116-117
- “streetcorner world” of men 街道角落的男人 76
- substance use 麻醉品使用; 参见 drug use
- support services 支持系统 ~与准军事化组织 71, 159
- suspiciousness 怀疑 76-77
- Taub, Richard 理查德·陶布 263 注 38
- television 电视 59, 215, 275 注 1
- transportation 运输 226; 接近 80, 225
- trauma centers 外科中心 131
- Twenty-sixth Street (*Calle Mexico*) 第26街 110-112
- urban heat island effect 城市热岛效应 16
- urban renewal and development programs 城市更新和发展计划 66
- urban research, Chicago school of 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研究 22
- utilities costs, heat-related 中暑的成本效用 159, 206
- Vaughan, Kevin 凯文·沃恩 237
- violence 暴力 日常生活的~ 97-103; 孤独与~ 54-55
- violent crime 暴力犯罪 127, 256, 259-260 注9; ~对老年人的威胁 51, 101
- violent crime rates 暴力犯罪率 55, 82-83; 区域的~ 10, 11, 88; 小村的~ 109, 120
- vulnerability 脆弱性 248 注 31; ~的修辞与赋权和消费者至上的语言 157; 参见 risk factors
- vulnerable residents 脆弱的居民 80
- water bills 水费 居民没有能力支付~ 162-163
- Water Department 城市供水部 161, 162, 187
- water pressure 水压 3, 5, 61, 161, 162
- water pumps 水泵 161
- water shortages 水资源的缺乏 161
- “water wars” “关于水的战争” 5, 161
- website 网站 226
- Weingarten, Paul 保罗·温加滕 207-208
- welfare states and extreme events 福利国家和极端事件 163-164, 268 注 19, 270 注 28
- Western Electric Company 西部电力公司 92-94
- Whitman, Steve 史蒂夫·惠特曼 28-29, 203
- Whitney, Cynthia 辛西娅·惠特尼 30
- Wilhelm, John 约翰·威廉 138, 171
- Winter, Mrs. 温特夫人 102
- Zhao, Dingxin 赵鼎新 262 注 26
- Zielinski, Graeme 格雷姆·杰林斯基 201, 211-213, 223

## 译者后记

杜克大学社会学系(现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的周雪光教授在2006年第4期的《社会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书评:“芝加哥‘热浪’的社会学启迪——《热浪:芝加哥灾难的社会解剖》读后感”,对美国年轻的社会学家埃里克·克里纳伯格的新作做了介绍和评述。此书获得2003年派克奖(Robert E. Park Award)和城市事务协会2003年城市事务最佳图书奖(Best Book in Urban Affairs Award of the Urban Affairs Association)。我感到,尽管这本书是从社会学专业的博士论文改编过来的,除社会学、人类学、医学外,实际上还涉及相关学科和领域,如公共管理、政治学、公共政策、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危机管理。而且,该书采取案例方法的理论分析,因此越发增加了我的兴趣。

我理了一下思路,《热浪》一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吸引力:

一是命题。克里纳伯格所研究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问题是,怎样的社会环境才能足够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芝加哥人在热浪中孤独地死去?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在意识到悲剧发生以后,仍然有那么多芝加哥人相继孤独地死去,他们与社会的纽带或联系真的非常少吗?

从芝加哥的热浪入手,探讨了人类永恒的一个话题,那就是人应该如何有尊严地活着和死去?儿童、青年人是一种活法和死法,老年人是另外一种活法和死法。对前者,学术界关注较多,而对后者,则研究较少。“关于城市居民的孤独,尤其是老年人和穷人的孤独现象,当今的学者几乎没有人对它进行研究,更没有人去研究这种现象的本质。”(第32页)克里纳伯格正是从700多个死难者身上,发现了老人余生的孤

独。这种现象的出现,反映了一个族群的历史轨迹,也是一种人生观的具体展示。追求个人权利的人,不仅在年轻的时候如此,而且在老年时也不改本性。解决人与人之间孤独的方法有许多,如果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常用的词就是“综合运用”。小区中,要有安全的居住环境,少一些毒品交易和其他犯罪行为;邻里关系有较多的交流和帮助,而不会出现老人死去多日,仍未被及时发现的现象;社区教堂和其他的社会组织也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解决老人所遇到的生活困难;政府采取相应的措施,增加适合老人使用的冷气中心,增添警力,鼓励民众加强交流。因此,克里纳伯格从热浪死难者身上,逐渐把视角转向社区、邻里、网络、政府机构和媒体。展示各个部分如何发挥作用的过程,就成为《热浪》一书的思考过程。

二是方法。克里纳伯格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生,有较深厚的实证研究的基础,特别是选取热浪作为个案,有其独特的慧眼神功。

一般而言,选择个案的好坏,有两个很重要的指标可以加以考察:

第一个是可控性。如果研究者对研究的对象不加以“适当”控制的话,研究可能无法深入,缺少针对性,会流于泛化。(1)时间控制。热浪时间为一周,只要收集这一周的材料,就可以了解整体状况,投入的精力会比较小。(2)人数控制。热浪死难者达 739 人,加上医院、消防队员、社区、教堂、社会组织、法医鉴定人、记者等人员,人数就不少了,如果作者要对这些人员都加以访谈,难度仍然很大,所以,作者巧妙地选择了相关的医院、消防队员、法医鉴定人和记者,特别选取了两个社区北朗代尔(North Lawndale)和小村(Little Village),这就降低了访谈范围过大的难度。(3)地点控制。在美国,人员死亡的灾难不仅出现在芝加哥,也出现在 1994 年加利福尼亚诺斯里奇(Northridge)地震和 1992 年佛罗里达的飓风中。如果把灾难加以整体研究,可能会泛泛而谈,变量之间缺乏逻辑性和有机联系,选择芝加哥这个城市,就轻而易举地把讨论的话题限定在相对较小的范围内,便于深入地分析。

第二个是扩散性。从南朗代尔到北朗代尔,从热浪的一周到整个芝加哥的政府再造运动,反映出作者不仅把自身的讨论限定在热浪这个话题上,而且以热浪作为一个聚焦点,触及家庭传统、邻里关系、产业结构、个人主义传统、犯罪活动、城市基础设施、政府管理、非政府组织(如黑人政治赋权力量、大都市老人在行动)、警民关系等方面,使探讨的问题辐射到整个芝加哥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

三是理论。研究活动不能凭空产生,有较强的传承关系,这项研究也是如此。芝加哥学派有一重要的研究途径,就是对城市的研究。克里纳伯格承袭了这一传统,包括案例研究、强调物理与社会空间、关注社区与公共生活、调查族群差异等,但他不囿于此,而是把重点放在城市作为一个整体社会系统这方面,这恰恰是芝加哥学派问题意识的核心。整体社会系统的研究,特别强调了政府管理、媒体传播的地位和作用。

四是材料。平常我们所见不成功的个案研究的材料收集,往往是第二手材料,包括报纸杂志媒体的报道内容,这样的材料在使用时,就会有很大的局限,因为媒体报道的重点与研究者的重点以及对材料的取舍有较大的不同,使用媒体报道的材料,有致命的缺陷。而克里纳伯格选定这一研究题材后,进行了16个月的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五年的研究活动。而且田野调查的“大部分时间我与那些孤独的、贫穷的以及没什么社会关系的人待在一起。”(第32页)到法医局查找档案,到墓地去参加活动等,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他在整个田野考察的过程中,访谈了40多位老人,对老人孤独和隐居现象有了较深刻的认识,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对两个相邻社区进行调查时,花了差不多半年的日常观察(1998年7月—1999年2月),做了40多次访谈,访谈对象包括当地居民、商人、政府官员、宗教领袖、社区组织者、警察等。只有与研究对象做成朋友,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才能了解“真实”的生活。

五是责任心。通过整本书,我们始终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作者有强

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学者的崇高使命感。通过访谈与参与观察,考察社会的基本运行,探求事实背后的真相,这不仅是要把它写成一篇博士论文,而且还要有一种勇气,排除主观或客观的干扰,提出不同的对事物的判断,显示出对生命的尊重,尤其是对像老人这一类弱势人群的关注,呼唤着对人的同情与关爱,重组人际网络。

2007年年初,我向杜克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生冯秋石发信,请他替我在美国购买此书。秋石很快把书寄给了我。恰好,2007年9月,我在北京师范大学07级硕士研究生中开设《现代公共组织理论》课程,就布置了一个作业,把《热浪》的英文版翻译成中文。通过同学们几个月的辛勤努力,中文版初稿完成了,不过有些粗糙,我在学期最后一次课程中对《热浪》这本书和周雪光的读后感做了点评。因此,对中文版最初做出贡献的,应该是07级的硕士生们。

2008年年初,我联系商务印书馆准备翻译此书。2008年12月,商务印书馆李霞编辑来信,已经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完成版权转让事宜,可以着手翻译。我一时陷入了两难选择:因为,此时我正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忙着收集课题资料和访谈,而翻译这件事耗时较多,牵涉的精力不少,但翻译出版时间又急,不能拖到访问结束之后。怎么办呢?思虑再三,还是先把翻译这事做起来,其他课题的资料收集和访问,放慢节奏,见缝插针,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在此期间,我除在哈佛大学进行访问外,还顺访了杜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锡拉丘兹大学、塔夫茨大学、波士顿大学等,包括做报告、旁听课程、参加会议、会见学者等活动。秋石在我到访杜克大学时做了周密的安排,使我度过了紧张而愉快的十天行程,一直心存谢意。

2009年4月20日,在纽约,《热浪》的作者、纽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克里纳伯格热情接待了我,介绍该书出版后的最新进展,并对我们完成中文版的翻译表示感谢,我提出由他写一个中文版序言时,克里纳伯格教授二话没说,愉快地答应了,并说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写信。为了理解有关词句的确切含义,我多次发信,克里纳伯格教授很快做了解

答。

尽管我对全书做了通读和翻译,但隐约感到,有关社会学、人类学、医学、地理学的翻译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寻找另外的合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副教授孙龙博士在教学科研任务极繁重的情况下,承担了核校翻译的工作,使整个书稿锦上添花,孙龙对事对人一样认真,在目前的学界极为难得。秋石为本书做了一部分的校译,并提出了非常宝贵的建议。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赵旭东教授、博士生辛允星提供过不少帮助。由于涉及芝加哥的一些地名,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江华恰好在芝加哥大学访问,他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

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指导的硕士研究生王彦玮帮助翻译注解和参考书目,根据以下书籍做了人名、地名的校译:(1)新华通讯社译名室主编:《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修订版上下),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年版。(2)周定国主编:《世界地名翻译大辞典》,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8年版。(3)中国地名委员会编:《美国地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4)新华通讯社译名室编:《英语姓名译名手册》(第四版),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博士生赵挺、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的研究生郝君超,对注解、参考书目、索引做了统一的格式整理。

在纽约时,克里纳伯格告诉我,根据《热浪》这本书改编的话剧在2008年2月21—4月6日演出,票价17—25元。我甚感欣慰,因为,在美国有这么多人把历史作为一个教训,也作为一个经验,这对以后人们过上幸福的好生活,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增强人与人的信任,提升组织的凝聚力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也就是说,人们没有“健忘”历史,也不应该“健忘”历史。

由于翻译校对期间,做着其他的事务,时间偏紧,再加上对本书理解得不深透,翻译出现的不当和错误,请贤者指正。

承接此书时,我在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从教,现交稿出版时,已调到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主持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

研究中心。尽管时空有些变化,但个案研究方法和第三部门的研究,仍是我关注的重点所在,本书的翻译,如能对研究生选题和提高学位论文质量有帮助,对国内学术界个案研究方法有一些启迪,逐渐形成与国际接轨的学术规范和拥有学术创新理念的话,乃是对我等辛苦劳作的一种慰藉,足矣!

是为序。

徐家良

2011年4月18日草,7月31日修改

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新建楼 2010 明月室



1995年7月，美国芝加哥市遭遇了历史记录上的最高气温，这场热浪导致了七百余人的非正常死亡。作者对这一事件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孤独地死去？进一步的相关问题是，人应该如何有尊严地活着和死去？

作者通过对城市家庭传统、邻里关系、公共政策、新闻报道等社会环境因素的剖析，探讨了造成灾害的社会因素。这一深入并富有解释力的社会剖析，使此个案研究具有典范性的指导意义。

<http://www.cp.com>

ISBN 978-7-100-091



9 787100 091855 >

定价：48.00 元

[General Information]

SS号=13458848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致谢  
序言 地狱之城  
导论 极端的城市  
社会剖析  
城市的社会流行病学  
典型性与极端性  
本书概述  
第一章 独自死亡：孤独的社会生产  
独自生活  
孤独的社会生产  
独自变老  
“我差点就死了”  
暴力和孤独  
恐惧文化  
最坏的组合  
一居公寓危机  
警戒信号  
孤独的性别差异  
第二章 种族、空间与脆弱性：都市邻里和支持生态  
配对  
贫困的社会环境差异  
一个被遗弃的社区  
转折点  
日常生活的暴力  
“这里所有人都得谨慎”  
邻里瓦解中的社会纽带  
教堂和街区俱乐部  
南朗代尔：成长中的小村  
“这里的街道总是人山人海”  
集中化的教会组织  
第三章 灾难中的政府：赋权时代的城市服务  
灾难中的政府  
面对热浪：责任政治  
组织性的匹配错误：社会保护与社区警察  
有害的忽视：容忍剥夺的政治意愿  
赋权时代为服务买单  
日常能源危机  
福利国家和极端事件  
第四章 公共关系治理  
否认、推卸和辩护

摆脱危机

第五章 引人注目的城市：灾难中的新闻机构和发言人

新闻和灾难

新闻是什么

发现灾难

谁的新闻？官方来源和记者报道惯例

不同的声音和有异议的地方

指派故事

快速思考

头条和可视图像

事件、图像和新闻地点

读者的碎片化及目标新闻

灾难事件的新闻价值：新闻事件的发生与终止

结论 城市环境中的新危险

灾难公式：城市极端条件日常化的典型危险

社会解剖分析

后记 永远在一起

注释

参考书目

索引

译者后记

封底